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标志着人类认识和揭示自然奥秘的飞跃和深化。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冲击下，在当代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崛起了一大批崭新的学科、思潮和观点，以期解决世界向

会主义，就必然要放眼世界，引进和借鉴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就是立足中国，立足当代，精选当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的具[illegible]性的有重大影响[illegible]思潮、新观点

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HISTORY

Mouton Publishers, 1978

根据莫顿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杨 豫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34,000

1987 年 2 月第 1 版 198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0 册

书号：11188·54 定价：2.65 元

K06
11

译者的话

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的历史学卷。作者系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巴勒克拉夫学贯古今，除了史学史，对西方上古史、中古史、近现代史、当代史和国际关系史也有极深的造诣，先后执教于英国圣约翰学院、剑桥大学、利物浦大学、伦敦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布琅德斯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曾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他一生多著述，主要著作有《公证员与罗马天主教廷》(1934年)、《罗马天主教廷圣职委任制》(1935年)、《中世纪的德意志》(1938年)、《近代德国探源》(1946年)、《中世纪的欧洲》(1950年)、《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国早期社会生活》(1960年)、《欧洲思想和行动的统一》(1963年)、《当代史导论》(1964年)、《历史与百姓》(1967年)、《中世纪的东欧和西欧》(1970年)，他还是《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1956—1958年和1958—1960年各卷的作者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册》(1978年)的主编。

1976年，他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

北京圖書館藏
B 427957

责本书的起草，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I·S·科恩和哈佛大学教授K·O·戴克的协助下，历时两年，完成本书，经过集体讨论后定稿，用英文和法文同时出版。本中译本按英文版译出，同时参照了法文版。

全书共分七章，对战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叶以来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趋势作了系统、全面、详细的阐述和分析。前三章概括了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传统历史学面临的挑战、历史主义的兴衰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对西方、苏联和第三世界各国历史研究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起点、途径和主要特征以及当代主要新史学流派的兴起作了精辟的分析；介绍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结合、渗透和交叉的必然性和产生的成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学新分支和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并对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优缺点，特别是对计量史学的功用和局限性进行了评价。在后四章中，作者着重阐述史前史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历史学的重大发展以及“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消亡。巴勒克拉夫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国别史、地区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从中得出结论说，目前“真正

的世界史"尚未诞生，开展历史的比较研究，尤为必要。对于各国档案馆、文史馆、博物馆、大学、研究所和科学院在历史学研究新方向和新趋势的冲击下，在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引进后发生的组织变化及其积极作用，作者在充分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弊端，并呼吁要高度重视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的重要作用。总之，当前历史学发展趋势中虽存在有待克服的问题，但前途是乐观的。

本书不是按时间先后和国别逐个地罗列各个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著作并加以评价，而是以当代历史学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贯穿全书。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一些国际学术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的国家委员会提供了各国历史研究发展和现状的专门报告。作者还参考了近二十年出版的史学著作数百种，读者从中足以窥见当代历史学研究的全貌。

由于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资料详实，取材广博，评价公允客观，本书被欧美各大学列为史学史的必读参考书，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肯定也会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译者在翻译时得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系主

任H·T·狄金森教授的支持和帮助。狄金森教授还特为中译本写了序言。译者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中译本在译校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教授王觉非先生和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先生的具体关心和帮助，特此鸣谢。当然，译文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应由译者本人负责。

杨　豫

1986年9月

于南京大学

序言

近三十年来，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都有巨大的进展。这意味着当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了解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代历史学家。但是，比历史知识的巨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近年来，历史学应当研究哪些方面，采用哪些方法，如何对过去作出解释，以及历史研究工作如何组织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教授对当前历史研究的主要趋势所作的阐述，全面介绍了这些深刻的变化，他的这部著作应当作为每个严肃认真的历史工作者的必读书。

巴勒克拉夫教授的这部重要著作共分七章。在第一章，他探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研究的主要变化。他说明了历史学在这个时期是如何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性更强的学科，并且论述了历史学家如何扩大了历史学的范围以及如何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这一章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追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世界各国历史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历史学家的影响。巴勒克拉夫教授指出，到五十年代，任何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反马克思主

义者）都不可能否认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且必须正视这场挑战。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二章解释了五十年代以来历史学家们对新的历史理论和新方法论的探索。他阐明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研究如何受到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越来越大的影响。他高度评价了法国年鉴学派等学者，是他们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历史研究更为科学化。这一系列的发展要求历史学家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其中主要是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结果，加强了特别是对社会结构的研究。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三章充分而详细地研讨了这些新方法，特别是更为详细地追溯了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他阐述了历史学家如何越来越注重于对追求科学严谨性这一理想的需要。这导致历史学家的研究重点从特殊转向一般，从表面事件转向内在环境，从叙事式转向分析式。为了研究事件在其中出现和历史人物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典型的、基本的结构框架，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家借用了“模式”。在历史学家所采用的新技术中，最重要的往往是以数量巨大、只可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的量化分析。五十年代以来，量度和量化技术实际上涉及到了历史探索的每个部门。

在第四章，巴勒克拉夫教授阐述了五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学家不仅采用了新的方法去研究过去，而且对以往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表示关注。他论述了亚非历史学家以及欧美历史学家对非欧洲世界研究的兴趣的急剧增长。五十年代以来，日本、中国

和印度等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特别迅速的进展。这些国家新史学的基本特征同西方史学一样，都是优先研究社会和经济问题。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五章着重阐述了现代历史学家近来获得的日益增长的知识如何置于一种体系中才可能使这些知识变得有意义，从而使历史研究得以进行。这引导着历史学家从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向对区域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和比较史学抱有更大的兴趣。这还鼓励历史学家去探索人类在社会中进化的完整理论。巴勒克拉夫教授相信，马克思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学家当中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解释历史的理论。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六章扼要地叙述了当今世界上历史研究工作是如何进行组织的。他证明了，近几十年来训练有素的、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他们从事的那一类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倾向也在不断地加强。他说明了历史学家所掌握的越来越多的知识如何使他们比过去更加依赖有成效地组织起来的档案馆；还说明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现在如何由大量的历史学刊物给予发表；他们的研究活动如何在数量越来越多的历史系、科学院和研究所里组织起来。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七章，也就是结论中考察了七十年代末历史研究的状况。虽然他看到了一些有待克服的问题，并且认为科学的历史学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他坚信科学的历史学正在一往无前地迈进，陈旧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态度正在退却。巴勒克拉夫教授对于科学的历史学的胜利也许过于乐观了（同时，由于他过多地强调了计量史学，从而忽视了文化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忽视了民众精神的历史），但是毫

无疑问，这部著作仍然是介绍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新型历史学研究发展的一部最优秀的著作，也是一部最基本的著作。对于希望了解历史学这门学科近几十年来的变化的每个严肃认真的历史工作者来说，巴勒克拉夫证明自己是一位胜任的专家和导师。他极为公允地评价了这些变化：他赞扬了这些重大的变化，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有必要对有些历史学家为什么会抵制这些变化的原因作出解释。

哈里·狄金森
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

前言

为了不致引起误解，有必要着重指出本书的目的不是全面叙述当前所有国家和所有地区的历史学著作，而是讨论当代历史学研究中显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趋势。大量的历史著作——也许占全部成果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完全是因袭常规的，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也无意图）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正因为这个理由，有些著作尽管非常出色，这里也不作专门论述。其次，我关心的重点不是专门史领域（例如科学史、法制史等），尽管其中的某些方面近年来进展卓著，而是对一切地区和国家的所有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影响的总趋势。当然，本书写作的总设计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抱那样的期望显然是愚不可及的，更不用说在本书写作中对有关主题的组织结构和选择了。我对自己知识方面的严重不足无论如何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尽管这样，我仍然准备就全球范围的历史学研究状况作一番讨论，因为我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如果说我在本书的写作中避免了错误的话，那是因为许多个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

委员会为本书提供了各种报告和意见。这里特别要提到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芬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等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提供和提交的报告和资料以及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和国际历史学委员会协同汇编的许多个人的论著和评论，这些材料都使本书得益匪浅。我想在这个适当的场合特意向为我提供报告和文件的各国鸣谢。然而，由于我受惠之多，我无法在这里向所有的人逐一表达我的谢意。不过，其中许多个人和团体是我必须特别致谢的。首先，我应当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总编辑雅克·哈维先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如果不是他给予有时陷于困境中的我以不倦的帮助和鼓励，几乎可以肯定，本书是难以完成的。其次，我要感谢两位起草人：I·S·科恩（列宁格勒大学）和K·O·戴克（哈佛大学）。我对他们三人的感激之情，远不是寥寥数语足以表达的。此外，我应当向苏联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和基础科学图书馆的F·A·费多罗娃博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她给予的帮助超过了我有权期望的程度。我还应当感谢彼得·哈纳克博士（布达佩斯大学）、萨蒂什·昌德拉教授（新德里大学）和萨多诺·卡托迪尔德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印度尼西亚国家委员会协调人），他们起草的报告和分析，在我看来，起了非同一般的启发作用。最后，我应当向J·德昂特教授（根特大学）、N·A·埃罗费也夫教授（莫斯科大学）、J·R·T·休斯教授（美国西北大学）、亨利-伊雷内·马鲁教授（巴黎大学）、查尔斯·莫拉泽教授（巴黎大学）、让·多梅松先生（巴黎大学）、博伊德·C·谢弗教授（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大学）致以热忱的谢意。同时，我还要衷心感谢墨西哥驻

巴黎大使西尔维奥·萨瓦拉先生，承蒙他读过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坦率和中肯的意见。我还应当向我过去的学生马克·奥洛弗斯基(布琅德斯大学)表示我个人的谢意。他同我进行过多次生动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然，本书的写作以及其中的错误和疏漏之处完全由我本人负责。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但是，还不止于此，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合格的历史学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伤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决不是历史。

——扬·赫伊津加："历史概念的定义"

目次

1 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事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历史学的观念及其职能，历史学家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显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此，本书所叙述的历史学研究的当前趋势自然主要是关于1945年以来的发展过程。1939年以前，大多数历史学家毫无疑虑地遵循着老一辈历史学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为他们确立的指导方针。1945年以后，他们开始对战前那种研究方式感到不满，而且逐渐明朗化。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学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从两方面对我们的历史观念发生影响。其最明显的后果是历史学家工作的外在环境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如果把1945年前后的形势——或者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把1900年和1950年的形势——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将马上发现在四个方面发生了重大的明显变化。首先，现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不再可能象过去那样对其他地区不发生影响，二十世纪的历史名副其实是全世界的历史。其次，科学和技术不可遏制地进展，在所有地区都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和知识模式。再其次，欧洲的重要地位已经下降。欧洲

从海外收缩，美国和苏联的优势上升，亚洲和非洲正在崛起。最后是自由主义体系的解体。一种在十九世纪还闻所未闻的与自由主义体系全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兴起了。二十世纪初，自由民主秩序似乎正在顺利地发展，然而，共产主义制度——1939年以前仅限于苏联——到1960年，已经扩大到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居住的地区。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在非洲，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这两种制度相互结盟，却不完全相同。

面对着这样一些根本变化，新一代历史学家当然不能不重新审查他们继承下来的历史观念，这毫不足怪。由此产生的失意和幻灭感甚至早在1945年以前就有所表露。英国牛津大学钦定教授莫里斯·波威克爵士颇带权威性和十分动情地提到了“压迫着思想丰富的历史学研究的那种不安和不适”。①当然，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才持有这样的立场。比他还早一代的特勒尔奇和卡尔·豪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对历史主义的“危机”进行过详尽的讨论。②但是，这种不安的直接影响涉及范围十分有限。旧世界的稳定性明显地在恢复，甚至1929年以后的大萧条也未能使历史学家对他们继承的传统所抱的信念有所动摇。相反，使他们的自信心开始崩溃的却是1939年到1945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欧洲的犹太人被灭绝，纳粹在东欧的兽行，使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流离

① M·波威克：“五十年以后”，载英国《历史》杂志，第29卷(1944年)。

② E·特勒尔奇：《历史主义及其问题》(E. Troeltsch,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蒂宾根，1932年版。K·豪西：《历史主义的危机》(K. Heussi, 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蒂宾根，1932年版。参见G·G·伊格斯：《德国的历史观念》(G.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米德尔顿，1968年版，尤见第7章。

失所，被迫作大规模的新的民族大迁徙，最后还有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大屠杀。所有这一切都使稍有良知的人不能再以旧的满足心理去看待历史进程了。艾赛亚·伯林爵士写道："当有人对我们说：去判断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成吉思汗或希特勒——在这份名单上，他还应当公正地添上克伦威尔的名字——的屠杀是愚蠢的；当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历史学家使用的范畴是中性的，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叙述。对此，我们作出的回答只能是：赞同这这些说法便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而且错误地表达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① 对于导致这种方向的历史观念，人们再也无法接受了，对历史思想的基础及其基本观点重新加以考虑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这些就是我们评论历史学研究当前趋势的种种努力所依据的背景。当前，历史学研究的重大发展，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产生于上述的这个或那个因素。另一方面，历史学新方法的探索目前仍处于试验性阶段，无论在自由主义阵营还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保守的历史学家还在发起自卫战，反对修正他们的任何研究方式。他们的论证有时还颇具说服力。对保守势力的抵制力量不应低估。如果作一番全面调查的话，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大多数的职业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研究的当前趋势即使不抱公然的敌视态度，至少也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正如特雷弗-罗珀教授所说的，在老一辈历史学家和"现代派"之间横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各自站在这条

① I·伯林：«历史的必然性»(I.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伦敦，1954年版，第76—77页。

鸿沟的两侧，“以互不理解，甚至相互鄙视的态度注视着对方”。[①] 结果，历史学深深地陷入了关于“人文科学危机”的经常讨论中。今天，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这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带有当代形势的特征，把有关人类的各个方面的研究与扩大人类经验范围和带有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烙印的文化生活新领域联系起来。[②]

在诸如此类的叙述中，如果我们对于目前史学界正在进行着的有关观点和解释的争论中偏袒任何一方，那将是极其错误的。这里无疑还存在第三种立场——但愿我能持这样的立场，那就是马克·布洛赫在他的那本名闻遐迩的著作《为历史辩护》中教给我们的那种立场。但是，我的目标有限得多，那就是对那些往往对立的不同思想流派的功绩不加以评判，而直接说明 1945 年以后对历史学研究发生影响的那些新动力是怎样起作用的，特别是用现有的资料指出似乎可能取得更广泛影响的那些趋势。未来如何，谁也无法预言。目前看来颇有前途的某些发展趋势，也许经过进一步的检验就会证明是缺乏生命力或昙花一现的。然而，新趋势已经赢得了充分的时间表现自己的特征，有些还显然站稳了脚跟，甚至为那些顽固坚持旧方法的人所接受。例如英国历史学家基特森·克拉克对计量方法等现代研究技术远不是虚与委蛇、抱敷衍态度的。他承认“在可以称为‘历史的’东西和可以称为‘科学的’东西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将日

---

① 见 1956 年 2 月 29 日《星期日泰晤士报》。

② 参见“导言”和“历史学家的困境”，载 J·H·普卢姆编：《人文科学的危机》(J. H. Plumb ed.,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伦敦，1964 年版，第 9，24—44 页。

益深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①传统研究方法的有力的卫道士埃尔顿虽然反对"将社会科学带入英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习惯中去"的趋势，但他同时又非常清楚地知道，社会学教会了历史学家如何提出"新问题"。至于对在共产主义世界之外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历史主义，他也毫不犹豫地说它已经被取代。"因为历史学研究本身的进步对许多有把握的结论产生了怀疑。"②

很清楚，目前史学界的争论，无论我们对它抱什么样的观点，都已经产生了两个重大后果。第一，几乎可以肯定，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已经出现，那就是历史学臻于成熟了。人们再也不能认为对历史学家的全部要求仅仅是常识的实际应用。第二，当历史学研究蹈常袭故的时候，对传统思想的挑战却使它重新焕发生机。经过一段稳定时期——有人甚至说经过一段严峻的时期——以后，历史学再次活跃起来。新的动力，新的趋势和新的见识正在将历史学推向新的方向。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不可能对各个国家的所有历史学家作出的努力进行详细和全面的讨论，我们的叙述只限于历史研究总的发展趋势。尽管这样，如果本书的叙述能够为各个地区的历史学家评价各自特殊的发展规划提供背景的话，那么，这样的讨论就能够为实际目的服务。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去解决历史学遇到的问题和处理历史资料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认识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环境的差异。新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

---

① G·基特森·克拉克：《批判的历史学家》(G. K. Clark, The Critical Historian)，伦敦，1967年版，第21，193页。

② G·R·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G. 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悉尼，1967年版，第23—24页。

是对世界上处于各种不同政治气候下的所有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不仅今天的历史学家作出的回答不同于他们的先辈，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同。他们看到，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已经改变，他们再也不能满足于三十年前或五十年前的那些陈规了。

1.1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

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只有放在十九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更加宽阔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时，才可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趋势是历史学家对1945年以前占优势的那种历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动，至少对于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来说是如此。对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支配历史学家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怀疑的趋势，是当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征，对于历史研究未来的发展也许同样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在方法论和理论观点方面仍然严重地依赖十九世纪末的老一辈历史学家，从而保持着连续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回溯到德国的兰克和魏茨，法国的米歇莱、菲士泰尔·德·库朗热和索雷尔，以及英国的斯塔布士和加德纳，而在俄国，可以回溯到克鲁切夫斯基及其学生、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的波克罗夫斯基。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对于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影响很小。因此，历史学界的重大争论是在以孔德和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罗伊森、里克特以及温德尔班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之间展开。这场争论于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在英国重新

爆发，那就是J·B·布里和G·M·特里维廉之间生动而最终毫无结果的那场争论。[1]这些争论不过是旧式情调的回光返照而已，并且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经大体上达成了明确的妥协。在理论上，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唯心主义的立场，将历史学与科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强调直觉(Erlebnis)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但在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却以实证主义为依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发现"新事实"，一是"通过历史的批判"来消除谬误。按照当时开始大批出版的历史学工作指导手册的说法，这种不自在的结合由以下方法解决了，即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中，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

历史研究工作指导手册的问世把业已形成的批判式研究原则固定下来，而且实质上毫无变化地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历史研究状况的一个典型特征，标志着历史学的解放，也标志着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诞生。在这类指导手册中，以1898年出版的朗格卢瓦和塞纽博斯的指导手册最负盛名，影响也最大。[2]历史研究按职业方式组织起来了。随着历史研究专业化的不断增强，研究技术不仅应当列为大学的正式课程，而且应当作为衡量职业水平的标准，这也许是无可非议的。

新形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1874年米什莱去世后的十年中形成的新批判史学努力积累已经获得的研究成果，并将把这些成果当作现有知识的基础传给下一代历史学家。这一学派的最早和最优秀的著作当推1893—1901年出版的由拉

维斯和朗博主编的《通史》。然而，这个时期历史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当推《剑桥近代史》。这套多卷本的巨著是阿克顿勋爵计划的。虽然它的第一卷在1902年问世时，阿克顿勋爵已经溘然长逝，但它意义重大，这不仅因为它被认为是国际通力合作的事业，而且还因为受过德国式教育并有日耳曼人血统的阿克顿才具备弥合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差距的特殊资格，因为它把德国和西欧的历史思想和实践的成果融为一体。《剑桥近代史》的写作主旨是企图把十九世纪已经取得的进展确立下来；同时，按照阿克顿自己的说法也是“为来到的世纪指明方向，制定规划。”③

阿克顿几乎无保留地接受了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④与

---

① 关于布里-特里维廉辩论的总结和主要文章见C·H·威廉斯：《现代历史学家》(C. H. Williams, The Modern Historian)，伦敦，1938年版。参见G·M·特里维廉：《历史女神——克莱奥及其他论文集》(G. M. Trevelyan, Clio, A Muse, and Other Essays)，伦敦，1913年版。

② C·V·朗格卢瓦和C·塞纽博斯：《历史研究导论》(C. V. Langlois and C. Seignobos, 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1898年版。在本书之前，德国出版过E·贝恩海姆的《历史方法论手册》(E.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最近一些著作有L·阿尔本：《历史学导论》(L. Halphen,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巴黎，1948年版；H·纳布霍尔兹：《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研究导论》(H. Nabholz,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mittelalterlichen und der neueren Geschichte)，苏黎世，1948年版和L·E·阿尔金：《历史批判入门》(L. E. Halkin, Initiation à la critique historique)，巴黎，1951年版。只需对照这些著作就可以知道它们与十九世纪末出版的书在内容上并没有多大差别。

③ 《剑桥近代史写作的起源，撰写人以及写作经过》(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ts Or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剑桥，1907年版，第22页。

④ L·科昌：《阿克顿论历史学》(L. Kochan, Acton on History)，伦敦，1954年版，第1章；参见F·R·斯特恩编：《历史的多样性》(F. R.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版，第246页。

此同时，他也无疑地认为历史学是“向前进的科学”。“终极的”历史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因为欧洲档案的开放，“全部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在阿克顿看来，“批判的可靠性”是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有了这样的素质，对滑铁卢战役的叙述便能够同时让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看了都觉得满意，他毫不怀疑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举他自己的例子）。《剑桥近代史》的撰写人得到告诫，说他们的任务既不是描述自己那个国家和宗教的历史，也不是自己的党派的历史，他们的唯一目标是“积累准确的知识”。这些话表达了阿克顿历史哲学的主旨。在他看来，历史是“经验所揭示的记录或事实”。历史学的目的是“非常实际的”。他把历史学看作“创造未来的行动和力量的工具”。① 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他那一代的看法。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批判这种对待历史学的坚定然而却过分简单化的信念，当然是极其容易的，却也是不公允和缺乏远见的。我们决不应当忘记，在当时，历史学的批判技术还是那么新颖，（正象阿克顿的经历所证明的）对愚昧主义的斗争才刚刚赢得胜利，学者们能够获得档案资料的时间还是那么短。“准确知识的积累”并非阿克顿时代的产物，但是，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知识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增长。从历史著作的纯数量来看，二十世纪初是大幅度增长的时期，低估那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将是大错特错。只是在第二代历史学家——指生

① 关于阿克顿的观点，参见他的“致《剑桥近代史》撰稿人函”和“论历史研究——就职演讲”，载《近代史讲座》(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伦敦，1906 年版。

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些历史学家——中，在1919年至1939年的这一时期的前半阶段而不是后半阶段中怀疑才开始产生。不过，这种怀疑与其说是产生于哲学的探索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发生变化的世界形势——虽然这些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还不如说是来自于历史学研究成果本身的发展速度和性质。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叙述一下削弱——如果不是完全摧毁的话——历史学信念的主要因素，对历史学抱有坚定的信念是二十世纪初十分明显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历史学界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对自己的工作方向产生了与日俱增的怀疑。第二代历史学家在阿克顿的继承者、剑桥大学教授J·B·布里的鼓励下，相信"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① 他们埋头于深奥的探索，穷究细枝末节。他们深信，不管他们的工作多么专门化，都会自动地产生实际成果。在他们的工作中注入了高水平的渊博学识以及艰苦的努力和勤奋，对此谁也不会抱有丝毫的怀疑。但问题在于得失是否相当，因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往往经过了数量极大而且难以综合处理的资料积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满情绪开始增长，这种类型的历史研究开始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而且只不过是"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② 此外，在这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多著作中还包含了对老一辈历史学家工作的批判、否定或修正。这些工作本身也许

---

① H·W·V·坦佩利编：《布里论文选》(J. B. Bury, Selected Essays, ed. by H. W. V. Temperley)，剑桥，1930年版，第17页。

② F·M·波威克：《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学研究》(F. M. Powicke, Modern Historian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伦敦，1955年版，第192页。

是有价值的，但却与阿克顿所主张的那种积累可靠的真实知识的观点相抵触。相反，它表明历史研究象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尽在原地打圈圈。这必然导致对阿克顿的"终极历史学"理想的怀疑。历史知识增长所带来的结果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历史研究的状况相反，不但没有为历史研究起廓清推动作用，反而使历史学复杂化，更纠缠不清。这些历史学家似乎记住了布里教导的一方面，却丢掉了另一方面，那就是他所告诫的：除非我们能够"确定它们与整个现实体系的本质联系，事实的集合或事实的罗列在理论上毫无意义"。①

阿克顿对"向前进的"历史学所抱有的信念之所以渐渐削弱，除了上述这些实际原因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其中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1914年以后，历史学家纷纷转变为主战派，都从本民族传统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很难设想，这样一个史学界怎么会是无偏见地追求"客观"真理的国际性学者团体呢？陶特曾认为："自从我们开始一步步地回溯了若干个世纪的历史以来，现在已经走到解决问题的半道。"② 这种令人欢欣的自信在战后凡尔赛和约和特里亚农条约中就象被戳破了的气球一样消失了。这样的信心面对的是东欧各国民族之间难以弄清的混杂状态。然而，更重要的基本事实是：那种依靠分工来调和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观点的试图注定要失败。德国历史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很快就被发现它不仅限于历史学家工作的后一个阶段，将唯心主义的批判应用于处理历史资料，并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必

---

① J·B·布里：前引书(1903年)，第47页。

② T·F·陶特："中世纪史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载《历史》杂志，第8卷(1923年)，第6页。

然会给历史学家所自诩的所谓实事求是和客观性以致命的打击。菲士泰尔·德·库朗热曾经写道："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但是，狄尔泰的主张打击了兰克所说的，并为阿克顿所赞同的关于历史学家在理解历史时有可能"排除自我"的信念，就象里克特就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在逻辑和方法论上的差别所作的批判分析打击了布里的著名宣言"历史学是科学，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一样。狄尔泰坚持说，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任何理解都必然地受到自己心理的影响。"历史事实"经过验证表明根本不是什么"事实"，而是一系列被认可的判断。历史中真正存在着真实性，这是老一辈历史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但现在显然变成了一个未曾解决的——而且在另一些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认识论问题。①

我们接着要讨论的另一个因素是历史学领域的扩大。一方面，考古学和人类学等新兴科学将历史学家的眼光向前推移了若干个世纪，迫使他们扩大视野，增广视角。另一方面，对探索"事实"的那些旧方法是否合适所抱的怀疑态度日益增强使历史学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兰克时代到阿克顿时代，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这一点极少怀疑，因为国家是历史演变中的主角。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叙述国家演变的事实。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份，政治史的重要地位开始动摇。实际上，政府的行为难道不正是对更深一层的经济潜流的反应或反映吗？不考虑经济力量的冲突，无视经济体系形态的模式，难道能够理解历史

① 参见F·R·斯特恩：前引书(1956年)，第20—21，25—26页。

进程吗？还有一个推动力来自德国的历史主义。正象西梅尔和狄尔泰所论证的那样，历史学家必须用先验主义的方法去认识“事实”。这一点如果是确信无疑的话，历史学家要理解过去的唯一希望仅在于在自己的头脑中将它“复活”，那么，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局限在政治事件中不可呢？譬如说，巴尔扎克的小说不也是象布满灰尘的档案一样充分地展示了法国复辟时期的社会状况吗？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相对于关心原始的历史事实或纯粹的过去的事实，历史学家难道不是更加关心人们的生活所依据的思想，尤其是政治家们活动所依据的思想背景吗？德国的弗里德里希·迈纳克是这个强大的思想史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影响立即扩展到英国和美国。

依照这种方式，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但结果却增加了历史学的复杂性。对“实际”成果所抱的殷切期望曾经鼓舞着阿克顿那一代历史学家，这时却被推到了遥遥无期的未来。事实上，那个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否认历史学有任何“实际”用途，相反声称自己的任务是“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英国历史学家T·F·陶特在1920年曾写道：“我们研究过去并不是为了归纳实际的政治教训，而是为了寻找过去真正发生过什么事情。”① 这是对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含蓄批评，同时也表达了同一时代历史学家的共同信念。

只要比较一下1902—1912年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和1957年开始陆续出版的《新编剑桥近代史》，历史学在二十世

① T·F·陶特：《英国中世纪行政史篇章》(T. F. Tout, Chapters in the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第1卷，曼彻斯特，1920年版，第7页。

纪上半叶走过的历程——至少在西欧——便一目了然。最明显的是，阿克顿的信心和目的感经过五十年的激烈动荡后几乎全部化为乌有。《新编剑桥近代史》的主编所撰写的导言，其基本精神已经同过去截然相反。在涉及历史学家的工作这一核心问题时，这位主编操着一副无可奈何的不可知论的腔调。而在涉及"历史学家的目的"这个中心问题时，这位主编又是用一套缺乏哲理的老生常谈来表达的。① 阿克顿信仰的"终极历史学"被当作空想抛弃了。乔治·克拉克爵士指出：

"晚一代历史学家并不憧憬这样的远景。他们希望别人一次次地超过自己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关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脑子，即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才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不可能包含不可变更的基本元素或与人无关的原子。……探索似乎是无止境的，一些缺乏耐心的学者躲避到怀疑论里去，或者至少用下列原理来作为遁辞：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它们彼此都是一样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②

假使可以把《新编剑桥近代史》当作历史写作和研究主流的典范来看待，那么它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历史学在

① 参见《新编剑桥近代史》，第1卷，剑桥，1957年版，导言，第28—29页。

② 同上，第24—25页。

二十世纪中叶已经跨入亚历山大的“白银时代”，可信、有责任感、多产——或许生产过剩——但缺乏目的感和方向感，仅仅在为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这个转变是巧妙的学究式的转变，而不是有勇气的反思。它抱有的希望充其量不过是“简单地说明现在知道了什么，从各种立场来检验这些知识，并且将这些知识同其他知识联系起来”。这也许可以当作令人赞许的目标，但很难说是挑战。到1957年，历史学被当作一门工艺学，而不是科学，并且把五十年代划定为历史学家能力的最高极限。① 结果，历史学陷入了专业性质的狭隘的技术问题中去了，这些问题只有其他专业历史学家才感兴趣。有些批评家把二十世纪上半叶说成“大多数历史学家迷惘的时代”；② 这样的批评被指责为过甚其词，但很难说完全是无的放矢。它至少值得人们从反面去思考。正如英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在1964年所说的，在一个这样引人注目的成长时期的终结，历史学家自己“对这门学科的怀疑和不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广泛了。③

1.2 历史主义的危机

在试图解释1900年至1950年间历史学家的态度所以发生显著变化的原因时，我们已经发现其中最突出的因素之

① F·M·波威克：前引书，第202页。

② 基思·托马斯：“工具与活计”，载1966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历史学的新道路》，第275页。

③ A·J·泰勒：《成长时期的历史学》(A. J. Taylor, History in an Age of Growth)，里兹，1964年版，第5—6页。

一是在于德国的历史主义思想学派的影响。人们往往说，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总是对哲学论证抱怀疑态度。他们在工作之前并不事先就自己工作的哲学前提作一番讨论。然而，哲学从前门被赶了出去又总是从窗口飞了回来。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狄尔泰和克罗齐的观点和著作赢得了广大读者时，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甚至对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普通历史学家也发生了愈益增强的影响。这些人一直对哲学毫无兴趣、声称自己的工作纯属经验范围，并且不知假设为何物。

当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历史主义并不是唯一的历史思想流派。1917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立即取得统治地位，而且如前所述，在苏联以外的地区也是一股日益增强的力量。在法国和比利时，旧的实证主义传统一直非常强大，抵消了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即使在德国，兰普雷希特和更晚一些时候的埃卡特·克尔也在试图拼命摆脱历史主义的观点，但他们对当时极为盛行的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十分微小。① 德国的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影响一直很大，但实用主义的反应有利于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建立的比较特殊的社会学方法运用于历史学。② 这种同样的观点在法国为亨利·贝尔及其历史综合杂志社的同事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

① 关于兰普雷希特的著名争论，参见 T·席德尔："反映在《历史杂志》中的德国历史科学"，载席德尔编：《〈历史杂志〉一百周年，1859—1959 年》(即该杂志专号，第189卷)。

关于克尔拒绝历史主义，参见韦勒为克尔的论文集《国内政治》(柏林，1965年版)写的序言。

② 参见 J·赫布斯特：《美国学术界中的德国历史学派》(J. Herbst,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in American Scholarship)，伊萨卡，1965 年版。C·斯特劳特：《美国历史学中实用主义的反叛》(C. Strout, The Pragmatic Revolt in American History)，纽黑文，1958 年版。

贝尔反对德国历史主义所强调的独特性和个别性。他认为历史学更应当是进行社会比较研究的当然的协作点。① 贝尔试图改变历史学方向的努力和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创的法国史学的新倾向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②

所有这些背离历史主义的新趋势对于未来都十分重要。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们没有能够抵消历史主义的影响(只有苏联例外)。虽然布洛赫在1939年和1940年出版的关于论封建社会的著作体现了他对“结构”分析的新关注，但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生真正的影响，而那时的状况和态度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然，历史主义也不是单一的、连贯的理论，德国的历史主义和以贝尼德托·克罗齐为代表的意大利历史主义之间就有明显的区别。③尽管如此，历史主义的影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广为扩散。柯林伍德在英国先着一鞭；甚至在实证主义的故乡法国，历史主义也通过雷蒙·阿隆和亨利·马鲁等作家的影响取得迅速进展。④ 1898

---

① 参见H·贝尔：«历史综合»(H. Berr, La Synthèse en histoire)，巴黎，1911年版。H·贝尔：«传统历史学与历史综合» (H. Berr, L'Histoire traditionelle et la synthèse historique)，巴黎，1935年版。H·贝尔："1900年以前我前进道路上的诸阶段"，载«综合杂志»，第67卷(1950年)。

② 参见J·格伦尼松："当代法国史学"，载«1949—1965年的法国历史研究»(La recherche historique en France de 1949 à 1965)，1965年版，序言，第11—16页。

③ 参见C·安托尼：«从历史主义到社会学»(C. Antoni, Dallo Storicimo alla sociologia)，佛罗伦萨，1940年版；P·罗西：«当代哲学中的历史和历史主义»(P. Rossi, Storia et storicismo nella filosofia contemporanea)，米兰，1960年版。

④ R·G·柯林伍德：«历史观念»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伦敦，1946年版；R·阿隆：«历史哲学导论»(R. Aron,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巴黎，1938年版；H·马鲁：«历史学的复兴»(H. Marrou, 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巴黎，1954年版。

年以来，德国唯心主义在西班牙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狄尔泰的观点有助于奥尔特加和阿梅里戈·卡斯特罗等历史学家思想的形成，并且通过西班牙的历史主义蔓延到拉丁美洲。①

我们这里不准备讨论历史主义的本质及其长期的历史和演变，也不准备讨论它的不容否认的名实相符的成就。② 历史主义在它的鼎盛时期曾经无可非议地而且健康地反抗了实证主义著作中夸大了的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倾向，这是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否认的。③ 我们这里要着重讨论的只是历史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影响，而且一致公认，这种影响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德国历史主义者正确地揭示了粗糙的经验主义方法论的不足，而这种方法论却在朗格卢瓦和塞纽博斯的《导论》之类的手册中冒充为"历史的科学"。E·H·卡尔曾经说过，这类形式上的批判及其要达到的准确性只是"责任，而非效能"，只是历史学家工作的"必要前提"，而"非本质职能"，正象诸如地质学家或岩石学家的本质职能一样。④ 而它的取胜之时恰恰正是真正的问题开始之

---

① 参见J·奥尔特加和加塞特：《吉罗姆·狄尔泰与人生观》(J. Ortega y Gasset, Guillermo Dilthey y la idea de la vida) 和《历史学体系》(Historia como sistma)，均载《全集》(Obras completas)，第4卷，马德里，1958年版。

② 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三部最新著作是：I·S·科恩：《二十世纪的历史哲学》(I. S. Kon,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ts)，两卷本，柏林，1966年版；M·C·布兰茨：《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M. C. Brands, Historisme als Ideologie)，阿森，1965年版；G·G·伊格斯：前引书(1968年)。

③ 参见I·S·科恩：《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历史简编》(I. S. Kon, Der Positivismus in der Soziologie. Geschichtlicher Abriss)，柏林，1968年版。

④ E·H·卡尔：《历史是什么?》(E. H. Carr, What is History?)，伦敦，1961年版，第5页。

时。西梅尔和狄尔泰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引起了人们对它们的重视。据说，"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客观地认识过去只能靠学者的主观经验才可能获得。"[①]西梅尔和狄尔泰以及他们的继承者特勒尔奇和迈纳克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无力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如果说早期的德国历史学派之所以摆脱了相对主义是因为他们对超越历史认识之外的但可以理解的形而上学的实在抱有坚定信念的话，那么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种信念已经基本消失。正是狄尔泰公开声明他的目的是为历史学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正是他对"科学的历史学"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并且抬高直觉作用的地位，才决定性地削弱了西方史学的基础。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辛辣的讽刺。这当然不是狄尔泰的目标，然而他和里克特·西梅尔一道进行的猛烈批判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历史主义观点的核心在于区别自然和精神，特别是区别所谓自然的世界(die Welt als Natur)和所谓历史的世界(die Welt als Geschichte)，即区别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世界和历史学所研究的世界。据称，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是不变性和永恒的反复，是为了发现一般原则，而历史学所关心的却是独特的、精神的和变化的领域。一个是"研究普遍规律"，另一个是"研究个别事实"，这个根本差别决定各自要求不同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抽象和分类方法不适用于历史学研究，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曾经活着的个人和集团，他们的独特个性只有用历史学家的直觉来理解才可能捕捉。

于是，历史主义提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历史的

---

① 参见F·R·斯特恩：前引书(1956年)，第25页。

世界是靠人的理解——即用狄尔泰所主张的方法——来直觉地认识呢，还是象康德研究物质世界时所主张的那样，必须事先假定自在之物的实在性是绝对不可认识的呢？再进一步考虑到历史学家本身也牵涉在历史中而不可能客观地袖手旁观，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不过，我们这里暂且不讨论历史主义涉及到的哲学问题，这里只讨论历史主义对历史学家的日常工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而这些后果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历史主义由于否认系统研究方法可以应用于历史学，并且特别强调直觉的作用，这样就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尽管在理论上也许未必如此。① 第二，历史主义用特殊性和个别性鼓励了片面的观点，而不去进行概括或试图发现存在于过去之中的共同因素。第三，历史主义意味着陷入更加繁琐的细节——若非如此，历史学家怎么能够抓住各种个别的形态和状态呢？第四，历史主义把历史学引向"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或导致如近来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所表达的——那种观点②：历史学家的唯一目的是"认识和理解人类过去的经历"。最后，历史主义赞同历史学的要素是叙述事件并把事件联系起来，结果必然纠缠于因果关系，或陷入马克·布洛赫所说的那种"起源偶像"崇拜。③

---

① 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反对将历史主义指责为"相对主义的历史思想"（见H·赫茨费尔德为《边纳克全集》第五卷写的导言，第16页）。但是，我认为他们的论证缺乏说服力，而且无论其理论立场如何，毕竟很难否认在大多数场合下相对主义是历史主义所造成的实际后果。

② H·G·伍德：《历史中的自由和必然》(H. G. Wood, Freedom and Necessity in History)，伦敦，1957年版，第15页。

③ M·布洛赫：《为历史辩护》(M.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巴黎，1949年版，第5页。

历史主义核心中的基本矛盾——也是它思想上不适应的根据——就在于它竭力想把对充实的宇宙的观念置于历史相对论的基础上。① 这是方枘圆凿，因此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尤其是特勒尔奇，他实际上明知其中的难处，却又找不到解决的方法，结果产生了伦理学和哲学上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声称一切价值观念和一切认识皆决定于产生它们的历史环境而造成的必然结果。历史主义学派坚持历史学所研究的是人类全部活动的独特性，从而葬送了历史学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有关人性的问题，或人类的历史意识或方向上作出真正贡献的可能性。相反，历史主义造就了一大批为关心历史而关心历史的"写历史的历史学家"。拿马克·布洛赫的话来说，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的本质"本身就是对可能性的否定"。②

今天，人们在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历程时，都不会否认历史主义由于排除人类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历史研究的正当对象而给历史学的学术水平带来的严重危害。崇拜特殊性而造成了历史学的单一性，崇尚"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割断了历史学与生活的联系，否认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概括的可能性并且强调事件的独特性，不仅割断了历史学与科学的联系，也割断了历史学与哲学的联系。有个批评者写道："我们越是探求特殊性当中有无穷无尽的意义，特殊性当中的一切就越是显得毫无意义。"③ 当然，过去有而且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迫切需要叙述得十分精彩和生动的历史著作，历

---

① 以下见G·G·伊格斯：前引书(1968年)，第13，270，285—286页。

② M·布洛赫：前引书(1949年)，前言，第15—16页。

③ P·列昂："历史的恐怖"，载《听众》，第54卷(1955年)。

史学家的以人物传记、叙事史以及描写战争和政治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大量著作主要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但是，巴克尔在一个世纪以前站在更高的水平上对历史学家所作的批评依然是正确的。他写道："在其他所有的重要研究领域中，概括的必要性已得到普遍的承认。"然而，一种"怪诞的念头"在历史学家中流行，那就是"他们的任务仅仅是把各种事件联系起来"，而这些事件是他们经过"伦理和政治的思索"才"偶然活化的"。[①] 巴克尔总结道：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历史学依然"可悲地缺乏""人类一切思想的更崇高的目标"。

缺乏崇高的目标还不是历史主义思想取得胜利的唯一后果。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后果是它否认客观实在。历史主义认为——用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历史"只有通过在作者的个性中反映过去才是"真实的"。[②] 历史主义造成这样的结果：一切事物都要根据时间、地点、背景和环境的相对关系来进行叙述、判断和评价。因此，历史学家"不可能认为某个人的本质比另一个人更坏"。[③] 迈纳克据此可以为"国家唯我主义表面的不道德行为"辩护。他的理由是，"从存在物最内在的个别特征中产生的一切都不可能是不道德的"。[④] 据说历史学家的职责纯粹是发现政治家——无论拿破仑还是希特勒——的行为是如何"受到历史限制的"。[⑤] 从这个观点出发

① H·T·巴克尔：《文明史》(H. T.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第1卷，1857年新版，第3—5页。

② D·奥格：《赫贝尔·费什尔》(D. Ogg, Herbert Fisher)，伦敦，1947年版，第176页。

③ H·巴特菲尔德：《历史与人际关系》(H.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纽约，1951年版，第108页。

④ F·迈纳克：《公民世界与民族国家》(F. Meinecke,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慕尼黑，1922年第6版，第92页。

⑤ H·巴特菲尔德：前引书(1951年)，第70页。

马上可以推导出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历史学家是“教授和撰写”适合于自己“组织的那类历史”。但是，“如果那类历史同时又是最宜于维护现存制度的历史”，那么他们“对此几乎无话可说了。”①

这种态度显然意味着不相信客观的历史学，而且似乎把客观的历史学看作仅仅是编写得比较巧妙的神话，把这类历史写出来是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现存秩序。否则，按照历史主义学派的观点，历史的目的本质上就是为了个人或个别。“它通过教授关于人类的行为，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环境和条件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从而扩大个人的经验范围。”②历史学开拓了我们的思路，引导我们去看待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的成就，扩大我们的视角，因此有助于我们察觉自己世界观的局限性。总之，它迫使我们“避免狭隘性”。③ 历史研究也表明事物总是比它的表面来得复杂些，从而告诫我们避免进行简单化的判断。最后，历史学还为个人提供观察力和更高级的智慧，帮助他去发现自己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的价值。④ 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经长期考察历史的多样性后总结道：“如果历史真有训导价值的话，

① H·巴特菲尔德：《英国人及其历史》(H. Butterfield, 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剑桥，1944年版，第1页。

② G·R·埃尔顿：前引书(1967年)，第48页。

③ H·R·特雷弗-罗珀：《过去与现在。历史学与社会学》(H. R. Trevor-Roper,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and Sociology)，伦敦，1969年版，第5页。

④ 参见G·里特尔："对现代历史学中的主要成就和重要问题的思考"，载《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第6卷(1955年)，第330页："对于今天或明天来说并不聪明，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机智的。"

那就是它将人类的能力教给了人类。"①

这些教训无疑都是有益的，但是这些教训的取得是否足以偿付上个世纪以来投入历史研究的那么多经费和才智呢？这是另一个问题。一切科学，从物理学到心理学，都是"将人类的能力教给人类"，但这些科学也具有更为积极的内容。有人对我们说："历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的真正价值在于提供训练和建立标准。"② 但在这一方面，历史学同样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而且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其他科学——例如物理学和数学——不但提供了严谨得多的训练，而且建立了准确得多的衡量科学准确性的标准。因此，这里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这就是历史学家必须提供的一切？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历史学在哪些方面有别于其他的科学探索呢？

这样的思考最后必将陷于失败和破灭，那是毫不足怪的。早在 1939 年以前，这些思考就已经开始成为瓦解自满自足的因素，这尤其表现在法国历史学家中。兰克有关发现什么是真实的存在(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的教诲已成为囊括历史智慧的全部语言。但是，过去"象事实一样"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东西，当历史学家认为他已抓住了它飞动的衣裾时，它已冲出了历史学家的所及范围，那么它又有何价值呢？

尽管如此，直到 1939 年也只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准备抛弃他们继承下来的那些观点。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十年中，历史主义原理基本上未遇到挑战，这并不会令人

① M·萨维尔："历史学家的进步"，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27卷（1958年），第25页。

② G·R·埃尔顿：前引书(1967年)，第49页。

感到惊奇。保持和恢复连续性的愿望以及从 1939 年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的愿望都是十分自然的反应。连续性的线索在西德被猛然扯断了，但格哈德·里特尔这样一些战后尚存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费尽心机，想把它重新接上。① 然而，新一代历史学家到 1955 年已经成熟，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要同过去决裂，至少也是愿意探索新方法和新研究线索的。战争使历史主义的符咒失灵。它在德国本身甚至“摧毁了历史主义所由产生的制度”，并导致对历史主义观点的批判性考察。② 但是总的说来，历史主义还没有被当作过时的东西和破烂货为人们拒绝和抛弃。1954年，“新唯心主义历史学的最后一位大师”③弗里德里希·迈纳克的逝世——虽然他在晚年突然表现出对历史主义原理的反叛④ ——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传统历史思想的天真无邪”已经消逝。⑤ 历史学家开始——尝试性地但目标明确地——探索新的道路。

---

① 参见G·里特尔：“德国历史科学现状及未来的任务”，载《历史杂志》第170卷(1950 年)；“对几个最终结果和现代历史编纂学基本问题的研究”，载 G·里特尔：前引书(1955年)以及“科学史、当代史和政治科学”，载《历史与理论》杂志，第 1 卷(1961 年)。

② G·G·伊格斯：前引书(1968年)，第27页。参见 W·J·莫姆森：《历史主义的彼岸历史科学》(W. J. Mommse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jenseits des Historismus)，迪塞尔多夫，1971 年版。

③ H·冯·兹尔比克：《德国人道主义以来的精神和历史》(H. von Srbik, Geist und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Humanismus)，第 2 卷(1951年)，第 293 页。

④ 参见他的讲稿：《论兰克和布尔卡特》(F. Meinecke, Ranke und Burckhardt)，柏林，1948 年版。他在 1942 年已经说到“自我分析和力求从起源研究来进行理解的历史主义”是“咬自己尾巴的蛇”。引自《历史格言和随笔》(Aphorismen und skizzen zur Geschichte)，莱比锡，1942 年版，第 11 页。

⑤ T·席德尔：《我们时代的国家和社会》(T. Schieder,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Wandel unserer Zeit)，慕尼黑，1958 年版，第 187 页。

1.3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导向反对唯心主义历史学的各种因素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夏尔·莫拉泽所说的，马克思的体系是"以唯心主义为其假象的伦理学掩盖下"产生出来的东西的真正对立面。① 在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当历史主义(就其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词义上说)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而丧失早期的生命力时，马克思主义为取代历史主义而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经出现过种种努力——其中包括克罗齐把历史解释为"自由的故事"和托因比把历史看作向越来越高级的宗教的不断演替②，试图建立普遍的概念来否定H·A·费希尔的著名论断，即他所说的在历史中看不到"节奏"和"模式"，只有"一个接一个出现的突然事件，就象一个浪头盖过一个浪头那样"。③ 这些努力都没有说服力，因为它们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被指责为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命运。④ 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

① C·莫拉泽:《历史的逻辑》(C. Morazé, La logique de l'histoire)，巴黎，1967年版，第298—299页。

② B·克罗齐:《历史是自由的故事》(B. Croce, La storia come pensiero e come azione)，巴里，1938年版。A·J·托因比:《历史研究》(A.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伦敦，1934—1961年版。

③ H·A·L·费希尔:《欧洲史》(H. A. L.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第1卷，伦敦，1935年版，前言第7页。

④ 参见H·S·休斯:《意识与社会》(H. S. Hughes, Consciousneso and Society)，纽约，1958年版，第226—227页。

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马克思认为，历史既是服从一定规律的自然过程，又是人类自己写作和上演的全人类的戏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当记载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应当从理论上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为此目的，就应当使用一整套成熟的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明确地宣告，“这些抽象……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① 总之，马克思从不否认历史过程或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质。他曾经写道：

---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arx and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ed. C. J. Arthur)，伦敦，1970年版，第4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31页。——译者)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在这个结构中，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必要前提是清晰而符合逻辑的。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没有唯心主义史学家任意选择来作为标准的"诸如自由、个性、民族和宗教等乱糟糟的主观主义概念"，而是以一切社会——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先进社会——的首要职能，即满足人们生理需要，提供食、住、衣、安全和生活的其他必需物质条件，作为自己的起点。马克思问道："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外，还证明了什么呢？"②

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经典的阐述。他在那篇文章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Werke)，柏林，1959年版，第2卷，第98页(《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卷，第118—119页。——译者)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ed. H. J. Laski)，伦敦，1948年版，第14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70页。——译者)

些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它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此外，“生产关系”本身适应于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变更。经济基础的每次变更“或快或慢”地带来整个上层建筑的急剧变革。马克思认为，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的发展“大体说来”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时代，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其中的最后一个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必定要被第五个时代——即社会主义时代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而且现在已经处在被取代的进程中。①

马克思“大体”确定的这个图式当然决不能看成“一成不变的社会学模式”。②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忘记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代替研究。③他们不赞成庸俗的唯物主义。正是恩格斯指出：“经济因素”虽然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政治观念、法律、宗教和哲学在适应于某种经济状况下一旦形成，便会演化出自己的逻辑，而且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将历史概念化实质上起到了启发性的作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第1卷，伦敦，1950年版，第328—32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82—83页。——译者）

② 苏联历史学家E·M·茹可夫在«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斯德哥尔摩，1960年版，第1卷，第83页）中说："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图解，……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

③ 参见格夫特和马尔科夫："关于苏联史学答美国学者问"，载«历史和理论问题»杂志，第6卷（1967年），第192页。

④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477—479页。——译者）

用。他们虽然认为科学的概念(也包括社会学的概念)反映了实际历史事实的特殊方面或特征，但他们也反对把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尤其反对把这种概念的内涵同它们所指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恩格斯在他的1895年的著名通信中写道："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但是，恩格斯接着写道，如果概念并不是直接地符合于它必须从中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一向不过是纯粹的虚构"。①

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未把历史学降低到抽象的社会学的地位，也从未夸大过社会学概念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却主张历史研究的方向应当是探索长期的或反复出现的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模式。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进行了辩护。这个观念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影响在十九世纪末已经明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被废除后的十年是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随着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到广泛传播。在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和意大利的贝尼德托·克罗齐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相颉颃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韦伯象克罗齐一样，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赋予了相对的合法性，并将它理解为"虚无主义的原理"②，但是，用斯图尔特·休斯的话来说，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全集》(Werke)，第39卷，柏林，1968年版，第43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515页。——译者)

② H·S·休斯：前引书(1958年)，第316页。

如果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最最明显的任务”本应是同马克思主义妥协的话，那么实际上，大部分职业历史学家回避了这个问题。正象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所指出的，古奇在1913年出版的论十九世纪史学的经典性概述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思想所发生的真正影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①

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1848年以来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疑惧。在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里，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实质上排斥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法国比较宽容，从饶勒斯到马蒂埃，从拉布鲁斯到勒费弗尔，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但在其他国家，尤其在德意志帝国，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既不懂又不想去弄懂马克思主义原理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梅林——又遭到排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终于开始崭露头角的话，也还是被“当成流行的崇拜实证主义的变态形式，是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②许多反对者在竭力加深这种假象，其中包括施塔姆勒和里克特这样一些批评家。直到1918年——而且事实上在那以后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大学历史研究和教

① G·P·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伦敦，1913年版。参见《1906—1956年的历史协会》(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06—1956)，伦敦，1957年版，第82页。

② H·S·休斯：前引书(1958年)，第42页。

③ 就本人回忆，在1926—1929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期间从未听到教师提及马克思的名字，但牛津大学也许属于例外，而伦敦经济学院所持的立场肯定不同。

学中依然被完全忽视。1917 年的俄国革命迫使俄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所作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们的反应本质上仍然是敌意的。然而，这却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的或学术的思考产生的结果。促使这种状态开始真正转变的事件是 1929—1930 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① 1929 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这时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正象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所说的，是应付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然而，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②

苏联的状况在 1917 年以后当然截然不同。③ 苏联政府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历史研究的发展，因为历史学被看作“共产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人民以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名义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的革命活动的一部分。”④ 1918 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和历史部主任。同年，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成立，波克罗夫斯基为首任院长。遵照 1918年 7 月 1 日关于重新组织和集中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档案的法令，各类国家档案被集中起来统一收藏，将过去无法接触到的大量文件资料供历史学家使用。1919 年，国家物质文明史科学院成立，随后又在 1923 年成立了苏联社会

科学研究所协会。1920年设立的"党史"委员会从事联共(布)党史和十月革命史的研究，而且从1922年起开始发行《红档》杂志，为共产党历史和革命运动史的研究公布了大批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这个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十月革命前，只有少数老一辈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其中包括R·J·维珀，V·P·沃尔金和N·M·罗日科夫。大多数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而其他一

---

① 参见J·格伦尼松：前引书(1965年)，前言第21—22页。

② C·韦伯斯特："历史教学和研究变化的五十年"，载《历史协会，1906—1956年》，1957年版，第82页。

③ 由于语言方面的限制，以下部分的叙述，若是没有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的帮助和他们的建设性批评意见，那是无法完成的。在这方面，我要向从事这一研究的两位报告起草人之一科恩教授(列宁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费多罗娃博士在这项费时的工作中给予的慷慨合作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彼得·哈纳克博士所作的精彩而生动的评论以及莫斯科大学的H·A·埃罗费也夫教授，柏林大学的E·恩格尔伯格教授，和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在以下论述中，我将尽可能避免使用那些有害于大量西语文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含义，也不涉及与本文要旨无关的内容，而是按照我在以上各节中批判性地评价1917年到1955年西方史学发展的同样方法，来评价同一时期内的苏联史学的发展情况。当然，对这里的解释我将负个人责任。苏联和西方的专家们对于这些解释，至少对于其中的部分内容，无疑会持有不同的见解。同样明显的是，对这个领域的概述也不可能希望提到这个时期的全部有关著作，难免挂一漏万。但是我认为，我在这方面的任务同其他方面一样，不是提供"全貌"，而是提取其中看来属于重要趋势和属于创新的那些成就。

④ 参见季诺维也夫：《苏联历史教学法》，莫斯科，1948年版。引自英译本，华盛顿，1952年版，第3页。参见格夫特和马尔科夫：前引书(1966年)，第203页。在这一方面请切记，按照苏联的观点，在社会科学中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中立立场，而且进步的和自觉的党性与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是不矛盾的。这里没有必要过多地讨论党性问题，只要简单地提到反对这一观点的西方作者，其中，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曾经说过："那些设想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假设就去写历史的人，有时就是拒绝考虑自己的假设。"H·巴特菲尔德：前引书(1951年)，第99页。

些史学家却公开地持敌视态度。因此，苏联历史学研究重建时期的早期阶段是处在马克思主义者与前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老一辈代表人物之间激烈斗争的气氛中。最后，一大批老历史学家，如B·D·格雷科夫，S·V·巴赫鲁申，J·V·哥季耶，S·A·热别廖夫，E·V·塔尔列，V·I·皮切塔和A·D·乌塔利佐夫以及年轻一代的史学家，象E·A·柯斯敏斯基，S·D·斯卡兹金，N·P·格拉齐安斯基，V·V·斯托克利兹卡娅-捷列斯科维奇和N·M·德鲁日宁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营垒，与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如M·N·波克罗夫斯基，N·M·卢金，E·M·雅罗斯拉夫斯基和V·I·涅夫斯基并肩工作。在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1925年创立了由波克罗夫斯基担任主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这个组织对于在历史学家中推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928年12月至1929年1月，全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会的召开标志历史学研究的重建过程进入了新的阶段。

尽管如此，全盘采纳马克思主义观点还仅仅是开始。毫无疑问，我在这里叙述的从1929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个阶段的苏联史学发展状况，不可能比我已经叙述过的同一时期内西方史学的演变状况更详细。有关这个发展过程，苏联和西方作者都作过详细的论述，这里只需提及已经引用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就够了。① 事实证明，苏联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原理逐步结合的过程是个艰难曲折的长期过程。外部的种种因素使这个过程更加复杂化，其中首先包括与资本主义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其次还包括苏联在政策上的反复，尤其是在斯大林时代。虽然这些外部影响在发生作用，

但西方作者直到最近对这一过程的叙述仍然存在不正确的趋势，他们忽视了苏联史学的内部演变。② 最重要的一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的接受，为苏联史学提供了进一步提高、改变研究重点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尤其表现在方法论

① 关于苏联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参见V·P·沃尔金、I·V·塔尔列和A·M·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历史科学二十五年》，莫斯科，1942年版。有关这个问题的近期重要著作，请参见：《苏联历史科学史论文集》，四卷本，莫斯科，1955—1966年版；伊列里茨基和I·A·库德里亚夫采夫：《苏联史学史，从古代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莫斯科，1961年版；A·V·阿尔齐霍夫斯基编：《苏联科学与文化史论文集》，莫斯科，1968年版；L·V·伊万诺娃：《1917—1929年苏联历史科学起源》，莫斯科，1968年版；A·M·萨哈罗夫：《苏维埃政权五十年的民族史研究》，莫斯科，1968年版；O·I·魏因施泰因：《苏联中世纪研究史》，列宁格勒，1968年版；L·V·切列普宁："苏联历史科学五十年及其发展成果"，载《苏联历史》杂志，1967年，第6期；V·伊列里茨基："苏联历史科学中的民族史学问题，1917—1967"，载《苏联历史》杂志，1968年，第1期。论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西文著作请参见E·恩格尔伯格："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对象和目标"，载《历史科学杂志》，1968年，第6期。关于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和态度，最广泛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向第十至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代表大会提交的论文，尤其是A·L·西多罗夫："苏联历史科学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载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第6卷(1955年)。茹可夫："世界史的分期"，载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第1卷，1960年。此外，已经引用的苏联史学家的一些重要论述见《苏联历史学研究》英译本，1962年出版，第1期，以及各个时期的《苏联报刊文摘》。有关苏联史学的英文版指导书，见A·G·马祖尔：《苏联现代史学》(A. G.Mazour, 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普林斯顿，1958年，第2版；C·E·布莱克主编：《重写俄国史——苏联对俄国过去的解释》(C.E.Black, Rewriting Russian History. Soviet Interpretations of Russian's Past)，纽约，1956年版。但是，关于苏联史学近来发展状况的比较新的，而且比较客观和有使用价值的著作是J·L·H·基普和L·布里斯比主编：《当代史在苏联的反映》(J. L. H. Keep and L. Brisby,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Soviet Mirror)，伦敦，1964年版。关于苏联史学的早期有实用价值的文献目录是G·施塔特米勒：《苏联的新世界史》(G. Stadmüller, Die neue Sowjetische Weltgeschichte)，载《世界史年鉴》，弗赖堡，1960年版，第11卷，第380—384页。

② S·V·乌特金："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史学"，载J·L·H·基普和L·布里斯比主编，前引书(1964年)，第117—154页。我认为他正确地强调了这一点。

问题上。苏联对约于1932年波克罗夫斯基逝世前的早期阶段所作的评价已经承认了它的缺点，但同时又坚持其积极的特征，尤其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范围。1920年底，波克罗夫斯基发表的著名的《俄国简史》标志了苏联史学的转变，从研究作为革命以前俄国史学特征的叙事性政治史转向使用专门化的社会—经济研究方法。① 与此同时，苏联的历史学研究把所有的新问题都铺展开来了，如革命运动史，特别是十月革命史，以及阶级斗争史，尤其是指俄国农民战争和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1928年，D·M·彼得鲁舍夫斯基的论欧洲中世纪经济史的论文集出版，由此引起的争论把整个封建社会的问题提了出来。② 同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方法的应用导致了其他领域中研究重点的转变。例如在古代史领域内，对奴隶制问题作了更加细致的考察。

尽管苏联史学有这些积极的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其中最严重的无疑是以粗糙的社会学的经济研究方法来对待历史学。这不仅影响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对历史学的职能和目的的理解，而且影响到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本身，对于观念和制度等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注意太少。尽管恩格斯曾经告诫过"不要闹笑话"，③ 但有些苏联史学家依然不恰当地企图将一切社会和文化进程同经济直接地联系起来。波克罗夫

① M·N·波克罗夫斯基：《俄国简史》，列宁格勒，1920年版。

② 参见D·M·彼得鲁舍夫斯基：《欧洲中世纪经济史论文集》，莫斯科，1928年版。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前引书，1950年)第2卷，第443页。恩格斯写道："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478页。——译者)

斯基曾经嘲笑过那些被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信念弄糊涂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说他们试图以谷物价格的浮动来解释1914年的战争起因。① 在这个时期的讨论中，意识形态的考虑过分地压倒了真正的论证。对具体事实和进程的研究兴趣太低。许多重要的历史时期，尤其是那些多少与遥远的过去有联系的历史时期如果不是完全被忽视，则是研究不足。历史学基本上被民族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淹没了。

当然，某些实际因素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释这种状况。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的骨干力量非常缺乏，当务之急是要培养一批这样的骨干，因此造成研究水平的暂时下降是不足为怪的。同时，供大学和中学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教科书也不足，也就是说，需要把力量从基本研究上抽调到编写通史的准备工作上去。这项工作一般是以集体为基础，不可能或者极少增加新的历史知识，而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解释已知的事实。学术论著的数量很少，而且注意力集中在范围有限的专题上。这些虽然是由于当时的环境造成的，但由此造成的后果却是无法抓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点，无疑阻碍了苏联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因而在三十年代初期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上受到了严厉批评。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各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1934年9月1日法令，即恢复中、小学的历史课程设置，并在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重新设置历史系。在随后的几年中，其他各大学也陆续开始设历史系。1936年，苏联科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合并，设立历史研究所，作为该院的一个分

① 参见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论文集»(M.H. Pokrowski, Historische Aufsätze)，维也纳，1928年版，第20页。

支。新建立的历史研究所立即成为全国的中心研究机构。历史研究的出版机构也有了明显的改进，开始包括范围更加广泛的专题。新的期刊，如《古代史公报》,《历史论丛》和《历史杂志》相继问世。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应用也有所改进。尽管如此，苏联历史学家仍然死抱着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欧实证主义史学家所建立的那种原文校勘标准和历史证据的处理技术，没有认真地提出问题。在方法论方面，虽然在考古学和史前史研究领域中创造了杰出的成就,①也开始使用统计分析方法,②但大多数苏联历史学家对于西方所探索的更为复杂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作出的反应是迟缓和犹豫不决的。西欧一些比较进步的历史学家——尤其是以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为核心的法国历史学派——远不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通过对新方法和新技术的探索使自己进入了崭新的领域，而在这个时期，苏联史学却不肯越雷池一步。③

苏联史学的进步也暴露了复杂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更加深化了，但没有象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所能希望的那样深刻。马克思曾经坚持说："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还是有关现在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④换言

① 参见S·J·德·拉埃写的"考古学和史前史"，载J·哈维特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J. Havet ed.,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纽约，1978年版，第2部，第1卷，第186，191，193—194，205页。

② 例如E·A·柯斯敏斯基：《十三世纪英国农业史研究》，莫斯科，1935年版。

③ 参见J·格伦尼松：前引书(1965年)，前言第22—23页。

④ 《德意志意识形态》(亚瑟版)，第4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31—32页。——译者)

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没有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只是从新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这一点在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大争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历史分期问题是四十年代苏联史学家最关心的主要问题。① 回顾这场争论，它的最主要特征也许就在于没有结论。马克思和列宁建立的大框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大框框内确立精确的和普遍承认的俄国史或世界史分期方法上没有丝毫进展。相反，由此产生的主要结论之一却是认为"按照严格的一致性和普遍可靠性的标准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做法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② 在历史的现实中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奴隶制或"纯粹的"封建制这样的东西。历史学家遇到的是因国家而异的"不匀称的结合"，其中既包括"前面一个社会—经济方式"的残余，又包括后面一个社会制度的"胚胎"。茹可夫强调指出："历史的发展决不是遵照公式的、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或直线型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常常表现为……对普遍规律和事件的符合逻辑过程的局部和暂时的偏离"。③ 另一个重要结论是，这场争论指出了将历史分期和经济因素加以绝对联系的危险性。"如果我们想把一个国家的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我们并没有权利人为地缩小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实和事件的范围。相反，只有深入和客观地评价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一切事实，然后才可能从中抽取出总的结论，才可能确立可靠的分期方法。"④

① 有关历史分期问题，已从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中选择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编辑为德文本，题为《苏联史学中关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分期问题》(Zur Periodisierung des Feudal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der UdSSR)，柏林，1952 年版。

② G·施塔德米勒：前引书(1960 年)，第309 页。

③ 茹可夫：前引书(1960 年)，第 397，456 页。

④ 《苏联史学中关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分期问题》，第330—331 页。

就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研究工作的内在困难和复杂性，历史事件的广泛多样性和明显的矛盾性而言，关于历史分期争论所产生的结果是重要的。① 马克思主义在途经这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时，曾经立下了醒目的路标。但在路标指示的范围内还有许多不同的路径，允许各种不同的方向和多种多样的解释。苏联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临近结束时出现的反应是反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教条主义的和刻板的解释。历史学家得到的告诫是不要拿事实去“硬套现成的模式，这种模式可能是符合逻辑的，但缺少坚实的历史根据。”② 苏联史学家的任务现在被规定为“研究每个社会状况的所有方面，根据具体历史环境的要求作出评价。”③ 在局外人听来，这种说法同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工作方法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了。

有鉴于这种发展过程，对于苏联历史学家在1955年以后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又重新回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上来，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苏联史学的发展从这时开始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苏联历史学家明显地表现出自我反省的态度。这种态度在许多方面与我前面叙述的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态度极为相似。它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自上而下的“路线”或指示之间难以调和，同时也产生于“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关的错误和歪曲”。④ 1957年创刊的党史杂志《苏共党史问

---

① 参见A·L·西多罗夫：前引书(1955年)，第397，456页。

② 见《分期问题》，第330页。

③ 西多罗夫：前引书(1955年)，第393页。

④ 参见格夫特和马尔科夫：前引书(1967年)，第205页。

题》编辑部指出，采用斯大林的《简明教程》作为“党史研究的标准严重地阻碍了进一步科学地解决党史中的问题。”① 这种态度在不同程度上也应用到了俄国史研究的其他时期和其他方面。在目前情况下，更重要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某些历史环境而立即产生的那些问题。尤其是发现了一些“空白”的领域，如重复性，典型性，社会一经济制度，历史时代和历史阶段等需要澄清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需要是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正如格夫特所指出的，由于历史知识极大扩展的结果，历史学家面临着“难以或简直不可能用旧的尺度来衡量的、新的、非同一般的问题。”② 总之，苏联史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一样，到 1955 年或 1956 年，正在迫切地期待着新的推动力。

形成这个状态的另一个新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1945 年以后的迅速发展。在波兰、东德、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和南欧国家中，旧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和“贵族历史主义”，在战后的头十年中已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所取代，历史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农民运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形成方面。③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显著的加强。在英国年轻一代史学家中已经形成蓬勃向上而且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克里斯托弗·希尔、约翰·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英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参与为历史学新观念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是毫不奇怪的。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根据在于许多不同的历史环境。它不仅感到自己已经面临着新发现的资料，而

且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例如中欧和东欧的资本主义过渡方式就明显地不同于西欧。[4]对于这一切都必须加以吸收并作出解释。结果又出现新问题，遇到新困难，至少要在已经扩大了的实际知识范围内和扩充了的不同社会—经济关系范围内对那些旧问题重新加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所涉及的面越宽，就越是感到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对它加以应用时需要有灵活性，需要基本概念的清晰和准确性，需要在方法上加以改进。

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但是，他们越来越感到，对十九世纪的历史状况作出反应从而形成的十九世纪的思想体系，除一般推动力外几乎已经不能为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提供什么了。用英国一位年轻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不仅"对社会学的兴趣"已经

---

① "迎接党史科学的新高潮"，载《苏共党史问题》杂志，1960年，第5期，第3—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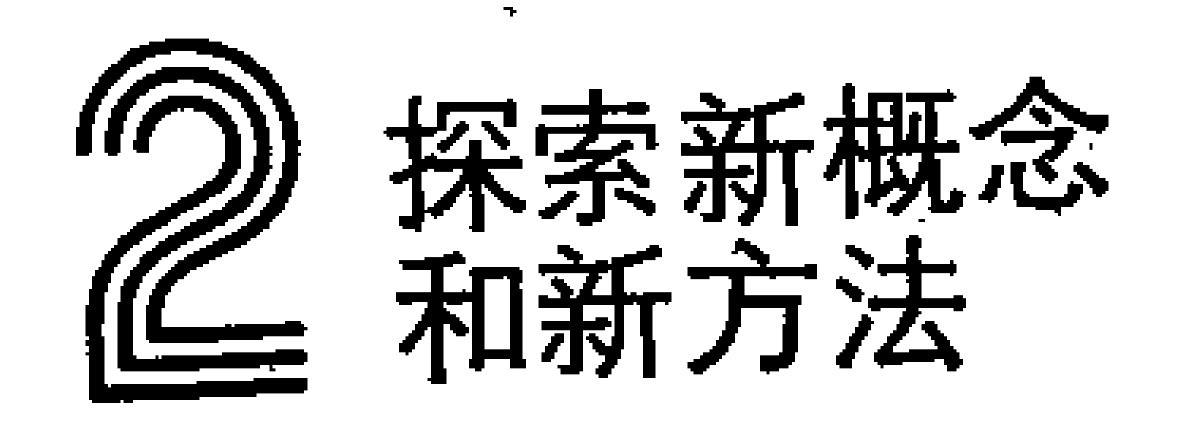
② 同上，第453页。

③ 关于这个早期阶段发展的大部分情况，在东欧各国代表团提交给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论文中作了充分的叙述，参见《波兰代表在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华沙，1955年版；《南斯拉夫史学的十年，1945—1955年》(Ten Years of Yugoslav Historiography,1945—1955)，贝尔格莱德，1955年版；《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匈牙利代表团的研究报告》(Etudes des délégués hongrois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布达佩斯，1955年版。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学发展状况在1952年以后发行的《历史科学杂志》(柏林)上作了充分叙述。波哥·格拉凡诺尔(Bogo Grafenauer)为我特地准备的报告——《南斯拉夫的史学》("L'historiographie en Yougoslavie")，使我得益非浅。我还应当表达对彼得·哈纳克的特别谢意，他的论文"匈牙利历史研究趋势"("Trend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Hungary")是很有启发性的。

④ 参见P·哈纳克：前引书手稿，第31页。

"失去它原有的激励作用，而且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社会学词汇已经越来越不足以囊括历史发展的全部复杂现象"。[1]这种说法决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① 基斯·托马斯：前引书(1966年)。



第一章的叙述如果能够说明1955年前后在“自由”派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中都孕育着某种即将露头角的东西，那就算是达到了作者的目的。毋庸置疑，这样的叙述必然会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强调历史研究新趋势中批判和异端的方面，而损害符合常规和正统的方面，也必然会倾向于夸大当时大量存在于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中自我质疑的潮流。对于那种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态度不够完善的说法，大多数历史学家表示了不满——而且至今仍然不满，他们只满足于继续撰写传统方式的叙事史。无视或低估这一事实都是愚蠢的。叙事史为什么依然盛行不衰、备受欢迎？它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占有什么地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要回过头来加以讨论。这里只需要说明一点就足够了，即1955年以后历史研究的趋势，是探索不同于传统的另一种研究方式。这正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当然，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推动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动力是不同的。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与地区之间不存在相互取长补短的连续性过程——这种过程确实在日益迅速增强，而是相

反，航空旅行时代带来的交通便利，新的流动性，各国历史学家之间（尤其西欧与美国之间）经常性的国际访问，学术会议的增多，以及苏联在1955年重新出席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后，放松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与非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相互接触的限制，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富有成果的思想交流。尽管如此，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历史学新概念和新方法的探索，起点不同，经历的道路也不同。首先，美国、苏联和西欧是这方面更新和取得进展的主要地区；①即使在目前阶段上，最突出的特征是处于相互融合或汇流的过程中——即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在吸收、探索和提炼其他地区的同行们提出的新技术和新的认识能力，然而，对这一新发展的不同起点作一些简要的思考，依然十分重要。

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的显著特征。②这种结合实际上开始于四十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先于它的"新政"一样，这种结合不仅为政治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供了极其广泛的新机会，而且一致认为，通过与传统形式的历史分析方法进行比较，从而用实际事例证明他们所叙述的那种研究技术和计量方法所具有的实用

① 亚洲和非洲的更新和前进要晚一些，大致从往往称为"非洲年"的1960年开始。它们对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将分别加以讨论，请参见第四章。

② 以下引文根据B·C·谢弗，M·弗朗索瓦，W·J·蒙森和A·T·米尔纳合著：《西方历史研究》(Boyd C. Shafer, Michel Francois, W.J. Mommsen and A. T. Milner, Historical Study in the West)，纽约，1968年版，第175—189页；A·G·博格：《美国新政治史》(A. G. Bogue, United States,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载《当代史研究》，第3期，1968年；E·N·萨弗思编：《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E.N.Saveth, American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纽约，1964年版；W·J·卡恩曼和A·波斯科夫编：《社会学与历史学》(W.J. Cahnman and A. Boskoff, Sociology and History)，纽约，1964年版。

价值。毫无疑问，社会科学的实际成果以及这些成果所证明的更为有效、更切中目标的方法论具有广阔的前景，是推动美国历史学家去重新检验他们继承下来的那些观点和方法的主要力量。重新检验他们所继承的观点和方法最初还是犹疑不决的，也是被动的。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一系列报告和出版物的问世，可以标志它的进展和巩固。① 很明显，这个委员会通过有目的地提高其研究能力，从而在过去的二十五年改变美国历史学家的观点方面发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重新检验过去的观点，这种做法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因为它在美国能够以具有悠久历史的先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潮流为基础。相信历史学和其他一切知识的探索一样都是"实际调整的工具"，② 而且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这种信念在美国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实用主义的传统曾在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暂时有所削弱，而且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对它的怀疑和自疑。但在 1945 年以后，就象这个时期美国取得了物质上的重大进步一样，这种信念也得以迅速恢复。不过，这样的进步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而且伴随着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如果说，美国历史学家首先是从欧洲各个学派那里大

---

① «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istorical Study), 1946 年版；«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 (The Social Sciences in Historical Study), 1954 年版；L·戈查尔克编：«历史写作的归纳» (L. Gottschalk ed., Generaliz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1963 年版；兰德斯与梯利合编：«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 (D. Landes and C. H. Tilly eds., History as Social Science), 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 1971 年版。

② 参见 C·斯特劳特：前引书(1958 年)，第 159 页。

量地吸取了思想——尤其是应用了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方法和"模式"，那么，从四十年代起，他们取得的成果已经打上了明显的美国式烙印。这时，他们采取了拉扎尔斯费尔德等社会学家，利普塞特等政治科学家以及库兹涅茨和里昂惕夫等经济学家的"启发式概念"和操作工具。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场"内部革命"。这场革命的先驱者包括詹姆士·C·马林、默尔·柯蒂、托马斯·C·科克伦和威廉·O·艾德洛特。[①]他们对常规的历史分析方法的"疲软无力"十分不满，认为这种方法"只注重表象和形式，一系列事件中的个别事件以及独特和个别"，因而"不去注意我们过去政治中某些意义更加重要的发展"。他们着手于利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发明的度量技术和方法，成果和含义。他们要采取新研究方法的主张不可避免要遭到强烈的抵制，[②]然而，它向整个世界证明，数据分析、计量技术、生态关联、计量经济学以及其他种种更为成熟的概念工具，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依然是美国对历史学研究作出的突出贡献。

如果说在美国历史研究中的这些发展，从"新政"晚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得了相当稳定的进展，那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955—1956年左右，苏联历史学也开始进

---

① 参见T·C·科克伦：《内部革命：论历史学中的社会科学》(T. C. Cochran, The Inner Revolution:Essays o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History)，纽约，1964年版；J·C·马林：《论历史学的性质》(J. C. Malin, On the Nature of History,Essays about History and Dissidence)，安纳波尔，1954年版；W·O·艾德洛特："历史学的计量化"，载《美国历史评论》第71卷(1966年)。

② C·V·伍德沃德："历史学与第三文化"(载《当代史杂志》第3卷，1968年4月)，对保守派的反应作了文雅而巧妙的叙述。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①]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只过了几个月，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的字里行间便可以发觉出现了批评性的文字。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前，1956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苏联现有的历史学模式展开了坦率而充分的讨论。[②] 但是，使这个新趋势得到巩固的是苏共二十大。虽然对这一趋势能够产生多么持久的效果仍抱有怀疑，[③] 但苏联历史研究在1956年以后已跨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说法是有充分根据的。[④]

苏联历史学变化的外部表现是：新研究机构的设立、新杂志的创刊，乌克兰、外高加索、中亚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拉丁美

---

① N·M·德鲁日宁编的《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期间的苏联历史科学》，(2卷本，莫斯科，1962—1963年版)全面概括了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期间的苏联史学状况。关于目前的状况，请参见《历史科学和当前的一些问题》，莫斯科，1969年版；尤其参见《历史问题》在过去十年中刊登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1960年第5期上刊载的"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59年以来的一些成果"；1963年第1期，波诺马廖夫："历史科学的任务"；1968年第1期："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全体会议五十周年纪念"；1968年第5期："1967年历史科学的光辉成就"；1969年第8期："苏联历史学家的新战线"；1969年第9期，A·丘巴良："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大会的结论和历史科学的目标"。又见季霍米罗夫："历史科学的意义"，载《莫斯科大学学报：历史版》，1969年第1期。西方作家的有关著作，请参见S·V·尤特钦："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史学"；孟德尔："苏联当前的历史理论"(1966年)，以及庞迪夫在《历史与理论》杂志1964年第4期和1967年第4期上发表的有关文章。

② 参见报告："第十届历史科学大会所反映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56年)；见吉普和布里斯比编：《当代历史学在苏联的反映》(J. L. H. Keep and L.Brisby, eds.,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Soviet Mirror)，伦敦，1964年版，第123—124页；参见《苏联文化》，第4—5期(1956年4—5月)，第2页。

③ V·皮罗什科夫："处于内部矛盾中的苏联历史科学"(1960年)。

④ 这是《历史问题》1960年第8期头版文章的标题："处于发展新阶段上的苏联历史科学"。

洲、非洲、亚洲和其他地区历史的专门机构的建立，这表明了专业化的加强。这些变化已经够明显了，无需再作进一步思考。比较难以估价的是这个发展的内在含义。除了反对斯大林时代过分夸张的政治趋势——包括对伊凡四世的个人崇拜以及对俄国的过去所作的爱国主义美化——外，这一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否定"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重新提出需要尊重事实。茹可夫指出，作为"个人崇拜"的后果，苏联历史学家经受了"心灵的创痛"，他们不是"从事实引出结论"，而是"不加考证地"重复"格言式的公式"，选择"事实材料去证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文献中早已从过去的某些材料中引出的这个或那个理论上的结论"。[①]

苏联历史学家对此作出的反应，用波尔什涅夫的话来说，就是强调历史学是"最大限度的具体"。[②]当时担任《历史问题》编辑的潘克拉托娃引用了列宁的话，号召历史学家把他们的著作建立在"准确的、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基础上，并停止那种扼杀不符合自己所需材料的做法。这种做法，按照继她担任《历史问题》主编的B·G·特鲁汉诺夫斯基后来的说法，只可能"造成历史学的贫乏"。结果，特鲁汉诺夫斯基本人以及其他人都向历史学家大声疾呼，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他们写出"活生生的而不是僵死的历史"，也就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的、有丰富色彩和层次"的历

① 参见《历史问题》1963年第2期刊登的文章："全苏历史会议"。该文报道了1962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历史学家会议情况，讨论了关于提高和培养史学工作者、历史教师应采取的措施。反映这次会议主旨的论文是波诺马廖夫的"历史科学面临的任务以及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师的培养问题"。该文在前一期上发表，并附有详细英文摘要。

② 《历史学与社会学》(1964年)，第313页。

史。① A·Y·古列维奇提醒历史学家说，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主要是指导历史研究的认识论，而不是对现实作先验的、本体论的叙述。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虽然他自己也合理地关注那些"在过去的事件组成的因果链条上不起作用而对当代却有意义的"事实——是检验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在具体事例中的应用，并在应用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而且在必要时进行修正或再提炼。②

隐藏在这些有限的实际要求之后的是意义更广泛的普遍原则，那就是重新强调历史学和历史研究的自主性。如果要求历史学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所需要的就是更加明确地划分社会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的理论(社会学)与社会的历史(历史科学)之间的界限，承认各自相对独立的作用。③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者斯特凡诺夫坚持认为历史进程的历史必须明确地区别于历史进程的理论，④否则，马克思的思想就会发生危险，不再继续成为批判分析的强大武器，而可能陷入教条，缺乏说服力，缺乏洞察社会的能力。正如M·T·约夫丘克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是不发

---

① 潘克拉托娃的发言参见1956年2月22日《真理报》和《苏共二十大速记记录》，莫斯科，1956年版，第1卷。特鲁汉诺夫斯基，波诺马廖夫等人的发言在1964年1月关于科学院讨论历史学方法论的一篇文章中作了报道，以"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为总标题，刊登于《历史问题》1964年第3期和《历史学与社会学》上。

② 参见古列维奇："历史学的一般规律和具体规律"，载《历史问题》，第8期(1965年)。

③ 参见"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以及费多谢耶夫和弗兰切夫的文章："历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提出"，载《历史问题》，1964年第3期。这两篇文章是讨论的基础。又见庞迪夫在《历史与理论》第4卷(1964年)第75—77页和第6卷(1967年)第451页上所作的分析。

④ H·K·斯特凡诺夫：《历史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索菲亚，1962年版。

展，不具体化，不用新的材料来丰富，不用符合新历史环境的新观点来取代个别过时的论点，便不能适用和应用于任何时代。"①

1956年以来，苏联史学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首先是大大放宽了对原始资料的限制以及对主题的选择和对事实表述的限制。结果，苏联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现在已经扩大到过去大部分被忽视了的十分广阔的研究主题上，例如关于1917年以后阶级之间的运动和阶级内部的运动，还有对苏联社会结构进行历史的分析。②从现在的角度来回顾，更有意义的也许还在于历史研究方法上的改进。随着这一改进，苏联对西方的或"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予以新的尊重，并且愿意进行试验。但是，更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恢复了早在三十年代已被取消的社会学的地位，加强了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合作。③六十年代初以来，苏联历史学家由于急于探索社会学分析的新方法，对控制论、电子计算机技术、统计学、结构分析以及模式应用引起了越来越密切的关注。④他们在争取获得新的认识能力的努力上并不就此却步。此外，波尔什涅夫唤起了对社会心理学或集体心理学的注意。⑤莫斯科大学正在进行一项庞大的内容分析工程，企图通过系统检验文艺复兴时代的全部文学著作来寻找当时道德观念的演变。⑥就方法论而言，苏联历史研究在使用更为复杂的现代技术上，如果在1950年还是表现得犹豫不决的话，那么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他们已经完全吸收了这些现代研究技术。从历史科学演进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1956年以来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

当然，促使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发生变

化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独立的世界历史研究所于1969年设立之前后，苏联历史学面临着新的研究角度，即从过去俄国史和欧洲史的研究转向更积极地研究亚洲和非洲的历史。正如A·K·安东诺娃所指出的，当"我们亲眼看到，亚洲和非洲新国家的工业发展方式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典型模式"时，还要承认"整个世界都遵循着某种同样序列阶段"的观点就不那么容易了。⑦这个问题我们将要回过头来讨论。目前只需要说，世界历史的挑战实际上是斯大林逝世后那个时代的新特点。正是因为苏共二十大强调了"第三世界"的作用，才引导苏联的全部历史学家去注意亚洲和非洲的

① 庞迪夫：前引书(1962年)，第454页。

② 罗加切夫斯卡娅：《苏联工业化初期工人阶级的历史》，莫斯科，1958年版；I·V·阿鲁秋尼扬：《苏联农业机械化动因，1929—1957年》莫斯科，1960年版；I·特里福诺夫：《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阶级斗争史论文集》，莫斯科，1960年版。

③ I·S·科恩："历史学与社会学"，载《哲学问题》，1970年第8期；A·H·鲁缅采夫："苏联的社会科学与当代现实"，载《历史问题》，1968年第9期。

④ 格尔曼-维诺格拉多夫和赫罗姆先科："控制论与历史科学"，载《莫斯科国立历史档案研究所丛刊》，第25期(莫斯科，1967年)；M·A·巴尔格："历史研究定形化的前提"，喀山，1967年版；《历史科学中的方法论和史学问题》，托姆斯克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斯塔依尔曼："历史学中的结构分析问题"，载《历史问题》，1968年第6期；康克："我们需要新历史科学吗?"，载《历史问题》，1969年第3期。关于苏联在特殊领域中(如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贡献将在适当的地方分别加以论述，这里只需提到格夫特和马尔科夫在《历史与理论》第6卷(1967年)上发表的文章"答关于苏联史学的问题"中开列的有关的书目和文章篇名。

⑤ B·F·波尔什涅夫：《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莫斯科，1966年版；波尔什涅夫和L·I·安齐费罗娃编：《历史学与心理学》，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联合出版，1970年版。

⑥ 参见J-C·加尔丹："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巴黎，1969年1月25日《世界报》副刊(总第7476期)。

⑦ 《历史学与社会学》，第282页。

历史。世界历史面临的问题，通过扩大他们的视野，迫使他们去考虑迄今为止除了专家以外人们很少注意的形势，从而在重新评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评价过程是1955年以后苏联历史学研究中的突出特点。其结果是动摇了对传统公式和传统方法的信念，从而加强了对新途径的探索。

我们已经注意到，1955年这个年份在西欧也是一个转折点的标志，因为正是在那一年，直接或间接地发端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的新思想才开始充分发挥影响。这里不准备详细讨论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成就，① 只需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即以他们为中心的历史"学派"以及他们在1929年创立的《年鉴》杂志是宣传他们挑战性的新历史概念及其作用的工具。年鉴学派很快就成为指导西方历史学家进入陌生的渠道并且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的主要推动力。他们产生了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影响。例如在英国，路易斯·纳米尔爵士对在十八世纪的政治中发生作用的政治—社会力量所作的分析为历史研究增添了又一个新的领域。② 但是，纳米尔的影响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到1955年，他的影响力已经基本消失，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回避了总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最有价值的文献是J·格伦尼松的"法国当代史学的趋势和成果"，载《法国历史研究，1940—1965年》(La recherche historique en France de 1940 à 1965)，巴黎，1965年版。参见H·S·休斯：《被堵塞的道路》(H. S.Hughes, The Obstructed Path)，纽约，1966年版，第一部分以及刊于《历史》杂志第52卷(1967年)上戴维斯关于马克·布洛赫的文章。

② 参见L·纳米尔：《乔治三世即位时的政治结构》(L.B. Namier,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二卷本)，伦敦，1929年版；《美国革命时代的英国》(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伦敦，1930年版。

的概念，另一原因是他的那部讨论政治结构的著作正好处于研究重点从政治史转向整个社会的时代。自然，甚至早在1939年以前，布洛赫和费弗尔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国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① 但是他们加强自己的观点需要耗费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一过程中断。费弗尔终生"为历史学而战"，但是，1955年却是这场战斗最终赢得胜利的一年。② "年鉴学派"的纲领和方法并没有毫无异议地被接受，尤其是未被德国的历史主义所接受。③ 但是，莫米格利亚诺在1961年曾经说过，年鉴学派"正在欧洲取代德国历史学派的地位，并且必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中心锻炉"，④ 这席话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年鉴学派的地位。从那以后取得的种种发展只不过证实了他的这一断言。

年鉴学派纲领的核心所在是坚持要求扩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对于布洛赫和费弗尔和他们的下一代继承者来说，这一要求是共同的，特别是费尔南·布罗

---

① 例如，布洛赫典型的观点和方法对英国的M·M·波斯坦产生了影响。反过来，波斯坦的著作，尤其是有创见的论文"劳工服务编年史"(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第4集，第20卷，1937年) 对法国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② 格伦尼松:前引书(1965年)，第50—51页。

③ G·里特尔:"对现代历史学的某些成就和问题所作的思考"，载«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公报»，第6卷(1955年)，第296—315页。又见G·里特尔:«栩栩如生的往事»(G. Ritter, Lebendige Vergangenheit, 慕尼黑，1958年版)中"现代史学中的问题"和瓦格纳:«现代史学»，第89—112页。见K·E·博尔恩:"法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途径"(1964年); M·武斯特迈耶:"'年鉴学派'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其'新历史科学'"，载«社会—经济史季刊»，第54卷，1967年，第1—45页。这两篇论文既作了批评，又抱赞同态度。最近有关的中肯的批评，请参见J·A·德·容格:"法国历史学实践"(1969年)。

④ A·D·莫米格利亚诺:«史学研究»(A. D.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伦敦，1966年版，第233页。

代尔和夏尔·莫拉泽①。布罗代尔在1956年接任高等教育实验学校经济和社会科学部主任。② 按费弗尔著名的话来说，新的历史学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这就是说，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③ 它与常规的"事件构成的历史"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而且一直非常鲜明。费弗尔不倦地进行论战，反对事件构成的历史(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在他看来，这种历史在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系列个别事件上——主要是政治史中有文献记载的事件上——并且企图用假设的因果关系链来解释它们，使它们能够自圆其说。用这种方式构想的历史，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不过是"新式的编年史"而已，因为这种历史眼光短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它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史料。简言之，它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同时，它又必须抵制诱惑，防止把自己分割为许多个各行其是的"专门化"部门(经济史、思想史等等)。这种诱惑在二十世

① C·莫拉泽：《关于历史和文化的三篇论文》(C. Morazé, Trois essais sur Histoire et Culture)，巴黎，1948年版；《历史逻辑》(La Logique de l'histoire)，巴黎，1967年版。

② 关于布罗代尔，参见格伦尼松：前引书(1965年)，第57—62页；武斯特迈耶：前引书(1965年)，第27—37页。

③ 费弗尔："走向另一种历史学"，载《为历史学而战》(Combats pour l'histoire)，巴黎，1953年版，第419—438页。

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曾经十分明显，因为，从社会背景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史比无用还要糟，它肯定会使人误入歧途。① 社会史或经济史的专门化研究的价值，无论如何首先在于它能够为整个历史学揭示新的任务和新的研究方法。② 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布洛赫写道："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象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问题的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③ 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不能纯粹靠搜集和罗列事实来进行。"过去"是不存在的，试图通过努力重组残篇断片，为"一堆遗体"恢复生命，是一种错误的幻想。常规的历史学便是在这样的幻想中失足的。同科学家的做法完全一样，正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④ 布洛赫毫不妥协地坚持，历史学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分类和不断提高的理解力以取代简单的、杂乱的而且实际上是无限的堆砌物的话，"⑤ 便没有权利在严肃的知识形态中争得一席地位。

布洛赫和费弗尔制订的这项总纲领在重申历史学家工作的科学性时达到了顶点。他们所说的科学性同德国历史主义

---

① 参见西德尼·波拉德："经济史——一门以社会为对象的科学"，载《过去和现代》杂志，第30期（1965年）。该文巧妙地指出了这类错误。

② 博尔恩：前引书（1964年），第308页。

③ 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M.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巴黎，1949年版，第26页；戴维斯：前引书（1967年），第274页；布洛赫接着说："整个历史研究从第一步起就假定已经有了一个方向。那么一开始就要有想象。但是，在任何科学中，消极的观察决不会产生丰富的想象力。"

④ 费弗尔在为莫拉泽的著作《关于历史和文化的三篇论文》写的著名导言中，提纲挈领地提出了他的这个论述。

⑤ 《为历史学辩护》，前言第13页。

所主张的直观的、主观的和反科学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历史学的科学可靠性的信念——即便它还是“襁褓中的科学”——是从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反复讨论的课题。[1]这无疑说明了他们的思想对不满于常规的历史学的疲软无力的那一代人发生了的影响。对于常规的历史学的咬文嚼字，主观的“解释”，依赖无法证实的“观察力”，关注表面事件，不合逻辑的争论以及玩弄“与自己的对立面毫无差别的陈腐的心理学格言”，这些做法，都使他们感到厌恶。[2]费弗尔的历史学观念是“通过今天生活在人类现实中的人们并且为了他们而重现过去人类的社会和状态。”[3]这种历史观念引起了战后一代人的共鸣，同他们直接沟通，这恰恰是常规的历史学完全做不到的。更有意义的是，虽然格哈德·里特尔对“年鉴学派”的整个基本观点持怀疑态度，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年鉴学派从1948年以来，已经在德国稳步地赢得了追随者。[4]

然而，光凭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还不能说明“新历史学”在1955年以后为什么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发展。布洛赫和费弗尔的观点和他们向唯历史的历史学（histoire historisante）的不成熟和不充分发起的进攻，从根本上说都并不新颖。他

---

① 《为历史学辩护》，前言第14页。比较布罗代尔在1961年第16期《年鉴》杂志上的文章。

② 同上书，第102页。我曾在《历史与百姓》(G. Barraclough, History and Common Man，伦敦，1967年版）中说明了我对职业历史学家十分热衷的那场不合逻辑的争论——关于乡绅的产生和法国革命的起源——所持的观点，这里恕不赘述。

③ 莫拉泽：前引书（1948年）的导言，第8页。

④ 见里特尔：前引书(1955年)，第311页。他说，尤其是德国“大多数”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对“发展”和“起源”的兴趣，转而以法国的模式对某些特定时代或某些概念，如封建主义、文艺复兴等，进行结构分析。

们的历史观念与几十年前亨利·贝尔的历史观念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整个理论方面，他们所说的话，亨利·贝尔早在他的著作《传统历史学与历史综合》——仍然是一部读起来饶有兴味的，有启发性的书——中统统说过了。[①] 但是，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们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他们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们提出了总的历史观念，而在于他们不仅成功地说明了新历史学在实践中有可能实现，而且说明了如何才能实现。简言之，他们带来的变化是在方法论上，他们不满足于采纳某个理论立场——而贝尔对此大体上是满足的——而是撰写这类历史从而树立了实际榜样。他们相信在这个榜样中制定出新目标的实际含义，并且精心创造出一套方法使之付诸实现。由于他们的努力还是零散的，他们的公式尚不完善，因此他们的继承者和追随者——布罗代尔、维拉尔、拉布鲁斯、莫拉泽等人——继续执行他们未竟的工作。通过这样的方法，一种新的方法论在新观点的鼓舞下逐渐形成了。这种方法论的潜在可能性在布罗代尔的划时代著作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这就是 1949 年出版的关于腓力二世时代地中海世界的著作。[②]

这一演变的线索是不难看出的。例如，布罗代尔批判历史学家"中气不足"，认为他们把"人类发展的长河看作是由一段段短暂而强大的激流衔接起来构成的，其中每一段激流的长度最多也不超过几代人的时间"。相反，他着重强调了历史

① 1935 年出版。

② F·布罗代尔：《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n à l'épcque de Phillipe II)，巴黎，1949 年第 1 版。

的“无限连续性”①。然而，直到布罗代尔才提出了“长时程”(La longue durée)这一概念。②他强调指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所谓长期的连续性是指“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即人类同地球表面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③而短期的急剧变化却象一阵又一阵冲击着岩石的海浪一样，将长期的连续性冲破了，并且(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产生了“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这是一场非常壮观的人间戏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杰出的人物”。④但是，历史学家如何才得以认识“长时程”呢？长期所揭示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存在，能够超越和抵制政治的动荡。正因为如此，必须建立结构的历史(histoire structurelle，或 histoire structurale)。将注意力集中于独特和个别的瞬变现象的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旧技术，现在显然不能提供这类历史。此外，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中，不仅可以觉察到无限多的个别事件的流逝，就象“花朵一样在一天的时间里，凋谢得那么快，谁也不可能再次采摘它们”，而且还可以认识到事件之反复发生的节奏或周期，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周期，例如价格和工资的涨落，同时也包括只有少数“伟人”才能冲破它们的文化生活的周期。但是，只要认真地进行考察就会证明，即使那些被传统的历史学称之为事件缔造者和操纵者——例如俾斯麦——的行为，几乎也完全受到这种节奏或周期的制

① 《为历史学辩护》，前言第16页，正文第12页。

② 布罗代尔：《历史著作》(F. Braudel, Ecrits sur l'histoire)，巴黎，1969年版。

③ 布罗代尔：前引书(1949年)，前言第13页；《历史著作》(1969年)，第11页。

④ 格伦尼松：前引书(1965年)，前言第60页。

约。①这些就是“事态”(conjunctures)——这是一个来源于经济学的术语——它使我们再度面临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用一般的历史研究方法是无法叙述明白的。然而，在构成历史的这三项要素——即结构、事态和事件，或用布罗代尔的术语，“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中，前者是历史学家最为(或应当)关心的，因为结构和事态是事件赖以发生的基本场所。在这个舞台上，个人扮演着来去匆匆的角色。当这个演员隐去之后，舞台仍然存在，当光辉灿烂和令人神往——而同样短暂的——的明天和后天来临时，这个舞台又将为别的演员所占据。

这样的历史研究需要使用新方法。纯粹罗列事件，无论是多么匠心独运地将它们拴在一个因果关系链上，都无法满足这种新的要求。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可以把1882年以后对非洲的瓜分解释为一系列相互没有因果关系的、或没有目的的相互孤立的反应，这样，他们便无法看到正在发生作用的新刺激因素和基调的变化，这就是“只叙述事件的历史学”(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缺乏洞察力和远见的一个典型例子。②他们罗列的事实可能是真实的，但这些事实无关宏

---

① 德国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之一赫尔穆特·伯梅吸收了年鉴学派的方法论，他以渊博的知识令人信服地证明俾斯麦的政策怎样受到德国的繁荣和萧条周期的制约，即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态开始到1873年大萧条结束的一个周期的制约。参见H·伯梅：《走向强国的德意志道路》(Helmut Böhme, Deutschlands Weg zur Grossmacht)，科伦—柏林，1966年版。

② 参见R·鲁宾逊和J·加拉格：《非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R. Robinson and J.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伦敦，1961年版)以及他们的文章“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6卷，1953年8月，第1—15页)。关于我对他们的批评，见笔者著《当代史导言》(G.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伦敦，1967年，第2版，第58—64页。

旨。① 过分拘泥于事件的过程，过分拘泥于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日常决策活动，因而忽略了说明包含这些事件和决策在内的较大的周期或"事态"。关注事态的历史学家必须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事态的历史学本质上是"数学化的历史学"(histoire mathématisante)，即记载着人口变化、生产和价格运动以及各种类似的曲线和图表的历史学，这种历史学只有用数字才能说明白。不过，也不能以为这种方法只能用于经济领域。相反，文化史——尤其是民众文化史——也可以使用定量分析。分析在某个时间内——例如从1780年到1850年——出版了哪些书？多少人阅读？谁阅读？同样可以得出用其他方法无法得出的结论。② 而不是用谁是"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家"的主观标准来衡量，因为，在这个领域内，爱好的变化十分明显和迅速，谁来评价谁是不是伟大的以及用什么标准来进行评价？另一方面，"结构的"历史学还需要使用另外一些不同的方法。它同地理学、人口学、人种学、气候学和植物学有联系。布洛赫和费弗尔特别强调了历史学同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样的。③ 历史学的对象不是中世纪的领主制、新兴的欧洲君主国家的行政区域，或现代的民族国家——在

---

① A·P·桑顿：《帝国主义原理》(A. P. Thornton, Doctrines of Imperialism)，纽约，1965年版，第45页。

② 例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850年》(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850)，伦敦，1958年版；C·M·契波拉的《西方的文化与发展》(C. M. Cipolla,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哈蒙德斯沃思，1969年版。遗憾的是，坎托和沃思曼编的《民众文化史》(N. Cantor and M. S. Werthman, eds., The History of Popular Culture)，纽约，1968年版却很少注意到要义分析法。

③ 戴维斯：前引书(1967年)，第275页。

这个方面，传统历史学家所使用的空间划分和别处所使用的时间划分之间的差别同样十分明显——而是地理区域。布罗代尔在有关腓力二世时代地中海地区的著作中，第一部份把地中海地区的地理历史(géohistoire) 作为文化和历史的统一体来论述，从而给予地理区域这一概念以明确的形态。

年鉴学派的影响遍及整个欧洲。在意大利，它引起历史学家"逐渐摆脱克罗齐的立场"。① 在德国，它虽然经过了一番别具特色的改造，但影响到席德尔、康策和(唯一的中世纪史学家）博斯尔的历史观念，② 而且对 1945 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历史学家(例如韦勒)的影响则更大。③ 在英国，只要随便提到几个历史学家的名字，如鲁德、霍布斯鲍姆、拉斯勒特和汤普逊，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响。④ 不过，这些个别的历史学家和个别事例还不能从总体上充分反映年鉴学派的巨大影响。新历史学之所以能够被人们

---

① 莫米格利亚诺：前引书(1966 年)，第 237 页。

② T·席德尔："历史中的结构和人物个性"，载《历史杂志》，第 159 卷，1962 年，第 265—296 页；康策和席德尔刊于《历史科学和教学》第三卷(1952 年)上的文章；博斯尔："历史学和社会学"(1956 年)和"历史学中的'社会学方面'"，载《历史杂志》，第 201 卷，1965 年，第 613—630 页。又见席德尔的论文集：《当代的国家和社会》(Th. Schieder,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Wandel unserer Zeit)，慕尼黑，1958 年版。

③ 参见 H·U·韦勒编：《现代德国社会史》(H. U. Wehler, 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科伦，1966 年版。

④ 参见 G·F·E·鲁德：《历史上的群众》(G. F. E. 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纽约，1965 年版；E·J·霍布斯鲍姆：《最初的造反者》(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曼彻斯特，1959 年版和《劳工》(Labouring Men)，伦敦，1964 年版；P·拉斯勒特：《我们失去的世界》(P.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伦敦，1965 年版；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伦敦，1964 年版。

广为接受，其关键所在，或其特征，就在于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开拓新的视野。布洛赫和费弗尔可能都没有首尾一贯的历史哲学。① 但这并不会使他们感到极度不安。他们坚信，历史学的复兴在于实践而不在于理论。因此，那场关于历史学究竟是一门工艺学还是一门科学的旧的争论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便化为乌有。德国的新唯心主义者试图在历史学和科学之间，或者说，在历史的世界（die Welt als Geschichte）和自然的世界（die Welt als Natur）之间，拉起一道"铁幕"，这种企图永远是荒谬的，因为它建立在有关科学探索和长期被排斥的历史学研究特征的观念基础上。既然造成这种错误划分的根源现在已被广为认识，这里便无需赘述了。② 关键的问题在于，新唯心主义的肥皂泡一旦被戳破——尤其是一旦明确了历史学家运用传统的描述性、叙述方法叙述个别和独特的事件，并不是他们的资料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一种自愿的选择，那么，历史学的眼光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应当对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推动力作出更加有效的反应，这样，新的道路便拓开了。年鉴派历史学家们正是对历史工作的

① 参见I·S·科恩：《二十世纪的历史哲学》（I. S. Kon,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20.Jahrhunderts），柏林，1964年版，第2卷，第50—54页。

② 爱德加·温德的文章："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几点联系"〔载克利班斯基和佩顿编：《哲学和历史学》（R. Klibansky and H. J. Paton eds., Philosophy and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就是否定历史学是科学的典型。参见O·F·安德尔："理论上的历史学"（载《历史杂志》，第185卷，1958年2月）和G·巴勒克拉夫："科学的方法和历史学家的工作"（载E·纳格尔、P·萨伯斯和A·塔斯基编：《科学的逻辑、方法论和哲学》，斯坦福，1962年版，第584—594页）。当然，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把这一问题当作重点来讨论过了。

潜力充满新的信心而跳进了这样打开的裂口，这只能引起热烈的响应。

从"研究普遍规律的科学研究"和"唯思辨的科学研究"之间的长期对立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学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都是科学的，而且是地地道道的科学。马克·布洛赫曾经说过，"人类的科学"不是个别人的科学，而是人类的科学；不是一般人的科学，而是社会的人的科学。①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布洛赫赞同了菲士泰尔·德·库朗热的名言："历史不是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堆积，而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② 这是布洛赫和费弗尔发动的这场革命的关键所在。从个别，即"孤立的人"，转向"集体的人"，转向社会。每个个人，无论他是否愿意，都必定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份。③ 以个别人物贯穿始终的历史学把个别人物的行为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这种历史学也许并不需要是科学的，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以社会的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则必定是科学的。它与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布洛赫不止一次地声称，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差别。④ 但是，他自己却触及到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如果说社会科学家首要关心的是分析某个特定时候的静止的社会，那么历史学家的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所具有的时代感。布洛赫说，历史学不是纯粹的"人类的科学"，而是时代的人类的科学。⑤ 为了抵制社会学家当中

---

① 布洛赫：前引书（1949年），第4页。

② 同上，第110页，注4；参见戴维斯：前引书（1967年），第278页。

③ 武斯特迈耶：前引书，第26页。

④ 同上，第16页。参见戴维斯：前引书（1967年），第278页。

⑤ "我们说过：'人类的科学'……，但是还应补充说：'在某个时代的人类'"。见《为历史学辩护》，第4页。

把历史学说成与他们无关的这种趋势，他进一步自豪地声称，理解现在的唯一方法是离开现在并把现在看作连续过程中的一个部分。① 正是在历史学的领域中，才有能力将现在"置于"相互关联之中，从而防止了使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唯历史论的历史学家感到困扰的"缺乏远见"的"近视病"，这才是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作出的真正贡献。②

年鉴学派在转向社会科学以寻找新的认识能力、模式和方法时，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与美国历史学家在同一时期所走过的道路十分相似，而且总是殊途同归的。这两个复兴运动之间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但是，它们的区别在于，法国的历史学家侧重于强调时代感。这无疑就是为什么社会、经济和政治科学提出的理论框框在他们的手中总是比在美国历史学家手中灵活得多的原因所在。正如莫米格利亚诺所说的："年鉴学派为法国树立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相互交流的榜样。"它"与美国的榜样相比，远为高超和多样"，③ 因此也无疑更加有利于赢得追随者。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与苏联当代历史学家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年鉴学派力求与他们交换观点。④ 年鉴学派和苏联历史学家都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决定论，⑤ 但是，他们都相信历史研究从它本身的意义来说是科

---

① 武斯特迈耶：前引书(1967年)，第14页。

② 例如，布罗代尔攻击经济学家，说他们有"为现实服务和为政府服务而奔忙的积习"。参见格伦尼松：前引书，前言第58页；武斯特迈耶：前引书(1967年)，第32页。

③ 莫米格利亚诺：前引书(1961年)，第233页。

④ 博尔恩：前引书(1964年)，第307页。

⑤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第307页中说："经济造就了政治、社会、文化，但是，反之亦然。"请与格夫特和马尔科夫在"答关于苏联史学问题"中的说法相比较(《历史与理论》，第6卷，1967年)，第184，187—188页。

学的，这不仅完全可能，也是必需的。按照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主张去进行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把注意力从独特性和不可言喻的事物引向研究限制和制约个人自觉选择的结构和事态，引向研究“社会的无意识”，这“比我们习以为常的表面上熠熠发光的东西还要科学得多”。[①]他们为同苏联及其盟国的历史学家之间进行对话开辟了道路，至少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观察能力和方法，使他们可以从中得益，而且正在得益。

如果我们想概括一下1955年以来历史研究的新趋势，我们便可以说，最为突出的趋势是集中，这种集中的主要特征是全面抛弃了前一代历史学家的基本观点。与此同时还伴随着恢复对历史学的思考和写作理论的兴趣。[②]既然这种理论的讨论主要是涉及分析常规的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而不是加以批判，换句话说，主要是倾向于承认传统的框架是合适的，因此，相对而言，这场讨论对哲学家比对寻找新途径的历史学家更加重要，而且对当前潮流的形成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正因

① 布罗代尔："长时程"，载《年鉴》杂志(1958年)，第740页；参见格伦尼松：前引书(1965年)，前言第62页。

② 例如，P·L·加德纳：《历史解释的性质》(P. L.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伦敦，1952年版；P·L·加德纳：《历史学理论》(P. L. Gardiner, Theories of History)，格伦科，1959年版；W·H·德雷：《历史的规律和解释》(W. H. Dray, 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伦敦，1957年版；W·B·加利：《哲学和历史理解》(W.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伦敦，1964年版；A·C·丹托：《解析式历史哲学》(A.C. Dantor,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M·G·怀特：《历史认识基础》(M.G. Whit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纽约，1965年版；B·A·格鲁申：《论历史研究的逻辑》，莫斯科，1961年版；波布林斯卡：《历史，事实，方法》(C. Bobrinska, Historyk, Fakt, Metoda)，华沙，1964年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的哲学问题》，莫斯科，1969年版；古列维奇：前引书(1965年)。

为如此，我们这里只作一些简略的叙述。① 当前趋势的主要特征又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而在过去，历史学一直被认为是与社会科学相对立的。虽然在有关它们之间关系的准确性质如何，意见还不一致，但是，实际上，今天的历史学家——除非他以遗老自居 ——对这种联系已经不再表示怀疑了。②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正是年鉴学派的首要成就。关于这一点，与年鉴学派没有直接关系的许多作者也加以证实了。例如卡尔，他在 1961 年就有关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所作一系列的演讲而闻名于世，他的演讲甚至没有提及布洛赫和费弗尔或年鉴学派。但是，他曾经说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是在同一种研究的不同分支中进行工作的，即研究人类及其环境，研究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和环境对人的影响，"③ 这时，他宣告的这条原理，用格言和例证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树立起共同的信心。

美国历史学家 H·斯图尔特·休斯对迄今为止历史学研究所发生的变化作出了可能是最恰当的总结，至少，是以大多数历史学家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了总结。④ 斯图尔特·休斯只承认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范畴是"包含各种研究范围并且具有

---

① 参见 J·哈维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J. Havet,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纽约，1978 年版，第 1259—1276 页。

② 参见刊于《过去和现在》杂志第 27 卷(1964 年) 上的讨论报告："历史、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第 102—108 页。

③ 卡尔：《历史是什么?》(E. H. Carr, What is History?)，伦敦，1961 年版，第 80 页。

④ H·S·休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载《美国历史评论》，第 64 卷 (1960 年)，第 20—46 页。又见 H·S·休斯：《作为艺术和作为科学的历史学》(H. S. Hughes, 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纽约，1964 年版，第 1—21 页。

解释能力的假设”，这些假设既没有“穷尽一切”，也不是“排他性”的。他反对“机械地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凌驾于传统历史学的写作方法之上”。他也拒绝放弃历史学继承下来的“文学和推论的气质”。尽管这样，他还是认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社会科学提供的广泛而多样的假设完全可以应用于历史学。“它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能够使历史学家提高和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全部解释过程”，或者，正象某个英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可以使历史学家“在掌握了事实根据时能够做到比较客观，而在没有掌握事实根据时也不至于胡乱地得出无法证实的断言”。① 休斯认为，布洛赫的历史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我们从那种缩小了目标的历史学研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他的伟大功绩。在他的启发下，我们认识到，只要我们稍微转动一下常规的历史观的透镜，就会立即看见整个可能的新世界”。

斯图尔特·休斯对于“新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所作的评价尽管十分谨慎——或许正因为他如此谨慎——但他的话已经概括了过去十五年至二十年中历史学家的态度所经历过的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及其研究方法了。休斯说，“传统史学及其方法没有明确的概念，没有公认的解释规范，从知识的角度看，总是无力的”。② 他预言，“今天的历史学正在进入迅速变化和前进的时代，具有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物理科学所具有的那种特征”，并以此结束了他的评述。③ 最重

---

① K·托马斯：“工具与活计”，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历史学的新道路》(1966年)，第275—276页。

② 休斯：前引书(1960年)，第20页。

③ 休斯：前引书(1964年)，第20页。

要的一点是，这个进展的推动力是来自实践，而不是来自理论。正如音乐的发展以乐器的性质的改进为前提，天文学的发展有赖于建立功率更大和效果更佳的望远镜一样，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应。唯有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才可能使历史学有所发展。因此“思考的中心问题应当集中在研究方法上”。①

正因为如此，现在有必要讨论一下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主要借鉴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大到了例如非洲等新的地区，这些地区没有什么传统的研究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新方法无疑很粗糙，还有待于不断完善。但是，对这些新方法进行试验是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许还确实是历史学的未来所系。正如比利时的一位作家最近所说的，历史学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它也许能够坚持住，并且能跨进科学的门坎，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能够成为“人类科学中的科学”。否则的话——如果它想回避这场挑战——便要冒一场有失去自己地位的风险，既不成为一门科学，也不成为一门艺术，只能成为一门“业余爱好”而苟延残喘下去。这样的历史学无疑还会受到尊重，而且非常流行，但被剥夺了真正的意义，失去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②

① 格伦尼松：前引书(1965年)，前言第53页。

② P·勒布伦："发展与计量史学"，载《社会学研究所期刊》(布鲁塞尔)，1967年第4期，第600,605页；参见巴勒克拉夫：前引书(1967年)，第5页："[它将成为]一种消遣……一种高雅的消遣——退休的科技人员的消遣，帮助智慧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解除疲劳……但是……毕竟是一种消遣。"

3 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我们已经说过，推动1955年前后开始出现的"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这种说法并不奇怪，更没有丝毫贬损历史学的意思。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捍卫历史学的"自主性"而奋斗。① 这种做法，用詹姆斯·哈维·鲁宾逊许多年前的话来说，是"对科学进步的条件作了错误的理解"。任何一门科学和任何一门学科，都依靠着其他科学和学科，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汲取生命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从中获得自己进步的机会"。② 历史学在马比荣时代和波琅德学派时代第一次取得重大进展时，③ 曾经有意识地以《圣经》批判的新科学为榜样。后来，在尼布尔和兰克时代，历史学又曾经借鉴和利用过经典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今天的历史学转向社会科

① G·R·埃尔顿：前引书(1967年)，第8以下，47—48页。

② J·H·鲁宾逊：《新历史学：近代史观论文集》(J. H.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纽约，1912年版，第73页。

③ 马比荣(Jean Mabillon, 1632—1707年)，法国历史学家，校勘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古文书学》(1681年)和《本尼狄克特年代记》(1668—1702年)。波琅德学派指十七世纪法国耶稣会的学术团体，以约翰·冯·波琅德(Johann van Bolland, 1596—1665年)为首，著有《圣徒传》。——译者

学去寻找新的认识能力和新的研究技术，只不过是继续了历史学研究过去在发展和提高的每一个转折时期一直遵循着的那种实际做法而已。

历史学家们会看到，他们自己的观点在社会科学的著作中大量地反映出来，这也不足为怪。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有着共同的目标，至少，它们都扎根于同一块土壤上。两者至少在原则上都自称要以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要研究"任何特定时间上的总体状况；它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全面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和人际关系"。①虽然历史学的渊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些甚至可以溯源到遥远的过去，有些还同宗教和哲学有关系。但是，作为理性探索的历史学，它的起源和社会科学一样，都产生于十九世纪实证主义这同一块土壤上。换言之，社会科学和历史学都声称要寻求某种真理，都标榜要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②我们已经看到，这是菲士泰尔·德·库朗热、阿克顿和布里等历史学家的信念，同样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康德和斯宾塞的信念。在德国历史主义——这是对实证主义的反动——的影响下，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性目标或半共同性目标被破坏了。从此以后，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不再是携手合作的盟友，反而相互视为仇雠。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德国历史主义的破产，自然而然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新结合开辟了新的途径。

---

① 参见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历史学会)的报告《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 in Historical Study)，载《社会科学研究会公报》，第64期(1965年)，第41，87页。

② 参见A·S·埃森施塔特编：《美国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第2卷，纽约，1966年版，第116，119页。

当然，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还有更直接的原因。社会科学家取得的成就，无论按公众一致承认的标准来衡量，还是按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所具有的潜在启发能力为标准来衡量，都是极其卓著的。历史学家当然会扪心自问：难道社会科学的这些方法和概念不能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有所裨益吗？第二个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势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从 1940 年到 1970 年，一系列的新问题不断出现——群众的行为、文化移入、城市化，精英人物的作用，这些还只是其中的少数例子——对于这些新问题的研究，用历史学的常规研究方法显然是难以适应的。结果，产生了历史学在方法论上的差距——即“史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重大差距”，历史学家之所以要转向学习社会科学家所创造的研究技术，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相信社会科学家已经提供了能够弥合这种方法论上差距的手段。①

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在简单地照搬社会科学的术语和范畴。首先，任何社会科学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具有逻辑上完整理论体系的部门，都不可能通过上述方法自动地将它们转换过来并加以吸收。一切社会科学都处在成长和试验的状态中。它们象历史学一样，依然还没有定型。社会科学家之间在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象历史学家之间一样，观点上的分歧也是十分尖锐的。其次，历史学家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接近社会科学的，他们抱有各自的不同目的，而且往往受到本民族传统的影响。苏联历史学家自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

① 参见 L·本森：“研究过去公众舆论的科学方法”，载 D·K·罗尼和 J·Q·小格雷厄姆编：《计量历史学》(D. K. Rowney and J. Q. Graham,Jr. eds., Quantitative History)，霍姆伍德，1969年版，第28—29页。

展开活动；法国历史学家比较偏爱迪尔凯姆、西米安、莱维-斯特劳斯和居尔维什；而在德国，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依然非常强大；美国在默顿、帕森斯和拉扎尔斯费尔德等社会科学家的影响下，研究重点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在大型理论化上，而是强调将某些概念和方法应用于范围有限的一些历史问题和具体的历史状态上。上述这些差别反映了不同的民族传统和历史传统，打下了烙印。只要比较一下美国的福格尔、艾德洛特和李·本森，法国的布罗代尔、古贝尔和莫拉泽以及德国的布龙纳、席德尔和康策的著作，就不难看出他们都有各自的明显特征。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产生于两个明显不同但却部分重叠的时期。即使在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还处于极盛的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历史学家，如法国的亨利·贝尔和美国的詹姆斯·哈维·鲁宾逊，始终在向社会科学寻找新的认识能力。不过，在这个阶段中，重点还是放在社会学、人种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论证方面，即使那些对旧的传统方法最不满意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开始着手去寻找新的历史证据和探索更加严谨的研究技术。① 大体说来，这就是1900年到1950年的基本状况。1950年到1955年之间，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本质特征是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社会科学创造的比较广泛的一般概

---

① G·巴拉克拉夫前引书（1955年）也许可以看作体现这个阶段主要趋势的最典型例子。虽然它批判了陈旧的观点并坚持有必要探索新方向，然而这种批判本质上是被动的，而且仍然承认传统研究方法是合适的。I·S·科恩指出，这本书并没有指出明确的前进道路。见I·S·科恩：《二十世纪的历史哲学》(I. S. Kon,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s)，第1卷，柏林，1964年版，第15—16页。

念转向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当然，对社会科学的概念所抱有的兴趣并没有减退，不过，这时已经同样认识到了，每一种历史学研究的新方法都需要一种相应的技术装备。新问题必然会引起新史料的使用并且出现适当的方法。这种新方法就是由1940年以后那一阶段中的两项发展提供的。第一项发展是大批涌现的社会科学研究技术，例如计量分析、分级程序技术，多重关联技术，回归分析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统计方法。第二项发展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计量历史研究方法的可行性。1950年以后，社会科学为历史学家开拓的前景不仅极为丰富多彩，而且比以前更加明确了。①

因此，社会科学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对历史学研究发生了影响。第一个层次是应用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思维的范畴。这些范畴已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检验，获得了声望，至少使人们不得不加以承认。第二个层次是新的计量方法的运用。尽管在过去的九到十年中，这种新方法多少有些轻率地夸下了海口，但实际上，这种方法仍然处在试验和尝试的阶段。在以下各节的讨论中，我们先全面地叙述社会科学的概念对历史学的影响，然后再讨论历史研究方法的新趋势。这个新趋势总的说来可以归结为历史学的计量化，或计量历史学。这一类的叙述所采用的一般做法，往往是分别考查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分支——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对历史学的作用。不过，这样的划分似乎夸大了各门学科的独立性。有些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的某个分

---

① 参见J·M·普赖斯："当前的计量历史学著作"，载《计量历史学研究》(Studies in Quantitative History)，1969年版，第4，7页。

支(例如社会人类学)特别关注，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却对另一门社会科学(例如社会学)最感兴趣。至少，在最初阶段上，社会科学各分支对历史学发生的影响不可能存在非常明显和确切的界限。此外，我们还必须牢记，象“结构”和“结构主义”这样一些概念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从数学、语言学到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所有的社会科学中去了。① 不久以前，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尤其是计量经济学。这种影响不仅改变了一代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方向，使他们从叙事式转向分析式，而且还是使各个部门和领域中的历史学家们都深切地感受到统计学和数据资料确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因素。② 然而，总的说来，历史学家在社会科学中发现了一系列概念和各种类型的新研究方法。他们是愿意接受这些概念和方法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深感不安。至于这些概念是来自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来自经济学，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探索这些概念使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增加新内涵的可能性有多大。

---

① 参见J·皮亚杰：《结构主义》(J. Piaget, Le Structuratisme，巴黎，1968年版)的导言。

② 参见R·戴维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R. Davis,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莱斯特，1965年版，第5—6页。他认为，出版利普森《经济史》(1915—1930年)和克拉潘《经济史》(1926—1938年)的时期是英国的转折点。克拉潘的特点是承认马歇尔经济学的分析能力，为“富有成果地描述我们过去的经济状况”提供了工具。克拉潘还在前言中着重批评了那些“忽视数量的历史学家”，并且力主“在各方面都有可能用比以前更加清晰的定量方法来说明过去的状况”。

3.1 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贡献

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原始的"文化和"文明的"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也是如此。其次，有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例如文化转移、不同社会(通常指比较原始的社会和比较先进的社会)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变化——对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研究主题。

以历史学为一方和以人类学和社会学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目标和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① 确实，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家使用的唯一证据——无论其研究领域多么特殊——只可能是历史的证据。② 然而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处理证据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上教给历史学家处理证据的方法。绝大多数的资料是相互关联的，更不用说当代社会中的关系是多么复杂了，这意味着社会学家不可能期望通过使用叙述的方法来罗列事实资料这样一种简单过程就可

① E·E·埃文斯-普里查德："社会人类学今昔"，载《社会人类学论文集》(E. E. Evans-Pritchard, Essays in Social Anthropology)，伦敦，1962年版，第25页。

② F·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学"，载《历史写作》(F.Braudel, Ecrits sur l'histoire)，巴黎，1969年版，第104页；参见《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第31页。

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因此，不管他愿意与否，都不得不转而采用其他的研究方法，例如民意测验、抽样分析、统计分析等等。这些方法为掌握大量的、杂七杂八的信息提供了可观的前景。至于人类学家遇到的问题，意义完全相反。如果说他们不是完全没有至少也是缺乏通常的那种历史档案。结果，人类学同社会学一样，有必要创造其他研究方法，那就是搜集埋藏在地下的资料，探询活着的见证人。

但是，人类学和社会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不是采用哪种研究技术，而是要带着问题去研究自己掌握的资料。他们不是寻找随手拈来的资料，而是寻找具体的资料来回答(据说)"当前形势的压力"迫使他们回答的问题。① 其次，为了衡量这些答案的价值，社会学家必须将这些答案置于某种理论体系中，并且只有将这些答案排列起来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研究的社会"结构秩序"一一对应，才有可能"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加以理解"。"这种能够从整体上看问题的模式，或作为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抽象"，一旦建立起来，并且把某个社会中的结构模式孤立起来，才可能进一步将这种模式同另一个社会中同类的模式作比较，从而建立起类型，并且确定它们的本质特征以及它们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②

从原则上来说，这和大多数历史学家声称他们也要做的工作也许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同社会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也使用概念和假设作为选择和解释的基础。舍此便无法进行工作。③ 其实，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两个主要差别。第一，历史学家使用的概念倾向于比较含蓄、武断，而且缺乏系统性。而社会科学家的概念则明确和系统化。第二，因为历史学家手中的资料提供了与事实相联系的某种类型的松散

叙事模式，所以历史学家尽可能回避理论问题。他们宁可多研究一些事件和人物，也不愿去探讨基础结构。因为事件和人物在历史记录中比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的资料中，通常叙述得更清楚。

评价人类学和社会学对历史学的贡献就是以上述情况为背景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贡献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恢复历史学家（至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抛弃的那种对科学精确性的理想。当时，这些历史学家正在同本身的实证主义遗产决裂。由于他们把制约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当作无法捉摸的东西，从而丧失了发现客观规律的希望。因此，他们相反退而执行一项精确性要求不高的任务，即为社会提供"集体的回忆"。④社会科学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而历史学家在里克特和狄尔泰的打击下丧失了信心，无力确定自己的研究工作应不应当被看作是科学的。对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科学性——按照爱因斯坦的定义，是通过把"个别经验"和"理论结构"联系起来，从而努力将我们杂乱无章和五花八门的感觉经验去对应一种逻辑上统一的思想体系⑤——却是研究工作的实质所

① 埃文斯-普里查德：前引书（1962年），第59页。

② 同上，第22—23页。

③ 历史学家使用的典型概念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革命、民主、俄国农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开明君主等等。参见《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1954年），第94页。

④ 这是雷尼尔对历史学家的职能所下的定义。见G·J·雷尼尔：《历史学的目的和方法》（G. J. Renier, History, Its Purpose and Method），伦敦，1950年版，第19，24页。

⑤ 参见O·F·安德尔："理论历史学"，载《历史杂志》，第185期（1958年），第28页。

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不可能在否定科学探索的目标和方法的同时而不脱离赖以立足的基础。如果不能声称自已将为社会提供依靠某些方法获得的某种知识的话，他们将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东西。① 自然，通过种种途径，他们已经改进了自己继承的实证主义遗产。②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基本信条，即对人类科学的效能所抱有的信念。

正是坚信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有可能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才是一般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对那些试图摆脱由于拘泥于历史主义而陷入困境的历史学家的主要贡献。陶尼曾经言简意赅地说过："野蛮人根本没有理由要掌握科学"。③ 如果说人类学家用科学方法可以解释原始社会的机制，社会学家运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说明当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那么，就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应当用同样的方法对过去的社会进行研究？对某项研究技术或概念的可用性可能会提出疑问。但是，社会科学已经做出的榜样无疑是鼓励历史学家重新探讨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可能性问题的最重要因素。克罗斯曼说过："如果历史学家试图以社会科学的发现为基础来说明人类行为模式赖以相联系，并最终赖以作出预测的一致性，那么，历史学就不再是(普鲁塔克所说的那种)寓有伦理道德的故事了，也不再是(赫

---

① 埃森施塔特：前引书(1966年)，第2卷，第120页。

② 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属于本书的范围。这方面的实例请参阅 D·G·麦克雷："社会学的危机"，载 J·H·普卢姆编：《人文科学的危机》(J. H. Plumb ed., 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哈蒙德沃思，1964 年版，第 126—130 页。

③ K·托马斯："历史学与人类学"，载《过去和现在》杂志，第 24 期(1963年)，第12页。

伯特·斯宾塞所说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一个伪分支。”①

因此，我们若要具体说明社会科学影响历史学家的态度和假设通过哪些途径发生影响，那么，第一条途径，也是最普遍的结果，无疑是研究中心的重大转变，即从特殊转向一般，从个别事件转向一致性，从叙事转向分析。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作用之间划一条过分明显的界线。确实，有些作者特别强调了人类学的作用，往往把它说成“最类似于”历史学的一门社会科学。② 因此，巴格比曾说过：“历史学如果真的想要超越‘半理性活动’的话，它就必须大量依赖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③ 埃文斯-普里查德甚至扬言：“历史学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成为社会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④ 当然，人类学确实通过好几种方式对历史学施加了独立的影响，例如，人类学纠正了历史学家固有的种族中心主义，并且证明历史写作并不完全依赖于使用文字档案，也为历史学家研究那些文字档案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的有关地区（例如非洲）提供了工具。对于这些方面，我们将要加以讨论。这里同样不需要作专门的论述，就可以理解历史学家在研究王权制度时可以有效地利用人类学家如范西纳关于非洲诸王国的著作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关于苏丹锡卢克人中君权神授观念的著作。⑤ 这些

---

① 摘自安德尔：前引书(1958)，第66—67页。

② 摘自《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1954年版)，第35页。

③ P·巴格比：《文化和历史：文明比较研究导论》(P. Bagby, Culture and History)，伦敦，1958年版，第20,50页。

④ 同上，第64页。不过应当补充一句，他还说过一些相反的话。

⑤ J·范西纳：“非洲诸王国比较”，载《非洲》杂志，第32卷(1962年)；E·E·埃文斯-普里查德：《苏丹尼罗河流域锡卢克人的君权神授观》(E. E. Evans-Prichard, The Divine Kingship of the Shilluk of Nilotic Sudan)，剑桥，1948年版。

著作还同样可以应用于社会生活研究的许多方面，从结婚、离婚到亲缘仇杀，叛乱和千年王国派运动等等。基思·托马斯曾经指出，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主题的史料并不缺乏，倒是历史学家从未象人类学家那样用他们学来的方法去研究这些史料。例如，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正苦于缺乏有关农奴的观念和态度的证据时，人类学对原始人类的精神状态的研究为他们提供了可贵的认识能力，因为认为各个地区的农民社会没有共同的特征的说法可能言之过甚。①

然而，当我们从这些特殊的事例转向讨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更为一般性的影响时，简直难以将它们加以区别。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毕竟是极为密切的，而且会越来越密切。② 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自然是它们的共性，而不是它们的差异。如果我们浏览一下迄今为止探讨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的大量文献和著作，便不难看到，在一些总的观点上已经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从当前着眼，我们只要将这些观点简单开列如下：③

一、首先，作为其他各点的基础，是要认识到里克特、狄尔泰、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等新唯心主义者建立的历史认识“模式”并不是必需的。正象有位作者所说的：“如果说有的历史学家从资料中看不出有结论性的东西，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去寻找”，而不是里面没有。④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对新唯心主义的立场是否正确总是可以怀疑的。⑤ 人类学和社会学所起的作用就是要证明这种哲学上的怀疑在经验上是正确的。换言之，按照新唯心主义理论的说法，使用那些不能应用于人类社会研究的方法，反而可以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二、特别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表明所谓历史事

实的“独特性”的说法，即认为对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是不可行的(如果这样做便要导致错误)说法是一种神话。即使历史学

---

① 托马斯:前引书(1963年),第10,16—17页。

② B·J·西格尔编:《人类学的两年回顾》(B. J. Siegel, Bienni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斯坦福,1965年版,第182页以下。

③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著作外,下列著作是比较重要的：W·J·卡恩曼和A·波斯科夫编:《社会学与历史学。理论与探索》(W. J. Cahnman and A. Boskoff eds., Sociology and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纽约,1964年版;S·M·利普塞和R·霍夫施塔特编:《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S. M. Lipset and R. Hofstadter eds., Sociology and History. Methods),纽约,1968年版;《历史学与社会学》,莫斯科,1964年版;E·N·萨维施编:《美国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E. N. Saveth ed.,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纽约,1964年版;F·多弗林:《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F. Dovring, History as a Social Science),海牙,1960年版;珀金:“社会历史学”(1962年);G·勒夫:《历史学和社会理论》(G. Leff,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伦敦,1969年版;L·本森:《向科学的历史学研究迈进》(L. Benson, Toward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istory),费城,1971年版;M·科马罗夫斯基编:《社会科学的共同领域》(M. Komarovsky, Common Frontiers of Social Science),格伦科,1957年版;I·M·刘易斯编:《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I. M. Lewis ed.,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伦敦,1968年版;J·克吕托夫:“历史学的重要性何在?一种社会学方法”(1963年);T·C·科克伦:《内部革命。论美国历史学中的社会科学》(T. C. Cochran, Inner Revolution. Essays o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64年版,其中的“社会科学和历史综合问题”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等两篇论文尤其重要;《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3卷(1957年)和第65卷(1959年)哈尔彭等人的文章;霍夫施塔特:“历史和社会科学”(1968年);P·拉斯勒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1968年);G·巴勒克拉夫:“科学方法和历史学家的工作”(1962年);S·W·F·霍洛韦:“历史学和社会学”(1967年);C·莫拉泽:“社会科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1968年);A·B·科班:“历史学和社会学”(1961年);W·O·艾德洛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1954年);K·波斯尔:“历史学与社会学”(1956年)和《历史学中的社会学方面》(1965年);席德尔:“历史学中的结构和人物个性”(1962年);E·皮茨:“结构:关于所谓历史学根本危机的思考”(1964年);E·M·斯塔尔曼:“关于历史结构分析问题”(1968年);M·A·巴格:“历史著作中的结构分析”(1964年)。

④ W·J·卡恩曼等,前引书(1964年),第5页。

⑤ P·L·加德纳:前引书(1952年),第44,64页。

家比较愿意关心引起变革的异常因素——例如拿破仑或希特勒的性格——而不愿去不理解正常因素的格局，但是事实上，正如通常所指出的，如果不理解发生异常的规则，便不可能充分理解异常因素。或者正象赫伊津加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依靠抽象才能区别具体，特殊只存在于‘一般’的框架中。”① 不过，除此之外，在传统历史著作中发挥中心作用的个人也是一种“抽象”，就象一个群体概念一样，同样是思维的产物，只有“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才能“观察到”，他是“概念的统一体，而不是感性的统一体”。② 如果单一或个别确实象常常说的那样，是“不可言喻的”，那么根据事实本身便可推论出它是不可知的。③ 因此，反过来也可以说，认识大规模事件比认识历史学家详加叙述的细小事件可能更为准确。或者正如冯·贝尔塔兰菲所说的，“被事实证明的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统计的模式和普遍的模式。”④

三、重新估价个人历史作用的结果，是驱散了历史决定论的梦魇。事实证明，历史决定论是巨大的阻力，妨碍了建立历史规律的种种努力。没有谁会否认个人有选择某些行为方式的自由。但是，事实也证明，这种选择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受

① 摘自F·R·斯特恩编：《历史学的多样性》(F. R.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版，第298—299页；《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1954年)，第50页。

② M·科马罗夫斯基，前引书(1957年)，第16页；参见布罗代尔：前引书(1969年)，第21页。

③ C·佩雷尔曼编：《历史学家的推理和推理方法》(C. Perelman [ed.], Raisonnement et démarches de l'historien)，布鲁塞尔，1963年版，第41—42页上P·勒布伦的文章："结构和计量化"。

④ L·冯·贝尔塔兰菲：《总体系》(L. von Bertalanffy, General System)，第7卷，1962年版，第17页；参见巴格比：前引书(1958年)，第35—36页；多弗林：前引书(1960年)，第78页。

到外部具体环境和固有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它们不是随意分布的”，而是“排列在某个模式中，既相互依存，又可以相互转换”。① 抽象地看，这也许是老生常谈。但是，社会学的作用恰恰是使之明确起来。也就是说，社会学证明自由选择或自由意志并不纯粹是任意的因素，即不是妨碍人类历史合理布局的意外因素。恰恰相反，它是可加以理性分析或甚至可用数学公式表示的。② 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我们使用了这种方法就能够“超越”个别，从而理解到历史不只是独特的或个别的——“不会出现两次的——事情和阶段，而是更加复杂、更加长期的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③

四、因此，社会学和人类学开拓了从个别过渡到典型，从单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过渡到事件和个人在其中活动的基本结构的新道路。这条道路一直存在，只不过被历史主义掩盖着。这个结构用福布斯教授的话来说，是“任何连续的社会中的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④ 开始把研究重点放在结构和“表现为适度时间连续性的有组织的行为体系”上，这大概可以说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它的意义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

五、当然，社会结构是不可能直接观察到的，只是从分析观察到的行为中产生的抽象。不过，按照一定的逻辑将这些抽象联系起来，使之呈现出模式，我们便可以通过这些模式看到社会的本质，并把社会看作一个单一的整体。人类学家

---

① 《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1954年），第43页。
② 冯·贝尔塔兰菲：前引书（1962年），第17页。
③ 布罗代尔：前引书（1969年），第21，102页。
④ 摘自托马斯：前引书（1963年），第17页。

和社会学家坚信，“人类的行为只有从完整的社会背景中去看才可能理解”。他们把每一种机构都看作是整个社会中有功能作用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社会的结构模式。①

六、关注于结构模式而不是着意于建立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间的联系，结果必然导致研究重点的转移。人类学最关心的是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决定社会行为的家庭关系、亲缘关系、法律和其他因素（例如社会习俗中的禁忌）。社会学家所关心的主要也是当代社会中的常规结构，例如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欲望和流动，个人对社会地位和安全的追求，选举中的偏向和习惯，工业企业和就业的变动形式，少数人构成的社会集团的特征和作用等等。但是，这样的一些制度和关系与类似的制度和关系，在历史学家描述的社会中显然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要将它们交给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去研究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没有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研究技术。因此，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引导历史学家去重视这些问题，而且指出了他们应当如何去处理和评价这些问题。

七、迄今为止，大凡对社会作过研究的历史学家基本上还是把社会当作印象式的“布景”，粗略地勾画了它的轮廓。然而，一出出政治事件的剧目正是在这个布景前面上演。结构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旦被确认，显然必须对结构模式加以认真的研究。其结果不仅扩大了研究主题的范围，而且使观

① 埃文斯-普里查德：前引书(1962年)，第19,23页。

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取代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中心——国家，意味着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了政治单位的突出作用只限于(即使在当时尚不完全限于)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阶段内(基本上指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同时还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有效实体可以(而且往往)超越或跨越政治界限。因此，把巴尔干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①比分别研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或克罗地亚的历史更容易理解，而且正象马克·布洛赫向我们表明的，研究贝里、布列塔尼、洛林和朗格多克这样的一些地区也比研究中世纪的法国更容易理解一些。因为，前者"包含着人类最根本的差别"，它们彼此之间在结构上的差异大于同它们接壤的政治体之间的差异。②这些区域的集合体和语言的集合体有自己的聚合力。"这种聚合力符合决定这个区域的居民一辈子的习惯生活方式、阶级和社会地位的特征、财产从属关系的形式以及商业生活方式"，更不用说那些会影响到民众态度和反应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其中也包括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应。③

八、把结构当作历史研究新重点的进一步结果是动摇了历史研究迄今为止将政治史放在优先地位的几乎视为当然的信念。与一般的观点相反，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即叙述政治事件的历史，既没有实用价值，也没有教导的价值。④这

① T·斯托亚诺维奇：《巴尔干文明研究》(T. Stoianovich, A Study in Balkan Civilisation)，纽约，1967年版。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年)是对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进行类似方式研究的一个榜样。

② M·布洛赫：《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M. Bloch,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巴黎，1952年增订版，前言第9页。

③ 参见K·F·莫里森：《欧洲的中世纪》(K. F. Morrison, Europe's Middle Ages)，1970年版，第13页。

④ 参见多弗林：前引书(1960年)，第54，89页。

类历史之所以还能不断地出现是因为公众还渴求它。不过，今天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会赞同海梅·比森斯·比韦斯的看法，即政治史"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新"贡献。① 其次，以政治事件为标准，将历史按政治事件的先后次序贯穿起来，并加以相互联系往往会产生谬误。布罗代尔在他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过某些历史学家的眼光肤浅，他们认为 1945 年以后的一系列事件是由雅尔塔协定或波茨坦协定造成的。② 科克伦在一篇被大量引用的论文中论证，当人们从"贯穿于长期的社会线索"来看待美国内战——"美国历史学上的重大分水岭"——时，它的重要性便开始削弱了。用王朝、战争、历届政府——例如路易十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杜鲁门政府——的方式来划分和排列历史事件并进行归类，就是只强调短期观点而忽视长期观点。"虽然事件是史料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连那些偶然的事件也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强烈影响，而应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于研究那个揭示文化发展主要动力的事件的各个方面"。③

九、所以，历史学家关心的中心问题，正象科克伦所说的，应当是"最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基本信念这样一些制约人类的因素所发生的物质变化和心理变化"，这些因素将决定"研究主题和历史年代的划分"。这无疑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社会现实"。他力主历史学家集中研究这种"社会现实"。这同样也是海梅·比森斯·比韦斯告诫西班牙历史

---

① 参见 J·比森斯·比韦斯：《西班牙史研究方法》(J. Vicens Vives, Aproximación a la historia de España)，巴塞罗纳，1960年版，第176页。

② 布罗代尔：前引书(1969年)，第63页。

③ 《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1954年)，第163，170页。

学家时想到的。他要求他们抛弃陈旧的“框框和陈词滥调”并转向研究“基本因素”，例如“人类、痛苦和饥荒；瘟疫和死亡；土地所有制、领主与其封臣之间的关系、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教士与信徒之间的关系……”。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结构基础”的偏爱——也就是说，不纯粹是另一种主观和武断的选择。相反，这是一种需要，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正常时，我们才有了一个标准去衡量什么是个别和偶然。①

十、然而，我们如何建立社会现实和结构基础呢？很久以前，诗人格雷曾经说过，关于穷人的历史记载既短又简单，在历史档案中的地位极低。此外，任何史料都有固有的偏向。任何手稿的搜集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偶然性的历史搜集工作。假设有关的手稿能够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的话，我们得出的结论恐怕就会完全不同了。与一般的想法相反，如果我们从叙事性史料转向考古学的证据，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②何况历史学家还会掺入自己的倾向。这当然不是说历史学家在解释证据伊始就有意掺入自己的偏见，而是说他们在选择看来比较重要的那些证据的过程中更加直接地掺入自己的倾向。蒂利曾经指出，“潜在的解释结构”以及有待于回答的问题的提出，都影响到资料搜集工作。因此，对于历史上个人的作用、个人的动机和责任抱有兴趣的历史学家会忽视那些眼下看来与他正在关心的问题没有多大直接联系——如果不是完

① 《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1954年)，第169页。参见布罗代尔：前引书(1969年)；比森斯·比韦斯：前引书(1959年)，前言第24页。

② 参见D·K·罗尼和J·Q·格拉厄姆编：《计量史学》(D. K. Rowney and J. Q. Graham eds., Quantitative History)，1969年版，第78，122页；多弗林：前引书(1960年)，第35页。

全没有联系——的那类证据，是一点也不奇怪的。[①] 总而言之，一般的历史资料(编年史、年鉴、回忆录和书信等)把正常视为当然，视为已经被认识了的东西而无需解释，相反，集中记述那些感动写作者的非常事件和非凡人物。写作者认为这些事件和人物更有趣，因此更值得记载。历史学家便被引向了上述方向。传统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杰出人物身上除了出自于好奇心之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主要原因，因为杰出人物的历史记载比较丰富，比较完整(且不说往往被有意地拔高)。而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史料却难以寻觅。结果是，那些对个别事件不感兴趣却只关心社会结构的历史学家不得不从"研究个别"的历史学所忽视的特殊类型史料中"研造"出自己的资料。这些史料之所以被忽视恰恰因为它"研究个别"。换句话说，从不同的角度去处理现有的文件资料无疑完全可能改写我们对过去所作的描述。相反，希望阐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历史学家却无法逃脱按照新问题的需要来重新编排新文件资料的繁重劳动。[②]

十一、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学的"另一条逻辑"对历史学家贡献最大。社会学和人类学提供了考查证据的其他方法，实践也证明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实际上，如果历史学家无视这类方法，势必会"遗漏许多问题"，也无法正确地提出问题(即"引出回答的问题")，结果也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③] 这种说法是有充分根据的。社会学对于什么需要作出

① C·H·蒂利："剖析反革命"，载罗尼和格雷厄姆：前引书(1969年)，第188—190，196页。

② 同上，第63页；参见布罗代尔：前引书(1969年)，第25页。

③ E·E·埃文斯-普里查德：《社会人类学论文集》(E. E. Evans-Pritchard, Essays in Social Anthropology)，伦敦，1962年版，第59页。

解释、如何作出解释等观念引出了划分材料的不同方法、对不同类型资料的探索，处理这些资料的不同方法，衡量重大问题的不同标准以及新的结论。同时，还澄清了传统上的争论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新主题的研究，而且可以处理人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历史问题。

十二、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首先必须引入比一般历史学著作中所具有的更高的思维精确性。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有矛盾。历史学家的习惯就是集中精力于细节。表面看来，这是最准确、最肯定的。然而，这种徒有其表的精确性全是假象。历史是一系列不需要作出解释的具体事实，这种观念就象约翰逊博士要证明椅子的实在便对它踢上一脚一样，或者就象有人想要否定哥白尼体系便硬说人人都看到了太阳从早到晚在天空中移动一样。历史学家所依据的常识性概念实际上等于含糊不清的、未经验证的和不可靠的结论。这些结论的准确性“往往还比不上原始部落居民对自然现象作的解释”。[①]他们自以为已经认识了人类行为的规律并用这些规律作为尺度，而不以历史证据为手段去检验这些结论。结果就象约翰·德莫斯所证明的那样，产生了例如家庭史研究领域中那种十分明显的错误。[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研究方法中那种印象主义的性质也使他们的结论无法得到验证和肯定。例如，“历史学家信手使用从报纸上摘引的只言片语，实际上却对现代的要义分析技术一窍不通。”他们没有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得

---

① 巴格比：前引书(1958年)，第37页。

② J·德莫斯的论文：“殖民时期布里斯托尔的家庭”，载罗尼和格雷厄姆：前引书(1968年)，第293—307页。

出的结论也不系统。① 社会学对历史学的重要实际贡献之一就是为历史学提供了纠正准确性不足的工具和技术，使历史学家可以用准确的、结构严谨的假设去取代一厢情愿的推测。

十三、在上述的各项技术中，无疑应当首推数量分析技术。确实，可以说数量分析与其说是一种技术，不如说是一种为其他各项研究技术奠定基础的基本程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数量分析在当前各种趋势中最强大，我们将对它作专门的讨论。一切结论都包含着定量的成份。历史学家在使用"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或"广泛的"这样一些词句时，尽管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都对量作了含糊的和不确定的陈述，区别在于他们是否用数字来证实他们的陈述。历史研究数量化的价值，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提供了检验和核实这一类笼统说法的手段。换句话说，数量分析方法提出的问题就是历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用相对精确的定量陈述，去取代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不够精确的陈述。②

十四、不过，数量化不是衡量研究方法是否已成系统的唯一标准。虽然数量分析法是当前社会科学对历史学家的研究技术装备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但决不是唯一的贡献。要求对资料进行全面和严格的，而不是片面和任意的编排、归类和分析，也许会导致数学程式的产生，然而，也并不一定如此，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是不可能的。人类学并没有借助于数量化

---

① 德莫斯：前引书，第 121 页；参见科马罗夫斯基：前引书（1957 年），第 29 页。

② 科马罗夫斯基：前引书（1957 年），第 117 页。罗尼和格雷厄姆：前引书（1969 年），前言第 7 页，正文第 4 页。

技术却成功地建立了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正确结论(例如,每种文化都包含某种形式的宗教,又例如,每种文化都禁止乱伦的行为)。① 更重要的是,社会学家形成了可以称为"编组概念"(organizing concepts)或"概念形象"(conceptual images)的东西。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例如官僚集团、社会地位集团,具有非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等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社会学家提出的用以说明并建立社会变化模式的理论是系统分析方法的又一实例。这种系统分析方法就其性质而言不是,也不可能是定量的。②

十五、马克斯·韦伯把类型学概念的形成看成是社会学对历史学的最重要贡献。这种类型——或模型——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们虽然产生于经验性的(往往也是历史性的)资料,却力图超越这些资料并建立起抽象概念和相互关系。可以说,这样的模型能够普遍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又称为"理想类型"),但在实际上,它们往往只适用于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例如韦伯的城市概念和官僚概念就是属于这一类型。这些概念被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的要素,虽然韦伯指出,欧洲(或西方)城市的特殊性质究竟是什么,只有在考察了其他城市(例如古代中国和伊斯兰的城市)没有哪些特征后才能够确定。因此,这是(或被看作是)建立适用于一切地方和一切时间的城市"理想类型"过程中的一个阶段。③

① 巴格比:前引书(1958年),第135页;参见布罗代尔:前引书(1969年),第70页。

② A·波斯科夫:"当前的社会变化理论";E·E·哈根:《论社会变化的理论》(E. E. Hagen,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霍姆伍德,1962年版。

③ M·韦伯:《城市》(M. Weber, City),格伦科,1958年英译本;参见卡恩曼和波斯科夫:前引书(1964年),第118—119,127页。

以上两个实例的基本目标都是从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至少相对稳定的结构所具有的根本特征。这种理论模型的价值就在于它有能力把那些杂乱无章的资料组织起来，并使它有意义；它们帮助历史学家突破特殊性的限制。

十六、模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为历史学家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在于指出历史学家可以成功地用以说明和解释历史证据的关系和模式。那些依赖一般"常识"的经验主义者在研究过程中从未想到过的那些要素和线索往往只有通过符合逻辑的理论化才得以产生。显而易见，这种模型象任何其他研究方法一样，也有可能被滥用，或被误用。尤其危险的是，容易让事实去迁就理论，而不是用事实去检验理论。这里有必要着重指出，理论模型并不非要正确到可以应用的程度。历史学家发掘出来的一些散乱例证可能使理论模型显得不可信，但这一事实并不必然破坏理论模型的正确性。类型是指观念形象，而不是对实际事件和状况的描述。类型与实际状况不符便可能暴露出观念形象的缺陷和不明确之处，从而可能要对观念形象的模型进行修正，有时甚至将它抛弃。尽管如此，由此产生的对实际状况的认识依赖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分类方式。这种与实际状况不符的现象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对证据中某些过去被忽视的特征引起注意。①

十七、我们不准备在本书中详细讨论社会学家使用的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但是，举几个例子还是有助于说明它们是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历史研究的。这些模型的规模显然不同，有历史学家一般使用的小型的特殊概念（例如斯大林格勒战

① 卡恩曼和波斯科夫，前引书，第11页；埃森施塔特：前引书（1966年），第2卷，第101页。

役，反希特勒的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布罗代尔称为“韦伯式的无限抽象”，①即关于试图建立一个包含一切社会现象的完整的总体系的概念。经验证明，在这些模型中没有一个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概念工具。相反，今天的趋势是集中力量于“中型”的概念模型，即分析具有一定意义的事实群体，目的在于建立相互关系、构造和前后连贯的模式，用来部分或全面地解释特定社会在特定时代的实际机能。因此，简单举例来说，大量的精力用来分析诸如选举的模式和选民的行为，分析公众舆论和社会流动等等，这些都是历史学家感兴趣而又认为是重要的课题。②可能会有人提到熊彼得的例子。在较大规模上，熊彼得提出了关于企业家是技术革新和经济进步的设计者的著名论点。这个论点是一系列长期经验研究的起点，也是西格蒙德·戴蒙德努力的起点。戴蒙德在研究美国实业家的基础上提出了所有的统治阶级一旦感到自己的特权和地位受到威胁时便会作出何种反应的模式。③我们同样可以很

① 参见布罗代尔：前引书（1969年），第184页。

② 关于选举行为的论著参见：R·黑贝勒："纳粹的地区背景"和L·本森："美国选举行为分类初探"，均载卡恩曼和波斯科夫：前引书，第407—421页；R·P·麦考密克：《杰克逊时代政治新解》（R. P. McCormick, New Perspectives on Jacksonian Politics），1969年版。关于公众舆论的论著见L·本森：《杰克逊时代的民主概念》（L. Bensson, 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普林斯顿，1961年版；科马罗夫斯基编：《社会科学的共同领域》（1957年）一书中拉扎尔斯费尔德、斯特雷耶和戴维之间的讨论。关于社会流动的论著，见罗尼和格雷厄姆：前引书（1969年），第99—108，209—216和238—271页上特恩斯特罗姆、史密斯和斯通的文章。

③ J·A·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J.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伦敦，1934年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纽约，1946年版。S·戴蒙德：《美国实业家的声誉》（S. O. Diamond, The Reputation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man），1955年版，尤见第182页。

容易地发现，社会科学家在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化研究中——这项研究开始于林德夫妇的传世名著《米德尔顿》——使用的概念为研究过去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的城市史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线索。①

十八、用以建立这些模式的方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同社会学家所建立的模式同样重要。这种方法的本质特征是用系统分析取代叙事式描述。例如，如果我们以十二世纪英国伯爵领地的统治者为研究对象，或者以十六世纪德意志的企业主、或1845—1890年间美国的铁路大王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一批批有共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共同利益的个人，那么，我们如何去估价他们的态度和反应呢？历史学家通常的方法是举出一些个别事例的结论。显然，这种方法不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答案(除非幸运地猜中)，因为完全列举是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倘若要试试，那很容易导致常见的结论，即"事物相互纠缠在一种复杂的无法解决的因果关系中"。② 历史学家从社会学家那里学来的东西，简

---

① 林德夫妇：《米德尔顿：当代美国文化研究》(R. S. Lynd and M. Lynd, Middletown.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纽约，1929年版；《转变中的米德尔顿：文化冲突研究》(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纽约，1937年版；参见O·汉德林和J·伯查德编：《历史学家与城市》(O. Handlin and J. Burchard eds.、The Historian and the City)，剑桥，1963年版；H·J·戴奥斯编：《城市史研究》(H. J. Dyos, 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伦敦，1968年版；A·B·卡洛编：《美国城市史》(A. B. Callow.American Urban History)，纽约，1969年版。

② 这是查尔斯·布思完成了十七卷本的煌煌巨著《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Charles Booth, Life and Labour of People in London，伦敦，1902—1903年版)后得出的结论。S·W·F·霍洛韦在英国《历史》杂志(第68卷)上撰文指出，这部著作是理论和考证相互分离所造成的学术上贫乏的典范。

言之，就是开始认识到对一个个事件作综合描述并不能代替从理论上将这些事件结合起来——更糟的还是全凭印象把这些事件堆积在一起，就象G·M·特里维廉在《英国社会史》中满足于串连事件的方法一样；就是认识到，形成整体的各部分（例如公众舆论）靠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根本无法认识，因此必须使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十九、本书显然不可能一一列举社会学家创建的各类分析方法（何况这些分析方法还在不断地完善或修正）。但是，有一些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历史学家遇到了“贵族”、“资产阶级”这样一些范畴。他们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范畴太笼统，缺乏确定性，因此毫无用处，应当完全抛弃。① 相反，社会学家通过有名的“群体分析”方法，力图使这些范畴精确起来并且具有可用性，即通过分析社会集团形成的基础、聚合的过程，行动的外在条件以及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的结构和模式。② 他们试图发现活跃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各个社会集团的个别成员（例如雅各宾派，艾奥瓦农场主谷物商协会等）共同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是什么，并且使用这些“共同性的东西”来建立社会集团聚合的基础以及这个社会集团的结构。社会学家认为，公开表达的信念（例如国家文告、演说和宣传中表达的信念）

---

① “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贵族？对于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无法找到……能够长期有效地区别两者的标准。因此，任何论证都会与显而易见的事实发生矛盾。”引自B·贝伦：“‘坦率的历史’和‘有深度的历史’”，载《历史》杂志（第8卷，1965年）。众所周知，A·B·科班在《法国革命的社会解释》（A. B. 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加深了这种怀疑。

② 《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1954年），第44—47页。

并不能够解释集体的行为。相反，这类信念受到了社会结构的有力影响和限制。因此，他们集中精力去分析社会集团的成份，或者，更普遍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分析某个社会集团的全体成员为一系列信念进行斗争的条件如何。有些历史学家就是力图使用这种方法去分析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等社会集团的，例如布林顿、索布尔和鲁德。他们首先设问：参加这些社会集团的是哪些人？这些人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这些人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与其他类似的社会集团有什么关系？只有完成了这些细节问题的分析之后，他们才着手转而去解决这些社会集团成员的动机问题。① 在分析这些集团的同时，创造出了一些其他的专门技术和概念，例如职能分析法和参照集团分析法。前者就是分析"某种类型的人，例如中年铁路职工处于某种社会形势下所具有的可以预测的反应或行动的一致性。"后者就是分析同时属于两个以上社会集团的每一个个人（例如同时属于某个教会、家族、俱乐部、商业或职业集团），预期这个人要（往往是竭力想要）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什么？谁能够施加不同程度的压力迫使他遵守这一准则？这样的联系也是分析选举行为和选举模式的重要因素。②

---

① 参见C·布林顿：《雅各宾派：论新历史学》(C. Brinton, Jacobins. An Essay in the New History)，纽约，1957年版；A·索布尔：《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群众运动和革命政府》(A.Soboul,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vernement révolutionaire)，巴黎，1958年版；G·F·E·鲁德：《法国革命中的群众》(G. F. 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59年版；埃森施塔特编：《美国史学方法》(A. S. Eisenstadt, ed., The Craft of American History)，第2卷，1966年版，第132页以下；罗尼和格雷厄姆编：前引书(1969年)，第207页。

② 参见T·C·科克伦：《铁路大王，1845—1890年商业头脑在行动》(T. C. Cochran, Railroad Leaders, 1845—1890. Business Mind in Action)，剑桥，1953年版。关于群体理论，见科马罗夫斯基：前引书(1957年)，第394页以下。

二十、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想衡量社会学概念对历史学家的态度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以为，亚历山大·杰申克隆对历史学的目的所下的定义是最充分的表述。杰申克隆说："历史研究本质上就是用得自于经验的各类假设结论说明经验的材料，并且检验由此产生的配合是否契合，以期通过这个途径证实某些共性，某些典型的状态以及在这些典型状态下各种个别因素之间的典型关系。"① 这种定义是前一代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不敢想象的，同时又是衡量社会科学对历史学产生影响的尺度。显示这个影响的标志是历史学家开始发现描述性的综合——以伟大人物和一系列重大事件为对象的综合——不能取代理论的结合。② 埃文斯-普里查德用英国国王约翰与英国贵族之间的斗争来说明《大宪章》产生的根源。他说，只有弄清英国贵族和约翰王先辈关于英国王位问题上的关系，只有认识了其他封建制国家中国王和贵族的关系之后，才能揭示这场斗争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这场斗争被看作某种类型社会中典型的或共同的现象时"，这场斗争才有意义。③

"约翰王与罗伯特·费茨沃尔特的作用如果被看作一系列典型社会关系的代表，他们作为个人的特殊性所具有的意义便大大降低了。当然，如果另一个人取代了当时约翰王的位置，整个事情在某些

① 参见A·杰申克隆：《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落后》(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剑桥，1962年版，第5—6页。

② 托马斯：前引书(1963年)，第6页。

③ 埃文斯-普里查德：前引书(1961，1962年)，第49页。

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不过，在另一些更基本的方面还是一样的。这种被剥夺了特殊性的历史事实也就不再是瞬时性的历史事实了，不再是转瞬即逝的偶然事件，正象社会学家所论证的，这种历史事实作为社会学命题不受时间流逝的影响，而且得到了概念上的稳定性。”

二十一、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莫罗曾经说过："历史是社会科学对过去的投影"。① 这一精辟的陈述概括了历史学过去二十年发生的变化。这种说法即使在今天的史学界中也有许多专业历史学家无疑不愿接受，然而，它至少指出了历史研究当前最强大的趋势。当然，必须强调说明，当前历史研究趋势决非单向的。如果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社会学和人类学能够对他们的工作做出贡献，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相信历史学也可以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增添极为重要的新领域，即时间领域，而且一般都承认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这一领域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②

就其性质而言，社会科学（只有经济学例外）对历史学实际上起到了全面推动的作用，而不仅仅局限于引进新的研究技术。③ 例如，历史学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尚未达到人类学家对于原始社会研究所达到的那样精确的程度，而且也没有从现代语言学的进步中得到很大的裨益。④ 因此，历史

① 引自戴维斯：前引书（1965年），第3页。

② 参见康恩：前引书（1970年）。

③ 参见下文。

④ 参见R·科泽勒克的批判。R·科泽勒克："历史学还为了什么？"，载《历史》杂志，第192卷（1971年），第1—8页（关于语言学，见第15页）。

学的方法论若要达到其他社会科学那样高的水平，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其根本原因在于，虽然有关方法论的著作已经大量问世，但是，只有为数极少的历史学家对社会学、政治理论和心理学略知一鳞半爪，接受过统计学和数学初级训练的历史学家尚不足百分之一。① 许多历史学家只承认自己的工作"同社会科学有关系"，却不愿意以社会科学家自居。这大概就是对莫罗的回答吧。正如范·伍德沃德巧妙地说的，他们心中想到的不是同社会科学联姻，仅仅是相互发生联系，不是相互合并(Anschuluss)，而是建立协约(entente cordiale)。② 但是，在其他领域已经出现一股强调"人文科学"的统一性的强大趋势，历史学也是其中之一。③ 如果说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在研究领域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这两门学科都与心理学有联系，也就是说，心理学的思考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有关人类行为的全部思考，历史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已经概括地叙述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建立的新联系所产生的比较一般性的结果，着重讨论社会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因此，在以后各节里有必要就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对历史学的影响作一些更加扼要的分析。这种分析首先从心理学开始。

---

① 参见P·勒布伦："发展与计量史学。在向计量史学前进吗？"，载《社会学研究所杂志》，第4期(1967年)，第600页。

② C·V·伍德沃德："历史学与第三种文化"，载《现代史杂志》，第3卷(1968年)，第25—27页。

③ J·格伦尼松强调指出，这自然是布罗代尔著作的中心议题。见他为《1940年到1965年的法国历史学研究》一书写的导言，第54—57页。

3.2 心理学和历史学

历史研究中对心理学方面的重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东西。修昔底德早就认为，历史解释的最终关键在于人的本性。作为修昔底德的门徒，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以当仁不让的心理学家自居。已发生变化的是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有的地位。首先，研究的侧重点从个人心理转移到了社会心理。其次，历史学家现在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法来使用心理学知识，不再把人的心理看作解释人类行为的始终一贯的、不变的、永恒的、固定的基础，而是看作社会环境中的一个侧面，必须同这个历史背景下其他所有的侧面一样予以解释。最后，自从弗洛伊德在七十年前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非常活跃的实验研究以来，心理学本身的进步为历史学应用比过去更加严谨和成熟的心理学概念奠定了基础。①

引起历史学家发生兴趣的第一个领域是个性心理学，这一点也不奇怪。老一辈历史学家对这方面会发生兴趣，其原因不言而喻。他们完全相信“伟大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杰出作用，而且坚信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析这些“伟人”的动机和行为。因此，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运用心理学的解释（弗洛伊德以后的历史学家则运用心理分析学的解释）。意义更大的还有现在被称作“心理历史学”的复兴。埃里克森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就是这种历史学流派的第一个著名事例。②1970 年以后，心理历史学成了一种时髦。不过，种种

迹象表明，这种时髦的全盛时期现在也许已经过去。原因不难理解。[3] 从本质上看，心理历史学转向这样一个问题：强调个人性格是历史事件关键的个性心理学对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否起重要作用？这个问题实际上等于问：我们是在讨论弗洛伊德本人对历史心理学，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他提出的而现在已经完全名誉扫地的群体心理分析或半群体心理分析的传记（例如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俾斯麦传》）的冲击呢，还是讨论当代心理分析历史学家更加成熟的著作呢？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而且里面还包藏着另一个问题，即历

---

① 本节的讨论参见 H-U·韦勒的论文"论历史科学与心理分析的关系"（载《历史》杂志，第 208 卷，1969 年）以及他开列的全部参考书目。W·L·朗格："下一项任务"，载《美国历史评论》，第 63 卷（1958 年）；H·W·格鲁尔：《历史写作与心理学》(H. W. Gruhle,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Psychologie)，波恩，1953 年版；B·F·波尔什涅夫：《社会心理学和历史学》，莫斯科，1966 年版；B·F·波尔什涅夫和 L·I·安齐费罗娃编：《历史学与心理学》，莫斯科，1970 年版；《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1954 年)，第 58—68 页；B·马兹利什编：《心理分析和历史学》(B. Mazlish ed.,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1963 年版；B·马兹利什："群体心理学和当代历史学问题"（1968 年）；A·贝桑松："历史学与心理分析"（1964 年），"心理分析：辅助科学还是历史方法？"(1968 年)和"向心理分析历史学前进"(1969 年)；A·迪普隆："集体心理历史学的问题和方法"(1961 年)和"弗洛伊德以后的历史学"(1969 年)；J-P·韦尔南："历史学与心理学"(1965 年)；S·卡卡尔："心理历史学的逻辑"（1970 年)；R·J·利夫顿："论心理学和历史学"(1963 年）以及他的论文集《历史学与人类生存》(Lifton, History and Human Survival)，纽约，1969 年版。

② E·H·埃里克森：《年轻人路德。心理分析学和历史研究》(E. H. Erikson,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纽约，1958 年版；《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Gandhi's Truth, or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onviolence)，纽约，1969 年版。

③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 J·巴曾：《克莱奥与医生》(J. Barzun, Clio and Doctor)，芝加哥，1973 年版；H·加茨克："希特勒和心理历史学"(1973年)；G·希默尔伐布："新历史学"(1970 年)；近年来，比尼恩 (Binion)、魏特(Waite) 和马兹利什等心理历史学家对上述著作提出的观点突然发起批判和进攻，也有参考价值，恕不赘述。

史学与传记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这里只需要提到当代作者的一些观点就够了。总的说来，这些观点持怀疑态度。在当前的心理分析传记的复兴中进行的种种努力，乍看上去，同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无关，而且遭到了他们的反对。① 他们从社会学中认识到了个人行为的限度，因此，对历史学著作中这种强调个别人物的行为和决策，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内在趋势，历史学家是怀疑的。他们承认，心理分析法也许有助于解释某个历史事件对个人的重要性，但它解释不了事件本身。希特勒的个人心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成其为真正的问题，使希特勒得以取得政权并且一直维持到 1945 年 4 月的，是出于德国的社会状况。② 如果有人说这两个问题多少有些联系，那么回答将是：这仅仅是信念而已，并没有可论证的根据。据说，埃里克森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超越了个别人物。路德的身份危机是十六世纪德意志身份危机的典型。③ 甘地的身份危机也是二十世纪印度身份危机的典型。④ 这种类似的理论虽然反映了常识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却是说起来容易，证明起来难，而且评论者也很快指出了其中的难

① 韦勒：前引书(1969 年)，第 552 页；贝桑松：前引书(1968 年)，第 150 页。

② 韦勒：前引书(1969 年)，第 549 页。贝桑松在前引书(1968 年)第 153 页中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沙皇伊凡的神经病或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神经病都不属于历史问题，更不可能解决任何历史问题。"

③ 身份危机是心理分析学术语，指个人的一种心理冲突，尤指青年陷入的关于自己的社会作用的迷惑和混乱，是性格连续性中断的意识，亦用以指某个机构和组织的属性方面上的混乱状态。——译者

④ 韦勒：前引书(1969 年)，第 544，546 页；贝桑松：前引书(1968 年)，第 151 页；马兹利什：前引书，第 168—169 页；卡卡尔：前引书(1970 年)，第194 页。

处。①实际上，个性心理学和群体心理学还没有令人满意地结合起来。个人因素和群众背景之间的联系，或者说，个人动机和群众行为之间的关系，尚未真正弄清。正如莫拉泽所说的，当前将心理分析学运用于历史学研究的种种努力，"无论已经取得多么辉煌的成果"，"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一开始就产生的对方法论的怀疑"。②

当我们从个性心理学的影响转向讨论社会心理学的影响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许多年以前，亨利·贝尔曾经坚持认为，历史的综合"必将最终导致……社会心理学"，"导致对基本需求的认识，而一切制度及其变化形式都将以这些基本需求为转移。"③布洛赫和费弗尔也都对集体心理学发生了兴趣。布洛赫这方面的兴趣反映在他所著《魔术师国王》(1924年)一书中，而费弗尔则反映在《十六世纪不信教问题》那本著作中。这些研究的原动力无疑是产生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居斯达夫、勒邦、格雷厄姆·沃拉斯和威廉·麦克杜格尔发表的著作对社会集团行为、群众狂热、集体意识和历史上非理性力量所进行的研究。④但是，当前对社会心理学的关注却与第

---

① C·基尔茨："甘地：作为治疗方法的非暴力主义"，载《纽约书评》，第13卷，第3期(1969年11月20日)，第4页。关于P·庞珀的书评，见《历史学与理论》，第9卷(1970年)，第204,206页。

② C·莫拉泽："社会科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载《现代史杂志》第3卷，第2期(1968年)，第210页；参见马兹利什：前引书(1968年)，第163,172页。

③ H·贝尔："我们的计划"，载《综合历史杂志》，第1期(1900年)，第6页。

④ G·勒邦：《痴呆心理学》(G. Le Bon, Psychologie des foules)，巴黎，1895年版；G·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G.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伦敦，1908年版；W·麦克杜格尔：《社会心理学导论》(W. McDougall,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伦敦，1908年版。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十分活跃的经验主义探索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同时，与使用群体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和分析当前世界上一些具有特性的现象和问题——例如暴力、专制主义、种族对立、反犹太主义、侵略和革命——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有密切关系。① 当代的历史事件，正如马兹利什所说的，要求用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方式来解释。② 如果当代历史确实是这样，那么，其他时期的历史同样也是如此。德韦勒对古代斯巴达的研究，威廉·兰格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发生瘟疫所引起的"长期而普遍的情绪紧张"所作的分析，以及勒费弗尔对 1789 年法国群众性狂热的典型研究，都是说明心理学确实为历史学提供了认识能力的事例。③

上述事例表明，心理学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领域是集体行为和反应的分析方法。由于非理性的力量和下意识的力量发生的影响，在某些特别具有毁灭性的事件之后的动荡和紧

① 例如，H·阿伦德：《极权主义的起源》(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三卷本，纽约，1951 年版；K·洛伦茨：《论侵略》(K. Lorenz, Das sogenannte Böse. Zur Naturgeschichte der Aggression)，维也纳，1963 年版；T·W·阿多诺等：《独裁主义者的个性》(T. W.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纽约，1950 年版；C·A·约翰逊：《革命与社会制度》(C. A. Johnson,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斯坦福，1964年版；N·W·阿克曼和 M·杰荷达：《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N. W. Ackerman and M. Jahoda,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纽约，1950 年版；E·西梅尔编：《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E. Simmel ed., Anti-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纽约，1946 年版。

② 马兹利什：前引书(1968 年)，第 163 页。

③ G·德韦勒："心理分析学和历史学：在斯巴达历史上的应用"(1965 年)；兰格：前引书(1969 年)，第 418—430 页；G·勒费弗尔：《1789 年的大恐慌》(G. Lefebvre, La grande peur de 1789)，巴黎，1932 年版。

张时期中最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例如十四世纪欧洲发生的瘟疫，1918年战败后的德国，以及1968年美国在越南失败后的痛苦经验，因此，历史学家倾向于集中力量研究这些时期。如果说每个社会都有“独特的心理结构”的话，这种“心理结构”至少部分是从共同的经历和态度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似乎就有理由（用威廉·兰格的话来说）“认为任何危机，例如饥荒、瘟疫、自然灾害或战争，都会留下它的痕迹……当然，危机造成的影响，其强烈的程度和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它的性质和程度。”① 不过，把重点放在研究危机时期以及危机造成的变化上，不管其本身理由多么充分，都不过是群体心理学在特殊情况下的运用，而且是倾向于挑选了病态和变态的成份，而摈弃了比较正常的反应。虽然在正常的情况下，人类做出的基本力量和冲动往往是潜伏着的，但是在每个社会中都始终在发生着作用，每次突然爆发的危机都是孕育着集体精神的长期而无声的，逐渐成熟的过程的结果。②

历史学家不仅经常遇见比森斯·比韦斯所说的“无法磨灭和消除的集体个性的烙印”，③ 而且不断有需要深入到构成社会生活的“集体力量的秘密”中以及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的秘密中去。现在再也没有谁会认为可以把这些简单地解释为对明确利益的合理追求了。对于帝国主义这类现象的许多研究也由于照搬帝国主义者的辩解，而不去深入帝国主义者的无意识基础，结果越来越糟。任何一个对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或极权主义进行过研究的历史学家都不

① 兰格：前引书（1969年），第416页。

② 迪普隆：前引书（1969年），第48页。

③ 比森斯·比韦斯：前引书（1967年），第168页。

会放过它们的心理根源。无论研究哪个社会和哪个时期，历史学家都必须解释心理的紧张——稳定力量和变化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尤其是那种保证社会继续运转所必需的社会秩序的上层结构与作为社会成员的群众本能反应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无可避免地发生作用，它是历史的骨骼和血肉。

遗憾的是，正如阿尔方斯·迪普隆所指出的，在这方面过去很少能够用通常使用的历史证据来说明。① 为了证实某些事件，便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事件之间是连续的。在有记载的历史表面之下存在着不间断的日常生活之流，就象现代音乐会的基础低音一样，不断地按节奏重复奏出一个低沉的音节。在这个节奏之上，人们可以听到千变万化的历史事件的美妙旋律。在史料的书面语言之下也隐藏着另一种语言，即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但被忘却掉的那种语言。在有意识的和有记载的历史之下还存在一个无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历史，这个历史没有被记载。在喧闹的市场和政治舞台背后也存在着一种寂静的生活，它无时不在，象在报纸上占有大字标题的"重大事件"那样，也是现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实际问题是怎样去对待那种"寂静的生活"，如何捕捉住"集体精神"那样一些既不可捉摸又那么现实的东西。这是个历史学家刚刚开始要设法去解决的问题。目前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解决这个问题的规划很庞大，但它却没有指出捷径。阿尔方斯·迪普隆曾经概括地说明了问题和方法。不过，他也特别指出不存在什么能够迅速见效的方

① 迪普隆：前引书(1969年)，第29—34页。

法和"高明的结论"。[1] 首先需要的倒是清理一下各个历史时期中反映集体精神的各种正常的和变态的形式，诸如各种创造、想象、价值观念以及其他各种表现方式。[2] 在这些表现方式中，迪普隆特别提到了符号、神话、宇宙观念以及"对空间和时间的描述。"[3] 迪普隆还明确指出，这样的研究实际上会造成长期把注意力集中在集体精神的特殊表现形式上。除迪普隆自己曾经对宗教战争思想和朝圣活动的心理动机进行过研究外，其他例子就是菲利普·阿里埃斯对法国旧制度下的家庭和儿童，对待死亡的态度变化等进行的著名研究，以及罗贝尔·芒德鲁的著作。[4] 不过，同样重要的实例是在不同层次上对各种社会集团——例如普鲁士的军官团，1840 年至1849 年的法国贵族或十八世纪俄国的贵族——的"集体精神"所作的研究。[5] 这些社会集团每个成员在同样的形势下作出的反

① 参见迪普隆：前引书(1961 年)，第 10 页。

② 同上，第 4 页。

③ 同上，第 10 页。

④ 参见 P·阿里埃斯：《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P. Aries,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ègime)，巴黎，1960 年版；"面对死亡。西方社会中死亡前态度的转变"(1967 年)；R·芒德鲁：《近代法国导论：论历史心理学》(R. Mandrou, Introduction à la France moderne, 1500—1640. Essai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巴黎，1961 年版；《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大众文化》(De la culture populair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十七世纪法国的官员和巫师》(Magistrats et sorcier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Une analyse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巴黎，1968 年版。

⑤ M·康菲诺："历史学与心理学。论十八世纪俄国的贵族"；A-J·蒂德斯格：《法国的大贵族，1840—1849 年。社会心理学的历史研究》(A. J. Tudesq, Les grands notables en France, 1840—1848. Etude historique d'une psychologie sociale)，巴黎，1964 年版；F·C·恩德雷斯："社会结构以及与其相应的德意志军官团在大战前夕的意识形态"(1927 年)；W·察普夫：《德国上层社会的转变，1919—1961 年》(W. Zapf, 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Elite, 1919—1961 年)，慕尼黑，1965 年版。

应并不相同。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并不能削弱那种建立“主导态度模式”所具有的价值。相反，它提供了唯一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可以对各种异常进行评价和分类。从社会的角度看，正象德国人抵抗希特勒的历史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集体精神”几乎总是战胜了个人想从纠缠不清的心理羁绊中挣脱出来的愿望。

虽然否定普鲁士军官团或中国粤军这类社会团体可能产生某种“集体精神”是不顾事实，但要建立精确的方式以便让历史学家能够有效地借助于心理学来描述和分析这些现象，却更不容易。例如，常识告诉我们，长征的经历必定会给幸存的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深刻的心理影响。可是，当我们听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内充满了使命感和献身精神是产生于“幸存者需要把自己的生存同其他牺牲者相对照的那种特有的负罪感”时，[①] 我们大可发问：这种说法如果说对于理解历史真有作用的话，作用究竟有多大？某个评论家曾说过，不仅是毛泽东似乎并没有“为这样的负罪感而终日不安”，而且，这些资料即使是真实的，也同历史学家的目标毫无关系。[②] 实际上，我们如果仔细考查一下社会心理学在历史学上的运用——例如兰格对中世纪欧洲瘟疫造成的影响的研究和阿里埃斯对十八世纪法国儿童的研究——会发现，显然没有一项是运用特殊的心理分析学技术的。虽然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界线是比较模糊的，然而，在这两门学科中，对历史学家影响较

① R. J. 利夫顿：«革命永存：毛泽东与中国文化革命»(R. J.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纽约，1968年版，第14页。

② 参见J·B·克劳莱编：«现代东亚»(J. B. Crowley, ed.,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纽约，1970年版，第273页。

大的看起来还是社会学。例如对普鲁士军官团这种社会集团的研究就是如此。它还说明为何迄今为止的分析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拉尔夫·达伦多夫曾经说过，心理分析学趋向于"变为一种不精确的社会学方法"。①

这种状况的出现当然有其特殊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建立起个性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之间的桥梁会遇到困难，对这些困难已有很多评论。② 例如，我们被告知，"民众运动中的恐惧和忿懑"是"童年时代情绪的残余"。这个说法也许很有趣，但是，对于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特殊的民众运动作用不大，尤其对于比较某地的民众运动与另一地的民众运动的表现更加如此。有人提出，"对路德的审判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这是一个未经科学地证明其是否可信的事实，而是一个假设，甚至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假设。对整个共同体构成威胁的灾难和死亡会引起群众情绪的动荡"，这也许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这种动荡通过什么方式表现出来，产生什么后果，则是另一个问题。③ 特雷弗-罗珀指出，这样的"灾难毫无疑问起了作用……但解释不了"。④ 达伦多夫曾经不厌其烦地指出，"社会—心理分析中的社会领域"往往是"用未经证实的，有时甚至是不明朗的断言来处理的"。⑤ 其原因显然是心理分

---

① R·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伦敦，1968年版，第375页。

② 参见兰格：前引书(1969年)，第414页；迪普隆：前引书(1969年)，第37，39页；达伦多夫：前引书(1968年)，第372页。

③ 转引自兰格：前引书(1969年)，第415，426，429页。

④ 参见H·R·特雷弗-罗珀：《宗教、宗教改革和社会变革》(H. R. Trevor-Roper,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s, and Other Essays)，伦敦，1967年版，第99页。

⑤ 达伦多夫：前引书(1968年)，第377页。

析学技术不能直接应用于处理史料。因此，试图通过间接方式来处理史料，确切地说，就会象阿兰·贝桑松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决不是什么心理分析了，只不过是心理分析学家在自己的直接经验中同其他情况进行类比而得出的判断而已。"① 这样的判断也许会使人们感兴趣，有资料价值，但也可能相反。不过，这些判断仍然是主观的认识能力，与历史学家从另一角度考查资料获得的认识能力在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虽然内容上有所差别）。总之，它使人们"对文化和个人性格之间关系的认识更接近于冷静的认识水平，而不是更接近于系统的可靠性水平"。②

因此，至少在心理学知识水平的当前阶段上，心理学能够为历史学作出的贡献仅限于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尽管有关反犹太主义和有关专制主义者的心理根源的著述已有不少，但马兹利什仍然不得不勉强地得出结论：这样的研究"并没有说明当代的历史现象。"③ 心理分析学补充了历史学研究中的其他解释，而不是取代这些解释。从方法论方面来说，一致的看法是必须谨慎对待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只要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经济学的解释）就没有必要借助于心理学的解释。④ 还有一个特殊的危险是"只靠微观证据而不顾宏观模式便得出结论"，例如，只用某个或某些革命者的心理活动来解释革命。⑤ 这种做法与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一项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相抵触。那个原则是，我们在得出总的

① 贝桑松：前引书（1968 年），第 151 页。
② 《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1954 年），第 65 页。
③ 马兹利什：前引书（1968 年），第 172，174 页。
④ 德韦勒：前引书（1965 年），第 23 页。
⑤ 约翰逊：前引书（1964 年），第 25 页。

结论之前必须综观全局。另一个同样重大的危险是不顾场合地使用心理学的普遍概念——例如自卑情结、抑制、下意识、内倾——作为解释历史的原理。贝桑松说过，“试图在历史资料里面发现心理学的概念”是“无益的和靠不住的”脑力活动。相反，“人们应当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料……然后弄清楚那些显然属于偶然性的事实和那些在过去没有被放在应有地位上的事实之间的关系。”①

持这种谨慎的态度当然不是说心理学，或甚至心理分析学，对历史学家也毫无用处。这不过意味着它们的作用不象有时说的那么直接罢了。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向历史学家提供的与其说是新的技术手段，倒不如说是促进他们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环境。例如，德韦勒曾经指出，只是在弗雷泽的人类学著作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发现问世以后，历史学家才开始认识到希腊宗教和文化中的非理性成分。理由是：虽然在此期间没有一个新事实说明这一点，但是，历史学家现在掌握了理论体系，通过这个体系可以把彼此孤立和互相分离的事实用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②这类事例不胜枚举。譬如，曼诺尼对殖民化的研究，他把殖民者和土著居民置于直接的心理对抗中，从而开拓了新的视野。斯坦利·埃尔金斯带着同样的心理学观点去说明美国的种族问题和奴隶制问题。③

---

① 贝桑松：前引书(1968年)，第152页。

② 德韦勒：前引书(1965年)，第23页。

③ 参见D·O·曼诺尼：《殖民化的心理学》(D.O.Manoni,Psychologie de la colonisation)，巴黎，1950年版；S·M·埃尔金森：《奴隶制：美国制度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问题》(S.M. Elkinson, Slavery. 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芝加哥，1959年版。

这就是说，群体心理学"既不是历史学的替代物，也不是在外表上为克莱奥梳妆打扮的化妆品，而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组成部分"。① 对历史上的每一个决策和事件所做的合理分析都留下了一部分剩余的问题未加以解释。只要心理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弄清这些剩余的问题，历史学家就不会拒绝它的帮助。然而，心理学通过提出新问题来帮助历史学家澄清自已的思想也许比为历史学家提供新答案的可能性更大。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的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于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

3.3 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地位

我们从讨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转向讨论经济学时，便踏上了比较坚实的基础。② 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那么玄妙了，而是历史学家的总态度和方法朦朦胧胧地再形成的问题，是

---

① 马兹利什：前引书(1968年)，第177页。

② 关于本节的讨论，请参见W·A·科尔：《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史》(W. A. Cole, Economic History as a Social Science)，1967年版；S·波拉德："经济史：以社会为对象的科学"(1965年)；W·H·B·考特："经济史"(1963年)；F·布罗代尔："为历史经济学辩护"(1950年)；J·R·迈耶和A·H·康拉德："经济理论，统计推理和经济史"，1957年版；F·雷德利克："对待经济学的新旧态度"(1965年)；"经济史的潜在作用和问题"(1968年)；G·G·S·默非："'新'历史学"(1965年)；L·E·戴维斯："新经济史批判"(1968年)；L·M·哈克尔："经济史的新革命"(1966年)；J·R·T·休斯："经济史中的事实和理论"(1966年)；R·W·福格尔："新经济史学的发现和方法"(1966年)；"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重新统一"(1965年)；"经济史规范问题"(1967年)；E·H·亨特："新经济史"(1968年)；B·H·斯利克·范·巴特："美国经济和社会史的新道路"(1969年)；M·莱维-勒布瓦耶："'新经济史'"(1969年)；D·C·诺斯："经济史现状"(1965年)。

历史学家接受和了解“人文科学研究”中关系密切的其他分支的新发现和新方法，从而准确和有意识地运用明确的理论的问题。难怪有人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①

为什么历史学家会认为经济学有可能对他们的工作作出重大的贡献呢？这并不难理解。经济事实随时随地都同历史学家息息相关。任何历史学家，无论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都知道经济事实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如果他们想要认识人类的经济发展，就必须掌握必要的理论工具和统计手段。例如，历史学家不了解货币定量理论的有关知识，便无法说明十六世纪英国价格的升涨现象。历史学家不借助经济理论便无法写出有关 1929 年经济大萧条、美国新政中的各项政策以及 1945 年以后确立的关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历史。在经济变革分析中，历史和经济理论的关系比历史学研究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更为密切。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但这不仅仅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其次，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对经济资料进行精确的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相对于社会学那种不太精确的资料而言，要容易得多。各国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目的地编制了征税册、价格和工资、人口普查报告和关税等等的记载，这些资料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基础坚实的准确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可能按照分类序列的形式编排。因此，对历史学中经济方面的

① 参见 R·戴维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R. Davis,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莱斯特，1965 年版，第 5 页。

研究与任何其他领域相比，有可能在更高水平的成熟性和可靠性上进行。

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密切关系由于近来的一些发展而得以加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历史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术领域的发展趋势一直是背道而驰的，就象当时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正在发生分离一样。经济学家(至少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集中全力以建立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据称不受时代限制的经济关系体系。历史学家却无一例外地在关注着总有一天可以不需要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的变革。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世界性的重大事件影响下而日渐衰落以后，这样的趋势才被扭转过来。由于整个世界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立即从研究短期平衡问题转移到对贸易周期和贸易周期理论的研究。对后一问题的重视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这时，再次由于世界性的重大事件的影响，经济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又接着转向对经济发展问题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①

经济学思想的基本趋势上发生的这些转变导致了历史学和经济学的重新结合，这一事实无疑说明了作为这个时期主要特征的经济史的迅速成长。②重视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和动力，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把重点放在历史因素上。这样便从经济史的定量研究方面给予了历史学家的工作以道义上的支持，同时又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尤其重要的是，

① 关于经济学的这些转变，鲁宾逊作了简明而精采的论述。参见J·M·鲁宾逊：«经济哲学»(J. M. Robinson, Economic Philosophy)，伦敦，1962年版；又见科尔：前引书(1967年)，第7—8页。

② P·肖努："序列史：总结和观点"(1970年)，第302，309页。

对价格史的兴趣与日俱增，而价格史是任何商业周期研究中的必要成分。在国际价格史科学委员会领导下，这个领域中开展的工作是历史计量化的一个重大突破。① 1950 年出现了第二项重大进展。由于西蒙·库兹涅茨的首倡，国际收入和财富研究协会开始编制大型的先进工业国家国民收入状况。尽管对其中的一些数据还有某些怀疑，但这些成果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变化中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而且提供了可类比的因素。②

当然，经济史永远具有计量化的方向。但是，迄今为止，经济史利用的数据几乎全是由政府或类似的部门制定的。经济史学家满足于对这样的统计资料进行分类，并且用来描述性地说明历史发展进程。然而，研究价格史的历史学家却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从托拉尔德·罗杰斯的开创性著作开始，价格史学家把掌握的数据资料汇集起来，第一次使用了大规模的统计重现技术，即用说明"严格定义的经济分析概念"的方式来组织数据资料。③ 这种做法为后来称为"新经济史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新经济史学"的诞生是不久以前的事。它的初步形成是以 1957 年和 1958 年康拉德和迈耶的著作以及1960年和1961年戴维斯·休斯和麦克杜格尔的著作为标志。④ 新经济史学的

---

① J·M·普赖斯："当前历史学中的计量工作"，载《历史学与理论》杂志，第 8 卷(1969 年)，第 5 页。

② 引自M·巴拉德编的《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新动向》(M. Ballard ed., New Movements in 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History)，伦敦，1970 年版，第 81 页。

③ 罗尼和格雷厄姆：前引书(1969 年)，第 330 页。

④ 参见 L·E·戴维斯，J·R·T·休斯和D·M·麦克杜格尔：《美国经济史：国民经济的发展》(L. E. Davis, J. R. T. Hughes and D. M. McDougall,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Economy)，霍姆伍德，1961 年版。

呼声极高。它的诞生据说标志着一场“革命”，是与传统经济史学的完全决裂。这样的说法正确与否是另一回事，这无关紧要。实际上，就连R·W·福格尔那样杰出的“新经济史学”流派的倡导者也承认“在旧经济史和新经济史之间有一条清晰的连续性的线索”。[①]无可置疑的一点是更加强调理论和更加系统地使用统计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大致于1955年以来的经济史的主要特征，并且还将保持下去。道理很简单，因为经济史领域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定量的范围内才能得出学术上使人满意的答案。

然而，新方法对经济史的影响决不仅是局部的和技术意义上的，它还在总体上影响了历史研究工作。例如，美国内战之前，奴隶制对于美国是否有利？铁路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问题对于经济史学家和一般史学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们必然会影响到对美国历史进程的任何一种解释和评价。[②]其次，新经济史学直接地向唯心主义历史学派的核心论点提出了挑战。这个核心论点认为，历史学在展示证据的方式上决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历史事件具有独特性，所以不可能进行有控制的实验。新经济史学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截然相反，他们说，建立“反事实”状态是完全可能的，至少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借助于这个方法可以衡量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实与在不同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之间有多大的差距。这一方法论上的总观点恐怕是作为非专业历史学家的新经济史学家对历史学

① 《美国经济评论》，第54卷副刊(1964年)，第377—378页。

② 参见S·L·恩格尔曼："美国内战的经济后果"，载《美国企业史》杂志，第2集，第3卷(1966年)。

作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①

新经济史学的这个"方法论特征"是由R·W·福格尔确立的。他把新经济史学"侧重于量度及其对量度和理论之间紧密关系的认识"抽取出来作为它的基本特征。②然而，毫无疑问，它的突出特征不是以上提到的第一点，而是第二点。量度本身若不附以统计处理方法和系统数量分析方法，它产生的结果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叙述。它以数字代替文字形式，而且(至少在一般的实践中)更加精确和准确，却没有创造出新成分。在量度技术方面，包括间接量度("重现过去可能存在但现已轶失的量度")，新经济史学比旧经济史学更精确，水平更高，但是，这也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类别上的差异。③用福格尔的话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新经济史学力图用可靠的假设一演绎模式去检验对过去经济发展的全部解释"。④

新经济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使用了这样的假设一演绎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计量经济学精心设计的技术，目的在于用数学方法建立起各种变量因素在特定的环境下相互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方式。这里没有必要来详细讨论这些技术，但福格尔提到的一些实例已经揭示了它们的特性。⑤总之，目的在于建立模式，用以展示影响经济变革的各种不同要素，而

---

① 巴拉德：前引书(1970年)，第82—83页。

② 福格尔：前引书(1969年)，第330页。

③ 亨特：前引书(1968年)，第5页。

④ 福格尔：前引书(1969年)，第334—335页。

⑤ 其中包括回归分析法("恐怕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投入一产出分析法和超几何分布法(例如，金达尔使用了这种方法来估计美国内战刚刚结束以后运营的州银行的总数)。参见福格尔：前引书(1969年)，第330—331页。

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代数公式)说明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这种方法将这些要素相互联系起来，从而衡量每个要素在某个时期的相对重要性。

迄今为止对这种假设—演绎模式的运用，主要目的都在于证实新出现的事物(如铁路)、机构(如银行)和生产方法(如炼钢)对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如果这些特定的新事物没有出现，或者这些特定的要素不存在，情况本来会怎样呢？由于这不可能有记载，只有创立假设模式才可以做到，并且从这个假设模式中推导出所谓的"反事实状态"(即在某种特殊条件并不具备时存在的那种状态)。当然，反事实命题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种命题早就包含在全部形形色色的判断中，有些专门是经济方面的，也有一些不是。例如，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对英格兰的影响，希特勒的莱茵兰重新军事化政策如果在1936年遭到抵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新经济史学家迄今作出的主要努力，是检验和澄清当前传统历史学著作中发现的那些经济类型的反事实命题，例如，关税政策是否加速了制造业的成长。

反事实命题的运用也未能免遭批判。尤其是雷德利克，他反对运用无法验证的假设，因为这种假设产生的不是历史，而是"准历史"。对于这些批判的回答自然是：假设无论如何总是复杂的，与其让它们含含糊糊，还不如使其明确清楚。正如霍克所指出的，经考查，大量批评实际上是无的放矢。① 不过，实际情况仍然是，从新经济史学向更高级的发展中得到的

① 参见G·R·霍克："评亨特先生对福格尔论题的研究"，载«历史»杂志，第53卷，第177期(1968年)。参见墨菲的力作："论反事实命题"，载«历史学与理论»(1969年)。

纯收获并不象许多鼓吹者以为的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哈克尔十分正确地总结说："运用计量经济学手段的经济分析……本身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从因果关系上说明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和结构。"[①] 休斯指出，存在着一种"正常经济生活中的非系统中断"，例如战争、农业欠收、股票市场狂热时期骚动的精神变态等等，这一切都"必须加以综合分析"，可是却往往被当作非本质的东西摒弃掉了，而且用一种"理论假设的先验公式"来取代。[②] 其次，在建立适当的大型模式中，固有的困难表现得日渐明显。经济史学家已经屈服于诱惑，集中精力进行"微观研究"，有意避开经济增长和"起飞"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所关心的重大问题。[③] 确实，对现代经济史的中心问题分析得越多，专门运用计量经济学假设的经济史学家对这些问题能否作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就更无把握。

尽管人们对新经济史学的一些极端表现已经失望，但它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甚至连雷德利克那样不轻易饶人的批评家也毫不怀疑对它的批评应当"到此为止"。危险在于容许经济学理论去限制研究范围，从而忽视了可以丰富我们对实际经济生活的认识的经验资料。休斯慎重地强调说，"确实存在着能够借助于理论去解释的规律性"，只有掌握了理论才有可能区别符合规律的和不符合规律的，才有可能区分意料之中的和意外的事物。新经济史学取得的主要成就一方面是缓慢而稳定地发展了一整套业已固定的对历史变革的经济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它把研究重点放在量度和理论

---

① L·M·哈克尔：前引书(1966年)，第175页。

② J·R·T·休斯：前引书(1966年)，第93页。

③ 勒维-勒布瓦耶：前引书(1969年)，第1064页。

方面。历史学家已经完全认识到建立在系统组织的资料基础上的严谨的统计分析是不可取代的，而产生于不准确和含糊的数据，并且以当代人的主观印象为补充的那种全凭印象作出的判断，已经失去了今天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的信任。尤其是经济史已经从叙述那些能够提供关于不同时代物质生活状况的事实资料转向探索一些专题，并且寻找出具体问题的答案。"以探索事实为主的问题越是完备，这样的研究便越接近社会科学中历史学的真正职能。"这种说法现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赞同。①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方向的变化从经济史领域波及到那些经历相似转变的同类学科所采取的方式。在所有这些同类学科中，最突出的是1955年前后在法国诞生的一个新学派，即历史人口学。②这个新学派的缔造者既有历史学家，也有专业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拉布鲁斯、默夫雷和伦阿尔等历史学家希望把经济学问题和人口学问题联系起来，并且借助于人口环境来解释经济增长。而索维、亨利和弗勒里等专业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则看到有必要扩展统计资料使用的时间范围，或者如同前面已经说到的，从横向分析转移到纵向分析。③新

① M·M·波斯坦：《社会科学中的历史方法》(M.M.Postan,Historical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s)，重印于《事实和关联：历史方法论文集》(Factand Relevance. Essays on Historical Method)，剑桥，1971年版，第25页。

② 有关历史人口学的概论，水平较高的是R·雷维尔编的《历史人口研究》(R. Revelle,Historical Population Studies)，载《代达罗斯》杂志(即《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公报》)，第97卷，第2期(1968年)。参见A·M·范·德伍德："历史人口学在历史科学中的地位"(1969年)。

③ 参见P·古贝尔："历史人口学以及对近代早期法国史的重新解释"，载《跨学科历史杂志》，第1卷，第1期(1970年)，第37—39页。R·T·范恩："历史学与人口学"，载《历史学与理论》(1969年)，第75页。

方法论的创立则是路易·亨利的功绩，它在1953年开始初具轮廓，到1956年已经基本形成。① 从1959年开始第一次使用新研究方法的报告发表以后，② 又呈现出突飞猛进之势。仅在法国一个国家就有五百篇论文已经发表或正在准备中。在英国，剑桥大学人口史和社会结构研究所在1964年建立后，也开始了同样的研究。③

今天流行的历史人口学与传统类型的人口学之间的差别就象"计量史学"(Cliometrics)与旧式的以描述和说明为特征的叙事式经济史之间的差别类似。事实上，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对人口问题并不注意，他们把人口当作已知的条件或参数，而不是批判分析的对象。总之，他们只满足于粗略地搜集出生和死亡的数字以及全国人口的估计数。④ 这样一些数

---

① 参见L·亨利："被人遗忘的大量人口学资料：教区登记册"(1953年)；M·弗勒里和L·亨利：《人口学中的教区登记册》(M. Fleury et L. Henry, Des registres paroissiaux à l'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巴黎，1956年版；《新的分析资料和古代行政状况探索》(Nouveau manuel de dépouillement et d'exploitation d'état civil ancien，巴黎，1965年版）一书是前书的增补本。参见L·亨利："历史人口学资料"以及他给《代达罗斯》杂志《历史人口研究专号》(1968年)撰写的题为"历史人口学"一文。

② 戈蒂埃和亨利：《诺曼教区克鲁莱的人口》(1959年)。

③ 参见P·拉斯勒特：《人口史和社会结构》(P.Lastett,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965年版；E·A·里格利，D·E·C·埃维斯利和P·拉斯勒特编：《英国历史人口学导论》(E. A. Wrigley, Eversley and P. Laslett. eds.,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ical Demography)，伦敦，1966年版；E·A·里格利："人口、家庭和家族"，载巴拉德编：《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动向》(1970年版)；格拉斯和埃维斯利编：《历史学中的人口：历史人口学论文集》(D. V.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芝加哥，1965年版；P·拉斯勒特：《我们失去的世界》(P.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伦敦，1965年版。

④ 参见肖努：前引书(1970年)，第302页。

字除了根本没有准确性可言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说明不了人口增长的原因，因此也不可能回答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关于人口长期变化趋势问题。新历史人口学的目标就是要弥补这一缺陷。

新历史人口学已被定义为"对各个时代的社会所进行的计量研究"，它的目的是"重现有关人口数量，出生、婚姻和死亡的人数变化趋势，以及家庭、村庄、城镇、地区和各个阶级的人口数量分配等等诸如此类的各个方面的实际状况，而且要求尽量地准确，研究的时间范围尽可能广大"。据称，这些事实一旦被聚集起来，便会"构成一幅社会结构的解剖图式"，而且使"迄今为止含糊得令人恼怒的学科，即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开始变得具有"严谨性和准确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事实的综合，有希望显示前工业社会中人口状况的特征，从而说明前工业社会停滞的社会原因和工业开始发展的社会原因。最后，只有综合这些事实，才有可能对法国或英国在马尔萨斯以前时代同当代世界上的前工业社会或发展中的社会，进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①

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只有通过大量的微观分析才有可能。亨利及其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继承者一直在致力于创造适用的微观分析方法。他们首创的研究技术名为"家庭重现法"。亨利本人以及其他学者对这种方法作过详细的叙述。简单地说，这种方法需要对法国十七世纪晚期以来和英国1538年以来的教区登记册分门别类地进行概括。同传统人口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它的分类方法是"具名式"的，而不是"总体式"的，

① 拉斯勒特：前引书(1965年)，第583，592—593页。

也就是说，这种分类的基础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家庭，把有关出生、婚姻和死亡的所有证件合并为一项档案。总体式的分类不是把男人、女人和儿童当作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具名式的分类只有把他（她）们一个个地加以识别后才可能进行。家庭重现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全体人口的必不可少的统计数据，而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和市镇的层次上开展研究工作。它首先注意到确定人们的结婚、生育和死亡的年龄。构成家庭的有关基本事实一旦被重现出来，就可以非常细致地调查出生率和死亡率，于是，就可以进行十分复杂的人口学分析了。①

历史人口学通过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显著，②仅凭印象去处理人口档案不可避免会导致印象式的分析。只有描述了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的有关细节，才有可能准确地认识这个社会和其他社会的差别属何性质，我们才有希望认识历史变化的进程。在这方面，历史人口学是对经济史的必要补充。例如，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包含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不止是经济方面的协同因素，对家庭这个广泛地反映了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经历和活动的因素进行研究，可以提供纯经济分析

---

① 里格利：前引书（1970年），第95页。

② 古贝尔的论文"历史人口学以及对近代早期法国史的重新解释"（1970年）罗列了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其中包括他自己的著作《博韦和博韦人》（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巴黎，1960年版；亨利：《日内瓦的古代家庭》（L.Henry, Anciennes familles genevoises），巴黎，1956年版。英国的一项著名研究有J·D·钱伯斯：《特伦特河流域，1670—1800年》（J. D. Chambers, The Vale of Trent, 1670—1800），剑桥，1957年版。美国有P·J·克雷文："历史人口学和殖民地时期的美国"（1967年）；J·德莫斯："殖民地时期布里斯托尔的家庭"（1968年）。参见J·吉耶茨托罗娃："波兰的人口史研究"（1968年）。

实际上不可能反映出来的必不可少的资料。① 人口和家庭研究已经揭示出近代早期的欧洲同其他前工业社会之间的重大区别。这些区别再次说明了以下的中心论点：例如，晚婚的做法降低了出生率，它可以视为保持自然资源对人口的相对有利比例的一个因素，同时还引起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积蓄倾向。似乎完全可以断定，如果在一般情况下，把婚姻推迟到有足够的资力建立新家庭时，由此产生的结果很可能会形成一种鼓励资本积累的积蓄和支出模式。

家庭重现法在许多方面相当于历史学家使用的社会调查方法。正如社会调查方法能够使社会科学家回答有关当代社会结构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一样，家庭重现法也能让历史学家回答有关过去的社会结构的类似问题。当然，历史学家理应感到兴趣的问题很多，回答这些问题无需理会人口学。但是，社会既然是历史学家的活动所关心的中心所在，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是家庭重现法的微观分析所无力澄清的。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历史人口学用新的观点解释了西欧得以在十九世纪积聚支持它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因素和政治权力因素。这个观点将得到一致公认。只有借助于历史人口学的帮助，我们才有希望找到以下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即西欧为什么能够逃脱在其他前工业社会中经常破坏持续发展的那种周期性事件？②

这里还有必要简单地列举历史人口学对其他一些问题所

① 家庭当然可以引进经济模式中去，但是，如果没有人口研究，它只能当作"外因"引进。

② 参见拉斯勒特：前引书(1965年)，第590页；里格利：前引书(1970年)，第99页；范恩：前引书(1969年)，第77页。

作的新解释，其中包括瘟疫和饥荒的影响，环境的变化对农村人口的家庭政策的作用，新生儿死亡率的变化，社会流动(用出身于不同的社会一经济集团的新娘和新郎的频次为指标)、阶级结构、土地圈占等等这样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的社会后果，移民和人口流动，城镇和农村的关系。然而，从其长期的革命性后果来看，历史人口学用新观点进行解释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避孕——或家庭节育 —— 的开始采用和推广。① 范恩正确地指出，通过统计方法确证过去曾经存在着家庭节制生育的做法，这是对历史人口学研究技术的成效作出的最高评价。"这项事例是非常突出的，它证明那些没留下任何文字证据的无名之辈私人生活中最详尽的怎么会成为我们要去认识的对象的。"它还证明，社会科学的计量研究方法怎样提供了有关人类行为的新证据，并且使我们能够回答那些使用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学家无力触及的问题，因为通常的史料含糊不清，不说明什么问题。现有的一些片断的书面证据并没有告诉我们家庭节制生育的范围和力度，但是一经定量分析，人类行为的证据是清晰而准确的。②

肖努曾经写道，新的人口史学"几乎无所不能"。③ 它在稳定的人口中心建立地区分析方面已经有了显示其价值的感人

---

① 关于避孕问题的历史文献和著作已经相当多。参见 J·迪巴居埃和 M·拉西维尔："法国避孕的起源"(1969 年)；A·夏穆和C·多芬："法国革命前的避孕"(1969 年)；E·A·里格利："工业化前英国家庭的节育"(1966 年)。范恩指出，H·贝格的著作：《近代家庭节育的起源》(H. Burgues, La prevention des naissances dans la famille:ses origines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巴黎，1960 年版)仍然大量依靠文字资料，结果还是没有充分说明家庭节育的程度和力度。

② 范恩：前引书，第 74 页。

③ 肖努：前引书(1970 年)，第 315 页。

例证。[1]然而，重要的是必须认识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很明显，这种方法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掌握基本的关键性的人口统计资料。非常关心工业增长和“起飞”问题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特别感兴趣的那些时期（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和国家（法国和英国）的资料都比较充足，这大概是种幸运的巧合。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地区和更早时期（十六世纪以前）的必要统计数据通常并不具备，而且也很难理解怎样才能概括路易·亨利及其继承者创造的研究技术。其次，对一个个教区作微观分析——例如对英国德文郡的科利顿和法国诺曼底的克鲁莱进行分析——既费钱又费时。对1538年到1837年这个时期的科利顿的研究，包括三万件抽样（每件抽样包含一个教区三百年内的记载），这些资料又转换为五千个家庭重现表，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人口和社会分析。

这些局限性也许有可能部分地加以克服。然而，这种分析方法一旦确立起来，那就有理由希望它们有可能使用不够完整的文字资料（如税册、炉税征收报告等），并且利用这种分析方法把社会结构的分析回溯到有教区登记的时期以前很早很早的时代，例如十三世纪。[2]其次，如果不是用手工方式而是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教区登记册提供的资料，显然会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3]抽样方法也应运而生了。[4]虽然使用这些方法和技术能够弥补某些缺陷，但是，家庭重现技术的内在局限性却依然如故。而且已经有人提出，说这些方法的使用恰恰表示“我们正越过一个阶段”而走向更熟练使用总体式研究方法的阶段，使用早期已有的这类片断证据的阶段。[5]这种研究方法——应当尽可能地同亨利的方法配合起来使用——明显的优点是它不需要那么高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而

且可以应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⑥

总之，历史人口学和新经济史学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在这两种新的研究方法中，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论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福格尔的著作使人们认识到至少有必要对美国铁路建设的经济作用方面未经适当分析随意得出的结论另作考虑。人口结构分析也完全否定了在社会科学家中普遍流行的关于前工业社会中家庭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的种种观点。这些都是重要的成果，尤其是后者。这个论点不仅涉及到社会科学研究，而且涉及到社会政策。另一方面，这里也有必要提到，有关新经济史学和新人口史学的革命性作用的有把握的预测至今尚未出现。这两个领域显然都倾向于针对比较容易解决的，而且就范围较小的问题展开研究。这些

---

① 参阅R·布劳恩:《工业化和寿命》(R. Braun, Industrialisierung und Volksleben. Die Veränderungen der Lebensformen in einem ländlichen Industriegebiet vor 1800)，苏黎世，1960年版；E·勒罗瓦·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E. Le Roy Ladurie,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巴黎，1966年版。

② 如拉斯勒特前引书(1965年)第591页所指出的。

③ R·S·斯科菲尔德:"过去的人口：重要档案的电子计算机连接"(1970年)；I·温彻斯特:"历史档案的手工连接和电子计算机连接"(1970年)；关于历史学家运用电子计算机的总情况，参见本书第6章，"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新研究技术的影响"，第305—314页。

④ 巴拉德:前引书(1970年)，第101页。

⑤ 肖努:前引书(1970年)，第317—318页。

⑥ 参见J·迪巴居埃:"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口"(1968年)。关于更多的研究方法，见古贝尔的两部著作:《路易十四与两千万法国人》(Louis XIV et vinght millions de Francais)，巴黎，1966年版；《十七世纪的十万外省人》，1968年版。

问题当中的变量因素有限。偏向从“基层”进行小规模的彻底研究并且集中于微观分析(某一个教区、工厂或商号、某个职业集团),从实际出发看比较明智。但是,这样便排斥了历史学中一些较重大的问题。由于一些地区性的专题研究被树立为典型榜样,它们将为得出更广泛的结论(例如全国范围的结论)奠定基础,这种说法也未必正确。

旧的实证主义观点认为,“历史事实”一旦被历史学家搜集起来便会纳入一种可靠的普遍公认的模式中,这种观点实际上已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正因为这样,真正的危险就在于,历史人口学家和“计量史学家”的努力将会在大量的支离破碎的研究中化为乌有,得不出任何结论,也没有最终结果。例如在美国,福格尔和本森引起的那些争论完全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但没有澄清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史人口学的情况也是这样。这种人口学研究的进展远没有得到肯定,然而却迫使它有必要去修正从亨利的关于克鲁莱的开拓性研究的著作和里格利的关于科利顿教区的同样重要的研究中得出的那些结论。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在不同的地区,女性出生率和儿童死亡率有惊人的差别。这一结论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描摹出一种貌似历史真实性的图景,然而,这种趋势无疑证实了旧的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历史经验是复杂的、独特的和多样的,而不是象新的研究方法所暗示要做的那样,可以在无可辩驳的定量数据基础上把这种复杂性转化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模式。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历史人口学的目标象计量史学家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小,更不确定了。现已证明,历史人口学和新经济史学并不象在不久以前的1966年那样充满

信心地预言自己已经找到了通向某些明确结论的捷径。[①]相反，它们的倾向是引出传统历史学所忽略的新的复杂性，从而使结论也复杂化并迟迟难以得出。这并不是说历史人口学和新经济史学带来的好处是虚假的，它们的作用难以持久，而是说好处看来并不象一度所说的那么直接，而是更加微妙。正象一位经济史学家说的那样，尽管它的目的是科学性，但是，资料的限制以及对变革造成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必然注定它"仍然是一门令人沮丧的不严谨的科学"。[②]

迄今为止，新经济史学和新人口史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是非常巨大的成就——已经迫使历史学家去重新思考、修正，甚至往往抛弃那些过去占支配地位的一整套结论和观点。也就是说，它打开了似乎已经关闭的大门，从而扩展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它们还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战略。难以想象今后的经济史学和人口史学的发展不是以定量分析为基础而以别的为基础。已经证明有价值的定量分析法看来可能会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其他领域中的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和人口史学已经用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明计量化方法作为历史分析工具的价值。现在的问题是，在可量度的定量资料不易得到的领域中，这一工具可在多大程度上加以应用？

---

① 例如，古贝尔在他的评论（"历史人口学……"，载《跨学科历史学杂志》，1970年，第48页）中承认历史人口学"并没有真正弄懂"自己发现的事实。他强调指出，"前工业社会中的人口特征"是"千差万别的"。他还说："我应当对生育问题作更多了解。"

② 巴拉德：前引书（1970年），第86页。

3.4 历史学的计量化

在当前历史著作和研究方法进步的背后，隐藏着对量度的新关注。这种关注显然是来自于社会科学。正是这一种关注使1955年前后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历史学有别于旧历史学。到1955年为止，即使在历史研究中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里，历史学的主要特征仍然是描述性和叙事性的。在其他国家，由于历史主义和历史遗传论的长期影响，在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和个别性的观念上筑起了一道不利于计量化和理论概括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心理屏障。

因此，就方法论而言，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所谓的“计量革命”。我们已经讨论过，量度和计量化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内实际上已经对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影响。然而，“计量革命”的特征和意义却还是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计量历史学笼统言之是指对一系列可以量度的现象进行的历史研究。按照彼埃尔·肖努的话来说，计量历史学“与其说是对个别事实感兴趣的历史学，还不如说是对可以归纳为同类系列的成分感兴趣的历史学”。① 另一些人，尤其是让·马尔祖斯基，则要求对计量历史学下一个比较狭义和严谨的定义。② 按照马尔祖斯基的观点，统计学或“纵向编年数据系列”的运用可能产生令人感兴趣的结果，但这只不过是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提高”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或改进研究方法。他认为在讨论狭义计量史学之前，有必要以横向分析补充和完善纵向系列。

因为“纵向系列”是指某个时期内某一类现象(例如价格)的变化。而横向分析指对同一时期内发生作用并且相互影响的有关现象(“经济事件的整体”)形成的结构进行分析。这个方面的典型是国民核算制度,它可以对构成经济活动的所有成分,从初级产品生产到积蓄和投资,进行精确的叙述和评价,它还可以(而且经常)转化为一系列的代数方程式,用以表示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变量因素。③

这样定义的计量历史学是试图“在国民核算的严格范围内估计全世界的经济量,通过这样的计量确立这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④ 但是,历史学家们反对这种定义,说它过分狭窄了。他们还认为这样定义的计量历史学比较注重理论经济学家的需要,却忽视了历史学家的需要。这里,我们不准备详细叙述由此而引起的那场争论的全过程。⑤ 肖努试图用“计量历史学”和“系列历史学”的区别来解决这个问题。前者是在马尔祖斯基所说的那种狭义上使用的(也就是指,“当结果可以纳入用国民核算为形式的模型时”使用的);⑥ 后者则是指其他各种量度形式,这些量度借助于要求内部统一的系列数据从而

---

① 肖努: 前引书(1970年),第297页。

② J·马尔祖斯基: «计量历史学导论»(J. Marczewski,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quantitative), 日内瓦, 1965年版。另一些同样重要的纲领性的论著是P·勒布伦的“结构与计量化:对历史科学的思考”,载佩雷尔芒编: «历史学家的推理与方法»(Raisonnement et démarches de l' historien), 1963年版;“计量历史学的发展。向计量史学前进吗?”(1967年)。

③ 参见马尔祖斯基: 前引书(1960年),第12,14,48页。在马尔祖斯基这本书的第26页和勒布伦的论文(1967年)第591—596页上,列举了代数模型。

④ 勒布伦: 前引书(1967年),第589页。

⑤ 关于这次争论的过程,参见P·维拉尔的论文“促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更好的相互理解”(1965年);肖努:前引书(1970年)。

⑥ 肖努: 前引书(1970年),第300页。

加强对孤立事件的考证。[1] 但是，在写本书时，至少除了法国，没有任何事实能够证明历史学家在写作时会考虑到这种语义上的差别。各种迹象都表明，"计量历史学"这一术语继续在广义上被使用来形容各类侧重于定量资料的量度和分析的历史著作，以区别于传统上强调定性的历史著作。

因此，在历史学家的眼中，马尔祖斯基提出的那一类分析方法只不过是计量研究方法的一种——也仅仅是一种——应用罢了。[2] 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法如果大力使用，势必会有三方面的局限性，从面会以他们无法接受的方式缩小计量历史学的研究范围（至于对这种观点的批判，本书将在其他地方讨论）。首先，这将有意地被局限在经济基础结构的研究上。因此，唯一的计量历史学是计量经济史学。第二，这种方法只可能应用于有充分统计资料可用的那些时期（大致指 1780 年以后）。第三，这只能应用于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即欧洲和北美的历史研究，因为这些地区（相对来说）比较早地注意了国民核算的统计。除此以外，正如肖努所指出的，[3] 由于计量历史学强调以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因此，这种方法也不适用于经济和政治边界尚不明确的那些时期，而那些时期实际上构成了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

这些局限性都是很严重的。不过，在计量历史学自以为能够施展作用的领域里，也就是在它能够被运用的有限历史时期和地区内，马尔祖斯基和勒布伦提出的那类定量分析方

---

① P·肖努："计量历史学还是系列历史学"（1964 年）。

② 还应当补充一点，这种类型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美国经济史学家创立的一种比较专门化的计量经济史。

③ 肖努：前引书（1970 年），第 174 页。

法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它的最大贡献在于把重点放在历史上“并不惊人的事件”上，放在任何特定社会中基础经济结构的演变，这些演变则是从当时重大政治事件引起的“突破”（“中断”、或“破裂”）中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计量历史学相当于，或者几乎可以说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程”概念的统计—数学表现形式。计量历史学的另一个目标是要达到“更高水平的客观性”。这当然是相对于历史学通常使用的研究方法而言的。[①]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经济背景下衡量某个变量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标准并不简单地是某个历史学家个人的判断，而是这个变量因素在可量度的各个因素构成的整个“群”中所处的地位，或者是“参照体系”的内聚力（“模式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每项变量因素都是这个“参照体系”的组成部分。[②]

尽管如此，不掩饰或不缩小计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很重要。马尔祖斯基本人就强调过，即使在最佳的可能状态下（意即可能取得一切必要的资料），计量历史学也决不会取代——实际上也不谋求取代——历史研究的其他各种形式。计量历史学之所以将例外的个人（“英雄人物”）、例外的事实以及“由量变引起的重大突变”置之不顾，那完全是因为它只注重于“从连续性和长期演化的角度去看待群众”。[③]彼埃尔·维拉尔及时地指出，[④]这些例外情况如果算不上至关重要的话，

---

① 马尔祖斯基：前引书（1965年），第15页。

② 同上，第14页。参见勒布伦：前引书（1963年），第30页；勒布伦：前引书（1967年），第598页。

③ 马尔祖斯基：前引书（1965年），第33，36页。

④ 维拉尔：前引书（1965年），第302页。

至少也是非同小可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极重大”的“变形”，以致产生了“结构上的非连续性”，如果有意将它置之不顾而去进行计量分析，这又有什么价值呢？① 毋庸置疑，有一些历史事件是无关紧要的，可以把它们当作对经济结构不产生影响的偶然情况而置之不顾。相反，有些历史事件显然不是这样。由于对这些事件无法进行定量估计，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对发展进程的影响都极大地限制了计量分析的范围。计量历史学可以说明社会的正常功能，但无法解释由量变而引起的重大突变，或者说，无法解释由量变而引起的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过渡的进程。简单地说，计量历史学本身不可能对它所叙述的社会进程提出圆满的解释。② 当计量历史学面对无法予以解释，只好全都作为特例予以记载的外部变量因素时，它便象其他类型的历史学一样，终究不得不落入“人类的和历史的复杂整体”这一结论的窠臼。③

以上这些认识并没有贬低计量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价值，只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局限性，对它不要提出过分的要求。用马尔祖斯基的话来说，计量历史学只是“存放着各式各样方法的‘军火仓库’中的一种武器”，只能在“相当有限的条件下”起作用。④ 无论它本身有多么大的价值，它作出的贡献也仅仅

---

① 马尔祖斯基：前引书(1965年)，第35页。维拉尔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战争不是‘外来因素’，不能将它抹去。"见维拉尔：前引书（1965年），第312页。

② 马尔祖斯基：前引书(1968年)，第190—191页。

③ 马尔祖斯基：前引书(1965年)，第36页；勒布伦：前引书(1967年)，第584页。

④ 马尔祖斯基：前引书(1965年)，第51页；前引书(1968年)，第190页。

是"不全面的"和"初步的"。① 问题显然在于，这种可以首先应用于经济资料分析的不全面的分析方法，是否也可以扩大应用范围，运用到非经济领域呢？如果我们赞同马尔祖斯基给计量历史学下的那种狭窄的定义，那么，它显然不可能推广运用。反过来，这恰恰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的定义过分狭窄从而给以否定的原因之一。但是，勒布伦已经指出，计量化并不简单地只是用来处理某个范围有限的特殊问题的方法（即"在国民核算的严格范围内估计全世界的经济量"），它还是一种开拓了新思路的分析方法和新程序。② 例如，计量化提出在衡量历史证据时，统计学的标准同传统的历史批判方法都是同样重要的，③ 也都是非常必要的。认为不需要计量统计资料的历史学家同认为唯有计量统计资料才有用的历史学家一样，他们的观点都是不完全的和片面的。

不过，定量分析技术的可运用的程度也远不象有时认为的那么狭窄。计量化和统计方法应当在经济史，甚或在社会史中，占有合法的地位，这已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承认。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承认定量分析技术可以运用于法律史、宪政史和思想史。他们采用了十八世纪的休谟的观点，即认为"有关任何品质和环境的争论"决不可能"达到合理的确定性和精确性"。例如，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标准可用以衡量汉尼拔将军究竟有多么伟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究竟多么杰出。④ 这种说法当然是绝对正确的。不过，我们确实能够对观念进

---

① 勒布伦：前引书(1967年)，第598页。

② 同上，第599页。

③ 同上，第601页。

④ 参见W·O·艾德洛特："历史学中的计量化"(1969年)，第13页。

行量度。这样说也是对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展开这项工作。对观念进行量度——例如，对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的思想进行量度——虽然不可能使我们得到最终结果，但却可得出有意义的结果。此外，这还不是用统计学方法对“无形之物”和“不可量度之物”进行衡量的唯一方法。如果我们知道哪些人在阅读哪些书籍，哪些书籍的发行数量有多少，那么，我们便把握了舆论的趋势。这种把握也许不够完善，但肯定不是没有价值的。这种做法无论怎么说，都比全凭主观去判断谁是最有影响的作者的那种方法会更加令人满意。最后，还有一种要义分析技术，也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材料范围内对反复出现的词汇、观念和主题进行有系统的定量研究。① 要义分析法的最新事例是计算十八世纪北美殖民地的出版物中有代表性的词汇的使用频率，用以衡量北美殖民地觉醒的发展状况。② 显而易见，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例如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使用这种方法也有可能取得重大的成果。

运用计量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后果是为那些至今尚未开始进行系统研究的领域增添了新的研究范围。大多数历史学家还认为这种方法也可能大大地深化这些领域的研究，例如法律史和宪政史的研究。这两个领域的传统研究方法是历史学家挑选出一些特殊的案例或文件（例如大宪章、权利法案、或雷克斯诉汉普顿案）来进行研究，而这些案例和文件用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衡量是非常重要和突出的。事实证明如果不将

---

① 有关要义分析技术的基础知识，参见T·F·卡尼：《要义分析法》（1969年）。本人通过与卡尼的当面切磋，受惠匪浅。

② 参见J·M·普赖斯：“当前历史学计量工作主要趋势概况”，载《计量历史学研究》（1969年），第11页。

这些案例置于诉讼的整体模式的背景下来认识，这种方法有可能引出错误的结论。只有系统的定量分析才有可能最终地提供上述背景。因此，某位学者在致力于对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英国财政法庭所审理的全部案件进行全面的定量研究，与此同时，另一位学者正准备对星室法院一个多世纪中的诉讼进行同样的定量分析。①

扩大计量历史学研究范围的上述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并不总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历史学在使用经济史学家和人口学家定量的“硬”资料，例如价格、人口普查数据、积蓄和投资之类的数据(不用说，这些数据在能够用作统计资料之前往往还要事先进行加工)上每前进一步，这些资料输入的统计学性质所起的作用就越大。例如，如果被选用来进行分析的词汇或符号并不真正含有本身具有的那些涵义的话，这样的分析无论使用的技术多么娴熟，都不大可能有太高的价值。有时，规定的目标也许太高，有时也许是量度的标准不够精确。作为这方面的实例，也许有人会提到戴维·C·麦克莱伦的著名研究。他试图量度出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要获得成就的抱负有多大力量，并且通过这样的方法来阐明造成文明兴衰的那些因素。②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感到鼓舞的著作。虽然麦克莱伦使用的数据有时还缺乏充分的说服力，③ 但这并不妨碍他达到自己

---

① 普赖斯，前引书(1969年)，第11页。

② D·C·麦克莱伦：《正在实现的社会》(D. C. McClelland, The Achieving Society)，普林斯顿，1961年版。

③ 例如，麦克莱伦在那本书的第11页上说“对十五个人的思想进行抽样分析就可以使我们充分地量度出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到前500年的希腊民众对于获得成就的期望达到了什么水平”。尽管他的论证与此相反，但是，他这句话的含意是谁也不愿意接受的。他在第130页和第134页上有关西班牙和英国的抽样分析同样遭到怀疑。这个问题太大，而且技术性太强，难以在此加以讨论。

预期的目的。人们只要考虑到——以麦克莱伦所举的例子之一为证[①]——从吉本到贝恩斯有那么多知识渊博和严肃认真的学者对于拜占庭帝国的生命力和文化成就、兴盛和衰落，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判断，那么人们对需要一种客观的量度标准看来不会有什么争议。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读过了麦克莱伦的著作之后，人们都会有"一种萦回心头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重要问题总有一天会有一些更高明的研究技术能够更加清晰地给它们下定义，并且更加准确地予以量度"。[②]

3.5 现状

对量的探索无疑是历史学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区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对待历史研究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方法的首要因素。就是那些象笔者一样未曾在计量研究方法上进行过积极活动的历史学家也承认这一点。甚至在反对派的一系列猛烈攻击中，对这一点也是缄口不言的。在历史学界，没有任何问题比它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它的光荣地位在1970年8月于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得到了确认。[③]

对定量测量和数量分析的潜能所给予的这种重视不应当引起任何惊奇。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一代新人闯入了所谓的"人文科学"领域。这一代人在知识装备上受到自然科学和科学世界观的影响，要比他们的前辈深刻得多。在控制论这门新兴学科兴起的时代，在电子革命、模拟电子计算机和

数字电子计算机诞生并加以利用的时代，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对传统历史学笨拙的研究方法已失去了耐心，并且力求将他们的工作置于更强的专业性基础上，这当然是不足为怪的。结果，历史学正在变得越来越成熟，研究水平越来越高，而且，人们难以相信这种趋势会发生逆转。如果公众对历史学的爱好依然是以艺术性、修辞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为转移的话，那专业史学家就大可怀疑了，那就无法解释G·M·特里维廉的著作《英国社会史》为什么能以质量之高而销售两百万套以上了。

当然，许多历史学家——也许大部分历史学家——至今尚未开始同这种新趋势协调。美国最近一部概述当前形势的著作不出所料地提出了“代沟”一词，④而且颇有道理地认为欧洲和（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人们可以作出判断）亚洲的这条“代沟”比美国的宽。这条“代沟”的存在从1969年12月美国历史协会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和一年后在波士顿召开的另

---

① 麦克莱伦：前引书（1961年），第21页。

② 参见R·戴维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R. Davis,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莱斯特，1965年版，第15页。

③ 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主要参见T·帕帕多普洛：《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T. Papadopoullos, La méthods des sciences sociales dans la recherche historique)；A·迪比克：《在人文科学前面临选择的历史学》(A. Dubuc, L'histoire au carrefour des sciences humaines)；T·席德尔：《历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之间的区别》(T. Schieder, Unterschiede zwischen historischer und sozial wissenschaftlicher Methode)；E·塞斯坦：《事件历史学和结构历史学》(E. Sestan, Storia degli avvenimenti storia delle strutture)；J·H·赫克斯特：《历史学、社会科学和计量化》(J. H. Hexter, History,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Quantification)；J·迪普隆：《语言和历史学》(J. Dupront, Langage et histoire)（该书涉及到要义分析方法的所有重要问题）。以上著作均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

④ D·S·兰德斯和C·H·蒂利编：《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D. S. Landes and C. H. Tilly eds., History as Social Science)，恩格尔伍德，1971年版。

一次会议上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①对老一辈历史学家的进攻尽管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但是攻击矛头所向也包括他们方法论的不足和理论方面的过分简单。这些缺陷都使传统的历史学无力地维护着现状。按照美国历史协会前任主席C·范·伍德沃德的话来说，“历史学是应时之作”，是“乏味、平庸和低级的……，在伦理上是陈腐的，在美学上是陈旧的，在学术上是枯燥无味的”。新一代历史学家的目的就是要根除这些弊病，代之以水平更高的方法论和概念明确而科学的标准。

我们有充分的机会指出，探索经得起“客观检验的结论”而不是探索“文学性较强的叙事史”，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种做法可以回溯到巴克尔和康德，从另一条线索上也可以回溯到马克思。其中能够说明研究重点为什么会转移到计量研究方法上去的新东西，是一系列复杂的研究技术的涌现，这些技术看来最终在可企及的未来会导致经得住客观检验的历史学的实现。历史学家应当满怀希望地利用这些研究技术带来的可能性，采取这种态度不仅理所当然而且也是有益的。历史学一直借鉴其他学科，正象其他学科也一直在借鉴历史学一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历史学为什么不应当利用数学家、统计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研制的和不断完善的武库。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经验证明，许多使人最感兴趣和最有创造性的成就大批出现在各个学科为自己划定的那些界线的边缘和交叉处。

确实，使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会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对

---

① 参见D·唐纳德：“激进的历史学家在行动”(1970年)。

于这一点，计量历史学的那些经验丰富的倡导者是非常清楚的。① 许多评论涉及的一个危险是为追求研究技术而追求研究技术。艾德洛特曾经说过："计量化研究中的最大危险不是忽视研究技术，相反，倒是变得过多地吸收研究技术。"② 如果有些常规的历史学家可以被指责为"胡乱摆弄档案文件"③ 的话，那么，计量历史学家也同样有可能被指责为胡乱摆弄电子计算机。满足于掌握复杂的研究技术可能会使他们变得自以为是，从而在选择某种特殊的研究方法时，可能根本不考虑这种方法是否适用。④ 人们有时还会忘记，仅仅凭数量还不能自然而然地为自己的论点作辩护。计量分析方法是否有助于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仅仅是个研究上的策略问题，而不是一种惯例。"没有从结构上进行考证的数量就象没有证据支持的观点一样，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是缺乏明确方向的。"⑤

使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会出现的另一个危险是有可能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术语来取代系统的分析。如果数量还不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那么，语汇便失去魔力。维拉尔指出："把迪盖克兰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指挥的一次战役描写为一场在准军事解放的目标下进行的防御性行动策略，⑥ 结果是一无所

---

① 勒布伦：前引书(1967年)，第602页。

② 勒布伦：前引书(1969年)，第21页。

③ 唐纳德：前引书(1970年)，第26页。

④ 参见普莱斯：前引书(1969年)，第13页。

⑤ 艾德洛特：前引书（1969年），第12页；巴拉德：前引书(1970年)，第78—79页。

⑥ 贝特朗·迪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约1320—1380年)，法国将军，统帅。英法百年战争中期率法国"自由运动"的退伍士兵进入西班牙作战，将亨利二世拥上西班牙王位。后来率法军将英军赶出法国南部和西部。——译者。

得的，甚至还有可能造成重大谬误。"① 以这种方式使用伪科学术语，除了会造成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错误外，还会造成貌似正确而实际上错误的准确性和客观性。② 还有一种根本性的危险是不加批判地使用"结构"等这样一些社会科学的概念的倾向。近来，一些历史著作中大量出现"结构"之类的术语，尤其是计量历史学，甚至于脆被定义为对"同一时期内各种现象组成的结构"进行的分析。③ 然而，"结构"的概念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可以想当然的，连社会科学家都在为它们内在的不确定性表示极大的关注和忧虑。④ 这里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席德尔极其正确地指出，看到历史学家并未打算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真叫人泄气。⑤ 这些概念和理论给历史学家造成的困难决不是无足轻重的。例如，社会结构这个概念既可指"正常"概念(即任何事物都适用于这个概念)，又可指"异常"概念(即正常的变异)。⑥ 我们凭什么标准来证明一系列经过考证的历史事实是"异常"的呢？在历史变化的哪一个阶段上"异常"的事物变得"正常"，而"正常"的事物变得"异常"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绝对不是可以不证自明的。⑦

---

① 维拉尔：前引书(1965年)，第298页。

② 赫克斯特说："换掉罐头听上的商标并不等于把猪肝香肠变成了鹅肥肝酱"。见赫克斯特：前引书(1970年)，第27页。

③ 马尔祖斯基：前引书(1965年)，第48页；参见J·克雷贝克斯："谈谈近代史启示作用的'重要性'"(1963年)。

④ 参见迪比克：前引书(1970年)，第6页；塞斯坦：前引书(1970年)，第19—20页；F·马克卢普："结构与结构的变化：晦涩难懂的话"(1958年)；R·巴斯蒂德："词语'结构'讨论会"(1959年)。

⑤ T·席德尔："历史的结构和人物个性"(1962年)，第273页。

⑥ 同上，第275—276页。

⑦ 勒布伦：前引书(1963年)，第44页。勒布伦说："我们至今尚未掌握有关从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过渡的可靠理论。"

然而，这些问题绝不是无关宏旨的。在关心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间有关封建主义的旷日持久而极其枯燥的争论的任何人都可以证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诸如封建社会开端于何时？封建社会的结构特征是什么？封建社会何时开始为非封建社会的结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所取代？

历史学家越努力使用定量研究技术就越认识到历史资料难以处理。在把史料置于可计量研究范围的种种努力中，最为复杂和最为成熟的那种努力将最终被迫承认——这种诚实态度令人赞叹——非数量的历史变量因素不仅存在，而且以这种方式在历史上发生作用的这些独立变量因素将会使计量研究方法无法作出完整的解释。这一点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马尔祖斯基对计量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几乎没有必要去论证计量历史学可否更有力地扩大运用到更广泛、更松散的有条不紊的研究中去。这当然不是说计量研究是无用的，而是说热心于计量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原先对它在精确性、确定性和客观性上能达到的结果所寄予的期望，基本上已经丧失。我们也不止一次地指出，计量化不仅没有澄清某些结论，反而由于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历史学忽视的那些因素，结果却往往把问题复杂化了，使问题解决的时间拖延了，使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是趋于简单和统一，而是变得复杂和难以处理了。至于历史上的个人——譬如说俾斯麦——与这个个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象过去一样神秘莫测。①

① 这就是克鲁多夫所说的"处在适当位置上的适当的人"的问题。见J·克鲁多夫："历史中什么人是重要的？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1963年)，第113页。

这并不意味着计量历史学没有作出，或将来也不可能继续作出重大的积极贡献。[①] 通过仔细地测定事件的范围，便可以缩小可能性的范围。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人把例如德国的统一归功于俾斯麦独自的努力以及他作为政治家的天才了，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解释那种无法说明的"黑暗中的大飞跃"。如果只有掌握了测定"正常"的标准，我们才可能衡量出"异常"的话，那么，就没有哪种研究技术能够比数量测定方法更有成效地建立这种标准。用马尔祖斯基的话来说，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对待"群众"的兴趣超过了对"英雄人物"的兴趣，那么，计量历史学就是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通过这扇大门，我们便可以接近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没有书面记载的千百万群众的秘密。[②]

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都是巨大的收获。不过，它们也说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历史学造成的影响为什么并不象有一个时期人们所期望的那么直接。我们决不应当忘记，"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一般结论并不是用数字来证明的"，"这些结论仅仅是一些似乎可以解释合理形态下已知事物的见解"。[③] 计量历史学造成的影响也有大量消极的东西。它摧毁了过去一直死抱住不放的结论和范畴，但谁也不能说这些结论和范畴已经过时了。[④] 休斯正确地强调说，"证伪为我们增添了知识"。[⑤] 然而，由此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又是迫

---

① 克雷贝克斯对计量历史学的贡献作了公允的评价，见克雷贝克斯：前引书(1963年)，第65—81页。

② 马尔祖斯基：前引书(1965年)，第83页。

③ 艾德洛特：前引书(1969年)，第15页。

④ 同上，第19页。

⑤ J·R·T·休斯：前引书(1966年)。

使历史学家裹足不前，重新考查自己的证据，并且回到原来的原始资料中去寻找新的证据。这样，我们距离问题的解决还是象过去一样遥远，甚至比过去更遥远了。人们常常表达的那个希望——历史学总有一天会跨越界限，成为不断积累和增添成果的科学——还远远没有实现。马尔祖斯基指出，计量历史学的新发现“在原则上”是可以量度的，也是不断递增的。[①] 但是实际上由于不可量度的变量因素的撞击，上述现象即使存在，也是十分罕见的。

然而，只要把今天的历史学同三十年前的历史研究在特征上加以比较，谁也不会再怀疑新方法论的作用，更不会怀疑这样的作用将会与日俱增。正如近来的一些论述明确指出的：“在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实际研究者所大力研究的领域是当前正在成长并有一批年轻人参加的那些领域。这批年轻人对待自己职业的看法与他们的前辈大相径庭。”[②] 大多数青年一代历史学家以社会科学家自居。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与——譬如说——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完全不同。其次，也许除了经济史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还是尝试性的和试验性的，他们已做的大量工作与其说采集和贮藏晶莹可口的新鲜果实，还不如说是提出问题，揭示困难。至今为止取得的成果看来主要是为历史学家的兴趣指出了新方向，特别是将注意力引向分析战争、经济增长、人口和城市化等专题。这些成果还证明这类研究专题要求使用新的工具。如果说这些工具还不是特别有效，也许还需要经过一番磨砺和调整，才能有效地服务于历史学

① 马尔祖斯基：前引书(1965年)，第14页。

② 兰德斯和蒂利：前引书(1971年)，第30页。

家自己的目标，那么，有人说这些问题和困难都是无法克服的，那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失败主义者。计量分析方法和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技术的使用是最近的事。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连篇累牍的谈论和批评，越来越多的讨论会和会议，有时似乎在数量上超过了正在产生的新著作。① 然而，这些现象是人们所熟悉的新躁动的先兆，而且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

历史学已经过久地徘徊于神话和现实之间的边缘地区。正象安德尔所说的，到 1950 年前后，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方法论上，历史学都到达了"僵死的终点"。② 历史学家以后从二十一世纪来回顾的话，也许会把这个新目标和新方法的发展看作历史学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正象人们有时提到的那样，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如果历史学终于完成了从伪科学向科学的过渡，那么就不会怀疑今天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力量是一般性概念和方法的应用和完善。然而，这样的胜利目前尚未赢得。

① 普赖斯：前引书(1969 年)，第 1 页。

② 参见 O·F·安德尔："理论的历史学"(1958 年)，第 13 页。

4 历史学的新领域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如果说，当代历史研究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从研究个别和具体转向研究普遍规律，是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作为最终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尝试，那么，第二项最重大的变化无疑是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扩展。这个变化从原则上来说，当然也并不新鲜。任何思想敏锐的历史学家对其他民族历史的好奇心迟早会胜过对本民族历史的兴趣。在欧洲的历史学家当中，对他们视野之外的历史事件发生兴趣的至少可以远溯至伏尔泰。然而，扩展历史学家的视野之所以再度成为当务之急，并且成为当代历史学研究中的主要趋势之一，是由于1945年以来整个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尤其是1957年至1960年间非殖民化过程的迅速推进。正如I·埃莱凯克所说的："活生生的历史要求对普遍概念的具体内容作具体的修正，同时还要求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历史研究，使它们产生更重大、更深远的作用。"这就是当代对历史学提出的最明确的要求。①

埃莱凯克还指出，这种要求并不只是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受到大量批判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已被取代。这一

点固然非常重要，而且有关的著作已经大批地出版，[2]但只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历史学家想要创造出有价值的成果，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获得民族独立以后，亚洲历史学家——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学家[3]——的工作很自然地集中于发掘本国过去的历史，尤其是集中于反对前辈欧洲学者对历史所作的"殖民主义的"解释。迄今没有任何人否定过亚洲历史学家这种反应的必要性及其有益之处。然而，我们同时又必须承认，从长远看，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神话取代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主义"的神话同样是劳而无功。用萨蒂什·昌德拉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无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4]相反，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树立至今尚未树立起来的那种立足全世界的观念。这种观念涉及人类历史中的中心问题以及"辩证的矛盾"，例如历史的连续性与飞跃，统一和差异，停滞和进步，社会进化中的革命阶段和静止阶段之间的相互交替，加速发

---

① I·埃莱凯克：《历史知识—社会意识》(I. Elekec, Connaissances historiques-conscience social)，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莫斯科，1970年版，第10页。

② T·J·G·洛赫尔：《欧洲中心论历史图式的消亡》(T. J、G. Locher, Die Überwindung des europäozentrischen Geschichtsbildes) 威斯巴登，1954年版；E·H·丹斯：《历史学—叛逆者》(E. H. Dance, History the Betrayer)，伦敦，1960年版。众所周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重大研究计划，就是开展反对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对待过去历史的斗争，从而恢复比较恰当的平衡。有关这方面的著作，请参见丹斯：前引书(1960年)，第154页。

③ 我应当借此机会向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委员会专门为我准备的两份精彩的报告表示感谢。这两份报告对本章的撰写有极大的帮助，在后面的讨论中，我还将多次提及和引用。

④ 摘自昌德拉："历史学中心论的解体"。这是他专门为本书撰写的一篇极富有启发性的文章。为此，我想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展阶段和缓慢发展阶段之间的相互交替。然而，只有通过对不同方向的趋势进行比较才有可能建立上面所说的那种观念。如果我们对迄今由于种种原因仍被忽视的某些历史领域没有更深刻的认识，这类比较纵然并非不可能，但肯定是肤浅的。①

当然，亚洲的伟大文明有其自己的历史学传统。亚洲的历史学传统同欧洲文明的历史学传统同样悠久，甚至在大多数国家还要悠久得多。今天再也没有人会死抱着长期流传于西方的那种"东方无历史"论（或"东方非历史"论）不放。②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对历史的兴趣同样源远流长。中国、印度以及西亚的历史学与欧洲历史学的源头相同，对过去给予关注的最早动因也基本上一致。③首先，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历史学的目标是一种准巫术，与古代的崇拜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目的在于抚慰神灵和令人畏惧的众神，因为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了人类的命运。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历史学后来都成了国王行为的记录，国王被看作神，或神的子孙后代，或近于神。历史学成了某种形式的宣传，"巫师和乐师借助于这样的形式来歌颂国王的至高无上和丰功伟绩"。④中国古典史学被简洁地描述为"官僚们写给官僚们看的历史

---

① 埃莱凯克：前引书（1970年），第11页。

② C·H·菲利普斯编：《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的历史学家》（C. H. Philips, ed., Historians of India, Pakistan and Ceylon），伦敦，1961年版，第4页。

③ E·弗格林："历史学的起源"（1960年）；B·C·布伦戴奇："克莱奥的诞生"（1954年）；H·巴特菲尔德：《历史学以及人类怎样看待过去》（H.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the Past），伦敦，1961年版。

④ 拉梅什·昌德拉·马祖姆达尔："桑斯克里特文学中的历史观念"，载《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eoples of Asia），第1卷，伦敦，1961年版，第13页。

学"。[1] 换言之，这样的历史不是如实地记载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王朝统治者的利益，出于保持现存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尽可能地抹煞和掩盖"分裂、分歧、紧张和变异这样一些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的连续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特征"，[2] 从而制造出某种自我形象。

长期以来，东方和西方的历史学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平行地发展着。同中国古典史学一样，法国或英国中世纪官方编年史也是作为统治的工具来编纂的。十六世纪英国的历史学著作也是为都铎王朝的利益而撰写的。西贝尔、特雷施克以及普鲁士政治史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著作充分证明，十九世纪的东方和西方在史学观点和立场上并没有很大差别。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即十九世纪，欧洲却开始第一次认真地试图将历史学置于事实客观性的新的基础上。兰克学派力图"如实地"发掘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则深入到历史的辩证发展进程中去。这两个学派都反映了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出现的重大变化，而且只有欧洲才发生这样的重大变化。马祖姆达尔曾经说过："十九世纪初的印度人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实际上一无所知。"[3] 印度的情况如此，东方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如此。甚至晚至 1935 年，当第一届现代史大会在印度召开时，大会主席萨伐特·阿赫默德·汗爵士仍然向印度历史学家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应用德国史学的批判方法，因为"在西方，这种方法使历史学几乎成了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4] 在日本，兰克的忠实信徒路德维希·里斯于 1887 年到

① E·巴拉兹："作为官僚实践指导的历史学"，同上，第 3 卷，第 82 页。

② A·F·赖特："中国文明研究"(1960年)，第 235 页。

③ 马祖姆达尔：前引书(1961 年)，第 416 页。

④ 摘自提到的两份报告。

达东京，从此才开始了日本历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在中国，以西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基础，扭转历史研究的方向，则以顾颉刚这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为标志。①

只要对事实作一番客观的考察，人们就不至于再会怀疑亚洲国家历史研究的复兴和现代化——当然也包括西方和东方学者在内的亚洲文明研究的全面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收了西方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概念。当历史的写作和教学还控制在欧洲人手中时，尤其是在较早的阶段上，西方历史研究方法的引进往往伴随着欧洲人的偏见和成见，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这些都是事实，而且这些事实一直成为客观地评价伟大的东方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应有地位的一大障碍。其次，亚洲各国都有自己本国的历史学传统——例如，印度有所谓的古事记传统（itihas-purana tradition），这些传统是构成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成份。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虽然各国在试图保留本民族的传统的同时又以本民族传统为基础而不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创立和发展新型的历史学作了种种努力，但是可以说，总的情况仍然是，这种复兴传统历史学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响应。②印度尼西亚历史研究所设立的一个委员会曾经报告说："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和态度与传统形式的历史著作'格格不入"。在目前的情况下，传统形式的历史著作只能

① 赖特：前引书(1960年)，第248，251页；J·格雷："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著作"(1961年)，第202—203页。顾颉刚的著作《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由A·W·赫梅尔译为英文出版(雷登，1931年版)。

② 至少，这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上述报告给人造成的印象。印度报告指出(第4页)，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用狭隘的眼光去看待印度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印尼报告(第19页)也指出，这种结果是"把过去的状况弄混乱了"。

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以德雅加迪宁拉特和普尔巴蒂雅拉加为先驱的印度尼西亚现代优秀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是以完全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类型来写作的”。这些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本书所关心的只是当代历史研究的主要趋势。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比较恰当的做法当然是不必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传统形式的历史学。①

西方历史学在三个不同阶段上对他们发生了影响。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注重于应用和吸收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创立的研究方法，即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方法，以及那种尽一切力量搜集事实并且千方百计地追求准确性的学术态度。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依然是非常强大的，尤其在辛亥革命后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这种影响才逐渐地被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所取代。德国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种影响之间的较量，直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在中国才得到解决，但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在这场胜利之前已经稳步地获得了立足之地。同亚洲大陆其他国家一样，在印度，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为那里的富有成果的争论和论战提供了课题。以D·D·科桑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对印度青年一代历史学家的思想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②

① 印尼报告(第4页)。这当然不是说传统形式的历史著作不能用作历史资料，实际上，德雅加迪宁拉特正是这样使用传统历史著作的。他同时又“详细地说明了印度尼西亚传统历史学的基础缺乏历史性”(第20页)。

② D·D·科桑比：«印度史研究导论»(D. D. Kosamb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纽约，1957年版；«古代印度文化和文明史纲»(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India in Historical Outline)，伦敦，1965年版。印度报告把这两部著作誉为“里程碑”(第18页)。

在这以后，印度历史研究的主要兴趣开始转移到新的方向。当前的趋势主要是吸收和应用西方过去十五到二十年中创造的复杂的分析技术。①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还会看到，拉丁美洲的历史研究也发生了类似的演变过程。

长期以来，拉丁美洲的历史研究一直在仿效欧洲的模式，而亚洲各国历史研究中的新趋势却是最近才出现的。各国的演变过程不平衡，演变速度也各不相同。在印度，自从获得独立以来，对西方历史学概念和方法的吸收一直在取得稳步的进展，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研究目前仍处在过渡阶段上，与全面接受文字史料考证的基本技术还有一段距离。印度尼西亚史学界整个地说来对于方法论的兴趣不高，只有萨尔托诺·卡尔托迪尔德约等少数历史学家才认识到了提高和改进研究方法的必要性。② 印度尼西亚历史研究的现实状况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只是近几年来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雅加达大学才设立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历史系。在印度，由专业学者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前后”才开始一批批地出版，这标志着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将会看到，这个转变的时间与标志着当代西方历史研究新趋势开始出现的时间极为相近。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暂且留待后面加以讨论。

1961 年，班蓬·奥埃托莫曾经在一部著作中写道，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学“尚未对历史科学作出新的贡献”。④ 如果我

① D·D·科桑比：前引书（1965年），第 31 页。

② 印度尼西亚那份极为坦率和公允的报告得出了如下结论（第 18 页）：“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研究尚未到达起飞阶段”。

③ 印度报告，第 12 页。参见上文，第 256—257 页。

④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 2 卷，1961 年版，第 78 页。

们把坚持“历史的科学性”看作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应当持有的态度，那么，不仅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研究状况确实属于这种情况，而且整个亚洲的历史研究状况也是这样。在这样的形势下，“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一直注重探索西方创造的新研究技术，并且运用这些新技术去研究本国过去的历史，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象西方历史学家一样，他们已经认识到，使用历史学家过去一直主要依赖的那类文字史料确实无法回答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正在尝试借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新型研究方法。他们很自然会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发，使用根本不同于欧洲的本民族传统去看待研究对象。他们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束缚，从而能够用崭新的认识能力去看待各种问题，并且赋予这些问题的答案以积极的内容。然而，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或北美）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从根本上说来，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舍此还可能出现什么别的情况。新研究技术的发明和新工艺并非哪一个民族可以独占的。如果说英国历史学家和苏联历史学家能够吸收和应用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计量历史学派的经验和方法，那么，为什么印度、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学者在这方面就会一定不如他们呢？确实，除非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感到了有试验新型研究技术和新概念的自由，并且在必要时经过检验证明这些技术和概念中某些成份如并不令人满意，这时便将其否定，否则，世界史的研究就不会出现重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当前历史研究状况中的另一个根本特征是对世界上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仅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学家如此，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历史学

家也是如此。只要对1960年、1965年和1970年先后召开的三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有关报告和通讯作一比较，就足以看出历史研究重点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当然，这里还必须指出，直到今天，欧洲史的研究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① 尽管如此，苏联历史学家提交给第十三届历史科学大会的报告以充分的事实指出，大致从1960年开始，西方学者对东方历史和非洲历史的研究明显地加强了。②

---

① 据粗略的统计证明，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十一届历史科学大会收到了一百二十五篇论文——关于小亚细亚古代史的六篇除外，因为这个地区按历史传统算作希腊和罗马古代史的一部份，其中，在"中世纪"部份里有关中国的一篇，日本的两篇，伊斯兰地区的一篇；在"近现代史"部份里，除了有一篇关于奥斯曼帝国封建制的论文外，其余全是关于欧洲史的。在二十五项大会报告中(有关历史学总论的报告除外)，只有两项是有关亚洲史的(即山本的关于中国由唐朝向宋朝过渡的报告和布朗的关于印度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报告)。1965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二届历史科学大会上，欧洲史占优势的情况仍然很明显——即使在有关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和统治阶级的两项历史专题上，东方历史学家提供了重要资料，但欧洲史的优势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将«大陆史»的整个导言和"文化移入"选为该次大会的主题之一，也说明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里，我们对中国文化移入问题的重大研究成果还是不得不放弃讨论的机会。

② G·F·基姆和V·N·尼基弗罗夫：«东方国家的历史研究，1965—1969年»(G. F. Kim and V. N. Nikiforov, Research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East, 1965—1969)，莫斯科，1970年版；G·A·涅尔谢索夫：«1965—1969年苏联有关非洲史的文献著作»(G. A. Nersesov, Soviet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y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for the Period 1965—1969)，莫斯科，1970年版。有关著作还有W·马尔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非国家形成的道路和方式»(W. Markov, Wege und Formen der Formen der Staatsbildung in Asien und Afrika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莫斯科，1970年版；I·盖斯：«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近代非洲上层社会的形成»(I. Geiss, Das Entstehen der modernen Eliten in Afrika seit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莫斯科，1970年版；A·帕拉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国家发展的质变»(A. Pallat, Qualitative Chan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II)，莫斯科，1970年版。

西方历史学家，其中也包括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学家，对亚洲和非洲各国历史的兴趣突然浓厚起来，在一定的程度上显然是出于对当前政治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这反映他们认识到了“第三世界”在当前国际政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反映他们意识到了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亚非国家的传统和历史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认识表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不断提出关于开设以研究亚洲文明为内容的“东方学”课程的要求。① W·T·德巴里等人曾经指出，这种实用主义态度的真正目的是以亚洲和非洲对西方的重要性为转移来评价前两者的历史，因此，未必是恰当的。② 然而，这无疑标志着历史学家扩大了视野，从而产生了令人鼓舞的效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使欧洲历史学家进一步认识到欧洲中心论世界观的局限性，促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愿望，要求努力超越时空界限。其次，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问题的研究中产生了开放和批判的态度，甚至产生一种意愿，即不仅仅只从殖民主义强国的立场上，而且在同样程度或更大程度上也从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影响的各个民族的立场上来考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产生的后果，尤其是把殖民扩张的历史看作各个有关方面相互冲突和对立的过程。③

---

① J·T·C·刘:“亚洲文明课程导论”(1957年);M·D·刘易斯:“我们应当开设多少种历史课？文科教育中的亚洲和非洲”(1962年); L·S·斯塔甫里亚诺斯:“世界史教学”(1959年)。

② W·T·德巴里和A·T·恩布里编:《探索亚洲文明的方法》(W. T. De Bary and A. T. Embree eds., Approaches to Asian Civilizations), 纽约,1964年版,前言第9,13页。

③ 关于这种态度的变化，请参见R·冯·阿尔伯蒂尼:《殖民主义末日》(R.von Albertini,Das Ende des Kolonialismus,科伦,1970年版)一书的导言。

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不用说，这种理想不但现在还没有实现，而且这方面的进展也还是十分缓慢和犹豫不决的，除非我们对那些长期被忽视的地区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欧洲历史学家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长期以来统治着欧洲史学界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历史学的局限性。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刚刚获得解放和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历史学家却迫不及待地研究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主义的强大推动力的反映，而且，如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学家十分坦率地指出的，极易导致思维境界的褊狭。① 但是，同时还必须牢记，在许多地区，基本研究工作仍然需要继续进行。这在欧洲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只要这方面的工作不是由具备当地知识的专家并在当地进行，那么，要得出更广泛的结论，基础依然是不牢靠的。

对于大多数刚刚获得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学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应用历史研究中最适用的技术，准确地、客观地、批判地筛选证据并加以分类。对于"黑非洲"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来说，更是如此。那里的历史学家——至少是研究欧洲人到达之前那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在过去的二十年内几乎不得不从零开始。除此以外，他们还必须设计和制作出适当的工具和方法。② 他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所获得的

① 见前面提到的印度尼西亚报告，第 70 页。

② 关于非洲历史学研究的地位将在下文中讨论。

成就是十分惊人的。然而事实又告诉我们，在我们可以声称已经充分掌握了非洲史的基本内容之前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亚洲史的情况也是这样。正如法国的一名历史学家最近指出的那样，隐藏在基本上还未加以考证的历史文稿中的那些基本材料只不过是一些现象。光是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立图书馆……收藏的藏文文稿就有九万八千卷，而且有理由认为它所收集的这些文稿还是不完整的。最近，印度学者已经有能力开列出印度尼西亚现存的一千五百部重要著作的目录，其中已经印刷出版的只有四十五部。在小亚细亚，文籍的发掘速度现在快得惊人，为了把它们破译出来，专家的人数需要增加十倍以上。①

虽然历史观的变化还仅仅是个开端，历史学家视野的扩大也还处于尝试性的阶段中，但是，这种基本态度的转变却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式取代了铺叙式以后，历史学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有效的分析需要有由事实材料构成的更加广泛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任何单个地区和单个文明所不能提供的。对于封建社会的内容丰富的讨论不仅涉及到欧洲的经历，而且要扩大到日本和印度的经历。要理解城市化过程，就有必要探索中国、拉丁美洲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城市的历史以及黑非洲市镇的历史。对农民运动的研究应当包括对非常广泛的一系列可比较的材料进行评价和考证，这些材料包括从革命前的俄国、波希米亚、莱因地区、爱尔兰和安提尔，一直到越南和中国。如果把帝国主义仅仅局限于近代的欧洲帝国主义，而忽视了古代世界上的传统帝国主义及其典型中国，也就是说，

① J·赫伯特：«亚洲导论»(J. Herbert, Introduction à l'Asie)，巴黎，1960年版，第15页。

不把帝国主义当作历史现象来加以考察，看来结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① 此外，还有诸如边界等这样一些基本概念也都存在类似的情况。②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世界历史新观念及其潜能，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对待东方历史的新态度。如果历史学要具有全球性观点，那么就不能再把亚洲文明的研究当作只有阿拉伯学家、印度学家、汉学家以及其他东方学家才有把握进行研究的特殊领域。谁也不会贬低老一辈东方学家作出的贡献，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大多数要归功于他们。但是，他们的兴趣实际上主要还是放在文学和语言学方面，他们所受的历史学训练非常少，对于历史学家最关心的那类问题他们并

---

① R·库尔朋的那本受到激烈批评的开拓性著作《历史上的封建主义》(R. Coulborn,Feudalism in History,普林斯顿,1956年版)指出了道路。有关其他方面,参见提交给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告:《当代世界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Enquête sur les mouvements paysans dans le monde Contemporain),莫斯科,1970年版; E·R·沃尔夫:《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E.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69年版; T·L·霍奇金:《殖民主义时期非洲的民族主义》(T. L. Hodgkin,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伦敦,1956年版,第1章:"新兴市镇";赖特:"城市的观点"和"象征和功能:对昌贡及其他大城市的思考"(1963年); R·M·莫尔斯:"拉丁美洲城市史的若干特征",载《美国历史评论》,第67卷,1962年; S·N·埃森施塔特:《帝国政治体系》和《帝国的衰落》(S. 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恩格尔伍德,1967年版。

② O·拉铁摩尔:"历史上的边界"(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论文,1955年),和《中国在亚洲内陆的边界》(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波士顿,1962年第3版;怀曼和C·B·克罗伯编:《关于边界》(W. D. Wyman and C. B. Kroeber, eds., The Frontier in Perspective),麦迪逊,1957年版; A·R·刘易斯和T·F·麦甘编:《新大陆看自己的历史》(A. R. Lewis and T. F. McGann eds., The New World Looks at Its History),奥斯汀,1963年版; D·格哈德:"比较历史思考中的旧世界和新世界"(1962年); J·B·凯利:《阿拉伯东部边界》(J. B. Kelley, Eastern Arabian Frontiers),伦敦,1964年版。

不完全了解。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近来历史学家当中一直在谈论着所谓的"东方学的梦魇"。[1] 这样的反应也许是被夸张了，然而，作为一个新兴的专门学科，东方学还刚刚摆脱孤立状态，在历史思想的主流中占据了一席地位，却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不仅是欧洲的情况，就是在一些直接有关的国家中也是如此。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从荷兰继承下来的、用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历史学，直到最近才占绝对优势。在欧洲——无论西欧还是东欧，关于东方国家的历史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同东方研究部门和系科相联系，而不是同历史系的教授们相联系，[2] 由此造成了双重结果。首先是集中精力于考察文学资料，妨碍了社会真实状况的获得。其次是造成一种明显倾向，即接受由这些文学资料——如阿维斯陀注释、吠陀和儒学经典——所宣扬的自我形象。例如在印度，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高度的知识传统的基础上和在古籍经典中所载关于印度社会生活的正式法典的基础上"来重现印度的过去。它提供了"宗教界和知识界上层人物的主要观念"，但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印度和其他社会一样，"法律制订者规定的法典与人民的生活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对于印度过去的研究"过分紧密地依赖于印度经历中的某个层次"，就象

---

① A·F·赖特："中国文明研究"，载《思想史杂志》，第21卷(1960年)，第245,253页。

② 例如牛津大学就是这种情况。伦敦大学近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参见C·D·科恩：《伦敦大学的东南亚史研究》(C. D. Cowan, South East Asian History in London)，伦敦，1956年版。在列宁格勒大学亚洲研究学院的七十八名教员中，三十七名是语言学家，二十名主要从事文学和语言学研究，只有二十一名是历史学家。即便这样，按照整个欧洲的标准来说，历史学家所占的比例还是最高的。

中国的历史是按儒教经典的模子铸造出来的一样。①

在非欧洲的历史研究中——其中某些地区的研究比另一些地区的研究更为先进，当前的趋势就是正在纠正上述偏向。为此，首要条件是必须将历史学从从属于“语文学式的东方学”的地位上解放出来，融入到历史研究的主流中去。这个过程在所有国家几乎都在进行中，这也是这些国家独立后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在所有国家中，独立以后都创建了新的大学，而且在这些大学里设立了独立的历史系。虽然这些成果还只是刚刚开始为人们所感觉，但这样进行的训练无疑将为历史研究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推动力量。至少在某些国家里，这一趋势还在向民族主义的道路偏转。新独立的政府设立历史系的动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在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新的历史形象”，有时也象奥埃托莫所说的，“是出于创造民族主义文化的迫切愿望”，而且事实证明“这种愿望与适应科学标准的愿望相比还要强烈”。② 这种民族主义的一面在刚刚取得独立后表现得最为强烈，现在也许已经过了它的高峰期。第二个前提条件是，无论对欧洲的历史学家还是对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来说，都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历史学，把力量集中于全体历史学家共同关心的那些问题上去，这确实是十分重要的。③“以印度尼西亚为中心的”历史与“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相比，只会更加片面，更加陈旧，它们全都不能充分取代全球的普遍观点。

考虑到在历史学中尚有大量的基本建设工作要做，因此，

① 德巴里和恩布里：前引书(1961年)，第29页。关于伊斯兰，见第61页。

②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2卷(1961年版)，第78页。

③ 印度尼西亚报告，第71页。关于“印度尼西亚中心论”，见该报告第23，60，64页。

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在现阶段应当集中精力于研究本国的历史，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如果不能从更宽广的背景下来看待本国的历史，那么，所有这些研究工作都将是徒劳无功的。亚洲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课程总是忽视了把亚洲当作一个总体来考察它的发展总趋势。① 因此，第三个前提，就象普莱布兰克所说的，就是要避免陷入专门化的陷阱。“阅读东方其他国家的历史和非东方国家的历史”，“并且通过这种办法从外部来解释我们自己的特殊问题，从而反过来弄清在其他时间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件”。② 这是一个对东方和西方的历史学家都普遍适用的忠告。只要历史学家忽视了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他们便会有回到知识孤立主义中去的危险，必然会阻碍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也是1947年和1949年以来事态演变的状况，否认这一点也是不对的。因为印度的独立和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导致了对非西方世界历史研究越来越密切的关心。正象帕尼卡尔及时指出的，这些事件标志着欧洲时代的结束和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开始。③ 在这个新阶段，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完全一样，都是构成当代历史背景的组成部份。当然，这些文明同来自欧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西方教科书和教材中关于亚洲的论述》(The Treatment of Asia in Western Textbooks and Teaching Materials)，巴黎，1956年版。

② D·辛诺尔编：《东方学与历史学》(D. Sinor, Orientalism and History)，剑桥，1954年版，第79页。

③ K·M·帕尼卡尔：《亚洲与西方的统治》(K. M. Pani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伦敦，1953年版，第11页。

洲的推动力在相互发生影响。这里还必须指出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开始对世界史发生兴趣，这也是历史研究本身发展的结果之一。只要历史学家接受传统的世系关系和进化观点，那么，单个民族或种族似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满足于发挥自己的传统职能，即把自己看作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捍卫者和阐述者。即使伟大的伊本·卡尔东也把研究范围囿于马格里布的部落、民族、王国和王朝，因为（据他自己说）他缺乏"有关东方及其民族的必要知识"。① 随着历史学向科学的历史学和分析式的历史学转变，事实充分证明这样限制自己是多么愚蠢。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比较性资料，使他们能够探索和分析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结构中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出乎意料的明显的无规则性和变异性的深刻原因。正象赖因哈特·维特拉姆所写的："没有世界史，历史学就毫无意义。"②

我们扼要地评述当前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和领域中历史研究的趋势及其发展状况，就是以这样的状况为背景的。这样的评述本身含有内在的困难，尤其是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难。强调指出这些困难显然是有必要的，而且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存在着差异。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错误地把所有的所谓"第三世界"的地区归纳在一起，似乎各地方的情

---

① 伊本·卡尔东：《世界史教程》(Ibn Khaldûn, 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第3卷，贝鲁特，1967年版，导言第62页。

② R·维特拉姆：《历史爱好》(R. Wittram, Das Interesse an der Geschichte)，哥廷根，1958年版，第135页。

况都是完全相同的。如果说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几经踌躇之后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今天拉丁美洲历史研究的趋势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截然相反，着重于强调拉丁美洲国家与亚洲和非洲国家之间在历史上和当前的各种联系。① 然而，对于拉丁美洲历史研究的发展和亚洲、非洲历史研究的发展加以比较，虽然会有一些启迪性的作用，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象他们之间的共性一样引人注目。如果把它们简单地看作共同模式的变异，那么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则是主要方面。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本章的结论性叙述将基本上集中在亚洲和非洲的历史研究状况上。

在当前阶段上令人吃惊的事情主要是世界范围内出版物的急剧增加，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举不胜举。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历史学家的大量著作以及东欧和西欧的类似著作，还在遵循着传统的道路。这些著作虽然在增加人们的知识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但是它们并没有揭示历史研究中突出的新趋势。因此，对于这些著作，本书不准备加以评述。当前历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两项发展是边缘学科的研究和历史学家的空间和时间视野的扩大。边缘学科的研究意味着追求比历史学家传统上依赖的那种研究方法更加具有潜在启迪力量和解释能力的新研究方法。历史学家的空间和时间视野的扩大，则意味着一种有志于超越至今占据历史著作主要地位的那些研究领域。对于欧洲历史学家说来，这意味着抛弃“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点。不过，这还意味着抛弃从兰克和黑格尔时代起就已经确立的那种观点，即认为历

---

① 主要参见J·H·罗德里格斯：《巴西与非洲》(J. H. Rodrigues, Brasil e Africa)，里约热内卢，1964年版。

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比一个更高级的文明”之间的交替。按照阿克顿勋爵的话来说，每个文明“按照时间先后，按照它们对人类共同财富所作贡献的大小相互联系起来”。[①] 世界历史不仅仅是那些“较高”文明的历史。中国、印度和伊斯兰的文明对于任何想认识文明的性质及其问题的人们来说，是和欧洲文明一样重要的。但是，世界史还要求更宽广、更长远的观点。它还包括那些传统上被当作“外部的历史”来对待的民族——不仅是非洲各个民族，还有中亚草原、缅甸、泰国、越南等国的早已被忘却了的那些部落以及哥伦布到达以前的美洲居民。[②] “文明”仅仅是历史时间中的一部分，甚至还不是较大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对文明的更深一步的认识，就必须从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待文明。而这一背景不偏不倚地包含着人类的全体。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只有同考古学和人类学携起手来，才会有所进步。

4.1 史前史

历史学领域的扩大——即时间范围的扩大——首先产生于史前考古学方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历史研究领域

① 《近代史讲座》(Lord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伦敦，1906年版，第317页。参见E·舒林：《黑格尔和兰克的世界史对东方的理解》(E. Schulin, Die weltgeschichtliche Erfassung des Orients bei Hegel und Ranke)，哥廷根，1958年版。

② A·W·麦克唐纳异常强烈地提出了这一观点。见他的论文(载《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2卷，第326—328页)。他讨论了卡伦族、喀钦族、钦族、纳喀族和库克族的历史作用。

扩大中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它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产生了普遍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人类过去的看法。例如在印度，过去二十至二十五年间考古学的迅速成长对于确立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发展先后次序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考古学的证据迫使历史学家重新考察雅利安人在印度的定居方式以及雅利安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与此同时，印度东部、纳巴达河流域和印度南部，甘加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文化的发掘揭示了雅利安人到来之前这些地区的文化状况。随着印度北部铁器使用年代的确定，便可能将使用铁斧砍伐甘加河流域一带的森林，使用铁尖犁耕种雨水浇灌地，与印度东部城市中心的兴起和幅员广大的帝国的建立联系起来。这些事实又为解决佛教起源的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①

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当前状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已作了叙述，②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只是考古学研究对一般历史学产生的后果。这些后果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历史学家视野的大扩展。近一百年来，考古学家发掘了若干种已被湮没的文明，这些文明过去的存在已被人们忘却。他们还破译了能反映这些被湮没文明的一些手稿。正如戈登·蔡尔德所说的："史前考古学造成了一

---

① 摘引自印度报告第323页，注404；参见阿尔欣：《印度文明的诞生》(B. and R. Allchin, The 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哈蒙德斯沃思，1968年版；S·皮戈特：《史前印度》(S.Pigg ot, Pre-historic India)，伦敦，1961年版。R·E·M·惠勒爵士：《印度河文明》(Sir R. E. M.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剑桥，1953年版。

② 参见S·J·德拉埃的"考古学与史前史"，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主要趋势》。尤其是他关于史前史对历史研究影响的论述对于我写成本节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当然，我决没有要侵犯他的领域的意图，有关方法论、分类方法和解释的种种问题，读者可以参阅他的深入浅出的论述。

场人类对自已过去的认识革命，这场革命规模之大，可与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所取得的革命相比拟。考古学不再是靠文字记载拼拼凑凑、零零碎碎地说明可怜巴巴的五千年的状况，现在它已经能够为历史学家展现出二十五万年的景象。它象光学仪器一样，已经将我们的视力范围往回延伸了五十倍，而且每年都在扩大着用新的立场和观点来加以叙述的领域。”①

史前史和史前考古学的影响面极广，引人瞩目，人所共知。因此，这里没有必要作详尽的评述。对西方历史学家说来，考古学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是打破了把古代史仅仅当作以希腊和罗马为主体的统一体的观念。② 在莫蒂默·惠勒的著作《帝国边界以外的罗马》以及类似的其他著作中，考古学成了通向联系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世界历史观念的锁钥。③ 然而，考古学发现的最重要和最持久的成果则是打破了历史学家传统上对文字记载的依赖，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证明了这些记载所包含的材料的不可靠性带有神话的特征。例如，考古证据已经证明，无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还是在印度，其定居方式与民间传统和经典叙述中的方法有着根本的差别。④

① G·柴尔德："史前史学家对播化论的解释"，剑桥，1937年版；载于L·S·斯塔甫里亚诺斯编：《1500年以前的人类史诗》(L. S. Starrianos ed., The Epic of Man to 1500)，恩格尔伍德，1970年版，第17页。

② J·福格特：《古代史和世界史》(J. Vogt,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und Universalgeschichte)，威斯巴登，1957年版，第21页。

③ R·E·M·惠勒：《帝国边界以外的罗马》(R. E. M. Wheeler,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伦敦，1954年版。

④ 关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开拓性著作有E·T·利兹：《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地的考古学》(E. T. Leeds,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glo-Saxon Settlements)，牛津，1913年版；关于印度，可参见A·L·巴桑姆："研究古代印度的现代史学家"，载《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1卷(1961年)。阿尔欣的前引书(1968年)也使读者注意到"以古籍经典为基础估价早期印度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考古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是依赖人类物质文化的制造物——燧石、石斧、石器、玻璃和陶罐之类，并从中取得信息。这种新材料的使用为历史学开辟了一个完整的领域，就象翻开了一本关闭着的书本一样。此外，考古学的发现还提供了具体和有形的证据，这种证据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应用统计学的可能性。考古学已经证明至少早在基督诞生三百万年以前，地中海的交通网就已经扩大到了奥克苏斯河和印度河。对西伯利亚、中国、印度和北非的正在进行的考古学研究还证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这个交通网在继续地扩大和延伸。考古学把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带进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对于所谓"有历史"的民族来说，它也揭示了这些民族的历史中被文字记载无声无息地忽视了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情况。希腊、罗马的古籍经典和资料侧重于强调政治事件以及伟人的作用。与此相反，考古学证据却揭示了人们如何生活，生产什么，商业交换的方式如何，生活水准多高以及使用了哪些技术，从而使研究重点得以平衡。

如果史前史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范围，那么，理由非常明显，它必然会强调说明历史学家的研究决不可以到此为止。在缺乏文字记载的地方，考古学证据能够提供必要的资料，甚至有时还是唯一有用的资料，用以重现过去的现实。在这方面，就欧洲来说，只要提到萨兰的研究就足以证明。[①] 他利用墓场的证据所重现的墨洛温时期文明的情景，远比我们仅靠文字记载才能重现的这个文明的情景更加完整，更加多样。还

① 参见E·萨兰：《从墓葬、古籍和实验中看墨洛温文明》(E.Salin, La civilisation mérovingienne d'après les sépultures, les texteset le laboratoire)，两卷本，巴黎，1950—1952年版。

有一些领域（例如城市史）的研究，如果不借助于考古学，历史学家将无法前进一步。甚至一些涉及到现代的领域也是这样，这已经非常明显了。1955 年以来兴起的工业考古学是一门新学科，它的目标是记录和解释 1760 年到 1860 年期间早期工业社会的遗址和结构。①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类历史的中心问题是同自然环境作斗争，而考古学最重大的成果就在于它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历史学家只有扩大自己的视野，超越传统史料所规定的范围，才有可能动手研究这个问题。直到最近，即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逐渐对社会变革的计划以及社会变革的进程和由此产生的问题予以关注时，才发现有关人类与自然环境所作的长期斗争的文字史料即使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也是少得可怜的。在这场长期的斗争中，世界上数以亿万计的人类的精力被消耗掉了。至少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要晚些——历史学家能够使用的有用证据，主要取自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它们提供了有关工具、技术、庄稼、土地使用和遗留物件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知识。这些知识使他们能够重新构想过去的社会形态，例如农村及其经济状况，还可以说明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社会变化。在这一方面，历史研究中新出现的社会学方向更加严重地依赖考古学，其中大量最优秀的著作都是社会学的认识能力和考古学提供的证据——有形文物，古代商道的实地调查，以及人种学的类似论据——相互结合而发生作用的成果。科桑比在研究印度时所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① 简要的介绍见M·里克斯：《工业考古》（M. Rix, Industrial Archaeology），伦敦，1967 年版。

同时这也说明他的著作标志着“印度的历史著作中开始出现了最有希望产生成果并富有创造性的趋势之一”。①

考古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门类，它象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可以在有关过去的任何领域和任何时间上为历史学家开辟蹊径，提供新的观点和立场。考古学还可以纠正只依赖某种特殊类型的史料——尤其是文学史料——而必然造成的在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历史解释中所存在的歪曲和误解。然而，考古学的特殊贡献却在于它极大地扩展了历史学家的时间和空间视野。考古学打开了一个完全关闭的领域，迫使历史学家用更开阔的全球观点去看待自己的任务。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捕捉史前的广阔景象，而且还意味着要象人类学一样使用不同的方法并且通过不同的途径，把历史学家从只注意所谓的“有历史的”民族，只注意过去的伟大文明的倾向，引向对唯有用考古学证据才能说明的那些民族的历史。然而这些民族的历史却是构成人类史诗不可缺少的部份。在文字史料匮乏和不足的地方，考古学就成了历史学家的具体和有形证据的主要来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考古学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学家已经启程走上了建立有关人类历史的真正全球观点的道路，他们正在力图弥补差距，力图抓住过去被忽视的那些领域，并且努力使那些只不过初具轮廓的图景不断完善起来。因此他们必须愈益转向依靠考古学以及考古学所提供的各种事实。

① 印度报告，第19页。

4.2 非洲史

考古学本来能够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然而至今却尚未发挥作用的领域之一是非洲历史的研究。[①]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非洲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这块大陆有着与其他大陆很不相同的特征。由于明显的原因，北非地区比较干燥，考古证据比赤道非洲一带气候潮湿和灼热的地区保留得好一些。确实，例如在象牙海岸这样一些地区，金属文物会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全化为齑粉，使出土考古文物毫无实际“用途”。[②]

对于这种差别必须加以认真的考虑。[③]非洲大陆象亚洲和欧洲一样，是由一些彼此完全隔绝的地区构成的，如果把非洲当作一个单一的历史单位来对待显然是极端错误的。气候和作物的极大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极大差异。对于这样的差异最好要分别对待，决不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至少在开始时应当注意。非洲历史基本的但并非唯一的划分方法，是将它分成撒哈拉大沙漠以北和以南的两大地区。我们今天所说的非洲史主要是指热带非洲或赤道非洲的历史，或者指我们所说的“黑非洲”的历史。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北部和南部之间不存在重大的文化交流。恰恰相反，撒哈拉大沙漠不仅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通道，尤其在伊斯兰教占领时代。不但非洲各个不同地区之间，而且它们同其他大陆之间，都不断保持着联系。

尽管如此，与地中海周围的其他地区保持着悠久历史联系的北非与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北非先后受到古罗马和伊斯兰教的影响，而且被包括在这两种政治范围内，因此，它不仅是非洲世界的一部份，也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份。不过，北非依然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西北非洲的柏柏尔人反抗和抵制了罗马人的基督教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努力保持自己的历史传统。例如苏丹西部的伊斯兰教，近九个世纪以后，大部分苏丹人都认为伊斯兰教是源于本国的，这种伊斯兰教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中东的伊斯兰

---

① 关于这个观点，见R·莫尼：《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2卷(1965年)，第208—213页。

② V·蒙泰尔："历史上殖民主义的瓦解"，载《见证》杂志，第142期(1962年)，第10页。

③ 关于本节的论述，请参见下列参考书目：《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8年版，第6卷，"非洲史学"条目(由K·O·戴克和J·F·A·阿贾伊撰写)；《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维也纳，1965年)，第2卷：《大陆的历史学》(History of the Continents)中"欧洲殖民者到来以前黑非洲的史料问题"以及在第5卷上展开的讨论；J·范西纳，R·莫尼和L·V·托马斯编：《热带非洲的历史学家》(J. Vansina, R. Mauny and L.V. Thomas, eds., The Historican in Tropical Africa)，伦敦，1964年版；R.科尔内万：《黑非洲人民史》(R. Cornevin, Histoire des peuples de L'Afrique noire)，巴黎，1960年版，有关史料和方法论，见第21—73页，1955年和1959年分别由R·A·汉密尔顿和D·H·琼斯编的《非洲历史学和考古学》(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Africa)是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于1953年和1957年组织的两次非洲史讨论会的会刊；J·W·布莱克："非洲史研究"，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第4集，第32卷(1950年)；H·莫尼奥："为黑非洲的历史而奋斗"，载《年鉴》，第17卷，第1期(1962年)；K·O·戴克："非洲的历史和自治"，载《西非》，第37卷；霍奇金："新的开端：非洲"，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历史学的新道路》(New Way in History)(1966年)。苏联的有关著作，参见涅尔泽索夫：前引书(1970年)；我还要向哈佛大学的K·O·戴克教授表示衷心感谢，承蒙他对本节的初稿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批评和意见。

教。[1]相反，在埃塞俄比亚人身上却留下了楔在两种完全不同文化之间的民族特征。在所罗门王朝时期，埃塞俄比亚创造了自己特殊的制度，即融合了非洲的政治制度和犹太—基督教的制度。不过，大多数历史学家也许会认为，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人基本上属于非洲人，虽然由于亚洲人和其他人的不断渗入而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之间的差别同样非常明显。面对亚洲和欧洲的沿海地区与外界保持着往来。而在内陆地区，稠密的森林地带造成了严峻的环境，使各个部落处于孤立和分散的状态之中。这两种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别。不过，内陆地区各部落的分散状态由于早期的加纳帝国（约公元300—1270年）、马里帝国（1285—1468年）和松加依帝国（1355—1591年）等这样一些王国和帝国的兴起而有所改观，他们企图控制商道，保护苏丹西部的黑人市镇免受荒漠上游牧民族的侵袭。由于塞利格曼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已经习惯于把这些国家的起源归之于地中海文明。地中海文明"经过麦罗埃[2]的过滤"，通过尼罗河流域的净化，对非洲内陆国家的兴起发生作用。[3]但是，非洲历史学家用充分的证据说明它们是当地土著文化的结晶。以贝宁王国、约鲁巴诸王国以及

---

① 这就是试图通过十九世纪的圣战来"净化"苏丹伊斯兰教的种种努力都未能成功地"改革"信仰的原因所在。在非洲的环境下，基督教发展了自己的特征，分化为不同的教派，这些事实也是众所周知的。请参见霍奇金：前引书（1956年），第98—114页。

② 麦罗埃（Meroitic），苏丹北部古城和古王国。——译者

③ R·奥利弗和J·D·费奇：《非洲简史》（R. Oliver and J. D. Fage,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哈蒙德沃思，1962年版，第50页；又见C·G·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C. G. Seligman, Races of Africa），伦敦，1975年第3版。

更晚一些时候的阿桑迪联邦为特征的西非森林地带的文明也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历史结构上的差别很自然地又产生于历史记载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平衡。在欧洲人到达西非海岸之前——习惯上指1434年以前，这里的唯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用伊斯兰文字写的历史。对伊斯兰教统治领域以外地区的历史，即使不是一无所知，至少也是知之甚微。正如一位专家所指出的："这块大陆上更大的一部份甚至连阿拉伯人的史料都没有涉及。当然，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的早期叙述更是如此，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没有超过沿海地区。"①

由于文字史料相对匮乏，非洲历史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考古文物，诸如伊费青铜头像和贝宁的精致青铜器。现在一般都承认这些文物出自非洲人之手。非洲的历史传统绝大多数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很少留有文字记载。这一事实恰恰证明在非洲历史中口述传统研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如果真正转向研究口述史料时，同样会发现它们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象卢旺达这样一些从结构上看建立了制度比较成熟的王国，口述史料是极其丰富的。而布隆迪这样一些政治结构上不稳定和多变的地区，口述史料则少得多，而且从年代上越往上推，史料就越少。② 过去的观点认为，非洲在欧洲人征服之前是没有历史的，或者说这样的历史和文明是由阿拉伯人的文明经过北非和中东扩散到这里的。虽然从根本上讲这些观点缺少证据，而且早已被严肃的历史学家

---

① 《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5卷（1968年），第312页；第2卷，第181页。

② 同上，第2卷，第204页；第5卷，第324页。

所否定和抛弃，然而，有关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字史料从各个方面来说其丰富程度和范围之全面是那以前任何时期的史料都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于非洲史的很大部份的研究来说，还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去做。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刚刚结束后，非洲独立运动的加快发展对非洲新史学的研究带来了推动力。象在亚洲一样，这种推动力曾经最初在反对欧洲人对非洲过去所作的解释中导致了民族主义的膨胀。但是，1960 年前后，依靠不充分的证据建立的推理和假设，在K·O·戴克这样一些研究非洲的史学家的影响下，逐步让位于科学的研究。戴克亲自撰写的早期著作在某些方面标志着非洲史研究的分水岭。②欧洲历史学家站在非洲之外来看待非洲的历史，他们写的或者是在非洲的欧洲人，或者是他们对非洲社会的影响。戴克把研究重点从欧洲人转变为非洲人本身，阐明了西非当地的社会——虽然与欧洲的交往已达四个世纪之久，但依然保留了自己的面貌——与欧洲商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他坚持认为，唯一可信的非洲历史是非洲人的历史。这一新趋势产生的结果以及这一趋势在当前已经发展到顶峰的状况，可以从献给托马斯·霍奇金六十周年诞辰的论文集中反映出来。③这部论文集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虽然它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宗

---

① 《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 2 卷，第 229页。

② K·O·戴克：《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1830—1835 年》(K.O. Dike,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1830—1835)，牛津，1956 年版。

③ C·艾伦和 R·W·约翰逊编：《非洲展望》(C. Allen and R. W. Johnson,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剑桥，1970 年版；又见 T·O·兰格编：《非洲史研究新课题》(T. O.Ranger, Emerging Themes in African History)，内罗毕，1968 年版。

教、民族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但是作者认为没有必要提及欧洲殖民主义者所起的作用。正如这部论文集中的一个撰稿人所说的，那种认为欧洲人的征服和统治对于非洲历史的形成发生了影响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①布莱克曾经指出，在非洲社会进化的所有阶段上，“最主要的因素是各个不同部落和部落联盟中的黑人民族”。首先从外力作用及其影响的角度来看待非洲历史的习惯掩盖了“非洲历史模式中的一些主流，即非洲当地的社会结构，部落战争，部落迁徙，当地的土地分封，以及土著文化对异族文化的反应”②。

非洲新史学的中心问题，是史料。的确，非洲史的史料并不象有时所认为的那么匮乏，而且近年来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搜集史料，对史料进行分类和编辑出版。但是，问题仍然是，这些史料无论是伊斯兰的还是欧洲人的，除极少例外，都是反映非洲以外的人的利益和观点，只会歪曲非洲人的行为和态度。穆斯林历史学家有时确实记载了非洲的传统，其中大多数用的是阿拉伯文，但有时也有用阿拉伯文翻译的当地方言记录。有关十六世纪以后的阿拉伯文史料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都是非洲人写给非洲人看的。③不过总的说来，穆斯林作者所关心的主要是伊斯兰教的传播，他们的叙述一般都带有片面的倾向。例如，他们的记载集中在穆斯林居民区中的领袖人物而不是传统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简言之，如果说非洲历史是非洲人的历史，那么对于这样的非洲历史来说，上

① 艾伦和约翰逊：前引书(1970年)，第85页。

② 布莱克：前引书(1950年)，第51、63页。

③ 参见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第5卷(1968年)，第314—315页上I·赫尔贝克的论述。

述文字史料不能令人满意，也是不充分的。无论是保留在口述传统中的，还是通过口头流传下来的，都极少叙述当地的文化，历史传说，王族世系，一个个的国王，也没有说明民族居住区域的起源及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本地文字史料极其匮乏的社会中，口述传统显得极为重要。因为在整个非洲，口述传统比文字证据的传播要广泛得多，还因为口述史料证明了文字史料所忽略的许多问题。所以，与其他大陆的历史学相比，非洲历史中的口述史料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其重要作用只有在美洲土著民族的历史研究中才可以类比。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大量的努力都用于搜集和记载口述传统史料。戴克曾经说过，这已经"列为首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正如现代非洲社会中发生的迅速变化正在使它消失一样。① 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口述史料进行估价并建立起一套考证口述史料的规则和使用口述史料的方法。这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引起了大量争论，这里不可能加以讨论。② 不过，这里只消说对这一方面进行现代分析的先驱者是让·范西纳，而且，现在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就足以消除对口述证据所产生的怀疑。然而，对口述传统的使用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其中以技术问题最为突出。传统的非洲史绝大部份是关于某个特殊时代的历史，在事件先后次序的叙述上是极为准确的。然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使曾经有人提到

---

①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第399页。

② 经典著作有J·范西纳：《口述传统：历史学方法论研究》(J.Vansina, De la tradition orale. Essai de méthode historique)，特尔夫伦(比利时)，1961年版；Y·珀森："口述传统和编年史"，载《非洲研究杂志》，第2卷(1962年)；D·F·麦考尔：《从时间的角度看非洲：关于从非洲的非文字史料中重现历史的讨论》(D. F. McCall, Africa in Time-Perspective. A. Discussion on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from Unwritten Sources)，波士顿，1964年版。

过，也是极少数的，即使有的地方说到了年代、世系和时期，也可能只与“结构的”时间而不是与事件先后次序的时间相关。① 因此，建立起大家都共同接受的编年史式的里程碑是一项极为重大的任务。只有使用考古学、语言学、人种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认识能力和研究技术才有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简单地说，需要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② 非洲史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是欧洲史学中使用的常规方法在这里基本不能适用，尤其是常规的欧洲史学主张，只有文字史料证明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欧洲本身，依靠书面文件证据而忽视其他形式的历史传统，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抨击。然而，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缺陷在非洲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非洲史只有摆脱这一束缚才有可能取得进步。“近十年来非洲史学中最富有成果的趋势”是边缘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③ 只有通过这一途径，传统的非洲历史材料才可能进行加工，才可能被用来撰写历史著作。

这里不准备详细叙述非洲史学的重要成果，不过，有两点一般性的结论需要提到。首先，大多数著作，尤其是早期的著作，几乎都必然是有关某些地区和某些特殊问题的。换句话说，在当前阶段中，最为重要的是准确、详尽和科学地考证“各个专题的历史”，而不是全面地考查结论。④ 其次，当前的绝大

---

① 引自A·德卢兹-希瓦：“人种学、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载《社会科学国际评论》，第17卷，第4期(1965年)，第617—620页。

② 布莱克：前引书(1950年)，第64页。

③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第398页(戴克撰文)。

④ V·蒙泰伊：“历史中的殖民化解体”，载《展望》第142期(1962年12月)，第12页。

"印第安派"之间对于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作用问题，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论战。一方持"黑人传说"，认为西班牙人惨无人

---

① 关于当前的研究状况，参见C·C·格里芬主编：《拉丁美洲历史文献指南》C.C.Griffin ed.,Latin America.A Guide to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奥斯汀,1971年版;H·F·克莱因编:《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和教学》(H.F.Cliene ed., Latin American History. Essays on its Study and Teaching, 1898—1965),2卷本,奥斯汀,1967年版;M·C·阿尔倍罗维奇：《苏联关于拉丁美洲各国的历史研究著作》,莫斯科，1968年版；E·C·达巴格扬"苏联拉丁美洲研究五十年来的著作",载《苏联与拉丁美洲,1917—1967年》,莫斯科，1967年版；R·J·卡尔东编：《苏联对当代拉丁美洲的想象》(R. J. Carlton, ed., Soviet Image of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奥斯汀,1970年版；R·埃斯奎纳齐-迈约和M·C·迈耶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拉丁美洲的学术发展》(R. Esquenazi-Mayo and M·C·Meyer, eds., Latin American Scholarship since World War II),林肯,1971年版。借此机会，我应当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苏联国家委员会致以衷心的感谢，因为C·达巴格扬博士以"苏联拉丁美洲研究主流"为题的报告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同时,我还要感谢米尔顿·范格尔教授(布琅德斯大学),他在我写作本节的过程中提出了忠告，给予了帮助;我也要感谢西尔维奥·扎瓦拉教授,他向我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

② R·格雷厄姆:"民族主义时期的巴西",载埃斯奎纳齐-迈纳和迈耶:前引书(1971年),第51页。

③ 格里芬:前引书(1971年),前言,第25,27页。

④ 据我所知,关于整个拉丁美洲史学研究发展状况的著作尚未问世。下列著作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J·H·罗德里格:《巴西的历史理论》(J. H. Rodriques, Teoria da história do Brasil),两卷本,圣保罗，1957年版;《巴西的历史和历史学》(História e historiadores do Brasil),圣保罗，1965年版；R·D·卡维亚：《阿根廷历史编纂学中的批判史学》(R. D. Carbia, Historia critica de la historiografía argentina desde sus origenes)，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年版；《墨西哥历史研究》(Veinticinco años de investigacioń história en México)，墨西哥城，1966年版；D. 科西奥·比勒加斯:《现代墨西哥的新政治史学》(D. Cosío Villegas, Nueva historiografía politica del México moderno),墨西哥城,1965年版；G·菲利奥·克鲁斯：《智利的殖民主义史学》(G. Feliú Cruz,Historiografía colonial de Chile)，圣地亚哥,1968年版;J·M·佩雷斯·卡夫雷拉:《古巴历史学基础》(J. M. Pérez Cabrera, Fundamentos de una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cubana)，哈瓦那,1959年版；其中最重要的还有E·奥戈尔曼的《危机和科学的历史学的来临》(E. O' Gorman,Crisis y porvenir de la ciencia histórica),墨西哥城,1947年版。

4.3 拉丁美洲历史学的新格局

当我们开始讨论过去被殖民主义全面统治的另一个大陆——拉丁美洲时，我们会发现那里的历史学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虽然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拉丁美洲的政治解放已经实现，但在这个旧世界里，过去曾经被殖民主义者占领的地区的历史所具有的那些本质特征，例如殖民化与当地土著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殖民地的土地占有形式等等，一直是拉丁美洲历史学研究的主题。近年来，有关新殖民主义和不发达国家的一系列反复提出来的问题，以及 1959 年古巴革命以来许多国家发生的革命性动乱，都有助于历史学去重点研究拉丁美洲各民族的历史遗产与亚洲、非洲各民族的历史遗产之间有什么联系。强调这方面的联系所产生的结果，很自然是要重新评估拉丁美洲历史学的内涵和方法。① 理查·格雷厄姆在叙述有关巴西的一部历史著作中写道："现代变革的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冲突和不稳定性"迫使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带着新的问题"去看待过去，并且"用新的标准去重新评价过去已经得出的答案"。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丁美洲的历史学与"现代历史学中最古老和最有建树的领域相反，是个"崭新的，充满斗争的研究领域"。③ 拉丁美洲史学从一开始就扎根于欧洲，以欧洲历史学为自己的楷模。④ 只要考虑到在拉丁美洲早期历史上欧洲文化传统影响在克列奥上层人物当中的力量非常强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西班牙派"和

多数著作是关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出现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无论从口述史料还是从文字史料来说，可使用的材料数量相对而言是很大的，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非洲历史学家感到有必要纠正欧洲人对非洲过去历史的一般看法，尤其是需要纠正关于欧洲对非洲的影响的一般看法。现在业已证明，欧洲征服非洲的时代与非洲社会中的巨大动荡和汹涌的浪潮正好巧合，而且相互作用。这些动荡和浪潮是那样的巨大，甚至有些历史学家可以说这是十九世纪的"非洲式的重新分割"。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非洲历史学家应当关注"只有以非洲人最后一次抵抗的……爆发为终点的""独立非洲发展的最后时代"。① 这说明在欧洲人统治的整个时期中，植根于非洲民族主义复兴的文化和历史的持久性。虽然在过去十五至二十年内对于非洲文化当地的渊源，传统的部落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某些非洲社会内部的发展和巩固等问题愈益予以关注。② 因此，非洲遭受殖民统治的时期以及非洲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的反抗依然显得十分突出，这一点也不奇怪。③ 不同之处在于，这些研究是站在非洲内部的立场上，犹如非洲人自己所看到的和经历的一样。

---

① 《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5卷(1968年版)，第314，323页。

② 例如，U·U·波特欣在《南非班图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莫斯科，1956年版)一书中叙述了南非班图族的社会组织。

③ 除了有关整个非洲和各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兴起的一般著作外，还有一些专著研究了抵抗殖民主义的个别领导者和某些起义的历史。这里由于篇幅的限制，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有一些开拓性的研究应当提到，这些著作有 G·谢波森和 T·普莱斯的《独立的非洲》(G. Shepperson and T. Price, Independent Africa)，爱丁堡，1958年版。R·I·罗特伯格的"英属尼亚萨兰和德属东非的抵抗运动和起义，1885—1915年"是专门讨论非洲某些地区抵抗运动的例子。

道地对待当地居民；另一方持“白人传说”，认为西班牙人仁慈地担负起了传播文明的使命。这场论战向人们表明，拉丁美洲的史学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简单地从殖民主义列强的立场出发决不可能写出拉丁美洲真正的历史。[①] 但是，拉丁美洲又与亚洲不同，前者没有保持住当地充满活力的史学传统，以抵制欧洲的史学传统。拉美史学即使不是从独立以前就开始，但至少在独立以后一直在紧紧跟随着欧洲史学的主流，尽管与此同时，拉美也在试图建立自已真正的史学传统。最初，拉美史学所追随的是在拉美传播最广泛的十九世纪欧洲的实证主义。[②] 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竭力仿效德国的历史主义；[③] 最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又开始学习法国的年鉴学派。在传播法国年鉴学派的过程中，曾经留学巴黎的一批拉美历史学家，象哈拉、弗洛雷斯卡诺和罗马诺等人起了媒介作用。拉美的伟大历史学家海梅·比森斯·比韦斯以娴熟的手法将年鉴学派的理论介绍到拉丁美洲。[④] 1957年至1959年，在比森斯·比韦斯的计划指导下进行的西班牙和美洲的经济—社会史问世，是拉美史学抛弃德国历史主义，同时

---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请参见B·基恩："再论黑人传说"，载«拉丁美洲历史评论»，第49卷(1969年)；L·汉克："关于暂停讨论重大结论的末议：对黑人传说的一些思考"，载«拉丁美洲历史评论»，第51卷(1971年)；B·基恩："再论白人传说"，载«拉丁美洲历史评论»，第51卷(1971年)。

② 参见L·齐亚：«墨西哥的实证主义»(L. Zea, El positivismo en México)，墨西哥城，1943年版；«墨西哥的实证主义的盛衰»(Apogeo y decadencia del positivismo en México)，墨西哥城，1945年版。

③ 通过奥尔特加和加塞特的媒介。

④ 比森斯·比韦斯：«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史»(Vicens Vives Historia social y económica de Españay América)，五卷本，巴塞罗纳，1957—1959年版。其中关于拉丁美洲的那些章节是由吉列尔莫·塞斯佩德斯·德尔·卡斯蒂略和埃尔南德斯·桑切斯-巴尔瓦撰写的。

也是拉美史学开始进入现代化阶段序幕的各种标志之一。①这项研究不仅为拉美史学提出了新目标，而且也为使用新研究方法的潜在可能性提供了令人折服的榜样。

当代的各种问题正在迫使拉美历史学家改变自己的方向，与此同时，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发生影响。旧史学及其广泛流传的民族主义精神气质，旧史学对英雄人物和独立运动的崇拜以及优先关注研究历史中的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还有旧史学"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那些没有多大差别的细节"等等，所有这些对于理解当前的形势以及这种形势的产生毫无帮助。尤其是十九世纪从欧洲继承下来的枯燥的传记叙事史传统已经被年轻一代的拉美史学家所抛弃。正象雷蒙德·卡尔所写的，这一批年轻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这样的传记叙事史"作为建立一定历史条件下变化的社会学"的基础是多么薄弱。②相反，还有不少年轻历史学家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他一些年轻历史学家开始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所有这些历史学家都普遍承认需要研究新问题，也需要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新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美史学可以被称为"本世纪的创造"而且成为本世纪下半叶历史研究中最实际的目标，尽管它具有悠久的传统。③

由此产生的最明显的成果是拉丁美洲历史学的现代化。拉美的历史研究依然注重于殖民地时期和独立战争期间的动

---

① 关于拉丁美洲抛弃历史主义，参见J·雷耶斯·埃罗莱斯："历史学与行动"，载«美洲杂志»，第159卷(1968年)。

② R·卡尔："新的开端：拉丁美洲"，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历史学的新道路»(1966年)，第299页。

③ 格里芬：前引书(1971年版)，前言第27页。

荡年代，不过，近来开始把重点转移到不远的过去。[①]但是，拉美历史学最根本的变化还是从对时期的研究转移到对问题的研究，例如种族关系，彼此孤立的民族之间的文化迁移，人口数量的下降和上升，各个不同地区的人口变化，市镇和农村的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外国资本的使用，农业制度和要求土地的欲望，尤其是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的顽固性和阻止变革的障碍，等等。[②]

和其他大陆一样，研究重点的变化所造成的结果是发现老一辈历史学家所使用的那些史料和材料当中很少有研究社会一经济问题所需要的那种资料。类似塞尔索·富尔达多的通史那样的一些著作，虽然也包含了拉美经济史各方面的全部情况或某个国家的全部情况，从面使它在提供研究假设上具有很高的价值。[③]但是，在目前阶段上，最必要的工作还是利用档案材料对某个领域，某个地区，某个城市或某个工业部门进行详细的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重现真实的和准确的状况。[④]这方面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进行概括的基

---

① 克莱恩：前引书（1967年），第398，542，574—575页。但这些事实是有目共睹的，这里没有必要赘述。

② 关于这些变化和新趋势，最精彩的叙述可以参见斯坦莱·斯特恩："拉美史学家面临的任务"和"拉美史学的地位和研究机会"，转载克莱恩：前引书（1967年）。

③ C·富尔达多：《拉美的经济发展》（C. Furtad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剑桥，1970年版；《巴西的经济增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Brazil），伯克利，1963年版；关于智利，参见A·平托·桑塔·克鲁斯：《智利：发展失败的一个例证》（A. Pinto Santa Cruz, Chile: un caso de desarrollo frustrado），圣地亚哥，1959年版。

④ 例如S·斯特恩对巴西棉纺织工业的研究，1957年出版的《巴西棉纺织工厂，1850—1950年》（The Brazilian Cotton Manufacture,1850—1950）和M·T·肖拉佩特罗恩对巴西糖业生产的研究，1968年出版的《圣保罗卡纳维拉农场的发展和衰落，1765—1871年》（A lavoura canavieira em São Paulo. Expansão e declínio,1765—1871）。

础十分薄弱，还需要对范围更广泛的问题进行评估，并且利用各个村庄、城市、国家、省份的原始资料来验证这些问题。①其次，一切结论必须说明拉美历史上二十多个共和国之间的极大差异，阐明它们的种族成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只有在广阔的背景下，历史学家才有可能对面临的那些问题进行比较。最后，利用同欧洲和亚洲的历史模式进行类比的方法来对待拉美的历史，确实充满着危险性。克劳迪奥·贝利斯曾经说过："以欧洲比较先进国家的经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不适用于拉丁美洲。"②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与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地区相比，决不能把拉丁美洲划为比较落后的地区。③虽然有种种理由可以证明应当将拉丁美洲看作"不发达世界"中的一部分，但是，拉美问题的特殊性使它不同于其他的前殖民地区。关于这些问题的解释必须到拉丁美洲本身的历史中去寻找。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因素，但过去十至十五年内拉美史学的进步，无论在对问题的理解和阐述上，还是在取得的实际成果上，都达到了更加成熟的新水平。这不仅是由于耐心细致的地方史研究提供了多方面必要的具体资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采用了包括人种学以及人种历史学、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等新兴学科，还有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内的边缘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有必要举出一些实例来说明拉美史学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博拉·库克和辛普森的人口研

① 克莱恩：前引书（1967年版），第549，591页。

② C·贝利斯：《拉丁美洲变化的障碍》（C. Veliz, 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伦敦，1965年版，第1页。

③ 卡尔东：前引书（1970年），第201页。

究为开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严肃而认真地说明了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拉丁美洲人民的命运。① 细致的人口学研究工作用准确的材料取代了“黑人传说”与“白人传说”之间的争论，为用长远的眼光估价殖民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② 而且还为将人口研究同有关土地利用、土壤侵蚀、居民密度等各个方而的独立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为重现西班牙人征服以后拉美印第安人的社会和文化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③

与注重研究土著居民相平行的是历史学家对奴隶制研究所抱有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对巴西奴隶制研究的浓厚兴趣，当然决不仅仅局限于巴西。希尔韦托·弗雷雷的传世力作为进一步开展对巴西奴隶制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了起

---

① S·F·库克和L·B·辛普森：《十六世纪墨西哥中部的人口》(S. F. Cook and L. B. Simpson, 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伯克利，1948年版；W·W·博拉和S·F·库克：《1548年墨西哥中部的人口》(W. W. Borah and S. F. Cook, The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in 1548)，伯克利，1960年版；《西班牙征服前夕墨西哥中部土著居民人口》(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on the Eve of the Spanish Conquest)，伯克利，1963年版；《人口史论文集》(Essays in Population History)，第1卷，伯克利，1971年版；博拉和库克对人口的估计受到了罗森布拉特的批评，见A·罗森布拉特：《1492年美洲的人口》(A. Rosenblat, La población de America en 1492)，墨西哥城，1967年版。但是，他们最后达到了一致的看法。他们的研究工作为其他地区的研究提供了榜样，见N·桑切斯-阿尔博诺斯："阿根廷人口史面面观"，载《历史研究杂志》，第8期(1965年)。

② 斯特恩夫妇：《拉丁美洲的殖民遗产》(S. and B. Stein, The Colonial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纽约，1970年版；C·吉布森：《西班牙在美洲》(C. Gibson, Spain in America)，纽约，1966年版。

③ 迄今为止，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是吉布森的《西班牙统治下的阿兹台克人》(C. Gibson, The Aztecs under Spanish Rule)，斯坦福，1964年版。比较全面的研究见斯鲍尔丁："殖民时期的印第安人：过去和未来的研究观点"，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7卷，第1期(1971年)；N·沃奇特尔："幻灭：西班牙人对土著居民的征服"，载《年鉴》，第22卷(1967年)。

点。[①] 其次，对新大陆上黑人文化迁移的复杂过程也开始给予了更加广泛的关注。[②] 这两方面研究中的任何进展和深入都是由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紧密合作的结晶。与过去相比，他们倾注了相当大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地研究了西班牙人征服以后的那段时期。[③] 然而，更加根本的转变则表现在制度史的研究上，即从政府的观点转移到被统治者的观点上去。换言之，也就是从研究帝国的法律和敕令所奠定的政策转向研究这些政策在地方或各个省份执行（或不予执行）的方式。[④]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暴露出了法令和实际执行情况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殖民统治的实际状况，如所有的社会阶层，从白人克列奥的上层杰出人物（benemerito）到被剥削的印第安人群众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这还为采用新的方法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等基本问题开辟了道路。[⑤]

对于其他历史学家，也许是今天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来说，拉美新史学的起点则是寻找有关拉美社会相对停滞和阻

---

① 关于弗雷雷以及后来的研究成果的概况，见埃斯奎纳齐-迈约：前引书（1971年版），第15,37—38,54—55页。T·S·斯基德莫尔的论文"希尔韦托·弗雷雷和早期的巴西共和国"（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杂志，第6卷，1964年），对弗雷雷作了最恰当的评价。

② 参见F·P·鲍泽："西属美洲殖民时期的非洲人"，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7卷（1972年）；M·莫纳："拉丁美洲种族关系史"，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1卷（1966年）；J·F·金："西属美洲大陆的黑人史"，载《黑人史评论》，第29卷（1944年）。

③ 斯鲍尔丁：前引书（1972年），第50页。

④ 格里芬：前引书（1971年版），第189页；埃斯奎纳齐-迈约：前引书（1971年版），第8页。

⑤ 参见L·N·麦卡利斯特："新西班牙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载《拉丁美洲历史评论》，第43卷（1963年）。

碍现代化的原因，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圆满的解释。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通过对当前状况的分析中寻找答案，他们特别强调国际资本主义对拉丁美洲造成的不利影响。[1] 与此相反，历史学家则强调指出了长期起作用的顽固因素。拉丁美洲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变化极为缓慢。吉布森曾经指出，工业化的进展——在别的地方（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前工业社会中各个层次的融合剂——没有把拉丁美洲从殖民地时期沿袭下来的严格的阶级制度中"解放出来"。[2] 1961 年，斯特恩曾经指出，同样重要的是，直到独立后一个半世纪的今天，拉丁美洲只发生过两次巨大的动荡，即墨西哥革命和古巴革命。[3] 因此，历史学家越来越重视把探索这些异常现象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在长期阻碍拉丁美洲变化的各种因素中，克劳迪奥·贝利斯指出了"拉丁美洲存在前工业社会的高度城市文明"。[4] 莫尔斯在拉美城市史方面作出的杰出研究，对于理解这个现象作出了重大贡献。[5] 其他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拉丁美洲历史上的"坚固基岩"同过去一样，仍然是土地。当前强调工业

---

① 参见A·G·弗兰克：《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A. 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纽约，1969 年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有名的著作是 R·普雷维什的《拉美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R.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成功湖，1950 年版。

② C·吉布森："殖民制度和当代拉丁美洲"，载《拉丁美洲历史评论》，第 63 卷，第 3 期(1963 年)，第 389 页。

③ 引自克莱恩：前引书(1967 年)，第 548 页。

④ 贝利斯：前引书(1935 年版)，第 2 页。

⑤ 参见 R·M·莫尔斯："拉美城市史的某些特征"，载《美国历史评论》，第 67 卷，1962 年；"拉美城市研究的趋势和课题，1965—1970 年"，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第 6 卷，第 1—2 期(1970 年)。

化以及国际贸易的有关问题的趋势可能很容易使研究的注意力背离主要的因素，即"土地以及在土地上的劳动力"。① 另一方面，尽管对"传统秩序的崩溃"和"迄今尚未露头角的、未被认识的和被忽视的阶级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尽管对当前的革命形势作出了某些明智和启发性的判断，② 但是，历史学家至今仍未对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发生的革命性变化进行过分析。十分明显，1930年的大萧条为拉美史学开辟了新时代，然而，我们对巴西的瓦加斯政权或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尚未作出圆满的解释。③ 虽然人们认识到现代类型的专制主义与较早期的考迪罗独裁统治有根本的差别，然而，正象惠特克在1965年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对于拉美现代类型的独裁制的全面研究确确实实尚未出现。"④

拉美史学传统上是从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的。⑤ 虽然用这种态度对待不同的地区和不同共和国的历史和社会结

① 克莱恩：前引书（1967年版），第544页。

② 例如，鲁伊斯·加西亚的《拉丁美洲一次革命的剖析》(E.Ruiz García, América Latina: anatomía de una revolución)，马德里，1966年版；拉莫斯的《阿根廷的革命与反革命》(J. A. Ramos, Revolución y contrarrevolución en la Argenti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年第2版。关于较近时期的革命形势的研究，最有价值的著作是戈特的《拉丁美洲的游击运动》(R. Gott, Guerrilla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伦敦，1970年版。

③ 埃斯奎纳齐-迈约：前引书（1971年版），第61页。但是，R·M·莱文的《瓦加斯政府：关键的时代，1934—1938年》(R. M. Levine, The Vargas Regime: The Crucial Years, 1934—1938，纽约，1970年版）也部分地涉及到这个领域。

④ 克莱恩：前引书（1967年版），第620页。

⑤ A·P·惠特克：《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A. P. Whitaker, Na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盖恩斯维尔，1962年版；A·P·惠特克和D·C·约尔丹：《当代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A. P. Whitaker and D. C. Jordan,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纽约，1966年版。

构会有明显的差别，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国别史上会不会使历史学家忽视对在整个大陆发生作用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呢？这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①。格里芬曾经写道，拉美的民族主义"倾向一直是分裂的力量"。②其次，"我们一旦越过了叙事史的界限并且试图解释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时，历史学的民族主义基础便立即显得不坚固了"。也许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今天拉美史学发展趋势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倾向于强调次大陆各民族的团结而不是分裂。即使常见的叙述为独立而进行斗争的领袖人物的传记——例如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传记——也不再首先把他们当作民族英雄来对待，而是把他们视为整个拉美的救星。③迄今为止，对拉美史学概念化的影响仍然不大。现有的大多数历史著作是各个不同的共和国历史的汇编，或充其量也不过是某个地区的几个共和国的汇编而已，与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文明的研究和斯托扬诺维奇关于巴尔干文明的研究是无法相比的。不过，充分的事实证明，拉丁美洲有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它与各个共和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并存，甚至超过它们。这种民族感对历史思想的影响已经十分明显，例如表现在西尔维奥·萨瓦拉的著作中。④

---

① 克莱恩：前引书（1967年版），第542页。

② C·C·格里芬："论拉丁美洲的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载《世界历史杂志》，第8卷，第2期（1964年）。

③ D·布什内尔编：《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其人及其形象》（D. Bushnell ed.,The Liberator: Simón Bolivar. Man and Image），纽约，1970年版。

④ 参见S·A·萨瓦拉：《殖民时代的美洲世界》（S. A. Zavala, El mundo americano en la época colonial），两卷本，墨西哥城，1967年版。这部著作使人们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考虑到H·E·博尔顿提出的，然而一度受到严厉批评的论点，参见布莱恩：前引书（1967年），第528—529页。

如果将拉丁美洲和其他“不发达世界”历史研究的现状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大于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这种状况的产生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拉丁美洲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获得了独立，因此，有关帝国主义及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问题不象亚洲和非洲历史学那样成为历史学研究中压倒一切的主题。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新一代的拉美史学家有共同关心的主题，这些主题不仅产生于当前形势中的共同性，如对“新殖民主义”的共同经验、人口激增、内部的革命紧张局势，以及军人政权等等，而且还产生于长期的历史原因。拉丁美洲人象亚洲人和非洲人一样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不过，正象莱奥波尔多·塞亚的富有思想性和首创性的著作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也在寻找自身和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①

4.4 亚洲历史学的当代趋势

在亚洲，引起人们对历史研究发生兴趣的直接事件是民族解放运动。②如同非洲一样，亚洲民族主义的成长推动了独立的历史学研究。大致说来，印度的民族主义历史学是在反对英国的印度史的过程中诞生的。早在1947年，K·M·帕尼卡尔就曾经写道，一旦“印度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去……对印度历史的需求便越来越迫切，而这种印度历史必须努力让我们认识自己的遗产的方式来重现过去。”他坚持说，在英国统治时期，真正的印度历史“不包括东印度公司及其后来取而代之的英国国王的活动，只包括印度自己的儿女们的英勇奋

斗从而使印度社会发生转变的那些动荡的事件。"③新独立的其他民族国家的政治领袖们还希望运用过去的历史为自己所要求取得的社会地位和尊重作辩护。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深刻地认识到需要向人们灌输"光辉的过去"的形象,④所有新获得解放的国家都设立了历史系或历史学院。当然,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出现成果。越南和缅甸同印度尼西亚一样,现代历史学"只不过刚刚诞生"。⑤

---

① L·塞亚:《美洲和意识》(L. Zea, América como conciencia),墨西哥城,1953年版;《拉丁美洲和世界》(América latina y el mundo),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年版;《拉丁美洲的思想》(The Latin American Mind),诺尔曼,1963年版。

② 除了一些一般资料外,本节的概述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四卷本的《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一卷是C·H·菲利普编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的历史学家》(C. H. Philips, Historians of India, Pakistan and Ceylon);第二卷是D·G·E·霍尔编的《东南亚的历史学家》(D. G. E. Hall, Historians of South-East Asia);第三卷是W·G·比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的《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W. G. Beasley & E. G. Pulleyblank,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第四卷是B·刘易斯和P·M·霍尔特编的《中东历史学家》(B. Lewis & P. M. Holt, 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以上四卷出版于1961—1962年。新出版的特别有价值的论文有A·F·赖特的"中国史学",F·罗森塔尔的"伊斯兰史学",J·W·霍尔的"日本史学"以及王赓武的"南亚和东南亚史学"。以上资料载《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1968年版),第400—428页。我还要借此机会着重提到本书的第149页(注③)上提到的,由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起草的那些专门报告。关于亚洲的历史学研究,还可以参见马祖姆达尔:《现代印度史学》(Majumdar, Historiography in Modern India)1970年版;索加特莫科编:《印度尼西亚史学导论》(Soedjatmoko, ed., An Introduction to Indonesian Historiography),伊萨卡,1965年版;《日本在斯德哥尔摩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日本历史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以及R·F·沃尔在1966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历史学新道路专辑》上发表的论文:"新开端:亚洲"。

③ 摘自帕尼卡尔:《印度历史概况》(Panikkar, A Survey of Indian History),见《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1卷(1961年),第417,427—428页。

④ 同上,第2卷(1961年),第75页。

⑤ 同上,第78—79,93,98,103页。

恰恰正是这个原因，若要全面地讨论亚洲的历史学必然会引出错误的结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和自己关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都必须逐个地加以考虑。尽管如此，除了反对欧洲人对亚洲的过去所作的解释外，在亚洲历史学中还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中有五点应当指出。第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非常实际的影响。由于明显的原因，这种影响在中国最为强烈。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加以叙述。在整个亚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大。尤其在日本，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提供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历史世界观”。在东南亚，“马克思主义思想注定要在形成历史观念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① 第二，强调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相互联系。一般说来，也确实强调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据说，“历史研究的发展必将同考古工作的进展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② 这句话固然是专指越南和柬埔寨，但肯定是普遍适用的。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同样重要。C·C·伯格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历史讲习班上坚持认为，必须把一个民族的历史著作看作这个民族文化模式中的组成部分。③ 这需要使用历史批判主义的普通原则无法提供的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历史研究的中心从这个民族历史的政治方面转移到社会和文化方面去的时候。这就是亚洲史学新阶段中的第三项共同特征。④

---

①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1968年），第420页；《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2卷（1961年），第331页。

② 同上，第309页。

③ 关于伯格的影响，参见D·G·E·霍尔的《东南亚史》(D. G.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伦敦，1955年版，前言第1页；《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2卷，第4—5页。参见伯格的撰文："爪哇人描述的过去"，载索加特莫科编：《印度尼西亚史学导论》（1965年），第87—117页。

④ 《亚洲各民族历史学著作》，第1卷，第455,457页。

第四，"是将新的研究置于直接和批判地利用本地史料的愿望的基础之上。"前面提到的有关印度尼西亚历史研究状况说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在挖掘欧洲档案方面尽管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过为了真正地理解印度尼西亚的过去，还必须把注意力引向研究印度尼西亚人民自己在各个方面的活动，尽管在这样的研究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1]随之而来的第五个共同特征是几乎自觉地接受了欧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霍尼在1961年指出，"越南学者最近发表的历史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所有这些著作的写作风格都与越南的传统历史著作大不相同"。[2]亚洲其他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这样一来，不用说就能知道欧洲的历史概念，无论是西欧式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已经在亚洲扎下了根。即使是那些实际上是在反对所谓"欧洲中心论"的著作，其研究和写作方法仍然具有欧洲的特点，面且是源于欧洲的。

当代亚洲史学研究还有区别于非洲史学的显著特征。正是这一特征，才使亚洲史学有可能认识到亚洲过去伟大的历史。今天的非洲历史学家面临着严峻的任务，实质上就是重新发现和重新创立他们的早期历史。面在亚洲，古代史的悠久传统早已存在，而且由于高质量的著名的文学遗产而得到维持和巩固。不仅印度、中国和伊斯兰的伟大东方文明是这样，就是东南亚也是这样。与所谓欧洲"中世纪"同时的东南亚的孟、高棉、占、爪哇、巴厘和缅甸的文化在大约一千多年的时期中发出了灿烂的光辉，产生了别具特色的艺术、建筑和本民族的文学。这些事实自然在指导着有关这些地区的现代

①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2卷，第310—323页。

② 同上，第102页。

历史学研究方向和写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马杰里·佩勒姆指出，亚洲"有基于古代文明遗产的文化和宗教的统一，以及享有共同骄傲的广大地区。"① 今天历史学家所作的大量努力是集中力量运用这个遗产，并且消除所谓西方作者的歪曲。如果说亚洲历史著作的支柱之一是殖民地时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那么，另一个支柱便是古代及其成就。在很早以前，阿里亚·萨马吉就把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带入印度，唤起了吠陀时代的学术和文明的精神，并且将它的光辉成就与西方的成就加以比较。

注重古代史研究的现象在整个亚洲是普遍的。1947 年以来，印度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部分历史著作所叙述的是关于古印度的文化史。② 毫无疑问，早期的大部分著作确实是粉饰过去的状况。其次，既然这些著作的目的是迎合民族主义的口味去对已知的事实作重新解释，那么，它们当然不可能提供新的符合事实的认识。同一时期乌尔都地区的历史著作也是如此。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并没有什么两样。③ 从历史知识有形积累的角度来看，在 1945 年以后的十到十五年之内，基本上没有进展。但是，从 1960 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经过历史方法严格训练的亚洲历史学家反对老一辈历史学家当中过分的和不加批判的民族主义，"客观性的新迹象"开始崭露头角。④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大学里历史系的设立，一部分则是由于引进了

---

① 摘自《外交》季刊，第 29 卷(1951 年)，第 638 页。

②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 1 卷，第 469—471 页。

③ 同上，第 495 页；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史学，参见上文第153—154页。

④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 1 卷，第 468 页。

较高的标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历史研究中的普遍趋势，这是大学灌输的结果。如果亚洲过去的历史著作一直处于孤立状态，并由此造成了思想狭窄的趋势，那么，它现在已经汇入了历史研究的主流，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令人庆幸和鼓舞的。其次，变化产生于从解释性的概括性的著作——目前进行这项工作的基础尚不巩固——转向地区史的一些较有成效的研究领域，正如上面已经正确强调过的那样，①这不仅是因为地区史研究与国别史研究在史料的处理方面更容易使用一般的方法，并集中地大量运用史料，而且还象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历史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地区史的研究往往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现实状况。在一个例如象印度那样幅员广大情况复杂的国家，必然会有地区之间的重大差别，如果要对整个印度作出有意义的概括，必须首先研究地区之间的差别和多样性。②

这些事实说明，象塔潘·雷肖德乌里对十五、十六世纪孟买社会的那类地区史研究是极其重要的。③它们还说明在亚洲所有的国家中，强调集中力量调查和出版淹没在地方档案中的史料也是当务之急。在可到手的史料大大超过今天已取得的规模时，大多数的历史著作才有可能不再被视为仅仅是一系列要求进一步开展研究的中期报告。对整个亚洲作的这番概述，给人们留下的整体印象是，还有大量的工作尚待完成，然后才可能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作出圆满的回答。毋庸置

---

①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471，479页。

② 这一点是由印度历史学家委员会的报告中第29—30页所提出的。

③ 塔潘·雷肖德乌里：«阿克巴和加罕格统治下的孟加拉»（Raychaudhuri, Bengal under Akbar and Jahangir），德里，1966年版。

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早就提议，西方历史学家应当集中力量去提高亚洲史的声望，让西方更多地了解和认识它。与此同时，亚洲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应当集中全部精力写出自己的历史。这项建议看起来似乎是舍本求末，或象E·H·丹斯所说的"本末倒置"，[①]然而，它却说明了历史学知识的目前状态，尤其是说明了需要对亚洲史进行大量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工作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知识渊博的、扎根本土的而且又具备必要的语言学水平的历史学家方可胜任。

尽管如此，低估亚洲史学已经取得的进步则是完全错误的。王赓武曾说[②]，"关键的概念"现在已经被亚洲历史学家完全接受，例如"时间和地点必须准确无误，对人物的认识要人格化，决不能神化；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必须用最佳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当然，亚洲历史学的进展是不平衡的。日本的史学研究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在1890年至1930年之间"逐步成熟，成为一门现代学科"。[③]在印度，现代历史研究可以说是从1922年至1932年之间六卷本《剑桥印度史》出版后开始的——如果仅从印度历史学家对这部著作作出的反应而言，锡兰的历史研究并不比印度落后多少。[④]另一方面，在东南亚，英国、荷兰和法国殖民统治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没有着意于培养当地的历史学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从出版数量还是从批判标准上看，日本和印度的历史研究

① E·H·丹斯：《历史—叛逆者》(E. H. Dance, History the Betrayer)，伦敦，1960年版，第79页。

②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1968年），第427页。

③ 同上，第418页（J·W·霍尔）。

④ 同上，第424页(王赓武)。

的进展是(除中国以外)最引人瞩目的。事实证明,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包括中近东和巴基斯坦,从以宗教和穆斯林宗教社会的生活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学向世俗的科学的历史观转变要困难得多。[①] 专业历史学家的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远远不足，至少同日本和印度相比是这样，因为在印度已经形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的庞大队伍，他们的研究范围包括印度历史上的每个时期和每种类型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东南亚，不同程度地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中间时期”上，即古代和欧洲殖民统治时期之间的那些世纪上。而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却是刚刚独立后被忽视的问题。帕尼卡尔指出,历史研究中的崇古趋向,研究中心从英国统治时期跳到吠陀时期,都包含着对殖民主义干涉时期的否定。[②] 当前的倾向——也是唯一令人欢欣鼓舞的倾向——是重新回到这个被忽视了的时期，并且强调这个时期在亚洲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开始逐个地考虑亚洲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学研究中的特征和问题时必须牢记的总背景。对于某些地区和国家来说，即使还有一些其他情况，这里也不再作过多的叙述。尤其是日本,在许多方面是例外的。因此,有人甚至表示怀疑,认为用亚洲的模式来讨论日本的历史研究是否合适。一个世纪以来的日本史学,即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史学,整个说来，所走的道路与其他亚洲国家完全不同。只要回忆一下日本近代史的突出特征，如成功地抵制了殖民主义的压力，有

① 参见《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1968年),第412页(罗森格尔),第425页(王赓武)。

② 帕尼卡尔:《亚洲和西方的统治》(Panikkar,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伦敦,1953年版,第323页。

能力在平等的条件下处理与欧洲列强和美国的关系，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也能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以及日本后来作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之一的出现，——就会认识到日本历史学家的思想遗产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历史学家的思想遗产是完全不同的。

日本较早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进展异常迅速。西方的有关搜集和考证历史资料的技术在1890年左右被引进了东京帝国大学，而且最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说比亚洲其他国家早一代人——已经完全取代了传统形式的历史研究。与此同时，日本正在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家，这也造成了与亚洲其他地区不同的条件。日本历史学家因在财力上得到富强的工业化国家的支持，又有高度发达的大学体制以及组织水平很高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因此拥有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学家所没有的优势。在历史著作写作的纯数量上，日本把其他亚洲国家远远抛在后面，没有哪个亚洲国家象日本那样使西方的研究标准和西方的研究方法拥有那样高的声望。这些都不会令人感到惊奇。西方历史文献的翻译在日本大量出版，从而保持日本历史学家的学术水平，并在研究上能与西方并驾齐驱。

在所有这些方面，日本历史学家的地位与其说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相似，还不如说更接近欧美历史学家。与此同时，他们自己的历史经历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很不相同。日本从未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日本历史学家不必首先关注殖民主义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却恰恰是亚洲其他国家当前历史著作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其次，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

学家在现阶段几乎倾注了全部力量去研究本国的历史，与此相反，日本历史学家的视野则广阔得多。日本历史学家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作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这可以从日本历史上与大陆保持悠久的联系中得到解释。最后，十九世纪末以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中很活跃，这就使日本历史学家习惯于从国际格局中而不是从孤立的地位上来看待日本的历史。可以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和侵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灾难性的太平洋战争的前提等等是今天日本历史学家首先关心的问题。① 但是，这些问题只有从与其他列强的政策的关系上去考察和理解才能解决。为寻找日本为什么和怎样进行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转折所作的努力，于是加强了与同样关心这些问题的日本与西方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相反，在今天的亚洲和非洲新独立国家中，对本民族特色的关注表现得非常强烈，而这在日本的历史著作中却不是个突出的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史学界内民族主义的冲动是异常强大的，但是战争与失败，原子弹的大屠杀和外国军队的占领等使日本受到损伤，已经使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名誉扫地，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一方面，日本今天的历史学趋势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历史学趋势完全相反。这很可能是因为日本的民族身份问题，日本在世界上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地位问题，不是可以轻易置之不顾的。② 但是，日本一旦成为工业大国，出现了工业化必

---

① 入江昭："日本帝国主义和侵略"，载《亚洲研究》，第23卷（1963—1964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外交政策"，载《亚洲研究》，第26卷（1966年）。

②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第414，420页（J·W·霍尔）。

然带来的紧张关系,那些问题便不再成为当务之急了。到那时,日本历史学家便会将这些问题束之高阁。他们象西方历史学家一样,更为关注经济和社会史,尤其是关于应当如何解释日本的经济现代化以及现代化对日本发生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西方的历史经验比不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当然更为重要一些。随着日本跻身于世界工业大国的行列,说日本已经和亚洲其他国家相脱离是一点也不过份的。日本历史学家面向欧洲和北美去寻找历史学的概念和方法。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日本非常强大,但是,大多数历史著作的特点严格说来还是属于经验主义的。而亚洲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民族主义基调和意识形态色彩在日本历史著作中却是没有的。

当我们从日本转向中近东阿拉伯国家时,我们看到的情况则远没有那么清晰。① 当然,西方对这里的影响也是很强的,但是正象在巴基斯坦一样,这些影响并非未受到挑战。虽然在中东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家中,有许多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里接受教育并采取西方的学术标准,他们用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学,但是中东也还有保守和正统的历史学家,他们拒绝接受西方的方法论,试图维持传统的伊斯兰历史学的活力。G·E·冯·格隆内鲍姆相信中东的历史学家对于"当前伊斯兰教中缺乏积极的世俗主义思想"仍然感到若无其事。② 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是,可以肯定,穆斯林和

---

① 除了上文提到的文献以外,参见M·M·齐亚达赫:"现代埃及史学",载《中东事务》,第4卷(1953年);H·伊纳尔齐克:"关于伊斯兰国家历史研究的一些看法",载《中东杂志》,第7卷(1953年);切伊内:"阿拉伯作家对历史的运用",载《中东杂志》,第16卷(1960年);哈达德:"现代阿拉伯历史学家和世界历史",载《穆斯林世界》,第51卷(1961年)。

②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4卷(1962年版),第471页。

阿拉伯的历史学目前正处在一个社会现代化阵痛的各种潮流交汇之中，而且尚未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虽然有些阿拉伯历史学家不仅使用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批判方法，而且转向重视研究那些“被忽视了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但是，西方历史学的影响对于中东来说至今还不是决定性的。中东历史著作的主要倾向仍然是“罗列事实而不是进行分析”，大部分历史著作充其量不过是“中世纪写作方式的延续”，“缺乏科学的态度”。①

中东的历史学之所以没有从传统形式向现代历史学过渡，其主要原因是对于中东的历史学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历史学缺乏真正明确的认识。与日本历史学家完全不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本民族的特征。中近东各国的历史在三个同心圆中运动：伊斯兰的、阿拉伯的和本民族的。至于这三种形式当中哪一种能够提供最适合于理解过去历史的基础，却存在着一番争论。如果说，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个基础一直是伊斯兰教的话——换言之，如果伊斯兰教被看作一个统一体，而中东的各个国家只不过是这个统一体中的一部分，那么，自从中东的民族主义兴起后，整个趋势却一直是将历史学的研究重点从宗教单位转移到政治单位，从末世学的研究态度转移到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研究态度上来。这一转变首先发生在土耳其。1908年革命以后，土耳其的国别史与伊斯兰教史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②这种转变后来随着伊朗、埃及、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宣布独立而传播到了

①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4卷(1962年)，第15,438页；切伊内：前引书(1960年)，第391页。

② 参见B·刘易斯："历史著作和土耳其的民族复兴"，载《中东事务》，第4卷(1953年)。

这些国家和地区。象在亚洲各国一样，用民族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扶植，这种现象从土耳其的凯末尔开始。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建立起民族亲和与团结的意识。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政府法令中特别规定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加强人民心目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感情"。① 由于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冲动而造成的结果是抛弃了伊斯兰教的和阿拉伯的过去。正如土耳其人向他们在中亚和东亚的故乡突厥民族的古代史中寻求鼓舞民族主义的因素一样，埃及人努力寻找他们的民族在伊斯兰教尚未传入这一地区以前的法老时代的根源。伊拉克人则唤起了对古代亚述的兴趣，黎巴嫩人把自己的历史一直上推到腓尼基人。与此同时，伊朗历史学家则痛斥毛拉的"无知和迷信"，控诉阿拉伯人毁灭了光辉灿烂的萨沙尼德文明。②

这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只不过是当前中东各个民族之间的政治对立过份简单化的反映。关于这样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只要提到哈利尔·因纳尔西克所说的"民族偏见"往往过分地"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性"这句话，也许就足够了。③ 其次，纯粹的民族主义的历史研究基础所具有的不完备性和主观性在不久以前已经日趋明朗。1950 年以后，土耳其在前一段时间出

① 切伊内：前引书（1960年版），第 392 页；丹斯：前引书（1960 年），第 75 页。

② 切伊内：前引书（1960 年版），第 384 页；《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 4 卷(1962 年版)，第 431 页。

③ B·刘易斯：前引书(1958 年版)，第 454 页。他在《中东和西方》(B.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布卢明顿，1964 年版）中的提法比较谨慎。他说："一般说来，民族主义史学对于历史学家并没有多大价值，除非它能够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确实起到指导性的作用"。见前引书（1964 年），第 93 页。

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已被抛弃。不仅如此，土耳其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是发生在伊斯兰教内部，土耳其的历史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已经被认识到了。①有关这一变化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它证明了传统的伊斯兰教历史观有强大的复兴能力。按照这种观点，古兰经、沙里亚以及伊斯兰教规一起构成了历史上统一中近东的因素。除非在伊斯兰教历史的总框架内，否则没有希望撰写或理解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历史。反对用夸大的民族主义观点解释历史的另一个因素产生于泛阿拉伯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主张，阿拉伯世界在各个时代就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又一次遇到反对分裂和寻求共同特性的要求。但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历史观与伊斯兰教的解释不同，它是反宗教的、对于泛阿拉伯主义历史学派来说，伊斯兰教的因素不是最重要的，统一的因素是阿拉伯民族的历史。纳比赫·阿明·法里斯等伊斯兰历史学家认为伊斯兰教是把"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地方的穆斯林团结在一起的纽带。②泛阿拉伯主义历史学派与这种观点相反，他们只关心中近东，只关心有没有可能寻找到阿拉伯历史上共同因素的令人满意的整体观点。

在这些相互对立的解释中，哪一种解释为中近东的历史学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基础呢？这个问题也许是没有答案的，但仍然是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学家长期关心的首要问题。如果说以穆罕默德·胡塞因·海卡尔为代表的老一辈历史学家是将阿拉伯各民族的宗教史同欧洲的宗教史加以比较，用伊斯兰

① 伊纳尔齐克：前引书(1953年)，第453页。

② 关于纳比赫·阿明·法里斯，参见刘易斯：前引书（1964年），第114页。

的历史来抵御西方，那么，当代的历史学家则比较关心确立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他们的着眼点是本民族的历史以及对阿拉伯民族和对本民族伊斯兰教的忠诚，这种忠诚有时相互重叠，有时甚至又相互冲突。历史学家的这种关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确实很容易使他们忘记自己的首要任务，即系统和客观地探索过去。这种观点还把阿拉伯历史学的研究范围缩小了。中东历史学家几乎毫不例外地只对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对中世纪的伊斯兰教，或对中东的古代史感兴趣，他们试图从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找到自己民族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渊源。罗森塔尔说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非伊斯兰国家的兴趣仍然极为有限，而且在这个领域中尚未出现第一流的十分杰出的重要成果。"[1]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现代的历史学研究标准，也不是说他们没有现代的研究技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中东，受过西方训练并掌握了现代方法论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已经发表了一些有关某些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史的严肃的论文。但是，这方面的进展还不稳定，包括的范围和领域还十分有限。费鲁兹·卡赞扎德得出这样的结论："伊朗现代历史学是很平庸的，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贡献。"[2]有关中东的大量优秀著作至今仍然是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近东历史学家至今还拿不出可以同苏联的关于中亚伊斯兰民族的优秀著作相媲美的成果。[3]

---

①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1968年)，第412页。

②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4卷(1962年版)，第431页。

③ 同上，第367—374页，其中，弗赖的文章简要地叙述了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和著作。又见G·韦勒和D·福特曼：«苏联关于中亚新史料的书目»，第1期，第23—29页和第2期，第24—31页，刊载了1959年至1960年出版的历史著作。

东南亚的历史学家也遇到了文化认同问题。[1] 首先，东南亚历史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可以肯定，这个地区并不呈现为象印度、中国、朝鲜和日本那样可以称之为整体文明的文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南亚象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化国家)一样，只不过是个地理群体，或者是具有共同历史的区域内的国家呢？伊斯兰教和佛教区域以及受到中国和印度影响的地区之间，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别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即使伊斯兰教的传统，内部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每一种不同的传统中都可以识别出最强烈的固有特征。这个特征是这个区域中不同的民族所特有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荷兰历史学家J·C·范·勒尔——1942年去世——已经挑选出这些本地成份作为东南亚历史学中的关键因素。[2] 据称，范·勒尔"给这整个死亡的世界——殖民主义初期以前在历史上独立发展的东南亚世界——注入了生命。"[3] 他的光辉的开拓性著作至今仍然影响很大。例如，这部著作的影响反映在雷辛克的著作中，也构成了霍尔的基

---

① 除了上文第193页注②提到的文献外，还可以参考D·G·E·霍尔的《今日的东亚史》(D.G.E.Hall, East Asian History Today)，香港，1959年版；科恩：《伦敦的东南亚史》(Cowan, South East Asian History in London)，1963年版；Z·A·瓦希德编：《马来亚的历史教学问题》(Z. A. Wahid, ed., History Teaching: Its Problems in Malaya)，吉隆坡，1964年版；J·M·范德尔·克勒夫："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著作"，载《太平洋事务》杂志，第31卷(1958年)；萨托诺·卡托迪尔德约："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学家"，载《东南亚史杂志》，第1卷(1970年)，H·J·本达："东南亚历史的结构"，载《东南亚史杂志》，第3卷，第1期(1962年)；J·R·W·斯迈尔："论现代东南亚历史学独立自主的可能性"，载《东南亚史杂志》，第2卷，第2期(1961年)。

② 关于"印度尼西亚历史研究"，见J·C·范·勒尔：《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和社会：亚洲社会和经济史论文集》，海牙，1955年版，第147—156页。

③ 斯迈尔：前引书(1961年)，第101页。

本观点，他试图将东南亚当作在它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可以单独认识的一个单位来对待。①

霍尔的这部著作为反对殖民地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心论，承担了重要任务。重要的是必须坚持，东南亚的历史必须"从内部"来撰写，即从这个区域本身的内部发展而不是简单地从它与中国、印度和西方的关系上来对待。东南亚各个民族并不仅仅是被赐与者，他们有自己高度发达和极为完整的文化。正象霍尔强调指出的，东南亚各民族的历史"只有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看才是可信的。"② 不过，所谓独立发展的东南亚历史，这一观念本身不过是"方法论的命题"，它还是"尝试性的和假设性的"。③ 这也是事实。何况自从独立以来，东南亚历史思想的发展趋势不是以整个区域为出发点，而是民族主义的。④ 例如，对于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中心问题是"印度尼西亚人民本身"，他们对于整个东南亚是否成其为一个单独的整体这样一个问题并不关心，而只关心"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和历史的有机统一"。⑤ 不用说，缅甸和越南等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纷纷取得独立之后，殖民主义历史学的时代已经明显地过去了。对于过分

---

① G・J・雷辛克：«神话之间的印度尼西亚历史学» (G. J. Resink, Indonesia's History between the Myths), 海牙，1967年版；D・G・E・霍尔：前引书(1955年)。

② 同上，前言第7页。

③ 斯迈尔：前引书(1961年)，第85页；本达：前引书(1962年)，第107页。

④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2卷(1961年)，第327页。

⑤ 前面提到的印度尼西亚报告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见«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2卷，第57—59页。

夸大欧洲人在二十世纪以前对东南亚的影响所产生的危险和错误观念，欧洲和亚洲的历史学家不难取得一致认识，而且一致认为，为了真正地理解东南亚的过去，需要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东南亚人民自己的活动上。但是，殖民主义的研究基础一旦被推翻，便立即产生了新问题，即用什么样的新基础来取而代之呢？这个问题象在中近东一样至今尚未解决。而且，这个问题还关系到关于国别史是否足以成为东南亚新历史学的基础这样一场辩论。① 明显的困难是东南亚新建立的国家从历史上来看几乎都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民族的社会。如果东南亚在历史上的统一只是一个假设的话，那么，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统一也是一个假设。在刚刚取得独立的那个时期，一致认为印度尼西亚是个文化单位，尽管有外国的影响，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于是一种"印度尼西亚中心论"占了上风。不过，这样的态度"在观念上是成功的，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就行不通了"。大约从1965年开始，也许还要早一些，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史学研究出现了反抗情绪，一个新阶段开始了。②

从许多方面来看印度尼西亚历史学研究新趋势中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当以萨托诺·卡托迪尔德约最为突出。③ 萨托

①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1968年)，第426页(王赓武)。

② 印度尼西亚报告，第64,69页。

③ 卡托迪尔德约的主要著作是«1888年万丹的农民起义：印度尼西亚社会运动专题研究» (Kartodirdjo, The Peasants' Revolt of Banten in 1888. A Cas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 in Indonesia)，海牙，1966年版；«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十九——二十世纪» (Kalonialisme dan nasionalisme dalam Sedjarah Indonesia, Abad XIX-XX)，日惹，1967年版；«关于印度尼西亚史学的几点看法»(Beberapa fasal dari historiografi Indonesia)，日惹，1968年版。当然，卡托迪尔德约不是印度尼西亚新史学的唯一代表，还包括印度尼西亚报告第22页上提到的特乌库·伊斯坎达。

诺·卡托迪尔德约并没有推翻印度尼西亚中心论。相反，印度尼西亚中心论恰恰是他全部著作的基调。不过，与老一辈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不同，他真正地认识到了仅仅提出独立自主的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存在显然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具体的研究工作来加以证明。他还认识到，仅从全国政治发展和“重大事件”还不足以证明独立自主的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存在。荷兰人可以把他们的东印度殖民地视为一个行政统一体，但是从印度尼西亚的观点来看，每个岛屿，每个地区和区域内的各个民族，都在过着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历史。殖民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和历史只不过略有冲击而已。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从印度尼西亚的观点出发，想要在整个现代印度尼西亚的水平上写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种做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印度尼西亚各民族真正的历史发生在“基层”。萨托诺·卡托迪尔德约提出，他们所需要的是更多地认识一个个地区和地方的历史，因为这些地方才有印度尼西亚民族的真正生活，而“国家的”历史只存在于殖民地社会中。纯粹的“政治”史遗漏的东西太多了。为了深入到基层中去，就必须放弃通常的只重视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以及主要政治人物的政治史研究方法，而且必须转过来重视包括印度尼西亚民族的日常生活在内的内涵最广泛的社会史、社会运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冲突。换句话说，就是需要集中精力去研究地方发展的微观历史而不是去研究那些由全国范围的“重大事件”构成的宏观历史。不过，这样一个广阔的和尚未开拓的领域也需要新的方法并大量使用未经筛选的资料。如果说萨托诺·卡托迪尔德约对印度尼西亚历史学的贡献是建立了新的而且极为成熟的概念体系，

那么，他所提供的研究技术也不稍逊色。对于研究政治事件的历史学家来说，文件的结构分析和考证等通常使用的手段是足够的了。如果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农民社会中复杂的社团生活，这些手段的价值就受到了限制。正因为如此，需要用新的研究方法，而萨托诺·卡托迪尔德约在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趋同中找到了这个方法。只有按照这样的方法才有可能对印度尼西亚民族史的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①

在萨托诺·卡托迪尔德约的成就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要进一步详加讨论的原因，就在于他指出了避免由于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寻找适当的方法这一问题而可能陷入明显的僵局。仅仅推翻欧洲中心论并且树立印度尼西亚中心论的观点以取而代之是很不够的。这只不过是用一套假设去代替另一套假设，用一个主观的价值观念体系去取代另一个主观的价值观念体系而已。其次，由于对广义概念的依赖经常会产生“不合适的公式”，这样的公式不可能转变为富有成效的历史研究纲领。② 因此，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十年到十五年中，历史研究没有能够为增加历史知识作出新贡献，这已经十分明显了。1960 年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从叙事式的描述——反殖民主义的模式所造就，并且歌颂印度尼西亚英勇的过去——转变为对具体问题的探讨，或对某些事件或某些时期作准确的、详尽的和批判的研究。新的一代历史学家也主张“从内部”去撰写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同老一辈历史学家一样是赞成印度尼西亚中心论的。不过，他们认识到，在民族主义的主题上老调重弹最终必定会丧失

① 上述内容摘要可参见卡托迪尔德约起草的印度尼西亚报告，第 30 页。
② 同上，第 69 页。

创造性和生命力。他们不再满足于修正和批判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对印度尼西亚历史所作的解释，而是运用新的批判眼光和新的批判方法去对待民族主义历史学。

这种变化造成的结果是诞生了更加成熟和水平更高的历史学，即不只是证明印度尼西亚过去的自主性和独特性。新旧两种“印度尼西亚中心论”的区别表现在四个主要方面。首先，新的“印度尼西亚中心论”关注对问题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叙述政治事件。换言之，即是分析式的而不是描述式的。其次，新的“印度尼西亚中心论”是立足于地方而不是立足于全国。简言之，它是“微观历史”而不是“宏观历史”，并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建立起至今为止仍被忽视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总有一天可以建立起真正的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学。第三，它的研究重点从“全国范围”的政治事件转向社会各种力量内部的动力，也就是说重点研究政治的基层以及地方上的全体居民，社会变化和社会延续的力量正是从这些地方产生的。最后，新一代历史学家从社会科学中发展了一些新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用它们装备自己去完成任务。①

虽然这些新趋势仍处于早期，但确实标志印度尼西亚历史学的重大进展。首先，这些趋势展现了真正的新知识积累的前景，而不是一系列有趣但却往往是高度推测性的理论和结论。其次，这些趋势说明，作为独立后的东南亚的历史研究的显著特征，即首先关心研究民族本体已不再那么使人困扰不安。现在已经认识到象“欧洲中心论”、“亚洲中心论”和“印度尼西亚中心论”等等诸如此类的术语不过是一些错误的反

① 印度尼西亚报告，第70—71页。

论，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些术语，不但不能澄清反而会模糊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① 为了克服由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带来的问题，光说说“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不够的，还需要说明完全不同的事情，即集中说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不是政治的变化。② 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当代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就可以走上充满光辉前景的道路。

在印度，历史学家已经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印度的历史研究的发展和组织比东南亚约早三十年。更重要的是，印度历史学家已经摆脱了把大量精力用于研究文化认同和民族统一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仍然是今天的许多亚洲历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民族主义在印度产生得比较早，1885 年印度国民大会党建立后就出现了民族主义。印度民族主义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历史学是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生平正好相吻合。尼赫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监狱中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可以看作是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历史学的顶峰。强调印度的精神和文化的统一，反对英国人提出的认为印度从未成为一个民族，只不过是个种族、宗教和等级的大杂烩的观点，这些问题不仅是尼赫鲁的著作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也是整个一代印度历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但是，自从印度获得独立以后，这些问题已不再成为紧迫的问题了。大约在 1955 年以后，印度历史学家已经感到可以自由地从这些广泛的、压倒一切的问题转向研究印度社会及其成长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去。

---

① 斯迈尔：前引书(1961 年)，第 100 页。

② J·D·勒格：《印度尼西亚》(J. D. Legge, Indonesia)，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4 年版，第 100 页。

当我们转过来看今天印度历史学的实际成果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成果的主要特征是实用主义和从实际出发的态度，也就是首先力图加深我们对印度历史各个阶段上的实际状况的认识。印度历史学家象亚洲各国历史学家一样，首先关心的是立足于从内部来看印度的社会。重要的是，有关英国对印度的影响的著作，例如对各届总督的政策的研究，今天英国对这方面的研究比印度自己还要活跃。① 关于印度民族运动的研究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美国、苏联和英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十分关心，而印度历史学的当前趋势是把重点放在英国人入侵前印度社会发生的演变上。② 在重点发生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给印度历史划分时期的愿望，不过这种分期不是以突出的事件(如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为基础，也不是以从外国引进的概念(如中世纪)为基础，更不是简单地以种族事件和统治阶级的宗教为基础，而是以印度社会形态的演变为基础。③ 因此，兴趣已经从研究政治统治的机制转移到研究莫卧尔王朝等印度帝国对社会发生的影响以及印度社会的成长，转移到研究印度的"封建社会"问题，即强大的土地贵族(塔库尔·柴明达尔等)阶级的兴起。这些人处置农村的剩余

---

① 参见上文第149页注③所提到的极有价值的印度报告（第25页）指出了这一点。例如，S·戈帕尔的专著《里蓬勋爵的总督任期》(S. Gopal,The Viceroyalty of Lord Ripon)，伦敦，1953年版；《欧文勋爵的总督任期》(The Viceroyalty of Lord Irwin)，1926—1931年，伦敦，1957年版；《英国在印度的政策，1858—1905年》(British Policy in India, 1858—1905)，剑桥，1965年版。这些著作都在英国出版了。当时，戈帕尔任牛津大学南亚史讲师，虽然他本人是印度人。

② 印度报告，第27页。

③ R·塔帕尔："对印度古代史的解释"，载《历史与理论》，第7卷（1968年）。

财产，成为印度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这种途径，有希望发现造成古典时代衰落并且建立起突厥人统治的基本的社会变化。①

印度历史研究当前阶段的根本特点和前面叙述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是从叙事史向针对问题开展研究的历史学转变，是从政治史向社会史和经济史转变。随着这种转变面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史料的运用。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个明显趋势是避免下泛泛的结论，加强了某些范围有限的方面和特殊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当前引起注意的问题中，下面几项是特别重要的：②

1. 印度社会，或者更具体地说，在莫卧尔王朝中是否潜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濒临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这场革命却被英国人消弭了？

2. 英国人入侵以前，“少数派”，如佛教或耆那教这样一些少数人的教派和其他一些异教运动，以及与此相反的宗教运动，如雅特人、锡克人、马拉塔人或阿富汗人的运动，在印度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它们同印度的种姓社会是怎样相互影响的？结果如何？

3. 是否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即不仅仅限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个人冲突和不和）可以解释莫卧尔王朝的瓦解，例如统治阶级内部（柴明达尔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或者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4. 英国统治者是否（象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那样）有意识地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或者换个说法，英国统治者

① 印度报告，第19页。

② 同上，第23—27页。

的政策（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否造成了印度社会中越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失调？也就是等于说，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印度的经济是发展，停滞，还是衰退？或者是否可能确定经济增长、停滞和（或）衰退的不同阶段？

5. 社会上层人物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促进印度民族主义成长的因素？换个方式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民族主义运动是否代表了外国和本国的上层人物之间的斗争，还是它涉及到印度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6. 印度的瓜分是英国人精心制订的政策造成的结果呢，还是因为在印度的社会和文化中本来就有其历史根源？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有关当前印度历史学研究的已经出版的各种论述中，最明显的差距都集中在特别详细地研究印度农民的历史上，例如关于农民运动、农民起义以及农民群众在印度社会演变中发挥的作用上。[1] 我们如果转向讨论中国的历史研究，便会立即发现，充分的事实证明这正是印度与中国当前历史研究的趋势中最明显的差别。在其他方面，这两个国家的历史研究趋势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例如，正象印度历史学家正在调查莫卧尔王朝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证据一样，中国历史学家从1949年以后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

① 在这些著作中，我应当指出L·纳塔拉扬的《1850—1900年的印度农民起义》（L. Natarayan, Peasant Uprisings in India, 1850—1900）孟买，1953年版；S·B·肖德乌里：《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内乱，1765—1857年》（S. B. Chandhuri, Civil Disturbances during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1765—1857），加尔各答，1955年版；I·哈比卜：《印度莫卧尔王朝的土地制度，1556—1707年》（I. Habb,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1556—1707），孟买，1963年版。不过，这些著作都不是近期的。关于印度现代史（1947年以后）的文献已陆续出版，但主要不是历史方面，而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参见H·阿拉维："农民与革命"，载《社会主义文摘》（1965年）。

探索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中国历史学家和印度历史学家一样，但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力量研究了汉族帝国时期的少数民族，如回族，苗族和蒙族。印度历史研究中最关心的问题是英国统治造成的经济后果，与此相仿佛，中国对于1840年以后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些共同的趋势反映了这两个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上的国家的人民在欧洲人统治时期的基本共性。但是，中国历史学著作和研究的最显著的特征，至少大约从 1955 年以后，在于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关注。按照毛泽东的话来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 中国的新史学所追求的目标，用翦伯赞的话来说，是"揭示中国被压迫民族伟大的革命传统"。② 在 1949 年到 1961 年间，尤其是在后一个阶段中，已经发表的关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农民战争的论文达四百篇以上，有关十九世纪农民起义的史料也相当于这个数字，有关这方面的论战正在继续进行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今天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

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引起了西方世界和苏联的极大关注，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方式来加以估价的。③ 谁都不否认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选题和方法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不过，我们这里只讨论它的积极成果。即使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作无情批判的人也对它那数量浩大的新成果和积极的成就有深刻印象。尤其在经济史方面，"许多新领域已经开辟，与过去的情况相比，现代中国的经济史写作已经在成熟的理论水平和全面地掌握反映实际状况的

资料上奠定了基础。"④大量的新文献资料已经可资利用，这是公认的。不过，人们也承认在方法论上有了重大的进展，在创造新中国的历史观以取代过时的儒学观念上已收到了实效。⑤ 还必须记住，中国传统史学体系的崩溃如果不是从1905年开始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1919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继承了进一步探索更加具有现实主义的中国史学的新观念。可以预期，他们对历史的解释基本上是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念来形成的，尤其是他们的历史分期方法。

中国历史学家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将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各类马克思主义的分期方法联系起来，同时又不致于抹煞中国过去历史上的独特性和特殊性。中国历史学家今天

---

① 《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第588页；第3卷，第76页。

② J·P·哈里逊：《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农民起义》(J. P. Harrison,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剑桥，1969年版，第6页。

③ 除了上文第193页注②提到的一般著作外，参见A·费伊尔威克和陈沙利：《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A. Feuerwerker & Cheng, Chinese Communis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坎布里奇，1961年版；B·维特霍夫：《旧中国历史学的特征》(B. Wiethoff, Grundzüge der älteren Chinesischen Geschichte)，达姆施塔特，1971年，第9—38页；A·费伊尔威克："重写中国的历史"；A·费伊尔威克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A. Feuerwerker,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坎布里奇，1968年版)收集了《中国季刊》第22—24期(1965年)发表过的十一篇论文和其他材料；刘宗若(音译。——译者)：《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争论》(LiuChung-jo, Controversies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坎布里奇，1964年版；J·P·哈里逊：前引书(1969年)；J·马尔奇西奥："人民中国的历史研究"，载《历史杂志》，第226卷，第465期(1963年)；J·谢诺："中国近现代史"，载《历史杂志》，第243卷，第493期(1970年)；R·V·费雅特金和S·L·蒂克恩温斯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中的某些问题"，载苏联《历史问题》，第10期(1963年)。

④ 费伊尔威克和陈沙利：前引书(1961年)，第169页。

⑤ H·卡恩和A·费伊尔威克："学术中的意识形态：中国新史学"，载《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1968年)，第6，10页。

正在进行的论战主要集中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因此，他们首先关心的历史分期问题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当前正在研究的选题。大致说来，当前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领域是在“关节点”上，即中国历史上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的过渡时期（例如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必然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为数很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例如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制度的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的分期问题，这个问题与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有特殊的关系。①

这里不准备就以上各个专题的研究情况作详细讨论，也不对这些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以及各种不同的解释逐一进行介绍。中国历史学家已经指出了“空白”和“薄弱环节”，尤其是指出缺乏“分析性研究”。② 尽管如此，这些讨论的丰富内容仍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仅从有关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文就发

---

① 马尔寄西奥：前引书（1963年），第160页；费伊尔威克：前引书（1961年），第275—276页。

② 费伊尔威克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历史研究》（1968年）第239页上引用了严中平的论述。严中平的论述充分说明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状况。他说1949年以来中国在近代经济史上取得的成就是“极其丰富的，远远超过了旧中国许多年来的所有成就”。然而，他也认为这项研究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从地理上，较多地注意了“沿海省份和少数大城市”，忽视了“内陆省份及其许多大村庄和人口众多的市镇，尤其是对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注意很不够。”“至于经济的各个部门，比较重视研究近代工商业，没有注意研究农业和手工业，虽然在旧中国，农业和手工业占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在研究的时期方面，由于对资本主义的萌芽进行了大量讨论，因此，比较多的著作是关于鸦片战争前的明清时代，对鸦片战争以后的时期给予的注意不够。”在研究方式上，严中平指出，“资料收集工作”超过了“出研究成果”，“缺乏经过认真加工的统计资料”。在已经出版的论著中，有许多是短篇论文，完整的著作较少。研究的课题很多，综合推论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分析研究非常之少。

表了一百五十多篇这一事实上就可以衡量出来。① 不过，中国历史学家所关心的中心问题还是对封建时期进行解释，这个时期按照当前中国流行的算法，是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1840年，占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那么，如何对中国历史上这段漫长而重要的时期开展研究呢？马克思主义原理除了把封建社会当作资本主义的温床加以论述外，对封建时代并不十分关注。如果漫不经心地将封建社会描述为静止的，那无异于说中国的历史是停滞不前和非常落后，而且这种说法也与已掌握的史料相抵触。所谓的"封建"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的时期，阶级关系，土地分封关系，以及农业技术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于中国历史学家来说，问题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解释封建社会中的动力何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强调毛泽东所说的农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动力"。对于把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提高到这样重要的中心地位，历史学家可能会表示怀疑，西方历史学家已经拒绝接受这种观点。然而，这个问题为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却是毫无争议的。

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次数上都是"世界上无法相比的"这一论点，经常为人们所引用。② 历史学家应当正视这些事实并对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进行估价。这无疑非常重要。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③ 回避了这个问题。相反，它描述了中国社会和谐的景象，把农民领袖污蔑为"匪"和破坏秩序的人。因此，在

① 费伊尔威克：前引书(1968年)，第101页。

② 哈里逊：前引书(1969年)，第213页。

③ 同上，第324页。

1949 年以前，实际上并不存在农民战争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研究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恢复了平衡。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往往说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国王和战争转移到普通人民身上，只有篡改历史证据才可能办到。这当是夸大之辞。拉铁摩尔曾经说过："历史证据全摆在那儿"，"唯一的问题是选择那些不为传统历史学家们重视的证据而已"。①

1958 年，中国历史学家受到告诫，要"厚今薄古"。② 严中平指出，"关于明清史的研究著作中，鸦片战争以前的多于鸦片战争以后的。"但是，与此同时，毛泽东坚持认为，认识前天的历史同认识今天和昨天的历史同样重要。③ 而且从现阶段来看，中国的历史著作和研究十分均匀地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展开着。一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去搜集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现代历史上各次重大事件参与者写的第一手材料。④ 另一方面，如马尔奇西奥指出的，在新创刊的历史学杂志《历史研究》的前六期刊登的三十九篇文章中，关于古代史和封建时期的文章不到二十四篇。⑤ 这也许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了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阶段上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性的缘故。这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有长久的兴趣。中国的这一传统，其强烈程度不亚于印度历史学家对吠陀时期的兴趣。中国最关注的经典注释和补遗的传统

---

① O·拉铁摩尔：《从中国看世界》(O. Lattimore, From China, Looking Outwards)，里兹，1964 年版，第 15 页。

② 关于"厚今薄古"，参见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58 年第 3 期；费伊尔威克：前引书(1961 年)，前言第 11 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第 821 页。

④ M·C·贝尔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载法国《历史杂志》，第 230 卷，第 468 期(1963 年)，第 405—406 页。

⑤ 马尔奇西奥：前引书(1963 年)，第 160 页。

远未丧失，象《汉书》之类的基本典册的点校本还在大量出版。

尽管如此，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根本特征是优先考虑社会史和经济史。当然，这方面同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许多新事物一样，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早就开始了，象郭沫若最初在1930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类的著作证明，用高度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和社会—经济研究方法可以获得新的丰富的认识能力。① 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社会—经济研究方法取得统治地位。但取得的成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因为十分清楚，在某个时期提供了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为教条。尽管如此，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研究的进展从整个来说十分可观。普遍认为中国今天的历史研究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加"灵活"，更少"僵化"，其基本方法更加充满活力，对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因素掌握得更加全面。② 新中国历史研究由于强调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以及他们在促进社会变革上的推动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

4.5 第三世界历史研究现状

在对当前第三世界历史研究发展状况所作的这番巡视即将结束时，如果要对这些发展作一清理，那么，应当集中说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中亚书局，1930年版。

② 费伊尔威克：前引书（1968年），第5，123页；A·F·赖特认为"教条式的方法造成了1949年以来历史研究成果不多"。参见《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1968年），第406页。

明亚洲和非洲的状况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拉美史学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和意义深远的变化，不过这些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发生在十九世纪初以来一直继承下来的历史学撰写和研究十分活跃的传统体系之内的，它的连续性并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大致上是研究态度和方向的变化，因此，没有必要在这里作进一步的评论。但说在亚洲和非洲已出现了新的开端也毫不夸张。这个新开端不仅表现为在许多方面慎重地与传统史学决裂，而且还是研究观点和研究人员的变化。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对亚洲和非洲的历史所进行的研究基本上掌握在欧洲人手上，只有日本和印度例外，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对东西方的历史展开了基础研究。1947 年印度赢得独立。1949 年新中国诞生。从此以后，亚洲的殖民地时代已经结束。1957 年加纳获得独立以后，许多非洲国家纷纷获得解放。亚洲和非洲的历史研究状况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亚洲和非洲新获得解放的国家中，历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对其成果和前景作出评价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项成果，无疑是在亚洲和非洲各国形成了人数越来越多的经过专业训练而且具备丰富经验的历史学家队伍（在拉丁美洲，这样一支队伍早已出现）。我们必定会看到，随着亚洲和非洲历史学家队伍的不断壮大，他们在撰写自己的历史方面将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而且最终会承担起全部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参与亚洲和非洲研究的欧美历史学家会越来越少。相反，随着 1945 年以来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他们对于亚洲和非洲学术上的兴趣会愈益加强，他们感到需要说明和解释这些变化，用全球的观点取代欧洲中心论，

这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是完全合适的。确实，从某些方面来看，参与亚洲和非洲研究的欧洲历史学家，无论是西欧的还是东欧的历史学家，都比以前有所增加。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如果在亚洲和非洲历史学家中的强大趋势是把他们的工作完全局限在自己的国家方面，那么，他们真正需要的倒是那种其他历史学家所具备的更加广阔的视野。胡尔什维曾经指出，①"强调中国所获得的成就的独特性和以其他地区的发展为广阔背景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是一回事，而在强调中国的独特性时却"忽视其他所有历史现象"则是另一回事。既然欧洲历史学家能纠正这种倾向，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在过去已经作出重大贡献的欧洲学术水平将会继续在亚洲和非洲的研究中发挥很有价值的作用。归根到底，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学如果想要结出丰硕的果实，就必须象欧洲的历史学一样，置于全球的背景之中。这既是亚洲和非洲历史学家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欧洲和美洲历史学家应当发挥作用的地方。

据说，基础研究必定会越益集中到当地学者手中，这种情况现在依然存在。只要从实际情况考虑——书面的、口述的和考古的史料是否可得以及语言障碍，等等——这种倾向本身就无法避免。即使对本民族的历史学家来说，语言上的困难至少在某些地区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如在马来亚，如果对这个国家的主要语言没有掌握到四种以上就无法开始进行认真的研究工作。② 在殖民统治时期，欧洲历史学家通过设立训练中心和机构来缓和这一问题，例如1900年成立的远

① 费伊尔威克：前引书(1968年)，第123页。

② 瓦希德：前引书(1964年)，第119页。

东法语学院，不仅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从事研究工作和野外发掘工作提供语言教学，而且为他们设立了特殊的图书馆和设施。[①]今天，这些方面的责任都由政府接管过去。在非洲各个大学中工作的欧洲人数量依然很多。但是在亚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殖民地区的研究工作，例如在爪哇或越南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于那里的历史丰功伟绩了如指掌并通晓当地语言的那一类学者，实际上没有。他们的位置已被当地的历史学家所取代。而历史学研究所赖以取得进展的新知识的积累，其希望就在这些当地的历史学家身上。在今天的中国，就连谙熟古汉语和口语的外国历史学家实际上也无法接触广泛分散在中国各省的尚未加以发掘的史料。因此，欧洲学者愈来愈要依赖当地学者所取得的初步成就。几年前，特威切特曾经指出，在东亚历史学领域中，"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我们的日本和中国同行将处于领先地位。"[②]虽然中国和日本象印度一样，在不同程度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十分明显，我们可以预料，随着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的急起直追，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学总的说来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此，目前种种事实都说明亚洲和非洲的历史研究正开始向前飞跃地发展。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大部分地区进入了新的阶段，那里的充满热情的业余历史爱好者已经被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历史学家所取代。尽管存在着一些阻力，尤其是中东的伊斯兰教国家和巴基斯坦，但是采纳和吸收西

---

①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2卷(1961年)，第99页。

② D·C·特威切特：《中国唐朝和宋朝的土地租佃制和社会秩序》(D. C. Twitchett, Land Ten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伦敦，1962年版，第34页。

方史学概念和研究方法现在已得到了普遍的赞同。而且正如王赓武所说的，如果说“在方法论的转变上开始时落后了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迅速地迎头赶上来了。①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方法论水平的迅速提高，用新的研究方法进行试验的愿望也大大增强。在非洲，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缺乏文字史料，这迫使历史学家不得不设计出新的方法以妥善解决口述传统的一些特殊问题。在其他地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强大。尤其在亚洲的大部分国家，马克思主义在促进对具有更强解释能力和启发性的方法的探索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无疑已经十分不满足于那种描述性和文学性的叙事史，他们很快地利用社会科学的技术和常规的历史学批判武器，迅速地转入社会和经济分析领域。我们还看到，拉美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也是这样。

方法论的这些进步主要是在过去十年中获得的。这一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为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学开辟了新的前景。第一代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一方面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者的历史解释；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欧洲的影响是亚洲和非洲社会转变的唯一因素。这样的社会转变往往是服从于急剧的动荡和逐渐的变化。这些历史学家没有掌握研究亚洲和非洲社会内部发展的分析工具。今天，这种情况不复存在。新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这些方法使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从内部”研究亚洲和非洲社会成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完全是“把殖民主义的历史学颠倒过来

①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6卷(1968年)，第424页。

了”。这不仅比殖民主义历史学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也比民族主义历史学前进了一大步，因为民族主义史学基本上没有脱离欧洲历史学家的窠臼，尽管它攻击了欧洲历史学家的观点。亚洲和非洲的新一代历史学家把研究重点从外部因素，尤其是殖民主义以及当地社会和殖民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转向研究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不仅仅注意研究亚洲和非洲对欧洲影响的反应，而且注意到欧洲人向亚洲和非洲渗透以前在亚洲和非洲社会中发生作用的那些力量。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还极为关注新亚洲和新非洲新在何处等问题。与老一辈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民族的历史，不是把它看作殖民主义历史学的对立面，而是看作对一种社会的研究，在这种社会中殖民主义的出现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许多因素之一。

态度上的这一变化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标志着亚洲和非洲更具有创造性的历史研究新时期的到来。目前最优先的研究范围是亚洲和非洲社会内部的演变，以及“来自内部”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而且标志着与通常承认的对待亚洲和非洲历史的研究方法的彻底决裂。除了极少数例外，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把精力集中在殖民地时期或上古时期，而且只有这两个时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我们已经讨论过，在获得独立以前，非洲的历史学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殖民主义列强的观点来写的。从内部，即从非洲民族的观点来撰写历史学著作，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也是很少的。而在亚洲的历史学研究中，东方学家的深刻而睿智的纯学术研究抵消了只关注研究欧洲对亚洲的影响的倾向，虽然这样的影响并

不是荡然无存了。但是，汉学家、印度学家和其他东方学家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些有关国家传统历史学的基本观点。他们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亚洲文明的黄金时代是上古时代。因此，他们献身于经过他们挖掘、出版和评校的那些经典古籍的研究中去。他们还继承了王朝史的陈旧分期方法。这是一种人为的、短期的分期方法，按照特威切特的说法，这种分期方法由于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宫廷政治，从而掩盖了"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期的历史变化的模式。"①由于从王朝史学观点来看，历史上大片大片领域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许多历史时期实际上因而被忽视。伊斯兰学者从研究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一下子跳到对阿拉伯觉醒的研究，而中国和印度的古典时期和十八世纪末之间留下了一大片空白。这段空白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大约有两千年之久。印度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空白，这些空白直到最近还没引起理应受到的重视。

我们只有认识到了亚洲和非洲早期历史学研究的局限性，看到了它的狭窄的范围，才可能清醒地看到亚洲和非洲历史学近来的进展程度和意义所在。概括地说，1960年以来，亚洲和非洲的历史研究可以说已经进入成年时代。在印度那样一些国家中，历史研究的重大变化发生得比较早，而总的说来，在过去的十年到十五年之间，历史研究中的方向和方法出现了新的变化，从而把亚洲和非洲的历史研究提高到了成熟的新水平上。毋庸置疑，民族主义确实为扩大对过去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推动力。但是，只有民族主义配备了适当的方

---

① 特威切特：前引书(1962年)，第15页。

法并牢固地掌握了概念时，才有可能向前跨出关键性的一步。既然老一辈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把注意力从研究内部的发展转移到对外部因素的研究，他们对殖民主义的关注便会逐步地自行消失。新历史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超越了老一辈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关心的研究问题，将研究重点转向从内部研究亚洲和非洲的历史。这样的矫正是十分重要的。在当时的知识水平条件下，对殖民主义所做的早期评价是不成熟的。只有当我们掌握了有关亚洲和非洲社会的结构及其实际功能的更加详细和更加具体的认识时，只有当亚洲和非洲的社会生活中复杂的、多层次的各个方面被揭示出来以后，我们才可能着手去解决殖民主义的问题，才真正有可能客观地和科学地评估殖民主义造成的影响。

从内部研究亚洲和非洲的历史还仅仅是个开端，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可能会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在目前情况下，最明显的是我们的无知程度。如果说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学中许多领域内的研究实际上尚未真正开始，这并不过分，而且决不意味着低估印度、中国和日本历史学家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甚至对于印度和中国的从古代到十九世纪之间的历史，我们也知之甚少。特威切特强调指出，对于中国的唐朝和宋朝，"我们的研究还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上"。① 只相当于一个世纪前英国的西鲍姆时代对中世纪史的研究水平。其他领域的状况并不更加令人满意。迟至 1961 年，东南亚的历史著作主要内容还是考证王朝世系，宫廷的生活，以及政府官员的任期和主要大臣的政策。对于过去的实际生活状况知道的"少得可

① 特威切特：前引书（1962年），第 32 页。

怜”。对社会结构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也就是说，对东南亚的许多不同社会的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还完全没有奠定。①实际状况是，要从内部来认识亚洲和非洲的社会，从绝大多数方面来说便意味着从基础不同的起点上重新开始，并且带有与早期历史学根本不同的观点。这也就是主张在比业已尝试过的领域远为巨大的规模上，深入研究某些特殊的状况和严格限定的范围，简言之，是主张开展“微观历史”而不是“宏观历史”的研究。这是一场严重的挑战，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可能要耗费亚洲和非洲历史学家的精力，然而，要从散乱地和随意地搜集有关过去的各种零碎的知识转向有系统地和有目的地研究亚洲和非洲的社会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以自己的各种形式出现的历史发展，这却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亚洲和非洲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在现阶段，发展历史研究的必要条件是深入细致地研究某些特殊问题。如在拉丁美洲，努力从“内部”来开展历史研究，同样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家的特征。这一认识决定了当前历史研究的方向。因此完全有必要补充说，深度的研究如果不与广度的研究相配合将会十分容易地失去其价值。专门化本身会带来一些特殊的危险。毫无疑问，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学在过去曾经被排斥在历史研究的主流之外，被当作是人数极少的一批高度专门化的东方学家和非洲学家的特殊领地，从而蒙受了巨大损失。还有一些冒险之处在于这种态度可能会因为当前流行的“地区研究”的观念而永远存在下去，这样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已对拉丁美洲过去的历史著作发生了影响。因此，正

① 《亚洲各民族历史著作》，第2卷(1961年)，第327页。

象R·F·沃尔所坚持的那样，“亚洲学的专家们只需要与同行交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亚洲和非洲历史学家今天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使他们自己的材料能够运用从而使这些材料对于受其他环境制约的民族来说也有意义。”①

对过去十五年至二十年亚洲和非洲历史学发展的回顾，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如何摆脱了孤立的状态。今天再也不会有人象不久以前一样把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学当作只有专家们才可涉足的深奥莫测的研究领域，这种态度上的根本转变无疑是对1945年以来发展的世界形势和重大事件的反应。然而，在今天的情况下，它已经远远地越过了促进它形成的最新动力。如果说首要目标是解释亚洲和非洲各国革命的直接起因，那么，今天已经完全认识到只有比现在更充分地掌握有关亚洲和非洲的先前情况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不仅如此，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只注重当代史的做法必然会忽略掉许多本来应当认真考虑的因素。在过去的十年到十五年内所发生的变化是从短期目标——对亚洲和非洲历史学家来说是否定“殖民主义”的历史解释，对于欧美历史学家来说是解释亚洲和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成就——转向对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发生真正的兴趣，不仅把亚洲和非洲历史当作纯学术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它们看作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意味着亚洲的观点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用亚洲的方式来认识亚洲，用非洲的方式来认识非洲，也就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来看待亚洲和非洲。只有这样，亚洲和非洲

---

① “新的开端：亚洲”，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历史学的新道路》(1966年)，第302页。

的历史经历在全世界的背景中才变得有意义。当我们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亚洲和非洲历史的兴趣迅速增长，为历史学研究增添了新领域时，我们并不是说在那以前亚洲和非洲的历史被忽视了——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而是说，亚洲和非洲各个民族的历史不再是从孤立的角度来加以考虑，而是被纳入了世界历史的整个模式中，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各种因素。这是需要加以单独讨论的重大变化。



探索历史学的意义：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

近二、三十年来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向历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随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历史学的迅速进步，随着科技史等历史学新分支的确立，[①]随着史前史和考古学的进步所造成的历史研究时间上限的前伸，历史学已经突破了过去的范围。新知识的积累，尤其是过去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那些研究领域中知识的积累，构成了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充分的事实还证明，这个发展过程尚未达到终点。如果历史研究要有意义并且能够顺利进行，应当将它置于什么样的体系之中呢？

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会同意，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通常使用的那个体系如果说当时是令人满意的话，现在已经不够充分了。1945年到1955年之间，对这个旧模式的可靠性所抱的怀疑态度变得更为普遍。[②]事

① 关于科技史方面的发展，简要的叙述有R·J·福布斯的论文"科技史"，载《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1卷，斯德哥尔摩，1960年版；参见A·R·霍尔："科学史"，载芬伯格：前引书(1962年)。

② 参见巴勒克拉夫：前引书(1955年)。我在那本书里试图概括当时已经表现出来的那些忧虑。

实证明，亚洲和非洲的各个民族注定要比不久前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世界里，以欧洲民族国家为衡量标准，以欧洲人的扩张为顶点的那种类型的历史学，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无法容忍了。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最近声称的："建立认识过去的新模式是当前最紧迫的需要"。然而，新模式应当是什么样的呢？①

对这个问题，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历史学家认为没有必要考虑。相反，他们全心全意致力于详尽的经验研究。用J·B·布里的话来说，他们相信"细枝末节的事实的综合……最终将说明真相"。②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毕竟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核心问题。菲利普·盖德拉曾经指出："建筑历史学的大厦不仅需要优秀的砌砖工人，也需要设计师。"③ 既然历史学不仅要关注尽可能准确地重现过去发生过的全部事实，而且还要关注发生的那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还要关心特殊事实的意义以及对它的解释，那么，详尽的研究必须同规模较大的计划联系起来，并且在将它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进行，才可能使这些详尽的研究具有普遍的关联。历史研究中专门化倾向的不断加强，加上历史学新分支的不断涌现，使各个研究领域各行其是，结果造成历史研究支离破碎。这样的危险已很明显。历史研究愈是趋于专业化，就愈加需要将各个研究领域沟通起来，而这种沟通只有置于较大的模式中才有可能。

当然，无论怎么说，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模式决不是前所

① M·拉巴德：前引书(1970年)，第21页。

② J·B·布里：《论文选集》，剑桥，1930年版，第17页。

③ 引自C·H·威廉斯：《现代历史学家》(The Modern Historian)，伦敦，1938年版，第77页。

未有的创举。试图领悟隐藏在转瞬即逝的事件背后的基本趋势和运动，寻找赋予这些事件以意义和内容的推动力和各种联系，所有这些努力和尝试都是从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孔多塞，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孔德、马克思等许许多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关心的首要问题。① 现在所发生的变化则是历史新知识的大量积累迫使历史学家必须思考和重新估价从老一辈历史学家手中继承的模式。例如，充分的事实证明，兰克在他的讲座《论近代史时代》中提出的历史解释曾影响了西欧好几代历史学家——反映了当时的环境和那些现在不再正确的态度。② 另一方面，由于对亚洲历史的新认识在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站得住脚。③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在目前阶段是否有可能建立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令人满意的全面观念？如果没有可能，那么，用什么来代替它呢？这样的问题已经提出，而且最终也在非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中提了出来。波普尔等坚持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整个人类的历史，只有无限多的关于人类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历史。因此，寻求历史发展的永恒模式或反复出现的模式的各种努力注定要失败。④ 不过，即使如此，历史学家需要解决的

① 参见 B·马兹利什：《历史之谜。伟大的思索者，从维科到弗洛伊德》(B. Mazlish, The Riddle of History. The Great Speculators from Vico to Freud)，纽约，1966 年版。

② 对于兰克近代史解释的批判，见 G·巴勒克拉夫：前引书(1955年)，第168—184页。

③ 按照费伊尔威克的说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不再公开坚持了。见 A·费伊尔威克：前引书(1968 年)，第 227 页。又见利希特姆："马克思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载《圣安东尼论文集》，第 14 卷(1963年)。

④ K·P·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K. P.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第 2 卷，伦敦，1945 年版，第 257 页。

问题依然是如何最合理地编织人类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不同历史。例如，将它们置于民族国家的体系中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用什么代替？否认包罗万象的关于过去的“历史哲学”观点并不能回避综合的问题，只是将这个问题提高到另一个水平上。

因此，除了有关历史的意义，以及对整个历史进程的解释等一些比较广泛的问题外，今天大量的注意力还集中到一些范围有限的问题上，例如是否有可能写出世界史，其方法如何，通常使用的“线性”模式，即大家所熟悉的以编年体系作为编写的原则是否可靠等等。我们将在第五章里评论当前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或类似的其他一些问题的态度，而不把这些评论自吹为全面和终极的评论。我们将要讨论的往往是一些不明确的假设，对于这些假设，许多历史学家并没有认真地推敲而加以信任。然而，当代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就是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愿意用更广博的知识和自身的深刻经验去分析和批判自己的一些假设。在这一方面，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与人类学、社会学之间的联系，使历史学家认识到过去对历史进程所作的许多解释看来太幼稚、太简单，从而促使历史学家更加深刻地思考历史研究的体系。

5.1 国别史和地区史

1945年以来历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 1939 年以前盛行的那一类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反感和厌恶。至少在欧洲——例如在德国和法国，还有匈牙利和波兰——民族至上

的历史学被看作是造成那场席卷欧洲大陆的巨大灾难的原因之一。这种历史学与当前的世界似乎是格格不入的。在当前的世界上，科学和技术以及大规模交流方面的革命性进展造成了愈来愈紧密的相互融合。简言之，国别史思想的可靠性看来受到事件的反驳。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历史学著作的撰写——可能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仍然是以某个民族为体系。相反，随着西方对国别史的可靠性所抱的信念已经动摇，反倒是亚洲历史研究的崛起给予国别史以新生。正如我们在好几个地方指出的，亚洲历史学家仍然竭其全力去研究本民族的社会及其成长，他们显然毫无保留地接受民族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体系。另一方面，在非洲，当前的政治边界基本上全是欧洲人在1880年以后进行干涉时造成的副产品，因此把非洲历史作为一种整体来思考，或把它当作由少数重要地区组合起来的历史的趋势越来越强烈了。

民族主义历史学复兴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历史研究的惯性，由于继续走老路比较容易，同时也由于他们比较熟悉使用立即可到手的、以本民族语言写的本民族的史料。在某些情况下它的复兴也是因为受到爱国主义的压力以及在十九世纪非常强大的那种信念的复兴所造成的，这种信念认为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铸造民族意识。不过，另一种实用主义不那么强烈的主张，也有助于民族主义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民族国家的现状是无法否定的普遍事实，国家机器看来即便不是全体人类活动的中心，也至少可以肯定它是大部分人类活动的中心，是各个国家公民生活的体现。即使我们很想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去撰写世界的历史，但是可以推断这种世界历史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而

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的推动力产生于各个民族共同体，产生于各个民族的心中，产生于各个民族领袖的脑子里。正是由于这样的理由，即使在今天，许多历史学家也不会同意“关于不受边界的限制才可能写出最优秀的世界史”的观点，其根据是“民族特征、民族发展和民族权力”是历史上最终起作用的因素。①

在这里讨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看来是很不合适的。尽管笔者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这里只要注意到这些观点并没有消除对于民族主义历史学思想的可靠性所抱的怀疑就足够了。首先，这种怀疑依然存在，并且在A·J·托因比的著作中作出了典型的表达，也就是说，国别史是否可以成为“历史研究中可以理解的领域”？任何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否自诩具有自成一统的而且能够自圆其说的历史？② 当我们仔细地考察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历史，用阿克顿勋爵的话来说，完全依赖于“由于更广泛原因而不是由于民族原因所产生的那些力量的推动。”③因此，我们可以怀疑法国、德国、低地国家和英国的历史如果不放在更广阔的欧洲体系或西欧体系之中，是否可以得到认识和理解。依此类推，人们可以怀疑印度尼西亚是否是历史研究中可以理解的单位？或者说，还不如将它当作所谓“东南亚”这样一个较大的历史研究单位中的一个部分更合适一些。

---

① 例如，鹈鹕出版社的《世界历史丛书》的编者在前言中依然公开坚持这个观点。

② A·J·托因比：《历史研究》(A.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第1卷，伦敦，1934年版，第45页。

③ 《近代史讲稿》，伦敦，1906年版，第180页。

同样明显的是，在许多历史时期——也许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历史研究单位。如果我们把民族国家当作一个衡量的标准——例如，我们说法国的历史事实上曾经划分为朗格多克、布列塔尼、洛林和加斯科尼。这些地区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我们这样做的同时便是用一种不考虑时代差别的模式强加于人，这是一种目的论的解释。最后，当我们把研究重点从政治事件和政治史转向科学史之类的领域时，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所具有的缺陷便会异常鲜明地暴露出来，因为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时，民族国家，甚至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国家，都可以说是合理地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集中点。也许有人提出，我们在许多领域中——例如艺术和文学，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制度和机构——肯定会遇到一些从本质上说属于"超民族"的活动（例如封建主义、印象派、巴罗克建筑等等都是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然而，即便这些活动也带有民族的生命，打上了极为明显的民族烙印。但谁也不会认为（当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除外）数学史、天文史，甚至蒸汽机和电动机的历史只有放在民族体系中才可能理解和认识。牛顿无疑是英国人，在英国历史上占有一席地位。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认识牛顿力学在科学史上的地位，那么，牛顿生于伍尔斯索普与哥白尼生于托伦以及开普勒生于韦尔一样，并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在这一方面，民族主义体系与其说是不适当，还不如说是毫无关系。

由于种种原因，在当前的历史学家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从民族体系转向地区体系。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类例子，例如布罗代尔关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著作，以及斯托扬诺维奇对"巴尔干文明"的研究。斯托扬诺

维奇把巴尔干文明当作一个可以认识的单位，取代了希腊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等各个民族的历史。在许多方面还有与此类似的例子，如把东南亚的历史撰写成"值得从其本身的角度来思考的"单个地区的历史。[①]然而，目前侧重于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实践上的，而不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近二十年来，地区史研究的发展，"区域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的设立，往往伴随着慷慨大方的拨款。所有这些现象的发生都是对某些比较特殊的政治形势——例如1956年的中东事件和1959年的古巴革命——的反应。他们从不掩饰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汇编"背景材料"以便解决眼前的问题。一些历史学家批评这种只注意解决短期问题的权宜之计是目光短浅的做法。[②]另一方面，许多历史学家却对区域史研究的发展抱欢迎态度，把这种研究看作一种途径以便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领域。有一所关于非洲和中东的研究所成了把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地方史学者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聚集在一起的研究中心。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当前历史学实践的发展完全吻合。如果一定要举例来说明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那么请看金布尔的《热带非洲》一书，这是以四十六名专家合作的成就为基础的一部著作。[③]

充分的理由说明，在未来的十年里，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

---

① D·G·E·霍尔：前引书(1955年)，前言第7页。

② 例如，特威切特谴责大学拨款委员会海特小组出于"纯粹的政治上的考虑"，对英国政策施加的影响。见他的《中国唐宋土地租佃制和社会秩序》，第32—35页。

③ G·H·T·金布尔：《热带非洲》(G. H. T.Kimble,Tropical Africa)两卷本，纽约，1960年版。

究将会继续发展。在组织机构方面，这一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已经确立，而且符合当前的实际需要。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这完全满足了历史学家对组织方面的需要的话，那就错了。除了怀疑到这样的研究抱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动机（而且往往是赤裸裸的政治动机）外，地理上的划分是否能够提供令人完全满意的体系，也一直存有疑窦。例如，东南亚是否形成了一个可以认识的单一的历史单位，是自身无法证明的。托马斯·霍奇金指出，"非洲史"这一概念虽然具有"肯定的实用价值"，但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一个限制性概念"。① 把某些区域当作孤立的地区来讨论的趋势，其结果必然会倾向于把这些区域同总的历史割裂开来，从而在一个本来就已经为支离破碎而苦恼不堪的学科内产生出新的专门研究部门。人们经常抱怨说，这些专家甚至互相不看彼此的著作和论文，更不用说他们无法彼此理解了。②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地区史往往局限于西欧、非洲、东南亚等地区，那里的民族国家幅员狭小，而且不够稳定。而其他地区，例如中国、苏联和美国，只要把它们当作政治单位就足够了。经常有人指出，谁也不会想把亚洲当作一个单一的地区。所谓"西欧"也仅仅是个假设而已，并不是历史的事实，甚至连地理的事实也谈不上。③ 反之，"地区研究"之

① "新的开端：非洲"，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历史学的新道路》，第305页。

② H·P·R·芬贝格编：《历史研究方法》(H. P. R. Finberg ed., Approaches to History)，伦敦，1962年版，前言第7页。

③ W·T·德巴里夫人说："现在几乎已经不再同意把亚洲说成一个统一体了。"见W·T·德巴里和A·T·恩布里编：《亚洲文明研究方法》(W.T. De Bary & Embree eds., Approaches to Asian Civilizations)，纽约，1961年版，前言第7页。我本人也坚决反对使用西欧或"西方"这个概念，见笔者前引书：(1955年)，第49—51页。

所以能够确立，看来唯一的原因似乎就是世界不再是个地区性的世界了，如果说世界过去曾经是地区性的世界的话。① 因此，归根到底，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是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这种手段在有些地方可以派上用场，但在另一些地方则不那么有用。这些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补充了国别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国别史的错误。但是，它们并没有取代在精神上和概念上都属于全球性的历史学。这种历史学的眼光越过了地区史的界限，并且对一切地区和一切时代都进行了考察。

5.2 世界史的前景

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② 早在1936年，荷兰的伟大历史学家赫伊津加就指出："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

① R·F·沃尔的独到见解见"新的开端：非洲"，前引书(1966年)，第302页。

② L·R·戈特沙尔克："二十世纪世界史的计划和观念"，载《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4卷(1965年)；茹可夫："世界历史的分期"，载《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1卷(1960年)；尾锅辉彦：《世界历史的可能性》，东京，1950年版；F·瓦格纳：《历史学家和世界史》(F. Wagner, Der Historiker und die Weltgeschichte)，弗赖贝格，1965年版；维特拉姆："世界史的前景"，载他的《历史学的兴趣》(Das Interesse an der Geschichte)，哥廷根，1958年版；G·巴勒克拉夫："世界史"，载劳伯格：前引书(1962年)。

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① 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都证实了他的论断。1945 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对于反映这个新形势的历史学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了。② 这是一种实际需要，尤其是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怎么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讲授十分之九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四分之一居民的那种历史呢？E·H·丹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对其他民族的基本理想和文化一无所知的民族将永远无法摆脱灾难。"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写的世界史把它五分之一的篇幅用于描述伟大的'有色人种'的文明，无论是尚存的还是已逝的，更不用说贡献出五分之四的篇幅了。"③

加强世界史研究的理由无疑是十分有力的。正如席德尔所说的，世界史不再是一种由过去的事件所构成的历史所要达到的虚构的目标，而是需要在历史中并通过历史来加以证实的活生生的经历。④ 正是那些使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发生转变的力量——首先是指绝大部分人类的崛起，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并发挥政治影响——迫使我们开阔视野去看待过去。近至1955年，人们还必须为不应当把中国"视为置身于人类历史主流之外"的观点进行辩护。⑤ 可是，

① 参见 R·克利班斯基和H·J·帕顿编：《哲学和历史学》(R. Klibansky & Paton, eds., Philosophy and History)，牛津，1936 年版，第 8 页，"历史学概念的定义"。

② 斯塔夫里亚诺斯："世界史教学"，载《近代史杂志》，第 31 卷(1959 年)，第 111 页。

③ E·H·丹斯：《历史学—叛逆者。倾向的研究》，第 26，48，125 页。

④ T·席德尔：《当代变化中的国家和社会》(T. Schieder,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Wandel unserer Zeit)，慕尼黑，1958 年版，第 197 页。

⑤ E·G·普利布兰克：《中国历史和世界史》(E. G.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剑桥，1955 年版，第 36 页。

在事隔不久的今天，取得的进展已经不再使人们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了。然而，越是强烈地相信需要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史，历史学家们便越容易认识到撰写这种世界史的过程中所包含的问题和实际困难。至今，试图撰写世界史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对此，大家的看法似乎是一致的。[①] 然而，对于有关撰写世界史的目标和方法，意见却很不一致。

当前盛行的对于世界史的看法仍然是主张在一卷本或多卷本的著作中，用连续叙述的方式描述人类文明的出现，把两百多万年以前开始的人类起源到今天的全部可以认识的过程，全部贯穿起来。鉴于题目本身的复杂性和知识的迅速积累，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将会遇到实际困难——尤其是关于欧洲以外世界历史的认识，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前的趋势是借助于专家小组集体撰写的各种历史。自 196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六卷本的《人类史》第一卷问世以来，这种共同进行的或合作撰写的历史著作已经不断地大批出版。这些著作并非全部但主要是用欧洲语言撰写的。[②] 这些著作发挥了很有价值的作用，已经得到普遍赞许。但是，职业历史学家对这些著作多半抱冷淡和怀疑的态度。用威廉·麦克尼尔的话来说，这些著作"收集了""令人感兴趣的大量史料"；不过，从学术水平来看，它们"显然未能提供清晰易懂的模式"。[③] 恰恰正是因为这些著作是由专家小组撰写的，所以可以将它们分离为联系松散的章节或论文，不可能代替某个历史学家的统观全书的眼光，即使在苏联编写的十卷本《世界通史》中，撰写人也不可能做到具有共同的世界观。[④] 因此，目前历史著作的主要趋势，尽管依然是集体写作，而且

多少带有百科全书性质，然而，历史学家个人完成的历史著作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

---

① 至少，这是1965年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讨论给人留下的印象。见《报告》第5卷，第525—540页。

② 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史》(History of Mankind)外，还有一些杰出的著作，其中包括G·N·克拉克编《新剑桥近代史》(G. N. Clark,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十二卷本，剑桥，1957—1970年版；F·克恩和F·瓦尔贾维克编：《世界史》(F.Kern & F.Veljavec eds.,Historia Mundi)，十卷本，伯尔尼，1952—1961年版；G·曼恩编：《普罗皮兰世界史》(G. Mann ed., Propyläen Weltgeschichte)，十卷本，柏林，1960—1965年版；M·克鲁泽编：《文明通史》(M. Crouzet ed.,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七卷本，巴黎，1953—1957年版；E·M·茹可夫编：《世界史》，十卷本，莫斯科，1955—1965年版；《简明世界史》，两卷本，莫斯科，1967年版。此外，还有一些单卷本的集体写作的世界史(即由不同的撰写人写各个章节)，我认为其中以J·鲍尔编：《简明世界史百科全书》(J. Bowle ed., The Concise Encyclopaedia of World History，伦敦，1958年版)最好。参见村川，江上和早志编：《世界史》，五卷本，东京，1955年版；尾锅和中矢：《现代史的形成》，东京，1955年版。

③ 巴拉德：前引书(1970年)，第23页。

④ 参见波兰罗兹大学的H·卡兹的独到见解，载《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5卷(1968年)，第539—540页。卡兹"对于为建立世界史的价值和能力所作的努力表示怀疑。这种努力体现在成百上千个历史学家所写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我们获得的往往是世界历史的支离破碎的残片，杂乱无章，很不美妙，往往令人讨厌。它们有时可以给师生们使用，但他们去阅读优秀的论文也许收获更大些。它们可以用作参考书，但在这方面又不如历史辞典。它们极易老化而过时——主要是因为历史知识的增长十分迅速，同时也因为历史观点在迅速变化，历史学中的各种分支和专业的重要性也在很快地发生变化。我比较主张多写一些不同的单卷本世界史，作者虽然不一定是整个人类历史方面的专家，但要有文学才气，对人类和社会的心理有深刻的见解，能够将人类历史的戏剧感传达给读者，将"人类"这个物种的巨大成就和极其愚蠢的行为告诉读者。例如，我就比较爱好马克思、存在主义者和基督教人格论者写的历史。这样的事业有助于推动更加健康的人类世界秩序的建立。这是历史写作的重要任务。

夫里亚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①

这里不准备详细评论近十年来出版的世界史著作。②无论这些著作存在什么样的缺点，与较早期的同类著作相比较，无疑都表现出了显著的进步，其中包括概念和认识能力的深化，毋庸置疑地反映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全球观点。不过，对于所有这些世界史著作在不同程度上所代表的世界史观所作的批评——或至少对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作

① 参见L·S·斯塔夫里亚诺斯：《1500年以前的世界：全球史》(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to 1500. A Global History)，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0年版；《1500年以后的世界—全球史》(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年版；W·H·麦克尼尔：《世界史》(W. H. McNeill, A World History)，纽约，1967年版；丹斯的近著：《统一的世界历史》(Dance, History for a United World，伦敦，1971年版)尽管比较生动，也有启发性，但风格不同，它的叙述从各个角度看不够一贯。当然，还有一些著作是论述某个历史时期的，如D·托姆森的《世界史，1914—1961年》(D. Thomson, World History, 1914—1961)，伦敦，1963年第2版；M·布鲁斯：《现代史的形成1870—1939年》(M. Bruce,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1870—1939)，伦敦，1958年版；E·弗伦策尔：《当代史：1870—1950年》(E. Franzel, 1870—1950. Geschichte unserer Zeit)，慕尼黑，1952年版；D·C·瓦特、F·斯潘塞和N·布朗：《二十世纪世界史》(D. C. Watt, F. Spencer & N. Brow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伦敦，1967年版；S·C·伊斯顿：《1945年以来的世界史》(S. C. Easton, World History since 1945)，旧金山，1968年版。

② 我有意省略不提由出版社自行组织出版的国别史(或地区史)丛书，虽然有些影响很大。这些"世界历史丛书"有时也被称为"合订本"，上文中说到的《鹈鹕世界史》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包括《菲舍尔世界史》(Fischer Weltgeschichte)；A·内文斯和H·M·埃尔曼编：《密执安大学世界近代史》(A. Nevins & H. M. Ehrman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J·H·普卢姆编：《人类社会史》(J. H. Plumbed,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伦敦，1965年版；R·布特鲁什和P·勒梅尔主编：《新克里奥》(R. Boutruche & P.Lemerele eds., Nouvelle Clio)。在我看来，这些丛书尽管有些值得赞许，但是没有体现，也没有想体现完整的世界历史观点，因此对这些丛书本文不再加以讨论。

一番扼要的考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①] 首先，从实际角度出发，这些著作引起了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有人认为，由于这些著作是以间接知识为基础进行编排的，因此落后于当前的研究水平。它们为了把整个世界都囊括进来，结果却把历史降低成为一些泛泛而谈的、含糊不清的结论；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只不过表述了大量未经仔细整理，而且毫无关联的有关事实的知识。[②] 另一方面，在目前已经出版的世界史著作中，除极少例外，仍然是旧式的传统叙事式历史著作，只不过简单地将它们从民族国家的场所搬到世界舞台上来罢了。我在其他著作中曾经指出，如果历史被看作一系列按先后次序发生的事实而不被看作一系列问题的话，[③] 那么事实证明，这样的历史著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类世界史著作不是起促进作用，而是起削弱的作用，不是鼓励学者们去探索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是造成对一系列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幻觉。当然，比较杰出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这种批评，而且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如此，人们一方面都认为世界史是，或者应当是完全不同于国别史的拼凑物的东西，应当用不同的精神和方式来展开研究，但如何建立这样的历史学，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

比实际困难更加重要的也许还是这类世界史所包含的理论问题。实际困难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随着经验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看来是可以克服的，而理论问题却是固有的。首

---

① 参见J·-P·阿居埃的全面评价："什么是当前历史的'大集合'。史学分析论文"，载法文《世界史杂志》，第8卷，第3期(1964年)。

② 正象某位作者说的，要么是"折衷的暗淡无光"，要么是"一元论的伪造"。见《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1968年)，第540页。

③ 巴勒克拉夫：前引书(1955年)，第159页。

先，最紧迫的问题，正如W·T·德巴里所指出的，是“我们缺少一个恰当而又得到一致承认的体系以便把世界文明表述为一个整体。”① 总而言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站在塔里木盆地看待世界的历史与站在泰晤士河畔看待世界历史这样两种立场会大致相同。斯塔夫里亚诺斯声称，他所采用的是“站在月球上观察世界的立场，把我们这个行星看作一个整体。这样的立场与站在伦敦或巴黎的人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同样也不会象站在北京或德里的人那样去观察世界。”② 这种研究方法与其他作者的方法相比虽然会更加客观一些，但是实际上非常明显，这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这种经过掩饰的西方中心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如，很难相信，印度或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赞同E·M·茹可夫提出的那种关于世界史的分期方法，即把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革命指定为“符合逻辑的人类进步道路上”的关键步骤。③ 如果说茹可夫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这似乎说明苏联的世界历史概念甚至比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性质。难怪亚洲的一些历史学家，例如内藤寅次郎、宫崎市定和前田直典等人试图使用其他的世界历史分期方法来取代茹可夫的观点。他们的世界史分期方法要求公正地将东方文化当作一个整体。④ 他们的这些

① 《亚洲文明研究方法》(1961年)，前言第10页。

② 《1500年以前的世界》(1970年)，第3页。

③ “世界历史分期方法”，载《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1卷(1960年)，第79—83页。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分期方法应用于亚洲受到了山本哲郎等人的公然反对。

④ 内藤寅次郎：《中国古代史》，东京，1944年版；宫崎市定：《近代东方》，东京，1950年版。参见布莱布朗克：前引书(1955年)，第16—18，23页。

努力取得了多大成功，这里没有必要加以考虑。这里只需要从这个事实的背景中认识到，站在北京或开罗看待世界史与站在巴黎、芝加哥和莫斯科来看待世界史，那是完全不同的。

斯塔夫里亚诺斯提出，人类的历史“几乎等于”“欧亚文明”史。持这种观点的决不止他一个人。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名代表指出，1500年以后“欧洲的进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① 反对这种观点的亚洲和非洲历史学家却寥若晨星。② E·H·卡尔在他的著作中极其正确地写道，有一种历史观点把达·伽马到列宁之间的四百年作为“世界史的核心，而把其他的一切都看作是这个核心的边缘。非常不幸，这种历史观是一种曲解。”③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史学把整个历史置于中央王国之中，把其他地区视为边缘，这样的历史观显然是一种夜郎自大的主张。不考虑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亚洲的近现代史，这样说也许是对的。然而，不考虑亚洲对西方的影响便无法理解西方的历史，这种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④ 不过，到目前为止，西方历史所得到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亚洲历史的重视。⑤

---

① 斯塔夫里亚诺斯：前引书(1970年)，第5页；参见《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1968年)，第539页。

② 但是，R·伊尔编的《亚欧之间的玻璃幕》(R. Iyer, ed., The Glass Curtain between Asia and Europe，伦敦，1965年版)撰稿人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③ E·H·卡尔：《历史是什么?》，伦敦，1961年版，第146页。

④ M·D·刘易斯："亚洲近代史研究方法问题"，载《亚洲研究》(1963年)，第14页。

⑤ 突出的例外有D·F·拉奇的力作《欧洲成长时期的亚洲》(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第1卷，芝加哥，1965年版；李约瑟的开拓性著作《中国的科学和文明》(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四卷本，剑桥，1954—1971年版；《东方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伦敦，1969年版；《中国和西方的官员和工匠》(Clerks and Craftsman in China and the West)，剑桥，1970年版。

关于世界史的形式以及各部分应占多大比例的问题上，要寻找一个多少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一致看法，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一个同样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组织世界史。既然世界史不仅仅是一系列论文的松散组合，也不是国别史的拼凑，那么，历史学家马上遇到的问题是：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哪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性，而哪些不具有这样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世界历史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个的民族，而是一个个的大洲和文明。① 人们只要回忆一下A·J·托因比试图归纳出一系列的世界文明的作法所遭到的那些批判，就可以看到他的假设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同时又产生了同样多的问题。② 相反，J·L·塔尔蒙认为，衡量世界史的标准在于世界史"应当关注有意义的整体"。③ 然而，这样仍然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即衡量有无意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世界史是为了提供一种内部连贯的、有真实意义的、普遍适用的模式，那么，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史决不可"缺乏前提"。④ 这些前提大致可以划分为唯心主义的前提和唯物主义的前提。唯心主义的前提可以阿克顿勋爵的自由观念为例，他把自由定义为"贯穿一切历史的主

---

① 《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公报》(1968年版)，第526页。

② 参见《近代史杂志》，第12卷(1940年)，第381页，索罗金的文章。K·雅斯贝斯：《历史学的起源和目标》(K.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慕尼黑，1949年版，第321页。关于托因比的介绍，参见下文。

③ 《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公报》(1968年)，第530页。

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英文版)，伦敦，1970年版，第47页。

线。"①这种前提还可以克里斯托夫·道森、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等当代基督教历史学家的观点为例。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的统一因素是由上帝和神明造就的。②不过，这种观点更多地出现在今天的神学家和宗教思想家的著作中，③而不是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在专业历史学家中，当前占绝对优势的趋势是采取比较广泛的唯物主义立场，也就是说，他们的中心论题是关于人类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威廉·麦克尼尔便持有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农业、战争以及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显然)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J·H·普卢姆则明白无误地声称："人类的物质进步"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它既使这样的进步为人们所认识，同时也为人类的希望提供了某些薄弱的根据。"④

对世界史所作的唯物主义解释之所以盛行起来，其中一

① G·P·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波士顿，1959年第2版，第360页。

② C·道森：《进步与宗教》(C. Dawson, Progress and Religion)，伦敦，1929年版；《宗教与文化》(Religion and Culture)，1948年版；J·J·马洛伊编：《世界历史的动力》(J. J. Mulloy, The Dynamics of World History)，伦敦，1957年版；H·巴特菲尔德：《基督教与历史学》(H.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伦敦，1949年版。

③ 即指马里顿：《论历史哲学》(Maritain,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纽约，1959年版；R·K·布尔特曼：《历史学与末世学》(R. K. Bultmann, History and Eschatology)，爱丁堡，1957年版；尼布尔：《人性和人类的命运》(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两卷本，纽约，1941年版；《信仰和历史学》(Faith and History)，纽约，1949年版；K·勒维特：《历史的含义》(K. Löwith, Meaning in History)，芝加哥，1949年版；雅斯贝斯：前引书(1949年)。

④ 普卢姆："历史学家的困境"，载他的《人文科学的危机》(Plumb ed.,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1964年版，第32页。又见普卢姆编的《人类社会历史丛书》各卷前言。

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影响。此外，也许还由于考古学和史前史研究的影响，这两门学科始终不渝地坚持人类的制造物所具有的重要性，它是人类历史知识的主要证据。最后，唯物主义世界史观的盛行，还由于当前历史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史和经济史而不放在政治史上。[①]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充分的事实证明了它的内在潜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不仅用"真实的前提"取代了"武断的前提"，[②] 而且还突出了人类历史中的一致性。按照正藏翁平的说法，以政治事件为基础的综合的世界史所关注的内容，倾向于"将被研究的各个文化区别开来的那些特征，"[③] 与此同时，一种以人类不断增强对周围环境的控制为中心主题的解释，不仅提出了一种对整个人类都适用的有机的原则，而且建立了能够衡量进步和发展方向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世界史会变得没有意义。它还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标准，让他们从全球的角度来选择哪些事件是重要的，哪些事件是不重要的，从而能够进行选择，决定哪些事实和事件应当写入世界史，哪些不应当写入。尤其重要的是，这种解释将历史研究的侧重点从民族和地方一级的事件——即从只对某个民族或种族群体发生影响的事件，转向研究更广泛的运动，例如对整个人类发生影响的新石器

① V·G·蔡尔德的论著，尤其是他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V. G.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哈孟德沃思，1942年版)明显表现出考古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英文版)，第42页。

③ 正藏翁平："建设日本的人类文化比较和统一的历史学"，载《东西方交通史国际讨论会》，东京，1959年版，第197页。

时代农业革命。又例如，卡尔·雅斯贝斯曾经提出过关于“轴心时期”的概念。他认为在“轴心时期”，世界上所有重大的文明中，人类生活基本条件和思想都在同一时间内发生了决定性的历史性突破。①

但是，这种作为世界史结构基础的假设并不象人们有时所设想的那样明确。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无论在什么地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对此看来没有人会提出疑问。但是，正象波多·韦特霍夫所指出的，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类作为社会和历史的存在是否也是基本上相同的呢？② 其次，恰恰是这种认为世界历史是有目的、有方向和有目标的思想具有特殊的西方传统色彩。众所周知，世界上许多重要文明都抱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到历史之外去寻找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目的。③至少，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说的“必须承认和重视人类历史基本上从一开始就具有统一性”这句话是否正确也是值得怀疑的。④人类群体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开始就是在需求的驱使下为生存的物质条件进行斗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是，或者至少可以合理地重现为单一的唯一进程，却根据不足。许多年前，特勒尔奇曾经指出，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存在着接触点，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以为人类的各种历史被实际的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他们的历史成为服从于唯一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

① 雅斯贝斯：前引书(1949年)，第19—20页。

② B·韦特霍夫：《旧中国历史学的特点》(B. Wiethoff, Grundzüge der älteren chinesischen Geschichte)，达姆施塔特，1971年版，第19页。

③ A·G·威杰里：《从孔子到托因比的历史解释》(A. G. Widgery,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from Confucius to Toynbee)，伦敦，1961年版。

④ 《1500年以前的世界》(1970年)，第4页。

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① 马克思自己也认为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只不过是逐渐形成的，而且显然是在相当晚的阶段上形成的，是"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劳动分工"的结果。正是这一点才使各种历史——即各个民族各自的历史——汇成了世界的历史。②

但是，如果我们姑且承认历史只是逐渐地形成了单一的历史进程，那么，又产生了新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茹可夫等人要人们注意的，也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个难题，也就是说，即便通过生产方式的若干经济阶段取得了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并不必然"以"直接的方式"出现。③ 至少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历史学家象大多数欧美历史学家一样，回到了使用欧洲通常使用的历史分期方法，即按"古代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的体系来归纳和排列历史事实。④ 但是，这样的体系是否有充分的根据，甚至在欧洲都存在激烈的争议。⑤ 如果把这个体系应用于亚洲和非洲的历史研究，出现的问题更大。事实上，亚洲大多数称职的历史学家已经抛弃了这种历史分期体系。⑥

这种观点的鼓吹者有时说，大量的证据证明了世界历史

① 《特勒尔奇全集》(Troeltsch, Gesammelte Schriften)，第3卷，蒂宾根，1920年版，第609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8页。马克思指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的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末，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

③ "世界历史的分期"，载《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1卷(1960年)，第76页。

④ 同上，第84页。

⑤ 我曾多次对这种分期方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见前引书(1955年)，第57—61页。

⑥ E·G·布莱布朗克：前引书(1955年)，第16—17页。

是“直线式的、普遍统一的”观点，“也就是说，甚至在远古时代，极为遥远的距离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之大足以把人类的历史构成一个单一的整体，或者松散地连结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但实际情况决非如此明确。这种普遍的主张的倡导者中最著名的是W·H·麦克尼尔。①但是，甚至连麦克尼尔在他的著作中一开始就不得不承认，据说首先开始于中东，然后蔓延到欧洲、中国、印度以及非洲部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可能并没有播化到整个世界，“美洲、南亚、西非的农业很可能有自己独立的起源。”②换句话说，根据现有的证据，麦克尼尔所谓的“认为人类过去的历史是彼此独立和多元化的观点”并没有被推翻。③例如，谁也不会否认中华民族与地中海的民族之间从远古时代以来就存在着联系和相互影响，尤其是李约瑟结论性地证明了这种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意义。④ 然而，这些联系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仅仅是一个特例，而且中国和地中海地区在若干个世纪里经历的道路实际上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同的。如果我们硬要将它们纳

① 他给巴拉德编的《历史学研究和教学新动向》(1970年)一书的撰文，第24页。

② 《世界历史》(1967年)，第1页。麦克尼尔补充说，对此“还不能作出定论”。显然，麦克尼尔以自己的推论为根据克服了偏见。他叙述过农业的“播化和引进”，并以此作为他的整个论述的基础，这同样是事实。但是，他也承认这是“无法确定的”，因此，“现代学者无法将它重现”。也许这里需要补充说明我是同意麦克尼尔这个观点的。不过，正象麦克尼尔所说的，如果证据不足以得出这个结论，那么，这个判断只不过是试探性的，还不能成为解释整个世界历史的基础，这确实也是事实。

③ 实际上，史前史学家中当前存在着对文明起源播化论的怀疑和否定的倾向。参见G·E·丹尼尔：《最早的文明》(G. E.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s)，伦敦，1968年版。

④ 我当然要提到他的四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这是战后历史学界的杰出成就之一。

入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这样来重现它们的历史必然会严重地违背历史真实性。

对世界历史所作的“播化型”解释——即把文化和文化的新事物从一个或多个中心向外播化看作世界历史的统一线索——遭到的另一个主要反驳意见是，认为这种观点具有过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F·M·波威克曾经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这种研究方式带来的危险就是它内部固有的倾向，即“按照这样的进程来排列过去的事情，那么，凡是最容易被现在利用的事情”，或者看起来同现在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便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① 特别是，这种观点把历史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运动，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才到达了当代的世界。由于当代世界基本上是由西方形成的，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如果说是下意识的话，就是西方种族中心论。它围绕着一个中心信念，即(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和北美在本世纪创立的那种社会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一直想要达到的“目标”。然而，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由西方形成和构筑的今天的“第一世界”也许只是暂时的，不会永恒地存在，就象希腊世界 (oikoumene) 或中国儒家历史学家所设想的作为历史顶峰的中央王国一样。任何把“西方的兴起”作为中心内容的世界历史观——就象 W·H·麦克尼尔所提出的——决不会被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视为定论。②

这些评论的目的是试图说明，今天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历

① M·波威克：《中世纪基督教徒的生活》(M. Powicke, The Christian Life in the Middle Ages)，牛津，1935年，前言第5页。

② 参见 W·H·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W.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芝加哥，1963年版。这里并不否认这部杰出著作的启发意义。

史学家开始对最近一段时期准备撰写世界历史所依据的思想观点提出疑问的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世界历史所关注的是各种文明的接触点和相互关系，并不要求综合性地重述整个的过去，而是研究人类社会在不同环境和不同文明中的发展过程。他们不仅认为，在当前对某些阶段和某些问题的深入考察工作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想把已知的整个历史系统化，并且将已知的历史过程按时间先后次序排列起来，还为时过早。他们还认为，"线性式的"世界历史观念本身就是非常愚蠢，漏洞百出的，是对历史的歪曲。拉格哈旺·伊尔呼吁历史学家"抛弃一元化的文明观"，并且"接受不可缺少的多元化的文明观"。[①] 萨蒂什·昌德拉竭力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无论这个中心是指华盛顿、莫斯科，还是指北京，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来取代它。[②]

这就是说，世界历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系列按时间先后出现的文明——这些文明按阿克顿勋爵的著名论断来说，就是"按照它们对人类共同财富所作贡献的时间先后和程度大小来排列其顺序"，[③] 而是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R·F·韦尔曾经写道，当人们用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过去时，"历史学便成为对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不是对事实的研究：即研究文化的、社会的和商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外交的和宗教的相互关系。"[④]

---

① R·伊尔编：《亚洲与欧洲之间的玻璃幕》，伦敦，1965年版，第19页。

② 萨蒂什·昌德拉："关于历史学分散化的一点说明"（打字稿，第4，12，19页）。这是昌德拉教授专门为本书写作准备的论文。借此机会，我对他提出的极有价值的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

③ 阿克顿勋爵：《近代史讲稿》（1906年），第317页。

④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历史学的新道路》（1966年），第302页，"新的开端：亚洲"。

E·赫尔泽尔曾提出，理解世界历史的必要前提条件并不是囊括整个已知历史的"宏伟博大的观念"，而是专门的、具体的探索，"注重于建立各大洲之间的历史联系，无论这些联系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①

这个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由于它是从不同于其他类型历史学的角度上楔入过去，因此，它同各种类型的历史学所勾划的线条发生了交叉。它提出了新的问题，例如有关思想观念，发明创造以及产品在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过程等问题。这个事实意味着不仅需要新的研究态度和方式，而且需要运用一系列资料和知识。总的说来，这些资料和知识正是只关心一个地区或只注意一个大洲的历史学家所忽视的。②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这种世界历史与其说是关心时代的发展及历史的目标和意义，——非西方文化基本上不关心这些西方所关心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关心各个地方的人类所面临的不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反应。对于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才是世界历史的本质。我们在后面各节的讨论中将会看到，正是这些内容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当代世界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人类制度、习俗、思

---

① E·赫尔泽尔：《观念和意识形态》(E. Hölzle, Idee und Ideologie)，慕尼黑，1969年版，第81页。

② 当然有些例外，特别是出版了大量著作论述伊斯兰教的中介作用，尤其是阿拉伯人将希腊的思想和科学传播到西方。参见G·F·哈德森：《1800年以前欧洲与中国的关系》(F.Hudson, Europe and China. Their Relations to 1800)，伦敦，1931年版。

想和观念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放弃了对线性式发展的研究以及对所谓从远古至今始终贯穿于整个历史的线索的研究。

5.3 历史哲学和"元历史学"

作为从人类起源到今天的全部过程的世界历史，与伏尔泰和黑格尔所使用的那个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这个术语之间，差别是很小的，而且没有固定的界线。① 我们已经看到，任何试图解释世界历史进程和意义的努力包含着某种判断标准，或对待过去的哲学观点。马克思就曾经把共产主义描述为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② 尽管这样，只需要比较一下阿诺德·托因比的《历史研究》与当代典型的世界历史著作（例如L·S·斯塔夫里亚诺斯的《1500年以前的世界》）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在态度和方法上有相当深远的差别。历史哲学

---

① 或许几乎无需说明，本节不涉及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认识的性质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被说成"非常重要"，并同"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立。实际上，哲学家比历史学家更关心这些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中由保罗·里科尔撰写的《哲学》部分，在前两章讨论了这些问题，尤其是第三章《人与社会现实》中有关"历史科学的认识论"的一些段落。大多数工具书简要（但不充分）地解释了"思辨的"历史哲学。据我所知，近年来有关这些问题的专著是非常丰富的。可以参见H·迈耶霍夫编：《当代历史哲学》(H. Meyerhoff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加登城，1959年版，主要阅读第四章(前面各章是关于方法论的论述)；P·巴格比：《文化与历史》(P. Bagby, Culture and History)，伦敦，1958年版；E·卡勒：《历史学的含义》(E. Kahler, The Meaning of History)，纽约，1965年版；O·F·安德尔编：《文明的问题》(O. F. Anderle,ed., Problems of Civilizations)，海牙，1964年版；C·道森：前引书(1957年)；B·马兹利什：前引书(1966年)。又见下文提到的关于托因比历史哲学的有关文献。

② 马克思：《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伦敦，1970年英文版，第135页。

克思主义者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不得不依赖的那些历史知识是相当粗浅的，从他在1848年以前写的早期著作开始一直到他的晚年，始終不渝地反复强调，当他的原理与历史证据相抵触时，“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他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应当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原理（历史证据经过一番引证之后可以支持任何一种原理），而是去检验原理，而且在必要时修改原理。甚至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也长期不断地被接受为历史哲学，这不仅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潜力，而且证明马克思主义成功地经受了检验。不过，同样明显的是，倘若马克思使用今天可到手的全部证据来写作的话，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形成他的思想。自从马克思时代以来，不仅历史知识的数量增长了一百多倍，就连社会学的分析能力和心理学的认识能力也成百倍地增长了。充分的事实说明，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情况都是一样，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历史哲学最终都必须认识到这些事实。与此同时，这里只需再次指出E·M·茹可夫说过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只阐述了——而且确实也只打算阐述——“一般趋势”，“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光满足于一个总的模式”。① 这决不是在批判马克思——更不是对马克思试图揭示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和发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及其规律所作的努力抱有怀疑，这只不过是说有必要认识到需要把历史哲学推进到更完美更高级的阶段——马克思本人在推动社会科学的进步中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是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的进步所要求的。

① “世界历史的分期方法”，载《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公报》（1960年），第1卷，第82页。

来仍然不可能出现那样的著作。①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强大的思想力量，在整个亚洲也是十分强大的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也同样很大。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伊赛亚·伯林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胆量最大，而且最充满智慧。"②

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③他充分地认识到——也许比后来那些他与之绝交的马

① 写作方法最接近的也许是沃格林的《秩序和历史》(E. Voegelin, Order and History)，前三卷已于1956—1957年出版，第4卷("基督教的全球时代")出版于1975年。篇幅较小的有D·D·科拉尔的《欧洲的洗劫》(Diez del Corral, El rapto de Europa)，马德里，1954年版；《新世界和旧世界》(Del Nuevo al Viejo Mundo)，马德里，1963年版。

② I·伯林：《历史的必然性》(I.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伦敦，1954年版。H·巴特菲尔德同样热烈地赞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时，他和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一样抨击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倾向。见H·巴特菲尔德：《历史和人际关系》(H.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伦敦，1951年版，第66—100页。

③ 不用说，讨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是本书的任务，在这里开列这方面的文献也是不恰当的。我只是想在这里尽可能实事求是地简略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所产生的影响。我希望，这样的做法不至于陷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争论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去。

家更加关心的是理论而不是事实，他们使用以事实构成的基础结构来勾划或说明他们对人性及其发展的意义所抱的观点，但往往不按照事实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相反，世界历史的作者们则把理论概念（例如文化的传播生产方式的变化等等）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当作纽带。这些纽带在他们看来最圆满地说明和阐述了他们试图联系起来的那一系列事件。

历史哲学——有时亦称作"元历史学"①——现在已经显然不受历史学家（神学家除外）的宠爱。如果说在当代历史研究的趋势中确实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的话，那就是历史学家摈弃了历史哲学。他们认为历史哲学同他们的研究工作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毫无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对这个方向影响最大的推动力并不是来自历史学家，而是产生于克勒贝尔和索罗金等社会科学家。② 据我所知，自从 1961 年托因比完成《历史研究》这部著作以后，在提炼人类发展全过程的本质和意义方面，还没有哪一部大部头著作可与这部著作媲美。迄今为止的发展趋势允许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即在不远的将

---

① 迈耶霍夫：前引书(1955 年)，第 292 页。按 A·布洛克的说法，"元历史学"(meta-history)这个术语是 I·伯林提出的。不过，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术语的来源。关于这个术语的讨论，参见 C·道森：前引书(1957 年)，第 287—293 页和托因比的《历史研究》，第 12 卷(1961年)，第 227—229 页。

② 参见 A·L·克勒贝尔：《文化成长的结构》(A. L. Kroeber, 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伯克利，1944 年版；《文化的本质》(The Nature of Culture)，芝加哥，1952 年版；P·A·索罗金：《社会和文化的动力》(P. A. Sorokin,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一卷本，波士顿，1957 年修订版；F·R·考埃尔：《历史、文明与文化。索罗金的历史和社会哲学导论》(F. R. Cowell, History,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Philosophy of P. A. Sorokin)，伦敦，1952 年版。

上面几句话就足以说明作为历史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及其持久的力量。我们如果回过头去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建立历史哲学中唯一独创性（考虑到是以施本格勒的理论为基础，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半创造性）的尝试，那就更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阿诺德·托因比毕其一生完成的伟大著作《历史研究》在1945年至1955年之间曾风靡一时。①今天，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这部著作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逝。有位批评家甚至大胆地提出这样的看法，认为这部著作"在二、三十年以后只不过是一件古玩"。②回想起来，托因比的著作之所以在西方得享盛名，看来是因为它反映了西方社会中某一部分人在重大历史时期的忧虑和不安（这部著作中论述"西方文明展望"的那一卷于1954年出版看来决非巧合），产生这部著作的形势已经消失，它的影响也随之消逝。③

历史学家一开始就是从反面来接受托因比的这部著作的。由于他们对这部书的批评只集中在史实的错误和遗漏上，结果偏离了中心问题。④托因比本人在这部著作的开始就

---

① A·J·托因比：《历史研究》，十二卷本，伦敦，1934—1961年版。

② 马兹利什：前引书（1966年），第363页。

③ 值得指出的是，1934—1939年之间出版的托因比的《历史研究》前六卷并没有在学术界以外引起注意。1945年以后这部著作广为流行，其原因不仅是世界形势的变化，而且是由于1946年D·C·萨默维尔的杰出的《简写本》（两卷本）第1卷的问世。

④ 已有大量的文献问世（其中大部分由托因比本人开列于第12卷的第680—690页），包括两部主要论文集，M·F·A·蒙塔古编：《托因比和历史》（M.F. A. Montagu ed., Toynbee and History），波士顿，1956年版；E·T·加根编：《托因比历史学的意图》（E.T. Gargan, The Intent of Toynbee's History），芝加哥，1961年版；O·F·安德列的分析文章："托因比批判"（1958年）。

明确指出，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中长途跋涉的专家来说，难道还有比对他们正好“穿越自己的那块小小的领地”时发现的错误进行批判更为容易的事吗？① 对托因比的真正批评还在于指责他从根本上缺乏概念的明确性，从而使他的著作失去了启迪价值。一位批评者写道：“一个如此宏大的综合结构体系竟然置于如此纤细的理论基础之上，真是闻所未闻。”② 他使用的研究技术是文学修辞的分析，而不是严谨的科学分析。当然，这决不是否定托因比深邃的认识能力和直觉，相反，正是这部著作对历史学界的“职业抄写员和法利赛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正是因为他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进行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③ 托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这项成就应当得到大家的承认。但是，如果要从历史哲学这个词的准确意义上来说，这部著作对历史哲学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相反，托因比“作出了英雄式的——虽然是盲目的——努力，企图建立世界史，并且用形而上学的拼缀物将它掩盖起来。”④ 用 M·M·波斯坦的话来说，“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并不是新的历史哲学，而是经过了乔装打扮并且蒙上一层面纱的各式各样的陈旧的哲学。它与

① 《历史研究》，第 1 卷，第 4 页。

② 胡克语，托因比引用于《历史研究》，第 12 卷，第 645 页。参见马兹利什：前引书(1966 年)，第 372 页。

③ A·J·托因比：《世界与西方》(A. J. Toynbee, The World and the West)，伦敦，1953 年版。

④ 马兹利什：前引书(1966 年)，第 375 页。

马克思相比较——如果可以作这样比较的话——不会更加光彩夺目。"①

巴格比曾经写道，"托因比严重地破坏了对文明的比较研究，他用极其荒唐和缺乏科学性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导致了人们对这整个研究工作的不信任感。"②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如果在当前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们已经同元历史学背道而驰，那么，主要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也不是因为他们对波普尔等人对这种历史哲学是否可信问题从理论上表示怀疑，③ 而是因为他们眼前最关心的问题已经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从当前还有待于进行整理和消化的历史知识大幅度增长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与托因比的主张相反——眼前想全面行动起来去解开人类历史之谜的时机尚未成熟。在现阶段，普遍认为有两项前提是必要的。第一是进一步促进和建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也是当前历史学界最明显的趋势。第二是要比现在更充分和更深刻地认识亚洲和非洲的历史——的确，需要把欧洲之外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认识。托因比坦率地承认，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希腊文明模式的基础上。在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正是这一点造

---

① M·M·波斯坦：《事实与关联。论历史方法》(M. M. Postan, Fact and Relevance. Essays on Historical Method)，剑桥，1971年版，第149页。

② 巴格比：前引书(1958年)，第181页。

③ K·R·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K.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伦敦，1944—1945年，1957年版；几乎作了同样恶毒攻击的书有：I·伯林：《历史的必然性》；R·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R. Aron,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巴黎，1948年修订版；M·J·奥克肖特：《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M. J.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伦敦，1962年版。必须指出，这些人都不是历史学家，而且是无的放矢。关于对奥克肖特的反理性主义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讨论，见波斯坦：前引书(1971年)，第1—14页。

成了极为有害的限制。充分的事实证明，任何试图进一步建立历史哲学的努力都必须建立在更为广泛和更为普遍的基础上。不过，基本概念的分类同样是重要的，诸如文明、阶级等术语以及托因比自己提出的"挑战和反应"等这样一些概念的分类。概念的分类只有借助于对具体的情况所作的科学分析，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更加严谨的研究才可能办到。当这样严谨的研究达到一定的水平，有了比较充分的事实资料为依据，概念结构更加臻于准确和成熟时，我们才有可能期望历史学家们再次着手去完成发现和分析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宏观社会发展规律和模式的任务，至于这个任务的完成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下还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下进行的，也许无关紧要。

我在其他地方曾经写道，托因比提出的那些问题"仍然是有启发性的，也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些问题"反映了我们当前无法回避的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① 历史学家现在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知识，这样一来，要形成综合的历史观，"从技术角度上看是无法实现的"，或者说，任何试图发现其根本意义的努力必将归于失败。这种论点一次又一次地提了出来，但是，（正象托因比正确主张的那样）这是一种失败主义。② 当前对历史哲学的这种冷淡状态将会保持下去，历史学家们将会停止探索关于过去的建设性观点，或者说，历史学家们将会继续满足于可以推测连马克思本人也不会赞同的那种天真幼稚的马克思主义。以上这样的状况是不难想象的。波威克曾经指

① 蒙塔古：前引书（1956 年），第 121 页。

② 正如他所说的，这意味着"过犹不及"。见《历史研究》，第 12 卷，第 648 页。

出，对创造性的历史解释的渴望之情过于强烈，以致这种解释无法产生。① 但是，根据当前的迹象，我们也可以推测到未来的历史学撰写者对那种宏大的、包罗万象的结构会抱有戒心，他们宁可从分析各个概念和问题开始，自下而上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相信通过发动一场勇猛的正面进攻，便可以解决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这种信念看来已经过时，并且在更狭窄和更切实可行的研究领域中被更有耐心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所取代。这种方法将涉及到给社会集团和社会结构下定义并且进行分类，涉及到估计和衡量社会的格局在各个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涉及到尽可能广泛地对各种社会中所有的人类都面临着的那些永久性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包括由饥饿和性欲导致的基本生理冲动，为了取得生活资料而同悭吝的环境进行的斗争，现有的社会模式在应付新出现的状况下的不足，权力和腐败的问题，恃强凌弱的问题，以及人们因饥饿和压迫而感到绝望，从而不得不作出的铤而走险的反应，等等。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携手合作，而且都能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样的研究若要取得成果，必须有一个基本上依赖于比较研究方法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讨论这种研究方法。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还应当补充一点。公正地说，这种方法应当归功于托因比，即使这同他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全相同。托因比象施本格勒一样，对于把历史进程看作一个单独的进步过程的"线性"历史观表示怀疑，用"周期论"的历史观来取而代之。他的

① 波威克：前引书(1955年)，第174页。

这种周期论认为，一系列的文明经历了多多少少大致相同的成长和衰亡阶段。正因为这样，托因比拓宽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他们看到了使用比较方法的潜在前景。当然，我们不需要也用托因比（或施本格勒）的周期历史观去看待文明的比较研究，或对各个文明内的具体机构和概念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提供了只有傻瓜才会抛弃的一条理解途径。实际上，这为解决世界历史中的问题也为探索历史的意义和规律提供了当前普遍适用的方法，而且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完成了一些最富有推动意义的工作，即使这样的推动有时仅仅是批判和抵制，而不是赞许和承认。

5.4 比较史学

比较史学可以定义为按照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的规范和范畴——而不是按照国家的划分和人为的历史分期——对过去历史加以概括，并进行研究。①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对国别史和通常使用的历史分期方法都不满意，他们对于构成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的因果——遗传论则更加不满。将过去的事实排列和组织起来的任何体系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思想的构造物，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对常规叙事史的成果和启发潜力感到不满，同时也由于社会科学造成的影响，历史学家现在越来越关注超越国界和时间先后次序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的模式。例如，倘

① 本节的论述使用布朗德斯大学的比较史学教学大纲，我曾荣幸地在该校教授过这门课程。

若我们把十二世纪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历史都置于封建社会的范畴内，它们有许多问题就是共同的。从1400年到1750年之间，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形式都是君主专制、贵族制和官僚制这三者之间各种不同关系的产物。在不同的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最终结局也许会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无论在英国、法国、西班牙，还是在德国，政府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都是相同的。又譬如，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一切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工业化社会和城市化社会的需要，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在以农业为主的不发达社会与城市化的工业社会之间，而不在法国或德国那样一些国家之间，也不在现代、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之间。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了比较史学的某些要素，说明了比较史学近几年来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也说明了比较史学试图回答哪一类问题。① 象"历史哲学"一样，比较史学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发生"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发生"的问题。它所提出的有关过去的问题是为了用来揭示(诸如)政府的性质、社会组织的形式、经济变化的原因、思想创造性的渊源等等。比较史学同"元历史学"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对研究专题提出了准确和明确的问题，并且深入追究下去。比较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我们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历史范围内确定：

① 关于比较史学的一般论述，参见T·席德尔："历史科学的前景和比较方法"，载《历史杂志》，第200卷(1965年)；R·维特拉姆：《历史学的兴趣》(1958年)；D·格哈德：《比较历史思考中的旧世界和新世界》(D. Gerhard, Alte and Neue Welt in Verg Leichender Geschichtsbetrachtung)，哥廷根，1962年版，第89—107页；B·霍泽利兹："论比较史学"，载《世界政治》，第9卷(1957年)。

家庭、财产、司法习惯、阶级划分等这些制度和机构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间内实际上是指什么，它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实际职能，否则，就家庭、财产、司法习惯、阶级划分这些问题形成广义的结论就为时过早或甚至弄巧成拙。[①] 从这个角度来看，比较史学——当代历史学家比较愿意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当代对有关历史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回答。比较史学不象写作世界史的历史学家那样在连续叙述人类的发展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也不象历史哲学家那样在全面的总体模式中寻找历史的意义，而是从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在撞击着人类的那些永恒的问题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为此，比较史学按照某种规范和范畴将过去组织起来，面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则用这些规范和范畴去探索现在。比较史学的这些做法是我们前面详细讨论过的那些历史研究发展的结晶。

当代历史学家之所以非常重视比较史学，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布洛赫的教导和他做出的榜样。1928年，他写了一篇对欧洲社会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纲领性论文。他的那部关于论述封建社会的名著也为后来的比较史学提供了楷模。[②] 同一时期与马克·布洛赫一样活跃，但影响不及他那么广泛的另一名历史学家是奥托·欣策。我在1930

---

① 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国际贸易理论以地区间资本和劳力的运动为基础推导出重要的结论。但是，波斯坦指出[前引书(1971年)，第28页]，这个理论并"没有探索和说明资本和劳力流动的社会过程"，那末，我们所说的国际贸易理论究竟是什么呢？

② 参见M·布洛赫的"建立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载《综合历史杂志》，第46卷，第28—29期(1928年)和《封建社会》(M. Bloch, La société féodale)，两卷本，巴黎，1939—1940年版。

年曾拜读过他那部刚刚出版的有关西欧代议制类型比较的著作，当时，就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① 当代比较史学与早期刚刚处于萌芽时期的比较史学有两个明显的根本差别。一个是当代比较史学在有意识地借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上的自觉程度高得多，同时，那些概念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把比较方法从欧洲扩大到欧洲以外的广大世界中去。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几乎是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学家全部逼迫到比较史学的方向上去，正如M·M·波斯坦所说的，其原因是“从单个的具体事件中不可能得出社会学的结论”；“如果要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就必须以比较方法……为基础”。② 不过，倘若要比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还必须超越一个个单独的地理区域或文化群体。马克·布洛赫在他的关于封建社会的研究中只满足于对西欧以外的状况作简短的叙述(他甚至从未把眼光扩展到观察东欧的封建社会)。③ 这样他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封建社会是欧洲特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呢，还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态？相反，欣策坚持认为代议制的等级会议制度是欧洲的特殊现象，是欧洲独特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过，我们依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观点所依据的比较性资料是

① O·欣策："西方等级身份法的类型"，载《历史杂志》，第141卷(1930年)和"代议制的世界历史前提"，载《历史杂志》，第118卷(1911年)。

② 波斯坦：前引书(1971年)，第20页。

③ 布洛赫的《封建社会》(1939—1940年)第2卷第249—252页以"略论比较史学"为题，简要地谈及日本。R·库尔朋编的《历史上的封建主义》(R. Coulborn ed.,Feudalism in History,普林斯顿,1956年版)试图扩大视野，但是，霍泽利兹在"论比较史学"(1957年)一文中立足于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对该书作了批判。

否(或者说在当时是否)具有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从更加长期的观点来看，当前亚洲和非洲历史学兴起以及对于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所抱的兴趣更为广泛，由此产生的最重大的成果是开辟了新的前景，第一次为开展真正的全世界范围的比较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种世界性的比较史学又为理解反复出现的社会发展进程的模式，为理解历史上的重大飞跃和连续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样明显的是，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带来了本身的问题和危险。关于这些问题和危险已经作了充分的讨论，这里只需举出两三个例子来说明。第一，M·M·波斯坦强调说，比较史学的目的不是要验证理论观点（例如经济理论的某些观点)是否正确，“理由很简单，从这种方式得出来的大多数结论是无法用事实验证的。”① 第二，我们必须对松散的类比有所认识。② 遗憾的是，这种松散的类比实际上仍然是历史学家最常用的共同方法。这种方法贯穿在托因比的整个著作中，然而缺乏科学的价值和启迪的价值，在严肃的比较史学中没有它的地位。③ 第三，正如我近来指出的，所有的比较方法都必须遵循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则，就是只有在可比较事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比较。④ 最后还有一点，个别化和

① 波斯坦：前引书(1971年)，第26页。波斯坦补充道：“其中一些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观点并不需要加以证实，它们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即使无法用事实来证明”。这种看法当然也是正确的。

② 维特拉姆：前引书(1958年)，第50—53页；席德尔：前引书(1965年)，第535—536页。

③ 关于“整体论类比的谬误”及其在托因比思想中的地位，参见D·H·费舍尔：《历史学家的谬误。历史思想逻辑导论》，(D. H.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纽约，1970年版，第255页。

④ 《政治科学季刊》，第86卷(1971年)，第154页。

概念化必定是相辅相成，共同存在的。或者正象R·维特拉姆所说的那样，只有把那些在某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助于形成个别特征的全部因素都一一加以考虑之后，我们才有把握着手研究在其他明显类似的历史条件下的共同个性是什么。①

大致说来，历史学家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比较史学的。一方面，他们从历史结构及其组成成份的角度来对待比较史学，另一方面，他们把比较史学当作一种手段，试图通过这个手段确定某些事件——或反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或具有因果关系的一系列事件——之间的统一性。后一种方法是近来比较常用的方法，但现在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种方法为施本格勒和托因比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他们使用这种方法去寻找或追溯文明兴衰的周期和典型的阶段。对他们使用的方法——尤其是生物类比法——产生怀疑很可能就是促成目前这种方法失宠的原因。但是，这种方法可以运用于范围比较有限的一些问题上。克兰·布林顿的有名著作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比较了(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等)四次革命的典型事例，力图确立革命必须经过的几个规范化的阶段。②另一个例子是W·W·罗斯托新近出版的名气更大的著作。他试图通过比较方法来建立历史进程的阶段。罗斯托在这部著作中研究了正在激烈讨论中的经济增长问题以及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起飞”的前提条件。③

① 维特拉姆：前引书(1958年)，第50页。

② C·布林顿：«革命剖析» (C.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纽约，1957年修订版。

③ W·W·罗斯托：«经济增长过程»(W. W. Rostow,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纽约，1953年版；«经济增长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剑桥，1960年版；“从经济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载«经济学杂志»，第66卷(1956年)。

这里不准备对这些著作进行详细的评论，但是有一、两个带普遍性的问题需要指出。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罗斯托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英国和美国的经历中得出结论）和克兰·布林顿的著作，基础都十分狭窄。布林顿著作中的例子只局限在欧洲范围内，没有考虑到第三世界的革命（从那本书的出版时间上看，这也许是不奇怪的）。事实证明，布林顿所依据的四次革命的例子是否具备了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从而能够得出（例如）"热月政变的反动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呢，这显然是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① 虽然我们可以假设这种论点的正确性可以从其他地区和其他时间的革命历史事实的研究中得到验证。就罗斯托的情况而言，这样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进行，研究结果否定了他的论点，也就是说，仅仅通过考察英国和美国的经历而建立起来的理论经受不住以其他国家——如俄国、德国和日本的经历为依据的批判。② 不过，真正反对这种类型的比较史学的各种观点之间是有差别的。这些观点提出的最根本问题是，这类比较史学的方法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各个有关社会之间，例如 1640 年的英国与 1789 年的法国之间，或 1789 年的法国与 1917 年的俄国之间在基本结构方面的差别。反对罗斯托著作的观点认为，英国或美国经济增长或起飞的各个阶段的模式，不能适用于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完全不同的那些国家，例如印度。罗斯托的结论之

① 布林顿：前引书（1957 年），第 215 页。

② J·马尔祖斯基：《计量史学导论》(J. Marczewski,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quantitative)，日内瓦，1965 年版，第 43 页。1960年，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会议充分讨论了罗斯托提出的论点，结果出版了由罗斯托本人编的《从经济起飞到持续增长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 Growth)，伦敦，1963 年版。又见《第一届经济史国际会议会刊》第一部分"工业化——1700 年以来经济增长中的要素"。

所以会出现错误，正是因为他简单地提出以西方式的现代工业社会为衡量标准，而不使用比较方法逐个地分析使西方各工业社会具有独特性的结构特征〔后来他又称之为"倾向"(propensities)〕。①

这些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抛弃了这类比较史学〔有时亦称过程比较方法(Verlaufsvergleich)〕并且转向采用基础更加广泛的结构比较方法(Strukturvergleich)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说试图建立诸如革命的类型学的这类比较史学，一定要被看成错误的东西，而是说，他们现在运用社会结构比较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近几年来，最吸引人们注意的历史研究专题莫过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和历史的研究。不过，只要他们试图把法西斯主义定义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并建立起一种类比学，那么，他们的研究就不能取得非常圆满的成果。②

① 格哈德：前引书(1962年)，第94—95页；波斯坦：前引书(1971年)，第88页。

② 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论著已经大量出版，而且有增无已。在比较研究方面，也正在展开，见F·诺尔特：《当代法西斯主义》(F. Nolte, Der Faschismus in seiner Epoche)，慕尼黑，1963年版；《法西斯运动》(Die faschistischen Bewegungen)，慕尼黑，1966年版。前一本著作公认为过多地讨论了法西斯主义的知识起源和思想领域。又见E·韦贝尔《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E. Weber, Varieties of Fascism)，普林斯顿，1964年版；J·韦斯：《法西斯传统》(J. Weiss, The Fascist Tradition)，纽约，1967年版。此后的有关著作包括F·L·卡斯顿：《法西斯的兴起》(F. L. Carsten, The Rise of Fascism)，伦敦，1967年版；S·J·伍尔夫编：《欧洲的法西斯》(S. J. Woolf, ed., European Fascism)，伦敦，1968年版；《法西斯的性质》(The Nature of Fascism)，伦敦，1968年版；G·阿勒代斯：《法西斯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G. Allardyce, ed., The Place of Fascism in European History)，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1年版；H·R·凯德沃德：《西欧的法西斯》(H. R. Kedward, Fascism in Western Europe)，纽约，1971年版。最令人宽慰的是，这部著作说明了报酬递减规律。对于当前法西斯主义问题研究的不足状态，W·席德尔评卡斯顿著作的那篇文章作了概括，见德文《历史杂志》，第209卷(1969年)，第185页。

澄清这样的概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放在各种不同的历史结构背景下去看待它们，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认识了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是什么，同时又看到了其他国家的法西斯政府（或秘密的法西斯政府，准法西斯政府）的独特性是什么，而且还看到了每一个独特性与产生法西斯的社会有什么关系，这时，我们才可能开始进行有意义的比较。这样做并不等于陷入了那种既过时又名声扫地的历史事件独特论原理——这样的一个反应，按西格蒙德·诺伊曼的话来说，"将会招致任何系统学科的终结"。① 而只是说，结构的因素发挥了作用，不能把它们简单当作偶然的"变量因素"而不予理会或加以抛弃。巴林顿·穆尔② 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使用结构比较法的话，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即在印度和中国的历史上，农村人民的悲惨遭遇肯定都是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特别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这个因素都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然而，为什么在印度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任何一个想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人都必须从深入探索它们各自不同的社会结构开始。

拿克兰·布林顿研究革命问题的方法与不久前出版的R·R·帕尔默和J·戈德肖特的著作作一些比较，就可以看出历史学家的态度近年来发生变化的方式。③ 我们知道，布林顿最关心建立事件发生的周期性次序。相反，帕尔默和戈德肖特却试图考察那些决定了十八世纪最后四十年内西欧革命运动——例如荷兰、瑞士、法国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等地的革命运动——的共同因素，并通过这种方法，寻找超越国界的统一模式、思想运动和社会变化。对于帕尔默和戈德肖特提出的

总观点无论会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④——也许，最主要的保留意见还在于阐述这个总观点时所使用的政治术语，这一总观点已经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对待比较史学的具有潜在价值的不同态度。类似的研究方法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那就是西尔维奥·萨瓦拉的关于新大陆殖民地历史的著作。在通常的情况下，殖民地发展史只当作殖民主义强国，诸如西班牙、荷兰、法国或英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分别加以研究。但是，在萨瓦拉的著作中，又一次把各个殖民地的历史拿来进行比较，而且把它看作整个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⑤

这样的研究工作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克服专业史（尤其是国别史）中分散和割裂状态的一种有效手段。这种研究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促进结合的因素，使我们通过分析特定时期的重大运动来探讨世界史。还有一些历史学家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同时期的社会"上，⑥而是注意对那些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相隔很

---

① S·诺伊曼："政治学比较研究"，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杂志，第1卷（1959年），第108页。

② B·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B.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波士顿，1966年版，前言第16页。

③ R·R·帕尔默：《民主革命时代》(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两卷本，普林斯顿，1959—1964年版；J·戈德肖特：《十八世纪的法国和大西洋革命》(J. Godechot, France and the Atlantic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纽约，1965年版。

④ A·B·科班："民主革命时代"，载英文《历史》杂志，第45卷（1960年），第234—239页。

⑤ S·A·萨瓦拉："新大陆殖民地史综观"，载《美国历史评论》，第66卷（1961年）和《新大陆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S. A. Zavala, The Colonial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墨西哥城，1962年版。

⑥ "建立欧洲社会的比较史学"，载法文《历史综合杂志》，第46卷（1928年），第20页。

远的社会中某些特殊问题和制度进行研究。罗纳德·赛姆对古罗马、西班牙和美洲各国上层社会所进行的比较就是一个典型。① 还有一个典型是迈克尔·霍华德收集和编辑的论文集，包括有关军政关系研究的论文九篇。② 这样一些论文集与研究十八世纪欧洲贵族的类似的论文集一样，③ 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缺乏内在的统一性。仅仅把不同国家的类似发展一一加以对照地排列起来当然有可能为比较历史学提供基础，但是，这样做还是要让读者自己去进行综合，得出总的结论。有关海因里希·米特斯写的宪政比较史著作的一篇评论曾经指出："罗列一个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但是，这种做法本身还不是比较。"④

比较史学当前的趋势是指向更高目标，达到更高水平。所谓有更高的目标不仅是指扩大比较史学的研究范围，用它进行的"专题研究"不仅包括人们比较熟悉的欧洲，同时也包括亚洲和非洲，而且还指它特别致力于有意义的比较。所谓达到更高水平，那是因为它使用了社会科学的工具，因而造成了研究方法和观点上的重大进展。⑤ 这方面有两个著名的事例，一个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巴林顿·穆尔。他对"前工业世界向现代世界过渡的主要历史途径"作了令人鼓舞的分析。另一个事例是最近以来艾里克·沃尔夫用墨西哥、俄国、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事实为基础对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所作的研究。⑥ 这些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用沃尔夫的话来说)它们"不是用抽象的范畴，而是用目前仍然继续存在的具体的历史经历"去研究历史的中心问题。然而（用巴林顿·穆尔的话来说），这些著作同时也证明"以事实为根据而获得的范畴有可能超越某些特殊的状况"。⑦

比较分析方法当然不能取代某些特殊领域中对细节的探索，象邓恩的著作一样，沃尔夫和穆尔的著作也是建立在第二手资料以及有关专题论著的基础上的。不过，特殊领域中对细节的探索同样也代替不了比较分析方法。例如，中国一个个村庄和地区农民生活状况的专门研究成果的积累本身还不可能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那种视野更加宽广的历史观点。细节研究使我们有可能把“农民”这个抽象概念分解成为能够说明地区差别的更加严谨的范畴，帮助我们区别富农、贫农和“中农”，区别地主、佃农和工资劳动者。就此而言，专门的细节研究是不可少的。不过，将这些专门研究的范围作一个计划——即使需要作进一步修改——并且将这个研究范围内揭示的农民生活的实际状况同有关伊朗、印度、或巴西等其他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同一类研究中揭示的状况进行比较，也是非常必要的。

---

① R·赛姆：《殖民地精英。罗马、西班牙和美洲》(R. Syme, Colonial Élites. Rome, Spain and the Americas)，伦敦，1958年版。

② M·霍华德编：《军人与政府。军政关系研究论文九篇》(M. Howard ed., Soldiers and Governments, Nine Studies 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伦敦，1957年版。

③ A·古德温编：《十八世纪欧洲的贵族》(A. Goodwin, 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伦敦，1953年版。

④ C·冯·施威林：“评米特斯的《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国家(1940年版，1958年第3版)》”，载《萨维尼法制史杂志德语摘要》，第62卷(1942年)，第420页。

⑤ 这样的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布林顿和帕尔默的革命研究(参见上文第273页注②和第277页注③与约翰·邓恩的《近代革命》(John Dunn, Modern Revolutions, 剑桥，1972年版)的对比上。邓恩的著作反映了应当如何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崭新观念。

⑥ 穆尔：前引书(1966年)；E·R·沃尔夫：《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E.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69年版。

⑦ 同上，第276页；穆尔：前引书(1966年)，前言第17页。

巴林顿·穆尔从三个方面很有分寸地概括了比较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优点”。第一，它“可以导致提出非常有用的问题，有时还能提出新的问题”。其次，它“可以从反面大致地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最后，它“也许可以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①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走得更远。例如，海因里希·米特斯为比较史学进行辩护时提出了这样的理由，他说：“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十分清晰地认识到每一个国家的本质特征”，“才有可能把必然和偶然加以区别，把个别和典型加以区别。”② 在洛赫尔看来，比较史学为世界史提供了最有成果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他写道：“在现阶段，只有使用文化比较方式的通史著作才是令人满意的。”③ 沃尔夫、帕尔默和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所进行的全面完整的世界史研究，以及托因比的著作，其明显的优点就是它们的研究范围既不会太宽，又不会太窄。太宽则使历史学家无力单独地有成效地将全部内容概括进来。太窄又会使历史学家无法推导出坚实可信的结论。看来，他们大致上代表了这样一类学术水平，即既有能力进行历史综合，同时又不至于降低学术性，更不会遭致谴责而被斥之为肤浅或抽象的系统化。

也许，这就是比较史学之所以成为今天实践得最广泛的那种形式的通史的根本原因。比较史学在当前历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可从1950年以来创刊的一些专门为比较世界史提供论坛的杂志中得到证明。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德在1950年

---

① 穆尔：前引书（1969年），前言第13页。

② 米特斯：前引书（1940年，1958年），第4页。

③ T·J·G·洛赫尔：《克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念》（T. J. G. Locher, Die Überwindung des europäozentrischen Geschichtsbildes），威斯巴登，1954年版，第17页。

创刊的《世纪——世界史杂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53年创办的《世界历史杂志》和美国在1958年创刊的《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尽管英国的期刊《过去和现在》和法国的《年鉴》杂志都为有关比较史学问题的文章辟出了大量的篇幅。

这些杂志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们的世界性。也就是说，这些杂志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只在欧洲范围内对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制度之间进行比较，它们开始把比较史学的范围扩大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① 我们确实可以有把握地说，促进人们认识到需要用比较和综合的观点去看待过去的主要因素是近年来对于欧洲以外的各大洲社会的知识迅速增长，兴趣大大提高。人们由此认识到需要对世界历史作出新的解释，而这一次，真正需要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解释世界历史。在当代许多历史学家看来，作为对世界上各种社会的各个层次上的特殊问题和所有方面的具体研究的比较史学是作出这种解释的关键。难怪比较史学在当前最引人瞩目。如果我们把比较史学说成是历史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趋势之一，恐怕没有什么过错。比较史学看来正在愈益引起新一代更加进步和更加勤奋的历史学家的注意。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个领域的前景，许多历史学家才充分相信历史学有机会为人类社会的研究作出真正的贡献，为社会科学增添一个不可缺少的新领域。

---

① 例如帕斯蒂的论文："东亚和西欧史比较研究的某些课题和问题"，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7卷(1964年)。

当然无法同核物理学的研究相比——他们花费的国家拨款和私人资助的经费，数目之大，十分惊人。总之，他们简直已经成了一种工业部门，虽然属于规模较小、没有利润的服务性工业部门而不是规模巨大的制造工业部门。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就象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小说中描述的那种人物，与世隔绝，蜷缩在象牙塔里或淹没在档案堆中。这种形象，除了在牛津大学可以找到外，恐怕都成了过去的事情。一位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拎着公文包和折叠伞，坐在横跨大西洋的班机上，读着《时代》周刊，他的邻座准会吃惊地说："这个人大概是个经理商吧。"这一写照无意中却道出了当前历史学界重大的根本性变化之一。确实，有许多历史学家是货真价实的经理商。某个历史学家如果有幸成为历史学教授，而且假如顺利的话，还可以从教授升任系主任、院长，甚至还有可能当上校长，然后，冠状动脉血栓形成，最后被人们忘却。这些并不仅仅是哈佛大学才有的事情。

各国的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组织情况有很大差别。某些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科学院是中枢机构，起着积极的组织和指导作用。但另一些国家，例如英国，这类组织似乎更象接近权势集团的名流自愿选择加入的俱乐部，没有特定的组织职能。还有一些国家的历史研究组织与大学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些国家，旧的观念仍然认为教学和研究应当同时进行，相互促进。但是，在另一些国家，历史学家的奋斗目标是尽可能地避开或脱离大学，卸下教学的"负担"，去追逐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清静的环境。于是，大学教授的职位降格为第二等，教学工作也交给了一批不那么杰出的人去承担。这里如果想要叙述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历史研究组织方面的种种差别也许是多

余的，也是枯燥无味、令人生厌的。好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内容充实的读物，若是有人对细节问题抱有兴趣，只要提一提这些书目就足够了。① 本章和前几章一样，我只想提出当前历史研究中意义比较重大的总趋势，在必要时也会涉及某些国家的明显特点。但是，我的叙述将尽可能地集中在一切地区和各个大陆与历史研究工作有关的发展上。我们将同前面几章一样，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就象前面讨论到的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一样——对于亚洲、非洲和欧洲等所有地方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共同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占优势的国家也是共同的。总之，这些趋势是超越了地理界限以及伦理和意识形态界限的发展，而且正是因为这样，才需要加以思考。

---

① 著名的参考书有：《智慧女神：学术世界年鉴》(Minerva. Jahrbuch der gelehrten Welt)，六卷本，柏林，1966—1972年版；《学术世界》(The World of Learning)，伦敦，1970—1971年版。除这两部书外，有关各国的类似参考书还有《文献研究和组织的目录报告》(Répertoire des bibliothèques d'étude et organismes de documentation)，三卷本，巴黎，1963年版。该书按地区分目，并且涉及到各门学科。除上述书目外，关于法国、西德、英国和美国的情况，最近出版的一部篇幅较小的参考书是B·C·谢弗、M·弗朗索瓦、W·J·蒙森和A·T·米尔纳合著的《西方历史研究》(Shafer, François, Mommsen and Milne, Historical Study in the West)，纽约，1968年版；关于法国，参见《1940—1965年法国的历史研究》，1965年版；关于英国，参见G·巴洛和B·哈里森主编的《大学里的历史学》(G. Barlow & B.Harrison, eds.,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ies)，伦敦，1971年第3版；基特森·克拉克和G·R·埃尔顿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大学中的历史研究设备指南》(Kitson Clark & Elton,Guide to Research Facilities in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剑桥，1965年第2版。关于苏联，参见论文集《论苏联历史科学的历史》，第4卷，莫斯科，1966年版；A·西多罗夫："苏联历史科学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成果"，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第6卷，1955年；关于波兰，参见B·列斯诺多尔斯基的报告："1945—1955年波兰的历史科学"；关于匈牙利，参见安迪克斯：《匈

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发生了变化是当代形势的明显特征，其主要原因是史料在数量和类型上的极大增长以及历史专业本身的迅速发展。要详细讨论历史专业的发展，首先有必要对当今世界对待教育的态度，尤其是对待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态度变化作一番叙述。这里只要注意到在校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和大学数目的急剧上升就足以说明问题。这种情况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一些历史较短的国家里特别明显，在苏联的一些目前还不够发达的加盟共和国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非洲和亚洲各国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注意到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发展的时间还很短。我们已经看到，在亚洲的许多国家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根本没有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澳大利亚

牙利代表在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研究报告》，第1—14页；关于南斯拉夫，参见《南斯拉夫史学的十年》(Ten Years of Yugoslav Historiography)，贝尔格莱德，1955年版；关于西德，参见海姆佩尔："德国历史研究的组织"；关于奥地利，参见A·列奥茨基的论文："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关于瑞士，参见E·K·福埃特："瑞士历史研究组织的历史"，以上三篇论文均载西德《历史杂志》专辑（1959年）；关于民主德国，参见卡斯特兰发表在法国《历史杂志》第226卷(1961年)和第228卷(1962年)上的论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参见塔皮埃发表在法国《历史杂志》第228卷上的论文；关于拉丁美洲，参见肖努发表在法国《历史杂志》第231卷(1964年)上的论文。在本章的写作过程中，我得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委员会的报告，借此机会表示衷心感谢。这些报告包括F·费多罗娃的"苏联历史科学的成就"，"苏联科学研究组织和经费"；A·桑切维奇和V·沙尔贝伊的"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以及V·A·德亚迪先科、S·M·胡霍姆印克和V·沙尔贝伊写的第二份报告；维尔霍·尼特马的"芬兰历史研究一瞥"；P·哈纳克的"匈牙利历史学研究趋势"；B·格拉芬诺尔："南斯拉夫的史学"；S·昌德拉的"印度历史学研究主要趋势"；萨托诺·卡托迪尔德约、努格若霍·诺托苏桑托、布查里和阿布杜拉奇曼·苏尔约米哈德约的"印度尼西亚史学主要趋势"；J·J·奥克穆蒂的"澳大利亚历史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不用说，若是没有这些无法估价的论文补充说明当前的出版消息，本章的叙述是无法完成的。

也是这样。奥克穆蒂博士指出："澳大利亚历史研究的真正组织"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的同一时期，不过总是稍晚一点。"①

欧洲的情况也并不象人们有时所以为的那样。在这方面，历史研究组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大致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才真正开始形成，而且法国和德国处于领先地位，这完全符合事实。然而在英国，一直到1923年，陶特才感到他可以公开宣布"为争取承认这门学科而进行的战斗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②不过，即使到那时，历史研究的价值仍然受到学术界的怀疑，虽然这些反对者显然已经失败了。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受过专业教育、学术上有资格的历史学家的数量，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还相当少。我们无法取得世界范围的比较统计数据，也许这种数据根本就没有。但是可以肯定，分配到历史系的教师"少得可怜，最多只有两、三名"，这决不是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的现象。根据波拉德教授的回忆，他于1903年出任伦敦大学教授时，"每隔一年才有一名历史系的毕业生。"④我一直无法找到准确的数据，已经引用的那些数据也很不容易进行比较。不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各国从事历史学职业的人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增长了两倍，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超过了两倍。英国从1946年到1966年新创立了八所大学，还有一些学院升格为大学。1968年，英国的大

---

① "澳大利亚历史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打字稿)，第3页。

② 参见《历史协会，1906—1956年》(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06—1956)，伦敦，1957年版，第38页。

③ 参见《历史》杂志第7卷(1922年)第81—91，161—177页上E·巴克尔和A·F·波拉德的争论文章。

④ 《历史协会》(1957年)，第6页。

学历史教师(不含助理研究员和研究生)为一千一百六十名。①根据最新的报告，在乌克兰，从事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一部分从事研究，一部分从事教学）超过三千人，不过，这个数字显然包括博士研究生在内。② 1955 年，苏联总共有大约三千名历史学教授和其他教师，共有历史学科的各门专业点二百九十六个(其中包括考古学和人种学，而英国的数字不包括这些专业点)。到 1966 年，这些数字无疑有了极大的增长。③ 印度尼西亚在 1940 年只有一个历史系。现在已经设立的四十所高等院校中，“有的设立了独立的历史学系，有的开设了一门以上的历史学课程”。④ 在瑞士等一些国家，历史研究人员数量的增长显然慢得多。⑤ 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研究人员的增长，足以弥补这些国家的增长不足。虽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历史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加，但从整个不发达国家来说，历史研究人员在数量上的增长无疑是非常惊人的。⑥ 在美国，据 1954 年的官方统计数字表明，有二千四百三十四名历史学家，到 1966 年这个

---

① 参见谢弗等：前引书(1968 年版)，第 146 页。

② “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历史科学的发展”（打字稿），第 12 页。有人怀疑其中还包括中学教师。据称在这三千人当中，“大约一百人获得博士学位”。

③ 西多罗夫：前引书(1955 年版)，第 404 页。F·费多罗娃在 1968 年的《苏联统计年鉴》(第 267 页)上提供的从事历史学和哲学的“科学工作者”总数为三万零三百一十人，其中一千零十九人获得博士学位。这两类人员很难划分，也不清楚其中包含哪些人。

④ “印度尼西亚史学主要趋势”(打字稿)，第 8 页。

⑤ 按照福埃特(前引书，1959 年版，第 504 页)的说法，从事历史学工作的人，包括档案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在 1959 年仍然只占全体科学工作者(四千至五千名)中的百分之三以下。

⑥ “印度尼西亚史学主要趋势”(打字稿)，第 72 页。

数字可能已经翻了一番。[1] 1941 年，美国有五十八个单位有权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共有一百五十八人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到 1966 年，有权授与博士学位的单位达到一百十六个，当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有五百六十人。“现在每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人数接近于1925年在世的历史学博士的总数。”[2]

以上这些数字只是随意抽样，而且，在目前的条件下也只能是随意抽样。不过，这些数字已经充分说明了由于研究人员在数量上的膨胀而造成的组织问题。在 1940 年仍然占优势的那种对待组织工作抱无所谓的态度以及当时的组织方法，显然已经被一系列的事件所推翻。“历史研究的新规模正在给历史学家带来新的问题”，[3] 这不仅仅是苏联一个国家的现象。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强，数量越来越多的历史学新分支不断出现，其中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已在前面提到了，例如历史人口学、工业考古学，还有一些新的分支是技术史、气候史和企业史，当然也包括科学史。[4] 这里只需提到李约瑟的已被普遍称为当代历史研究最杰出成果之一的名著——《中国的科学和文明》。[5] 不过，同样明显的是，(象李约瑟那样)从事这类工作的大多数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历史学家。他们同历史学专业的主流关系极为松散。[6]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新专业化(用玛格丽特·高英的话来说)往往只顾及“微观状态，甚至只顾及亚微观状态”。这些新专业大多数有自己的专业期刊。随着一般历史学家专业化的加强，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历史研究要避免被肢解成为互不相关的一系列专业部门，那么，研究结构的重新组织便势在必行。

影响到历史研究工作组织的另一个因素是史料。无论传统类型的史料还是新型史料都在急剧增加。这些都是现代历史研究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十九世纪形成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仅最重视史料,而且也最缺乏史料依据,其基础是精细地、批判性地考证某一份文件档案。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是档案过分丰富,确实太丰富了,传统研究方法根本适应不了由此产生的情况,也无力适应这种情况。历史学家过去完全有可能仔细地研究(例如)百年战争头一年的全部档案和文件,然而,

---

① 参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人力资源》(Personnel Resourc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华盛顿,1959年版,第39页。按谢弗的说法(前引书,1968年版,第184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的历史学家有一万二千多人",但还不清楚这个数字包含哪些人,似乎是指美国历史协会会员,其中当然包括业余历史爱好者和退休历史学家。与英国历史协会(1966年有会员一万一千五百人)相比,美国历史协会会员比较少。

② 谢弗:前引书(1968年),第204页。

③ 费多罗娃:"苏联历史科学的成就"(打字稿),第25页。

④ 所有这些研究部门和分支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大量文献,往往技术性较强。它们许多专门化的期刊对这些文献作了极好的研究,例如1947年创刊的法文《科学及应用史杂志》,1912年由乔治·萨顿创刊的《伊西斯——科学史国际评论》,1962年创刊的《科学史——文献、研究和教学评论年刊》。关于商业史,参见H·M·拉尔森的《商业史导论》(H. M.Larson,Guide to Business History),剑桥,1948年版;T·C·巴克尔的《商业史》(T. C. Barker, Business History),伦敦,1960年版。关于技术史的近期著作有M·多马编的四卷本《技术通史》(M. Daumas, ed.,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巴黎,1962—1968年版;A·E·马森和E·鲁宾逊:《工业革命中的科学和技术》(A. E.Musson & E.Robins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曼切斯特,1969年版。关于气候史有H·H·兰姆的《变化中的气候》(H. H. Lamb, The Changing Climate),伦敦,1966年版;E·勒罗瓦·拉杜里:《公元一千年以来的气候史》(E.Le Roy Ladurie,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巴黎,1967年版。

⑤ 李约瑟:《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第1—4卷,剑桥,1954—1971年。全书计划出七卷。

⑥ M·高英:"科学和近代历史学家"(1970年)。

现在很难想象哪一个历史学家，甚至一批历史学家，或数批历史学家有能力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头一年里光是与欧洲有关的全部文字档案和文件仔细研究一遍。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有能力做到，也很难说获得的成果能够抵偿他们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历史研究范围的极大扩展，尤其是亚洲和非洲国家历史研究的扩展。直到最近，这些国家的历史档案还没有系统地收集起来进行分类、登记、编制索引目录和出版。一旦这项工作着手进行，我们可以想象新史料将会源源不断地大量涌来。到那时，如果想胜任历史研究工作，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新的组织能力。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光是为了收集和编辑罗马教廷自成立到1198年的为数不多的、而且远不是完整的文件档案集，就花了七十多年的时间，并且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就可以看到在早期比较从容不迫的时代里使用的那些方法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对于今天来说已经不可行，不适当了。① 新的任务，新的目标和新的原始资料，都迫使我们而且将继续迫使我们用长远的眼光从方法论上重新评价这门学科，而这在传统上一直是由个人进行的，拒不承认用任何集体组织形式来进行。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历史学已经增强了科学性，也就是说与那些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的观点的青年一代历史学家（就许多青年历史学家而言）建立了联系，那么，很明显，历史学在使用现代技术提供技术帮助这个意义上说，其科学性已经加强，而且将会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简单事例，诸如摄影技

---

① 即保罗·克尔进行的巨大工程：《罗马教廷主教文献集成》(Paul Kehr, 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第1卷，《意大利主教》，柏林，1906年版。

术，它已经取代了过时和费时的、有时还会发生笔误的手工抄写文件档案的方法。此外，在某些领域，例如在艺术史研究中，可以用摄影方法从极其零散的来源中收集材料。因此，使用摄影技术可以对某些画家或某些流派的作品进行鉴别并且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方法在过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① 应用新科学技术的另一项著名的实例是使用放射性碳（碳 14 ）读数器和年轮测定法来确定历史年代，尤其在考古学和史前史研究中这些方法得到了应用。② 依靠书面档案以外的资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不得不设法创造比处理文字档案所需的技术更加复杂的技术。③ 这些技术一旦被引进，只要适用，就会被其他领域中的历史学家所接受。例如航空摄影技术最初是克劳福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明并用来帮助考古学的，现在已经成功地应用到中世纪农业史和城市史研究上去了。④

从历史研究工作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些新技术多多少少需要精密的设备，因此一般说来历史学家个人无法得到。作为个人，历史学家似乎还没有能力拥有或租用飞机，况且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正确地对航空照片加以说明。由于同样明显

① 塔尔博特·莱斯说："舍此便几乎无法进行工作"。引自 H·P·R·芬伯格编的《历史研究方法》，第 172 页。

② F·E·佐伊纳：《过去年代的确定》(F. E. Zeuner, Dating the Past, 伦敦，1958 年第 4 版。

③ S·皮戈特：《考古学研究方法》(S. Piggot, Approach to Archaeology)，伦敦，1959 年版，第 26 页。

④ M·W·贝雷斯福德和 J·K·S·圣·约瑟夫：《中世纪英格兰航空测量》(M. W. Beresford and J. K. S. St. Joseph, Medieval England: An Aerial Survey)，两卷本，剑桥，1958 年版。

的理由，在历史研究中正在愈益发挥重要作用的电子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也属于这种情况。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愿意——有些历史学家确实非常愿意——这些变化或类似的变化正在将一种全新的组织强加在历史学家头上。早在1955年，圣·约瑟夫呼吁，要求"建立一个有权威的中心机构以便从各个大陆收集和保存已经使用过的航空照片。"① 虽然这项呼吁没有得到响应，但这毕竟标志着历史学家对自己工作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海姆佩尔指出，铁路时代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使历史学家可以从四面八方集中史料。② 航空旅行的时代把这个趋势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使史料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用。正是在这个不断扩展的背景下，愈益专门化的历史学科面临着数量激增的证据和史料以及越来越高级的处理技术，所以，我们的评述将集中在今天历史学研究工作组织中看来属于主要趋势的那些内容，而不过多地去注意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异。

6.1 史料的获得和档案机构

总的来说，历史学家要依赖档案工作者去获得自己需要的史料，因此，毫无疑问，近年来文件档案数量的激剧增长，给档案工作者带来了在 1940 年以前难以想象的问题。1945年以前已经确立的档案馆很少，规模太小，设备太差，人员太少，无力收藏和处理从许多方面涌来的大量历史档案。此外，文

① 《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第 7 卷，第 103 页。

② 引自席德尔编：前引书（1959年），第 152 页。

件档案的性质和特征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引起了对档案科学传统技术和基本概念的重新思考。如果要试图处理好数量大幅度增加的档案文件，那么，整个档案组织——至少包括档案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薪金——便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或提高。这些只有通过大幅度增加政府拨款才有可能办到。

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档案文件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有四个。一个影响最普遍的原因是现代各国政府的官僚性质。源源不断出现的综述、调研报告、研究和调查、人口普查、咨询、计划和规划，不仅产生于政府部门，而且产生于商业公司和其他法人团体，他们全都在制造过去无法比拟的大量文件，虽然从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打字机、速记法、口述记录仪和类似的装置投入广泛使用后，文件数量早已开始以惊人的比例增加了。第二个因素我们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在档案工作者收藏的大量文字档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各种其他形式的记录，例如口述传记资料（在非洲尤其重要，但不局限于非洲）、照片、胶卷、磁带录音、谈话记录等。第三个因素造成的结果虽然不那么直接，但同样很重要，那就是历史研究的中心内容发生了转移。随着历史学家的兴趣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和经济史，档案馆和博物馆收藏的主要资料便从传统上一致公认必须优先收藏和处理的那一类档案——例如珍贵的文件（英国的大宪章可以看作最典型的珍品）、编年史、年鉴和政府颁布的政治档案等，转移到了优先收藏和处理社会史所需要的那种分布极广的文件（例如契约、帐簿、租折、税收登记、公证人的议定书和商业记录等）。这类资料在各个地方都以数千万计地存在着，而且显然不可能对它们进行详细的分析、分类、编制目录和索引。历史研究中心内容的转移所造成的后果，就象

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走进了档案馆却往往找不到所需要的那类现成的文件，他还需要着手进行大量工作，即把能解答他所提出的新问题的档案文件进行分类排队。① 最后一个原因是在1950年前后开始出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档案文件大量增加，从而使他们认识到了当前的需要是组织和使用本国的历史档案，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独立以前殖民政府所进行的工作。

档案馆和资料库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档案材料整理和分类工作在近二十年来飞跃发展。当然，在那些迄今一直忽视收藏历史档案的地区，这些工作更为迫切。根据巴克斯特向萨哈拉以南非洲技术合作委员会呈交的报告，到1957年为止，萨哈拉以南非洲已有二十七所档案馆，其中大部分是在1945年以后新建立的档案中心。② 黄金海岸（即后来的加纳）到1945年才建立第一座档案馆。在尼日利亚，戴克首先递交了一份关于极力主张建立国家档案馆的报告，1954年创设了第一座档案馆。③ 在这些档案馆设立的影响下，其他地区也在较晚的时候开始了这项工作。尼泊尔直到1961年才迈出第一步，利用印度的技术援助系统地收藏档案。在新西兰，虽然从1929年起就设立了档案处，但是，直到

---

① 布罗代尔：前引书(1969年)，第25页；又见J·格伦尼松：《法国历史研究》(1955年)，前言第45页。

② T·W·巴克斯特：《萨哈拉以南非洲的档案机构》(T. W. Baxter, Archival Facilities in Sub-Saharan Africa)，哈福德，1959年版。

③ K·O·戴克：《关于尼日利亚历史档案保存和管理以及建立国立档案馆的报告》(K. O. Dike, Report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ublic Record Office in Nigeria)，伊巴丹，1954年版。关于东非的情况，参见D·查尔曼和M·库克："东非的档案机构"，载《档案》杂志，第8卷(1967—1968年)。

1952年那场无情的火灾发生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建树，而正是这场大火激发了对收藏和保管档案的极大兴趣。到1961年至1962年，国立档案中心终于开展了有效的工作。①在澳大利亚，虽然新南威尔士州从1893年起就设立了历史档案馆，但是，直到1957年才决定重建堪培拉国立图书馆的一个部门——联邦档案部，使之成为一个国立的档案机构。②

当然，档案馆的飞跃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亚洲、非洲和澳洲。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郡和各大城市的地方档案馆实际上已经全部开放，散落在各处的至今鲜为人知的大批资料被收集起来，分类、登录、编制目录索引。在这批资料中间包括中世纪以及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大批档案。这类工作，在战争期间，作为为防止敌人的军事行动而避免历史档案遭受毁灭所采取的防御措施，部分已经进行。这些资料由于包含了各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丰富内容，可以说对促进英国历史学的转变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③ 它们在数量上的影响只要通过埃塞克斯一个郡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从《埃塞克斯档案馆指南》于1946年初出版到1969年出新的增订本为止，该馆收藏的文件档案从不足五千件增加到五十万件左右，其中对三万件已全部作了整理、分类和编制索引。④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世界范围的进展，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数

① 参见P·S·科克斯："新西兰国家档案馆的发展"，载《档案学家协会杂志》，第3卷（1965—1969年）。

② D·S·麦克米伦："澳大利亚的档案改革"，载《档案学家协会杂志》，第1卷（1955—1959年）。

③ 关于它的意义，参见载于1949年3月10日《听众》（第395—396页）和《国家档案馆成立二百周年纪念文集》（维也纳，1949年，第392—395页）上的笔者的文章。

④ 《英国历史评论》，第85卷（1970年），第636页上的"短讯"。

量和档案馆都在增加。例如，保加利亚1952年以前尚未建立中央档案机构，但在二十五年以后已经编订了二千三百件档案文件集，供人查阅。① 1963年，别洛夫提出的报告涉及到在苏联建立新档案馆的庞大计划。② 在1956年至1961年的五年中，有二十二座档案馆开放。这些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文件近三千万件，此外，还有二十一座档案馆正在筹建中。1958年，根据M·N·季霍米罗夫的倡议，开始着手考察西伯利亚的档案，并由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档案学家负责进行这项工作。与此同时，非洲在1957年开始实施一项关于收集口述史料和书面档案的周密计划，其中包括在非洲的资料和欧美档案馆、图书馆馆藏的资料。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着手准备编纂大规模的档案馆指南系列丛书，这项工作从拉丁美洲开始；接着在1963年又计划编纂关于非洲史料的规模同样巨大的档案馆指南系列丛书。③

大量新资料通过这种方式开始进入流通，却给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带来了一些问题，也提供了一些机会。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仍然有一个老问题，那就是大海捞针。不过，这个问题现在则以新的规模出现。各种级别的档案指南、档案索引和手册不断在各国编纂和发行，但一俟出版就过时了。准备和出版这些资料已经变成一项重要行业。④ 对于历史学家或档案学家个人来说，除非他的研究集中在某个范围狭窄的地方专题上，否则，他怎么敢希望及时获得并消化所有这些资料呢？波威克早在1929年就提到了“大量难以处理的资料的不断积累”。他还对“研究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史或世界史任何阶段的任何一个人能否写出一部跨度在五十年以上的真正的伟大著作”表示怀疑。⑤ 今天，这种怀疑还可以从五十年的

跨度缩短到五年，而且还要把地理范围的限度缩小到五十公里以内。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学家在资料准备工作上花费的大量时间与真正用于研究的时间，比例很不相称。不仅如此——由于需要掌握和驾驭的资料的数量是那样浩大，几乎可以肯定，单独进行工作的历史学家个人所积累的资料必定是信手拈来的，而且是不完整的。历史学家在动笔写作之前应当着手收集和分析全部史料，这已经成为一种旧的观念。这种观念（据说在理论上一直受到尊重，但在实践上却未必如此）在新资料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已被完全推翻了。⑥

档案学家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少一些，但技术性更强。这些问题结果导致了1950年前后刚刚开始形成的那种档案管理理论和实践发生缓慢的但不可抗拒的转变。不过，这种理论和实践必定会进一步加强——仅从文件积累造成的纯粹压力而言也会这样。由于档案科学是在档案学家偏重于处理早

---

① P·米加切夫："保加利亚的档案组织工作"，载《档案》杂志，第8卷，第20期（1958年）。

② "苏联档案制度的组织"，载《档案》杂志，第6卷，第32期（1964年）。

③ 在《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报告》第2卷（1965年）第182—198页上，对此有一个初步介绍。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议，见该卷第191页。

④ 这里无疑有可能开列出各国用各种文字定期发表的大量目录，现阶段给各种文字的目录汇编出一份总目录的条件已经成熟。参见T·贝斯特曼编：《世界目录总目》（T. Besterman ed., A World Bibliography of Bibliographies），托托瓦，五卷本，1965—1966年第4版；《目录总索引——目录总目集成》（The Bibliographic Index. A Cumulative Bibliography of Bibliographies），十一卷本，纽约，1971年版。不过，后者只包括拉丁文著作。

⑤ M·波威克：《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学研究》，第176—202页。

⑥ 然而，这样的旧观念依然存在着。例如，N·F·坎托和M·S·施奈德编的《怎样研究历史》（N. F. Cantor and M. S. Schneider, How to Study History，纽约，1968年版，第194页）仍然告诉学者们说："要完全相信你能够寻找和阅读到你那个专业的全部资料。"

期档案的时候发展起来的,①因此,缺乏充实的内容。档案科学主要是关心收藏和保管。把每一件证据珍藏起来,依然是历史比较悠久的档案馆,尤其是欧洲各国档案馆的首要任务。大量的时间、思想和精力都用于研究诸如迭片法之类现代保管档案的方法。②然而,矛盾的是,即使在这些历史比较长的档案馆里,销毁文件与保存文件同样迅速地成为档案工作者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所谓销毁,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处理掉"或"消除掉",其方式至少是毁掉复制品,或规定某种标准以决定哪些应当继续保存,哪些不必保存。其原因当然纯粹是因为现代的文件数量庞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可用的时间极短。在藏有大量档案的档案馆,例如1901年才建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档案馆,保存的全是现代档案。因此,这类档案馆对档案学家的资格和工作态度方面的要求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档

---

① 在有关的基本著作中只须提到A·布伦内克的《档案学》(A. Brenneke, Archivkunde),莱比锡,1953年版;其中包括过去的参考书目;H·O·迈斯纳:《现代的证书和文件集》(H. O. Meisner, Urkunden und Aktenlehre der Neuzeit),莱比锡,1952年版;T·R·舍伦贝格:《现代档案学:原理和技术》(T. R. Schellenberg, Modern Archive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墨尔本,1964年版。这些著作充分说明现代档案科学已经形成。接着在1951年,新的国际性杂志——《档案——档案学国际评论》——问世。战后,各国相继创办了档案学期刊(当然有些国家在战前已创办了类似的杂志,如德国的《档案杂志》),其中包括英国在1949年创刊的《档案》,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档案》,1927年创刊并在1938年复刊的波兰的《档案》,民主德国于1951年创办的《档案通讯》,美国在1938年开始发行的《美国档案》,意大利在1956年创刊的《档案》等等。

② W·H·兰威尔:《书籍和文件的保存》(W. H. Langwell, The Conservation of Books and Documents),伦敦,1957年版。当然,这里完全有必要指出,需要保存的不仅是古代文件。由于廉价机器生产的纸张在市场上大量出售,这种纸张的预期使用期在多数情况下不超过三十年。现代文件若要长期地、永久地保存,还需要加工,以保持抗蚀能力。墨水成份的变化也造成类似的问题。

案馆。在传统档案馆工作的档案学家，主要是从档案学院培养造就的。例如，巴黎档案学院和维也纳的奥地利历史研究所成为后来各国——除美国以外——档案工作训练中心仿效的楷模。随着新档案的增加以及现代档案比例的上升，对古文字学、古文书学以及其他传统"辅助科学"训练的需要逐渐下降。相反，对于实用的管理技术训练的要求却有所加强。随着历史研究的专题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近代和十九、二十世纪，档案工作重点的转移也必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对近期历史著作出版状况的分析表明，当前有关1789年至1945年这段时期的历史著作占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研究1933年到1956年的历史著作的相对比例，从1955—1956年的十分之一上升到今天的七分之一。① 因此，现代档案的重要性也得到了相应的加强。

现代档案的数量极大，这一特征也引起了一些问题。海姆佩尔曾经指出，史料的处理传统上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程序，即编辑、研究、叙述和公布。② 这种工作程序赖以建立的基本前提，正如1824年开始出版的《德意志史料集成》所主张的那样，对某个阶段的历史来说，所需要的全部史料是有可能发现、出版并加以利用的。这样一来，各个国家无数的学术协会和团体，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全都致力于编辑和出版历史资料和典籍，有的靠政府（象伦敦国立档案馆编制的英国中世纪财政官员登记册），但更多的靠学者独立进行，并且几乎全都通过学术协会来出版他们的成果（例如中世纪的契据登记册和主教登记册）。档案学家的任务是重新组织这笔

① 联邦德国《历史杂志》，第212卷（1971年），第375页。

② 海姆佩尔：前引书（1959年版），第152页。

财富，提供目录、索引、收藏状况、文稿分类目录，而且在有利的条件下供人们使用，至少可以提供每一份档案文件的简明摘要，并尽可能地提供日期或大致日期。历史学家正是在这时将工作接了过去，通过全面分析史料，制作所有版本的评校版和考订版，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全面考证典籍，并陈述考订者所遵循的原则。这种工作不乏杰出的典型，有些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着。投入这种枯燥无味的劳动和工作的献身精神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敬佩。① 如果没有这些工作，历史学会变得出奇地贫乏，甚至完全失去立足之地。不过，有些做法在某个时期采用时最受人们的欢迎，看来也最有效，但在另一个时期却未必最令人满意。关于重视原版典籍的收集和评校工作，我在这里要谈两点看法。第一，长期以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这种工作已经失败。收集和考证中世纪(指公元 1200 年或 1300 年以前的西欧)的档案文件也许还是可行的，至于近代的某些领域，如外交政策，或许也是有用的，但是，只要我们一接触到现代的档案和史料，仅从数量上的急剧增加就已经达到了无法驾驭和掌握的程度。② 第二，还必须考虑到将所有

① 例如罗马法语学院正在汇编的文件集《文件摘要》(Registres des papes)，13—14 世纪；教皇特使的各类报告和通讯集的出版，见 K·A·芬克的《梵蒂冈档案》(K. A. Fink, Das Vatikanische Archiv)，罗马，1951 年版；H·芬克编的《阿拉贡法令集》(Acta Aragoensia)，三卷本，柏林—莱比锡，1908—1922 年版；E·约西姆和 W·胡巴奇编的四卷本的《S·马里亚·托伊托尼科伦外交历史法令摘要》(E.Joachim and W. Hubatsch, eds., Regesta Historico-Diplomatica Ordinis S. Mariae Theutonicorum)，哥廷根，1948—1965 年版。

② 有关两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大型外交文件集的选择(必然是)非常有限的，谁也不可能设想发表全部档案。这引起了对于选择原则的担忧(其中参见巴特菲尔德的论文："官方历史及其易犯的错误和标准"(1951年)，这意味着任何文件集无论内容多么丰富，也只能作为严肃的研究工作的指南，更不用说查询未发表的档案了。

档案和文件公布发行，即使能够办得到(但实际上办不到)，除了少数(很容易确定的)特殊情况外，实际上未必是处理史料的最恰当方法。有人也许会问，这种做法难道不就是以有关历史学和历史研究的性质的某种观点为转移吗？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是由事件构成的。随着历史学家对定量数据发生了新的兴趣，当然就要求使用新方法——也许是一系列新方法——来处理历史档案。对于从统计角度来说极有价值的那些档案文件，从其本质来看未必重要，也未必能使人感兴趣而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处理，更谈不上分别出版了。只要印刷出版是广泛使用史料的唯一方法，那么，将档案工作的重点放在编辑典籍上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因此，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遇到了双重的变化。第一，由于历史学的兴趣转向新的焦点，有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渊博的学识，尽管令人乍舌，却已经过时了，至少不再适用于现代所关心的主要课题，不能满足现代的要求。第二，用于传播这些学识的方法虽然尚未完全被取代（看来也不可能被完全取代)，但是，已无法满足现代历史学家的目的，因为这些历史学家现在最关心的不再是个别、异常和例外情况。同时，这种方法也无力妥善处理今天正在积累而且逐年剧增的大量档案文件。

当然，谁也不会反对继续出版那种旧式的多卷本档案文件集。《德意志史料集成》在 1945 年以后立即恢复出版，而且在赫伯特·格隆德曼的倡议下，又增加了一个部分，出版有关中世纪精神性方面的史料(列在“精神思想史”栏目下)以便适应历史研究新兴趣的需要。①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神圣罗马

帝国的议会档案集，即德国的《德意志帝国国会法令集成》，早在1867年就开始出版，但在1933年至1945年之间中断。在海姆佩尔的领导下，这项出版工作又在大力进行。苏联不仅继续出版旧的史料集，还开始大量出版新的史料集，其中主要包括现代史料（例如十卷本的档案和资料集《伟大的十月革命》）。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对原始资料的出版工作极其重视。毫无疑问，对于亚洲和非洲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来说，当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全面地校订、编辑和出版基本史料。但是，有些事实也证明，这种出版工作没有切中要害，而且不可能切中要害。全面出版史料集在当前的条件下光从经费上考虑，就会寸步难行，除非能够直接得到政府拨款，或者得到财源充裕的基金会的资助。一直到1940年还在坚持出版档案集的许多档案出版协会已陷于经费告罄的窘境，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正象F·哈尔通对德国的《德意志帝国国会法令集成》所提出的问题一样，有人也许会问，这样的工程难道不会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吗？②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可能理解到历史档案及其处理的整个问题正处于变动状态之中。北爱尔兰档案馆副馆长最近指出，档案学家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有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也无力提供系统的指导。③

---

① 参见H·格隆德曼："德意志历史学典籍中的思想史"，载《作为历史的世界》，第10卷（1950年）；"德意志历史典籍提出的新任务"，载《科学与教学中的历史》，第2卷，1951年版。

② F·哈尔通：《十五世纪以来的德意志宪政史》(F. Hartung,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vom 15. Jahrhudert bis zur Gegenwart)，斯图加特，1950年第8版，第3—4页。

③ K·达尔文："检索档案中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载《档案学家协会杂志》，第4卷（1971年）。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通常使用的解决办法（即编制目录和索引）充其量不过是无法达到的理想，说得不好听，就是陷阱和幻觉。在这样的情况下，档案学家们开始探索机械援助的潜在可能性是非常自然的。这种探索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但引起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第一项，也是最简单的一项试验，其价值已经成功地显示出来，那就是用微缩胶卷摄影技术处理了从德国手中缴获的大批档案文件。这批文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被运往英国（白金汉郡）沃登宫和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① 至于使用更尖端的技术，开拓性的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例如美国的犹他州盐湖城摩门历史，协会由于世系学的特殊要求而尝试性地使用了电子数据检索法。第三项创造性工作也在美国开始进行，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校际政治研究合作会议作出决定，委托霍华德·W·艾伦负责建立历史资料库。②

这里不准备详细讨论和叙述历史学正在引进的新技术。也许，关键所在是使用机械进行分类和记录的方法将取代手工方法。因此，摘录或转述档案文件中的内容可以不再使用手抄纸，而直接记录在霍勒里斯卡片上，或在纸卷上打孔，这

① F·T·爱泼斯坦和G·L·温伯格：《缴获德国文件指南》(F. T. Epstein and G. L. Weinberg, Guide to Captured German Documents)，华盛顿，1952年版；《缴获的德国文件指南补遗》(Supplement to the Guide to Captured German Documents)，华盛顿，1959年版。《德国外交部档案胶片和缩微胶卷分类目录》(A Catalogue of Files and Microfilm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华盛顿，1959年版。关于苏联缴获并转交给民主德国的德国文件，见H·洛茨克和H-S·布拉特：《波茨坦德国中央档案收藏概览》(H. Lötzke & H-S. Brather, Übersicht über die Bestände des deutschen Zentralarchivs Potsdam)，柏林，1957年版。

② 罗尼和格雷厄姆编：《计量史学》，霍姆伍德，1969年版，第114—116页。

样不仅可以通过机械的方式从卡片或纸卷上提取并抽出所需要的资料，而且可以编制“印出”分类目录。这种处理资料的方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避免了重复劳动。确实，校际合作会议决定建立历史资料库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许多历史学家发现他们的时间都浪费在查找和处理别人已经记录过的资料上。电子计算机检索系统不可能代替个人进行档案研究，人们也不打算用它来取代。但是，由于它的高度性能（也就是说它记载在纸带或卡片上的信息量很大），电子计算机检索系统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也有可能提高个人进行研究工作的效率。例如，一个简单的检索系统只能鉴别党派的名称和地名、租地和特许状的授与者和接受者，以及有关的村名。即使这样，它对研究工作也有很大帮助，它还有可能建立起复杂得多的代码，容纳多达三千甚至更多的单词或词条（地产图、耕地、圈地、沟渠、公路等等）。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经过适当训练的工作人员能够将档案和文件原件上的信息直接在卡片或纸带上打孔，以便裁剪出中段，从而节约了研究人员的大量时间。

这种机械方法也许只适用于某一类历史档案，对另一些则未必适用。目前，这种方法主要还是用来处理第二流的常见档案文件。即使这样，也不应当低估它的优越性。首先，正是这种第二流的常见档案资料堆积在档案馆里，其数量之浩大，令人却步。这些资料被束之高阁，或者只作了摘要就扔在一边，完全是因为有实际困难，人手不足。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今天的历史学家最迫切需要使用的还是这类资料，因为他们最关心计量问题。其次，随着档案学家使用机械方法处理档案的实际经验不断增加，他们无疑将会发现类型越来越多的档案资料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进行适当的处理。仅仅从

物理学检索角度上看，电子计算机在档案工作中无疑会有广泛的用途。对于档案使用者来说，无论他是档案管理人员还是历史学家，迅速、有效、全面、准确的资料检索是第一需要，但这要求档案组织作深远的变革。其中的一项变革已在前面谈到，那就是职业档案工作者的态度，以及对他们的训练和培养发生了变化，一位富有实际经验的档案学家说过，在这些方面，传统习惯仍然占据统治地位。① 另一项变革是在经费方面。各式各样的机械援助手段都要付出巨额经费（并不一定大于按常规方法工作的档案工作人员的工资累计总数，但是，这么大数目的一笔经费很难做到一次凑齐。）何况，如果国家不大幅度地对档案馆增加拨款，那么，很难看到档案馆能有什么办法达到处理大量新涌入的资料所必备的水平。因此，第三项变革是必然要求互相合作。昂贵的机器如果得到充分使用，就完全可以赢利。那么多地方性的小型档案馆同时存在是否还有必要，是一个尚有争论的问题。然而，相对地集中，至少集中在一些较大的地区性档案中心，或者加强档案馆之间的合作和配合，用以解决某些问题，则是一个可能出现的发展倾向。我们将会看到，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情况，也将出现同样的发展趋向。

6.2 新研究技术的影响

如果说新技术对历史学家产生的间接作用是一种使史料

① 达尔文：前引书（1971年），第22页。

更加方便地为其所用的手段，那么，它的直接作用，无论对历史学家的工作及其工作态度，还是对历史研究组织所产生的影响，从潜在意义上来说，都大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电子计算机技术。据说，“历史学并不是第一个在数据处理设备出现后发生变革的学科。”① 事实上，历史学是最后发生变化的。然而，其结果不仅影响极为深远，而且不可逆转，这是十分显然的。在历史学家掌握的一切现代辅助科学中，电子计算机技术革命性的变化最有意义。

历史研究已经运用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来处理数量极大而且迅速增加的文献。② 尽管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这里仍然需要扼要地说明在电子计算机应用中的新发现，同时又尽量避开技术问题。首先，必须强调指出——有关作者对这个问题都特别慎重——电子计算机科学同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一样是一门辅助学科，决不排除人的因素和历史学家的判断的重要性(在某些方面还确实增强了这种作用)。不仅历史学家必须使用他评价其他任何资料时使用的同样的学术考证标

① 罗尼和格雷厄姆：前引书(1969年)，前言第8页。

② V·A·乌斯季诺夫：«电子计算机在历史科学中的应用»；莫斯科，1964年版；“关于电子计算机在历史科学中的应用”，载«历史问题»，1962年第8期；J·J·卡克：“为历史科学所应用的电子计算机新技术”，载«苏联历史»，1964年第1期；格里曼-维诺格拉多夫与赫罗曼先科：«控制论与历史科学»，莫斯科，1967年版；M·斯梅尔塞和W·I·戴维森：“历史学家与电子计算机”，载«埃塞克斯研究所历史文集»，第54卷(1968年)；C·M·多拉：“历史研究中的革新：计算机方法”，载«电子计算机和人文科学»，第3期(1969年)；C·A·吕克拉特：“关于历史科学领域中的电子计算机数据处理序论”，载«历史杂志»，第57卷(1968年)；D·V·德奥皮克，G·M·多布罗夫等：«处理历史资料的计量方法和机械方法»，莫斯科，1970年版。墨菲和米勒：“关于使历史研究技术更加专门化问题：电子计算机建立的‘真实类型’”，载罗尼和格雷厄姆的前引书(1969年)。在此书中，艾德洛特所写“历史学中的计量化”一文还叙述到大量有关问题，这在“计量史学”一节中已经提及。

准去衡量电子计算机处理的资料，而且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研究所产生的结果，决不可能比历史学家最初“输入”的资料更好。例如，倘若使用了不准确的或错误的统计资料，电子计算机便会复制出不准确的结论，“甚至可能使问题更复杂”。①其次，电子计算机既可以处理文字问题，又可以处理数量问题，也就是说，虽然电子计算机实际上最适用于（或者说，至少在现阶段最常用于）处理数量资料或统计资料，然而，从原则上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电子计算机不应当同时用来处理定性资料。不过，要在这种情况下编写程序必定更加困难，把握也不大。因为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指标的正确选择，正象加尔丁所说的，②决不是想当然的。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可能还有一些同样可供采纳的各类指标。换言之，只有在分析可识别的范畴内与大量事实有关的问题时，电子计算机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信息过于含糊以致无法概括为可以认识并普遍被接受的范畴时——当然，如果完全是由于信息量的不足——想把信息转变为适用于电子计算机分析的形式，不仅办不到，而且可能产生错误。电子计算机工作的必要前提是事先有可靠的分类程序。只有在事先对所要研究的进程、现象或对象作初步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地着手达到定量分析的目的。乌斯季诺夫说，建立算法语言的工作——也就是说，将数据转换成机械语言——“实质上构成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句话初看起来似乎相矛盾，实际上恰恰

① 这一观点是P·马赛厄斯提出的。他说：“探索计量方法……需要对史料作更加批判性的评价……而不是相反。数据数学处理方法运用越多，便越须认识史料的可靠性，或了解史料中可能包含的错误”。见巴拉德：前引书(1970年)，第80页。

② 见《年鉴》杂志，第18卷(1963年)，第261—262页。

是前面所说的意思。一旦完成了程序编制，电子计算机的操作就是纯机械的了。[①]

只要认识到了这些根本性的限制，那么，对于在历史研究中应用电子计算机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便无可怀疑了。电子计算机基本上承担了两方面的功能，那就是贮存资料、建立"资料库"和进行资料检索，没有这两项基本功能，研究便无法进行。当然，历史学家的工作从来就是干这两方面的事：收集资料，并进行分类，然后按照自己的工作计划去选取资料。不过，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这些工作，其规模是历史学家个人用"手工方式"（即用笔和纸以及他的有限时间）所无力办到的，也不可能达到电子计算机所具有的速度。确实，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的最明显的优越性就是规模经济。例子之一是科瓦利先科和米洛夫对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全俄统一市场形成的研究。这项研究需要大约十万个相关因素。[②]另一个例子是斯梅尔塞和戴维森对 1640 年到 1682 年马萨诸塞的埃塞克斯县档案记载中全部地产清单共二万六千件数据卡片的处理，这些数据包含这四十二年中所能获得的有关这个县的财产的全部资料。如果让一名工作人员用手工方式来处理这些数据至少要花费五百个小时，进行十二万五千次计算。但是，电子计算机只用了十分钟左右就以系统的形式提供了必要的信息。[③]这些事例证明，仅从信息量之大，在必要的规模上组织信息之复杂程度，以及所涉及的计算次数之多，都是通常的

① 见《年鉴》杂志，第18卷（1963 年），第 261—262 页；斯梅尔塞和戴维森：前引书（1968年），第 118 页；德奥皮克等：前引书（1970 年），第 13 页。

② 科瓦利先科和米洛夫："研究全俄农业市场形成过程的原则"，载《苏联历史》，第 1 期（1969 年）。

③ 斯梅尔塞和戴维森：前引书（1968 年），第 113 页。

手工操作技术所不堪胜任的。如果历史学想要着手解决这一类问题，没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简直不可想象。

因此，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电子计算机为历史学家开辟了新的前景，使过去非常想进行、但实际上完全不可能进行的研究项目，现在有可能进行了。当然，电子计算机可以在较低的级别上简单地用来作为方便的手段，去完成方便的机械任务，例如分类、编制目录、或制作简单的统计图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用途在档案馆里基本上已经发挥。但是，这类工作纯粹属于计算，因此，利用普通的机械计算器往往也可以有效地完成，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占用电子计算机的宝贵时间，是否真正值得，也是个问题。① 事实上，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的真正价值还在于更先进和更高级的层次上，在这个层次上的问题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实群体集中在一起，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并按照一套特殊的指令或程序，从中抽取出结果。事实上，如果事先进行的分类体系是完全的，那么便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程序反复使用数据库。也就是说，资料库已经变成了常设性的知识库，在这个知识库的基础上可以推导出一个又一个的结论（这些结论不同于学者们个人写的笔记和摘要，那种笔记和摘要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他们自己才看得懂），同时也保证了历史学的发展前景，使历史学成为——至今尚未成为的——一种积累性的科学。

对于历史研究的未来，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还包含着另一些重要意义。首先，它迫使研究者提出清晰、精确的和准确的问题，并且消除含义不明的词汇，这些词汇一直是历史著作中

① 参见施奈德：前引书（1970年），第9页。

的祸根。吕克拉特曾经指出，历史学家进行工作时带有的观念，有许多就是极为抽象和模棱两可的。这些观念没有启迪作用，只能把读者弄得更加糊涂。在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之前，这些观念必须划分成有严格定义的成份。虽然这些成份中还会保留一些不明确的残余，但与一般人所认为的相比无疑会有更多的成份转换为一系列不受价值观念影响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客观的）陈述。这种陈述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① 在编制程序阶段上，总会掺进定性标准，因而也会掺进主观标准。但是，只要编为程序就使得这些标准更易于识别，因而缩小了主观解释的范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极有意义的。其次，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使人们再也无法为那种从随意拼凑的零碎证据中推出结论的传统做法作辩解了。研究工作的基本法则是"不仅要考察所研究的历史进程中的某些个别指标，而且需要考察它的所有方面。"② 斯梅尔塞和戴维森引用的事例证明，有了电子计算机，便可以吸收全部资料并且进行分析。这样一来，那种过时的、靠不住的抽样法便无可借口了。③ 最后，又如吕克拉特所指出的，电子计算机第一次为历史学真正提供了机会去粉碎有名的"循环论证法"，这种方法至今仍在阻碍着历史学，使它无法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前进的科学，即从一些个别情况下的抽象中建立广义的"理想类型"或隐类型(crypto-types)，然后又通过参照其他个别情况再一次推翻（或证实）这些"理想类型"或

---

① 吕克拉特：前引书(1968年)，第274—275,283页。

② 德奥皮克等：前引书(1970年)，第5页。

③ 关于这个重要论点的进一步讨论，见斯梅尔塞和戴维森：前引书(1968年)，第113,119页。

隐类型。[1]由于电子计算机有能力同时吸收和处理全部事实，从而排除了方法论上的基本障碍，使历史学家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连贯性和统一性，从而得出客观的结论。

因此，种种事实证明了吕克拉特和施奈德的观点正确。他们认为电子计算机的引进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会导致历史学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至少能够为进行思索的历史学家解决长期来充分认识到了的方法论的困难指明道路。应用电子计算机的明显好处在于，只要应用得当，历史学就有可能获得迅速的进展，这种进展速度是迄今仍然依赖缓慢而又辛苦的手工操作的历史学家无法想象的。其次，电子计算机取代了历史研究的初步技术工作，而这类工作在一般情况下要占去研究者四分之三甚至更多的时间。这样一来，历史学家获得了解放，可以发挥自己的基本职能，即进行解释和说明。[2]当然，在这一方面，无论电子计算机在进行研究的初步工作中能做多少事情，历史学家仍然起主导作用。机器可以比较精确地回答交给它的特殊问题，而且错误率低于人脑，但机器不可能进行本质上属于创造性的工作，即评价和判断用机器处理过的数据资料。再次，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实际上是跨学科合作工程唯一有效的基础。许多人认为，合作工程大而言之决定了整个人类科学的进步，小而言之决定了历史学的进步。乌斯季诺夫曾举例说，任何描绘古代世界共同体经济生活的尝试，不仅需要分析遗留下来的文字史料，还必须运用历史学的三个不同学科，即古钱币学，铭文学和考古学。实际

① 吕克拉特：前引书(1968年)，第270—271页。

② 吕克拉特前引书第293页和乌斯季诺夫前引书法译本第290，291，294页分别强调了这一论点。

上，想要同时从事这三个学科的研究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办到的。即使每个方面，或每组证据，都分别交给经验丰富的专家去考查，各人也是从各自的角度来进行的。结果不会是综合性的，仅仅是一幅拼凑成的图画。只有电子计算机才有能力吸收全部材料，将它们联系起来，以客观的标准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能够把这个问题当作整体来对待。① 最后，通过贮藏输入的信息，电子计算机能够建立"资料库"。这个"资料库"至少从原则上来说应当供给研究各个时代和所有地方的历史学家使用。的确，现在已有可能设想创建规模庞大的、能够相互协调的国际"资料库"，它——终于——可以让历史学家在前辈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建立起理论和结论赖以形成的事实基础，而不用象过去(和现在)那样，不断地回到史料中去检验、补充或"修正"前辈们的理论和结论，当然，这些理论和结论总是需要修正的。总之，斯梅尔塞和戴维森对历史学提出的要求也许并不过分。他们说，"由于历史学现在能够收集到全部的有关数据资料，因此至少完全能够成为天文学或古生物学那样的一门科学，后两者都以过去为研究对象，尽管都认识到它们的资料中有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但还是得到了发展。"② 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不用担心以下说法会出现矛盾：在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援助下，历史学已经发展到了最终完成从"前科学"学科向科学学科过渡的阶段。

当然，所有这些叙述都认为历史学家的传统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且象加尔丁所说的那样，克服了根深蒂固的心理

① 乌斯季诺夫：前引书，第288页。

② 斯梅尔塞和戴维森：前引书(1968年版)，第126页。他们是专指经济史，而不是一般的历史。但是，很难找到这样的限制有什么理由。

障碍和制度障碍。① 在目前阶段，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期望会有迅速的进展。虽然最初的试验阶段已经完成，电子计算机技术作为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已经牢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要积累充分的数据资料以备电子计算机分析之用，还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有待完成。因此，期待今后十年内会取得大规模的成果，也就是说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是完全不现实的。其次，电子计算机的占机时间极为昂贵，竞争性也很强。正象施奈德所说的，如果历史学家不能充分证明他们的工作能够发挥明显有用的社会功能，其中首要的一点，是通过说明人类共同体的基本社会进程，并且加深对这些进程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完全可以肯定，他们将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胜利。② 幸运的是，这也许有可能结束某些深不可测的(至少从外人看来)、无用的"探索"。这种探索目前已经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甚至达到了可怕的程度。这里必然涉及到历史学家基本态度的根本转变，尤其是结束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在历史研究中的那种放任自流和逍遥自在的组织方式(严格地说是没有组织)。

如果今后的机械工作大量地、或大部分或全部地可以由电子计算机来操作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必定是集体性的工作，而且必定将以过去从未达到过的(而且连想都不敢想的)规模来进行计划。只要按照计划进行工作，电子计算机就会有很高的效率，无论是执行某项特殊程序的短期计划还是协同规划的长期计划都是如此。否认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将会有得有失是非常愚蠢的。过去一些最优秀和最富有创造性

---

① 《年鉴》杂志，第18卷(1963年)，第263页。

② 施奈德：前引书(1970年)，第10页。我完全赞同他的灼见。

的工作就是个人灵感得到激发的结果，也是个人精神不受压抑的结果。协调的研究可能极易造成限制，破坏首创精神。还有一个同样明显地需要认真考虑的危险，是存在着损害历史学家独创性的可能性，使他们成为由非历史学家为达到与历史学最大利益无关的目标而操作的机器中的零件。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现的这种缺陷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有把握地说，新的发展必将继续下去，甚至会加快发展速度，因为这些新的发展是当前形势的必然结果。将研究设备集中在少数主要的研究中心，加强计划性，并且切实地按照现代社会的实际状况重新组织历史学职业，所有这些发展还在进行中，还没有最后定局。虽然并不是每项发展都由于历史研究引进了电子计算机科学才开始出现的，其中许多发展早在电子计算机投入使用以前就已非常明显，但是，电子计算机毫无疑问地推动了这些发展。关于这些发展，我们需要分别加以讨论，其中首先可以考虑历史研究工作在组织方面的变化。

6.3 大学、科学院和研究所

对历史研究组织发生了比较深刻影响的最早因素之一是大学和大学教育的演变，这已在前面提到。产生于谢林和洪堡时代的教学和科研合一的神圣原则，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明显濒临崩溃。凡是受到德国式教育的影响比较深的地方——尤其是美国——这项原则都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是从社会上层的有限范围内经过严

格选拔才产生的，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被打破，尤其是新型的大规模大学的兴起和涌现，又给予这种观念以致命的打击。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它的大多数分校都是为在得到充分发展时能容纳二万五千名学生而设计的。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研究生的数量都有所增长，研究生班的规模也有迅速的发展，成了较高层次的研究指导中心。这种研究生班最初是计划用作一种研究手段，就象一个小作坊，在教授的指导下，六至十二名学生象学徒一样"为知识作出新的贡献"而辛苦地操作和生产。过去的研究工作以研究生班为中心，现在愈益倾向于由博士研究生——他们在正规学习期间一般要用头两年来准备通过"资格考试"——进行，甚至在博士后阶段进行。

这些发展所导致的结果①是多方面的，当然不仅限于历史学。②其中之一是在教授队伍中，至少在教师梯队的上层，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本科生的教学工作上抽调到研究生甚至博

---

① 可以说，我所极力想说明的那种方式只反映了美国的状况，参见谢弗：前引书(1968年)，第196—206页。对于这样的批评，我不准备反驳。不过，事实上也是所有的国家(现在几乎无一例外)都存在他们说的那种状况，即大学教育向一切有专门资格的申请人开放。这种情况已经普及到全世界。当然，各地之间有差距。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这个总趋势，至于地区之间的差距并不值得重视，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是全面讨论高等教育，而是讨论高等教育对历史学的影响。

② 既然历史学是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少数自然科学平行发展的，而且许多组织方面的问题是相互交错的，那么，E·特里斯特的那篇杰出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与此有极大的关系，尽管从形式上看他的研究范围并不包含历史学。见E·特里斯特："研究组织和经费"，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第一部，纽约，1970年版。我所依赖的历史专业方面的文献可以补充特里斯特的描述。按照特里斯特著作的观点，同时也由于我们要讨论的组织问题的总特征，我不再开列参考书目，因为逐个地叙述各国的状况会离题太远，对于说明历史学界所面临的整个问题也没有多大帮助。

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上去，把对本科生教学的大量工作——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留给“助教”（通常由博士研究生担任）去完成。第二个结果是某些大学的降格。大学越来越倾向于以高级学校或学院的形式出现。头脑最聪明的一批人逐渐离开大学，前往研究所、研究中心或科学院。在那里，他们可以潜心科学研究，不会因为承担大学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而受到干扰。简单地说，大学与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虽然没有割断，但受到了削弱。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象美国的众所周知的格言“要么发表，要么灭亡”——用来维持现状，虽然学者们要满足个人的学术冲动的真正愿望起了比较有效的作用。不过，现在的情况依然是，一名教授要指导的论文有时竟达二百篇之多（这样的事例在一些世界名牌大学里是闻所未闻的），无论他怎么努力想把全部精力投入自己的主要研究工作，实际上却根本办不到。[①] 因此，除了其他种种原因，某些专题涌现出的大批简短的论文要全体高级教授才能完成，在特定的情况下，至少也要大多数高级教授才能完成。同样，把毕生精力投入自己的巨著，却在这部巨著问世之前就溘然长逝的学者，也不乏其人。

影响到大学地位的另一项发展是科学院的建立，尤其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院的建立。这种类型的科学院既是制定政策又是承担绝大部分针对性问题研究的中央指导机构。现在，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也模仿苏联和东欧国

---

① 关于二百篇论文这个数字是根据五十年代初我通过个人关系获得的数据。近年来，情况有所改进。据《西方历史学研究》（第45页）的说法，1964年巴黎大学的一位教授正在指导六十篇论文，另外两名教授各指导三十篇论文。

家广泛建立了科学院。① 在许多方面，苏联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苏联早在1918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由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任院长。1936年，共产主义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合并，这时才设立了历史研究所。最初，历史研究所最关心的问题看来主要是组织和指导编写适合的教科书的筹备工作，组织了教科书的大量出版。②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十卷本《世界通史》所表明的那样，主持和指导教科书的编写虽然依旧是历史研究所的重要责任，但它的活动范围很快得到扩展并且成了国家最主要的研究机构。1968年，鉴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历史研究所分为世界史研究所和苏联史研究所，另外还成立了军事史研究所。历史学家还进入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所去工作，例如亚洲民族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不用说，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科学院，设立了有自己特色的专门研究所。但是，苏联科学院是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指导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以及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科学院除了行使其他职能外，主要是审批重大研究项目的计划，作为中介人与政府谈判（这一点倒很象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但职权范围要广泛得多），为自

---

① 特里斯特充分地讨论了有关科学院的一般地位。见前引书（1970年），第696，746—748页，这里无需重复。有关历史学的科研组织，我要特别感谢F·费多罗娃的论文"苏联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经费"，这篇文章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我还要感谢I·S·科恩的宝贵文章。参见赫沃斯托夫："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科学活动"，苏联科学院英文杂志《社会科学》第2卷（1970年）上刊登的M·克尔德什的论文："苏联科学院：苏联科学思想的中心"，以及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和历史学杂志"为总栏刊登的一系列通讯。关于波兰的情况，见"波兰在第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

② 赫沃斯托夫：前引书（1966年），法国《历史杂志》，第236卷，第130页。有些典型数字是西多罗夫的前引书（1955年），第403—404页提供的。

己和其他研究机构争取经费、设备和开发资本，负责检查苏联整个研究发展状况，并组织有关的委员会和会议来决定重大的研究课题和任务。①

很显然，这种由中央控制的组织形式——虽然这里应当强调指出科学院并非政府机构——对历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科学院不对研究进行垄断，②但是它的结果之一肯定会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全面规划。其次，这种组织形式的重点放在集体研究工作和整体探索上，由在一起紧密合作的历史学家来进行，并且定期向专家征询意见。这种趋势极为鲜明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研究工作组织状况的特征，虽然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形式也有可能妨碍出成果，除非对历史学家个人深入和专门的研究专著能予以支持并使之富有成果。③ 第三，虽然科学院和大学之间在人事关系方面至今还没有严格的限定，著名的历史学家可以在担任科学院院士同时又担任大学教授，作为荣誉职位，但"科学院派"作为优于大学教授的一个阶层正在出现——或者已经形成——这个总趋势已呈明朗。对于这个趋势目前还很难作出什么结论，因为许多国家的情况表明，各人的具体情况有很大

---

① 以上主要根据费多罗娃的"苏联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经费"，英译打字稿，第2页。

② 这一点以及科学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在特里斯特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强调。参见特里斯特：前引书（1970年），第746页。

③ 费多罗娃的"苏联历史科学的成就"，英文打字稿第25页（俄文原稿第23页）特别指出："倾向于汇编一般论述"仍然是当前苏联史学的"最主要的""总趋势"。与此同时，她又明确指出（第14页），1965年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专著和论文。关于波兰，见"波兰在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第374页；关于乌克兰，见德雅迪先科、帕尔霍姆邱克和萨尔维伊：前引书，第10节；关于民主德国，参见卡斯特伦："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史学"，载法国《历史杂志》，第228卷（1962年），第413页。

的差异。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某个教授可能把全部时间用于教学，与此同时，另一名教授也许把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时间从教学任务中摆脱出来，去参加研究所的集体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级别和地位的差异证明教学和研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然而，第四，从更加长远的观点来看，意义更重大的是在大学设立可以由大学教师（而且正是由他们）组成的专门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机构配备技术专家，从而具有长期的基础。这些专家并不属于大学系统的任何部门。这实际上意味着研究工作者——就象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馆员一样——同大学和大学的教学职能相脱离，也意味着研究工作愈益倾向于变成一种独立的职业。

苏联的模式不仅成为东欧各国的楷模，而且正象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也成为亚洲和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当务之急和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教育和培养素质较好的行政官员的骨干。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科学院机构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研究而是教学"。① 西欧和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有些国家——例如法国——也有很高程度的中央控制。② 与此同时，另一些国家——例如英国——的中央控制下降到几乎等于零，"'业余性质'的长期传统""一直是妨碍有组织地训练和培养历史学家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尤其突出。③ 除了法国及其国立科学研究中心以外，西欧和美国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机构不是靠国家拨给经费，而是靠私营基金会

① "印度尼西亚史学主要趋势"，打字稿，第72页。
② 谢弗等：前引书（1968年），第33，47页。
③ 同上，第140页。

提供资金(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古根海姆基金会和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不过，这些国家的历史研究尽管组织方式不同，社会环境也有差异，但发展的总进程基本上同其他地区并无二致，至少在历史研究正在成为结构性更高、个性更少的意义上没有多大差别。

除了学者个人进行的研究工作外，当前最重要的特征无疑是独立研究组织的兴起，以及研究工作集中在大学以外(但或多或少仍然与大学保持松散联系)的各个独立或半独立的研究机构中。这种研究机构现在数量很大。确实，在某些情况下，正象德国的一名历史学家所说的，也许"现在的研究所和专门委员会太多，而学者太少。"① 独立研究机构数量增加的一个首要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就是现代研究设备——尤其是电子计算机——成本极高，人们又很想把这类设备安装在某个适当的研究中心。第二个原因是现代研究工作的特征正在发生的变化，技术上的要求越来越精密，光是从便利和经费上考虑，至少就会要求"把集体性的研究组织缩小到最低限度"。② 让·格伦尼松指出，在法国正是由于1947年高等教育实验学校第六分部的建立才为"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组织机构上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便难以想象年鉴学派能够那样生机勃勃地开展研究工作，

---

① 谢弗等：前引书(1968年)，第115—116页。关于联邦德国，见第111—115页；关于法国，见《法国历史研究，1940—1965年》(1965年)，第67—182页；关于南斯拉夫，见格拉芬诺尔："南斯拉夫史学"(打字稿，第15—16页)；关于波兰，见"波兰在第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第371—399页；关于苏联，见费多罗娃前引书第4—5页提到的资料。此外，1960年到1966年间，法国大多数《历史杂志》刊载了关于"历史学研究中心"的一系列论文。

② 《法国历史研究》(1965年)，第49页。

同时也难以想象他们会产生那样具有决定性的重大影响。①现代历史研究的真正特征之一就是在研究所所长的指导和协调下由一批助理研究人员在研究机构中共同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②

海姆佩尔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有利于推动专门研究机构建立的另一个总的长期趋势。他提醒我们说，保罗·克尔早在1913年就开始抱怨相当大的一部分研究工作是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与英国同一时期的保罗·维诺格拉多夫爵士一样，他曾经倡议建立官方主办的研究中心，但同样没有成功。③他发现研究工作不仅仅是筹备写作一部著作或论文，而是一个带有连续性的任务。只有配备了固定研究人员的研究机构才能为完成这样的研究工作提供充分的条件，因为这类研究工作的完成所需要的时间、精力和设备远不是任何个人能够拥有的。研究所应当为某个研究小组，或工作小组提供机会，以便能够在一个地点进行日常的研究。④不过，海姆佩尔又指出，这需要态度的转变，也就是说，不能再把研究仅仅看作年轻的历史学家为获得自己的学术专业地位——这个专业对他来说可能适合，也可能不适合——作准备的一个阶段，而应当认为研究本身就是高尚而且有益的工作。至于历史学，按照十九世纪的精神，是把培养和训练史料考证能力列为首要任务，因此旧的态度在这个领域中占据了优势。不过，今天的

---

① 《法国历史研究》，前言第25页。

② F·布罗代尔、E·拉布鲁斯和P·勒努万："近现代史研究方向"，载法国《历史杂志》，第222卷(1959年)，第46页。

③ 席德尔：前引书(1959年)，第176,179页；关于维诺格拉多夫，见《西方历史研究》(1968年)，第140页。

④ 席德尔：前引书(1959年)，第150,153,220页。

历史研究所需要的更高级的训练——例如统计学，或经济理论的训练——已经带来了变化。[1] 以法国为例，现在通过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教育和训练就有可能"使研究成为实际的专业，而不必承受教学工作的负担。"[2]

用海姆佩尔的话来说，研究所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这个时代需要决策和积极的态度，迫切要求出成果，迫切要求展开综合性的研究，迫切要求着手解决重大的课题。因此，这个时代决不会赞同那种陈辞滥调：任何研究，无论多么深奥莫测，无论多么摸不着边际，迟早总会产生结果。[3] 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历史学家们决心采纳已经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功作出积极贡献的那种组织形式，标志着他们决心依据当前的条件去调整历史研究的方法，以满足时代的要求。目前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研究所这种组织形式不会取代只会补充那种比较陈旧的组织形式。但是，研究所将要执行旧的组织形式无法行使的职能，这种职能的重要性在教学和研究状况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任何时候都在不断地增长。研究组织和专题研究集体是完成关乎历史学未来的新目标的前提条件。随着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偏见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不断被克服，它们无疑必将在历史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6.4 历史学家个人的地位

讨论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当前的趋势和发展将会把什么样的地位留给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呢？回答也许相反，即这一趋势和发展为他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说到底，

"自由的"研究和"有组织的"研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相反，它们是相辅相成的。[④]即使组织性能最高的研究所，它的目标是否正确，它的规划是否切实可行，全都取决于负责指导这个研究所的那位历史学家个人的眼光和灵感。海姆佩尔指出，过去的许多集体研究项目之所以半途而废和失败，是因为它们依然沿袭陈旧的方式，墨守成规。[⑤]恰恰正是"制度化"给集体研究造成危险，使它本身很容易就变成了目的，整天纠缠于考虑如何保持自己的组织，除非它的负责者个人对历史的价值和能力有深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产生于他个人对史料高度的熟悉，从而看到了其中的含义，并且将尚未处理过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真正的历史。归根到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历史学家个人的眼力和对本质的掌握能力，尤其是历史学家个人的智力。

集体的组织、研究中心和新的机械技术无疑已经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强调指出，组织上和技术上的革新虽然是对历史学家的非常有益的补充，但决不能代替历史学家个人的判断。电子计算机能够避免——甚至能够发现——机械的错误，但它不会思考，也不可能提高历史学家自己的学术质量。统计学和统计方法也不是只有好的一面。我们已经看到，每一个研究项目进行得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负责组织这个研究项目的个人。斯梅尔塞和戴维森提

---

① 席德尔：前引书(1959年)，第218，220—221页。

② 谢弗等：前引书(1968年)，第51页。

③ 席德尔：前引书(1959年)，第219页。

④ «法国历史研究»(1965年)，第23页。

⑤ 例如海姆佩尔对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所的评论，见席德尔：前引书(1959年)，第171—172页。

醒我们说，研究结果总是取决于规划设计者的思维质量。只有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才可能熟谙所要研究的特殊对象及其问题所在。例如，历史学家只有知道了“哪些过时的结论所依据的统计资料中是不充分的”，才有可能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得到了回答，有关数据资料也作了处理并且可以使用，这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释的功劳——或责任——完全属于他个人，决不属于电子计算机。”①艾德洛特说，研究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的和机械的问题，而是智力和分析能力”，研究工作需要的基本素质“不是掌握研究方法的熟练程度”，而是“逻辑性和想象能力”。②这些话说来也许是老生常谈，但从当前过分强调技术和组织作用的角度来看，最好还是要弄明白，历史学的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历史学家本身的个人素质。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尽人类最大的可能性确保历史学有明确的方向去吸引它应当得到的那一部分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不久以前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前历史研究的发展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让历史学家不要直接考证保存下来的有关过去的档案，而是强调技术能力，用熟练的技术手段去处理已知的数据资料，虽然目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我曾经斗胆写过这样一句话：“不能在原始资料的新溪流中定期更新自己的历史学家很快会不成其为历史学家。”③历史学家离原始资料越远，就越容易被自己创立的理论和对过去作出的描述引入歧途。在他作的描述中，被记载的事实很容易变成被

① 斯梅尔塞和戴维森：前引书(1968年)，第110,112,116,126页。

② 罗尼和格雷厄姆：前引书(1969年)，第21页。

③ “历史学家及其档案”，英国《今日历史》，第4卷(1954年)，第412页。

任意耍弄的小玩艺，或者很容易变成他按自己制造的模式巧妙安排的砖块。其次，研究所组织集体撰写的历史著作把各个撰写人的精力集中在某个范围有限的章节里，很难想象这类历史著作不会缩小历史学家的思想视野，不会扼杀智慧火花的闪现。同时还很难想象他们能够突然认识到只有任凭自己的想象在历史中驰骋才可能认识到不容置疑的相互关系。

以上的这些看法中没有一项是，也决不意味着批评当前历史研究中组织更加严密的趋势。这里只不过想提出一个建议：当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已经做到了——譬如我个人就相信，为保证历史研究工作能够从一切科学研究的进步所力图依赖的人力和资源的相互结合以及合理配置和布局中获利，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历史学家个人的地位依然有保障，历史学家个人作出的贡献也依然非常重要。总而言之，正是天才的个人提出了相对论。我们没有理由设想历史学——或任何其他科学研究工作——可以不需要个别天才才可能提供的思想火花。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步依然受到埃里克·特里斯特所说的那种“学术个人主义机能失调顽固症”的阻碍，① 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然而，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的状况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创造性研究的甘泉枯竭，那么，在保证采取必要的措施纠正这种状态时，决不应当损害或削弱个人的学术自由。

由于今天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那些主要问题范围很广，也比较复杂，历史学家个人研究的作用必然会下降。大多数

---

① 特里斯特：前引书(1970年)，第786页。

重大研究项目规模都很大，靠某一个人的头脑绝对无法完成。成立专题研究小组进行协同研究的时代已经来到，但这也有可能剥夺历史学家的机会，而不是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除非能够为天才的个人留有余地。盖德拉说过，历史学既需要砌砖工人和石匠，也需要设计师，任何研究组织和知识专长的总和都代替不了它们。早年那种欢欣愉快和无忧无虑的个人主义已成了过去的事情。历史学家作为个人既要保持自己的学术完整性和从前辈手中继承下来的职业水平，同时又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状况。取消研究组织并不等于在不同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是止步不前，甚至是倒退。从 1950 年到 1955 年历史学在所有领域中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来看，这样的止步不前或倒退纯粹是自暴自弃，简直无法想象。

7 结语：当前趋势和问题

回顾前面各章的叙述，任何人都会感到，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它不仅明显地表现在历史研究的进展速度上，而且还表现在历史学各方面所经历的十分明显的纵深发展上，尤其是同过去五十年的停滞——当然，这是指历史学思想观念上的停滞而言，而不是指以惊人速度增加的成果——相比，这个进步就更为明显。十五年前，我曾试图概括历史学的研究状况。当时，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历史科学深深地陷入了十九世纪历史学的沉重车轮碾压出来的深辙之中。① 我所作的论述很难越出西欧这个极为有限的范围。同时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却可以声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处在完全不同的状况下，有光辉的前景。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同西方历史学一样有了惊人的进展，至少在研究技术和概念方面有了提高。这个结论也是不容争议的。1955年以来，历史研究取得的全面进步完全可以描述为革命性的进步，至少可以说过去几乎完全被忽视的亚洲史和非洲史方面的进步是革命性的进步。

在这个比1940年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觉地依赖科

学的世界上，历史研究之所以会出现革命性的进步，根本原因是科学的宇宙观对新一代历史学家产生的影响。人类——作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历史著作的主体（这样说也许是错误的吧？）——只不过是宇宙物种中的一部分。从康德时代以来为人们公认的所谓人类和物质宇宙两分周天的知识体系，对现代人来说——譬如说，对于1940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完全是老掉了牙的老古董，已经过时了。把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与（譬如）鱼类这个物种的历史当作本质上根本不同的历史来对待，所依据是值得怀疑的拟人说。确实，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偏见暂时放在一边，那么，就有可能论证，在若干个世纪里人类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并没有其他一些动物，例如虱子或老鼠所起的作用那么显著。② 从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历史和生物都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历史时间完全是生物时间的延续，或者说是"极点"。从地质学家的观点来看，也必然会持类似的论点，也就是说，地球的形成，地球的内部构造和气候的变化等等，全都影响着——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则是控制着——有机体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③ 因此，诸如古气候学等科学现在变得更加重要了，④ 因为人们认识到

---

① 见笔者前引书（1955年），特别是第1—30页，以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56年1月6日刊载的文章。

② 例如H·津泽：《老鼠、虱子和历史》(Zinsser, Rats,Lice and History)，伦敦，1935年版。在一般情况下，历史学家现在可以飞上三万英尺的高空，在空中观察人类在地球表面上留下的痕迹。他们有时甚至怀疑到人类对物质环境起的作用无论从持久性还是从深刻性恐怕都无法同珊瑚虫相比。

③ C·D·达林顿："历史学与生物学"，载M·巴拉德编：《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新动向》，伦敦，1970年版，第147—160页。

④ 见1962年在阿斯彭（科罗拉多州）召开的全国科学院古生物学学部会议上的报告。参见勒·罗瓦·拉杜里载于《年鉴》杂志第43卷（1963年）上的文章，第764—766页。

（举一个常用的例子来说）北方人的航行光用“历史证据”（例如莱夫·艾里克森的中世纪北欧传记）是解释不了的，还必须同气候的变化联系起来。① 实际上，人类历史学与科学之间——例如，与生物学之间——所开拓的整个新领域是至今几乎尚未开始探索过的新领域。

另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无疑受到现代世界上流行的科学思想体系的深刻影响。新一代历史学家具备更加完整的基本科学的基础，他们与老一辈历史学家完全不同，愿意用科学的范畴进行思维。正是这种态度和方式的变化，而不是某些具体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应用，才产生了新的学术环境和气氛。这种环境和气氛的变化基本上就是历史学家，或者说，更切合事实的说法是指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准备从科学的角度对历史事实提出问题。他们已经判定历史资料象（例如）解剖学资料一样可以用于科学研究。M·M·波斯坦在谈到叙事类比法时指出，历史学家已经作出了牛顿在著名的那一天躺在虚构的苹果树下作出的那种选择。② 历史学家本来可以对自己提出一个这样明显的问题：为什么正是那只苹果偏偏选择了那个不可重复的瞬间落在他那只独特的头上呢？这是历史学家会按常规提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向自己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苹果为什么会落下来并且由此诞生了万有引力理论？如果说历史学界还没有诞生一个牛顿，也没有创造出一个万有引力理论的话，

---

① 与气候的关系同样适用于研究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著名问题。参见G·德·比尔：《阿尔卑斯山与大象》（G.De Beer, Alps and Elephants,伦敦，1955年版），第104—107页讨论了有关气候的证据。

② M·M·波斯坦：前引书（1971年），第13页。

但似乎也终于达到了能够产生重大飞跃的阶段——其他一些同样不够精确的科学，例如植物学、古生物学或动物学，早已达到了能够产生飞跃的阶段——即从收集资料和描述资料，到推出结论，并且形成科学的论点。

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这种设想的理由前面已作了详细的说明。这里毋庸赘述。可以肯定地说，历史学界现在已经重新振奋，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潜在力量。这种感觉与二十五年前波威克所批评的那种怀疑和不安感完全相反。① 然而，历史学已经达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意味着它一定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误入歧途。如果说，本书的明确目标是要指出当代历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并加以评价，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承认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保守主义。也许，有些批评家会说，这正是他们最关注的弊病。目前，抵制历史研究变革的力量同推动变革的力量相比较，至少是一样强大，甚至可能更强大一些。古语说得对，老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象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

当然，这并不是想说历史学——甚至那种最传统类型的

---

① F·M·波威克：前引书(1955年)，第229，235—236页。

历史学——是停滞不前的。恰恰相反，“细小的改进”如同涓涓细流从未停止过，而历史学家从来就习惯于进行这类细小的改进。[1] 人们可以看到，五十年前历史学家使用的术语没有一个不在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同时被修正、改进、提高，甚至发生根本的变化（历史研究中大多数的修正、改进、提高和变化确实都是这样产生的）。[2] 历史研究主题的扩大也非常显著。关于这个问题有些（当然不是全部）在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我没有误解本书的概述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话，那么，改进、变化以及研究重点的转移都不是关键所在。历史研究的当前趋势已经证明，我根本不可能就（例如）英国议会史的各种解释或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各种解释中发生的变化作一番提纲挈领的概括。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有些新研究主题有可能造成研究方法和态度的急剧变化，但又可以肯定，并非全部如此。我之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去讨论（例如）非洲—美洲史这个当前最时髦的研究领域，倒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个研究领域不重要——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关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美国国内历史的大部分著作，包括为数不少的关于黑人奴隶制这个“特殊制度”的著作，正是由于忽视了非洲—美洲的观点才产生了不少错误——而是因为在这种非洲—美洲史中除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些概念和方法外（例如对口述传统应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概念

① 关于“细小的改进”这个实例，请参见A·马尔威克：前引书（1970年），第181—182页。

② 这一阶段的典型是《历史》杂志在许多年内定期刊登的以“历史的颠倒”为栏目的一系列文章。这个栏目的文章从1917年开始，到1955年才销声匿迹，原因倒不是这份杂志坚信再也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颠倒了，而是因为它往往把颠倒了的论点又颠来倒去，实属荒唐。

和方法了。[1]这个想法是否正确，敬请指教。

既然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今日历史研究区别于昨日或前日的历史研究的那些趋势，因此这里显然没有必要详细讨论那些从本身内容来讲虽然非常杰出但无意在研究方法和概念上创新，甚至有时还对创新横加责难的大量著作。关于思想史的发展，我不准备进行讨论。五十年代以来，这种历史在有些国家风行，但我认为它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为它对过去十年至十五年内历史研究中充满生命力的新事物的出现并没有起到什么促进作用。[2]这类历史著作一旦问世，自然会在本身的推动下继续存在下去，就象旧式的政治史和历史人物传记会不断产生一样。不过，整个说来，我们完全有把握说这股潮流在近十五年中已经转到了它的反面。巴特菲尔德所说的历史学是"游离于思想活动的领域"，这个观念已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抛弃。[3]尽管如此，这里仍然有必要指出，迄今绝大多数的历史著作还处在传统态度的控制之下。本书所叙

---

① 关于非洲—美洲史的一篇非常简要的导论是A·康韦的《美国黑人的历史》(A. Conway, The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伦敦，1968年版。有关这个领域的论著已大批出版。

② 思想史的概念是极为含糊的。H·J·舍普斯在《思想史的现状和未来》(H. J. Schoeps, Was ist und Was will die Geistesgeschichte，哥廷根，1959年版，第10—12页)一书中承认，知识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只要参考一下斯特龙贝格在《1789年以来的欧洲思想史》(Stromberg,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789)一书中开列的书目，就可以看到这个领域实际上是无所不包的。不过，事实证明思想史是发源于伯克哈特、赫伊津加和迈纳克。据我所知，目前在这个领域中最杰出的，影响最大的首推H·斯图尔特·休斯。他的著作《意识和社会：欧洲社会思想的方向性变化，1890—1930年》(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纽约，1958年版)堪称思想史领域中的典范。

述的那些新趋势是否能够取得必然的胜利，还没有得到保证。目前，这些新趋势只表达了——也许恐怕只不过是一种期望——少数历史学家的心愿。其次，有些历史学家对这些新趋势表示欢迎并且希望这些新趋势的发展能够得到巩固，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只不过是把这些新趋势看作对传统历史学的有益的技术补充，将它同传统历史学结合起来。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新趋势将会取代已经被驳倒的历史哲学和过时的方法论。④

因此，在我们作出结论之前，有必要简要地思考一下从前科学的历史学向科学的历史学"突破"——这种"突破"在现在看来还仅仅是一种可能——将会面临哪些主要障碍。首先，最主要的是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有关这种障碍前面已经提到。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本身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由于旧观念和旧立场作为被继承的知识在历史教学中已经定型(至少在一些比较古老的大学中是这样)，并被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而使这种心理障碍成为最严重的障碍。任何变革的要求被斥之为"妄图把历史学弄得面目全非"而被置之不理。既然对当前的历史学中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和非科学性作过考虑，那么，为什么又把这

③ 巴特菲尔德曾经写道："没有任何一种历史会比仅仅从文字上研究思想而获得的那种历史更加错误百出"。他还补充说，按照这种历史的说法，"似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思想才刚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巴特菲尔德：《历史与人际关系》(Butterfield,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1951 年版，第76，84 页。

④ 例如，马尔威克就持这种态度，见马尔威克：前引书（1970年），第198页。

种要求变革的愿望当作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排斥呢？这个问题是无法解释的。[1]毫无疑问，波威克唤起的移情作用至今还有强大的影响。他说："我之所以如此执着和入迷，难道仅仅是因为我能够寻找到菲尔尼斯僧侣们真正使用过的牧场吗？"它使许多历史学家把历史看作对过去的召唤，看作"与往事神交的博物馆。"[2]这种历史观念虽然不是作为理性实践，而是作为唤起对过去的神往，但由于民众的需要而得到巩固和强化。历史使故事增辉添彩，并且进行着道德教诲，依然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欢迎，特别是当某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民众十分愿意听取这种道德教诲的时候。引诱历史学家去迎合民众的这种要求的力量是强大的，尤其是当他们这样做在学术上并不需要付出过多精力的时候。这类历史著作不是杰出的成就，不仅有塞西尔·伍德姆史密斯的《刨根问底》和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那样一些半通俗历史著作，还有——只需要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象史蒂文·朗西曼爵士那样一些著名的职业历史学家所写的叙事式历史著作。[3]这些历史著作的出版，充分说明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充满智慧的历史著作在受过教育的读者心目中仍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

① 马尔威克：前引书（1970年），第104，179页。他的忠实信徒之一，英国的G·基特森·克拉克充分说明了传统历史学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同时，他也承认〔见《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形成》（Kitson Clark, 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伦敦，1962年版，第17页〕传统史学把画面割裂开了，"从而无法看到它的整体"，结果形成了"一种历史唯名论，其中只有无数的偶然性而没有普遍性。"

② 波威克：前引书（1955年），第182—183页。

③ 当然我是指他的名著三卷本的《十字军东征史》（Steven Runciman, History of the Crusades），剑桥，1951—1954年版。对于这部著作我已经给予最高的评价。

对于历史学家仍然坚持写作那些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如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早已不加问津，本质上属于叙事式的并且运用文学技巧写作的著作，恐怕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科学地对待历史学的新态度无法形成的另一个因素是历史学家没有能力摆脱自已的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科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取得了进步。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和国家，就有多少种历史。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历史学曾经以神话的形式诞生于人世。历史学与神话、尤其是与民族神话的联系依然是一个很有力的因素。中国有位历史学家说过“历史写作多多少少是一种政治行为，这个观点已经受到普遍承认。”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也说，“我们教授和写作的历史是那种适合于我们社会组织的历史”，“如果这种历史同时又最适用于保持现存的政治制度，那就更无话可说了。”① 如果实际情况真是如同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么许多人会想，历史学的未来将是暗淡的。不过，正象我们多次有机会看到的，一切国家的历史研究全都集中在本国的历史上。不用说，这些本国的历史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表现本民族的神话。“建立得到全世界公认的历史”并不象某些反美宣传所说的是北美特有的古怪心理。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往往不自觉地在为本国的现状辩护，实际上，说穿了就是被自已生存的那个环境所愚弄，从而成为牺牲品。历史学仍然是产生民间传说最适宜的故乡。对历史学的未来表示关心的任何人

---

① 见《中国季刊》第23期（1965年），第73页。参见A·费伊尔沃克前引书（1968年）和H·巴特菲尔德：《英国人及其历史》（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剑桥，1944年版，第1页。

对这种状况只会感到深切的不安。除非历史学能够象天文学和化学经历过的那样从神话中摆脱出来，除非历史学能够一劳永逸地与自己的神话渊源断绝关系，就象天文学与星相学决裂以及化学与点金术决裂那样，否则，历史学很难有机会摆脱过去一直囚禁着它的恶性循环。

当前历史学的发展从这个方面来看，很难说是令人鼓舞的。贝塔里达曾经指出，“这些发展既指出了前进道路上的死胡同和歧路，也指明了成功之路。”① 然而，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贝塔里达所指出的这些，而是上文已简单提到的那种来自官方的压力，这些压力完全可能被用来保障历史学能够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得到承认。当然，这些压力在任何国家都始终存在着。的确，我们可以推测，作为政府主持编订的《关于1914年战争起源的英国档案文件集》的主编之一哈罗德·坦佩利实际上明明知道他自己在1930年所说的深切遗憾就是指由政府来主持历史研究有可能使历史学受到损害。② 然而，越来越尖端的新技术已经投入使用，历史研究的结合趋于紧密并且由政府来主持，为此产生了对经费的要求以解决机器和人力上不断增加的支出，从而使历史学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需要对政府的控制作出让步。用特里斯特的话来说，“社会科学”——其中，他特别指出了历史学——“已经负起了政治上的责任。”③ 很难期望政府（或这方面的私人基

① 贝塔里达："历史学家和对整体的欲望"，载《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64年)，第180页。

② H·W·V·坦佩利：《探索与现代史》(H. W.V. Temperley, Research and Modern History)，伦敦，1930年版，第4页。

③ 特里斯特：前引书（1970年)，第799页。关于历史学的地位，参见第798页。

金会)会选中那些被认为有悖于本国利益的研究项目，对于那些也许不能明显促进本国利益的研究项目也不可能拨给经费。巴特菲尔德用充分的事实论证了"官方历史学"的"潜在危险性"。[1]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今天几乎比比皆是，尤其是还存在那种(用巴特菲尔德的话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无需严厉的审查制度"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可能"用款款酥软的魔力或用制作精巧的令人感到舒适的链条将历史学"束缚起来。[2]

当前形势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危险。这些危险虽说更加琐碎，但不可掉以轻心。其中的危险之一，就是过分热衷于为技术而技术，特别是过分迷恋电子计算机科学的非常吸引人的潜在能力。虽然艾德洛特等著名计量历史学家对这种危险曾经提出过警告。贬低和抹煞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是愚蠢的，我当然不会有这个意思。科学的进展大都依赖，而且往往不得不等待技术上的进步(例如植物学的进步有赖于复式显微镜的发明)。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历史学是个例外。恰恰相反，电子计算机只要使用得当，就有可能象前面指出的那样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积累性的科学，从而摆脱过去那种被伪哲学和有缺陷的方法论所拖累而陷入的恶性循环。不过，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数量分析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认识的手段"。[3]决不允许——就象某个时期是否允许使用书面史料那样——用它来主宰历史学研究的过程，并由此来决定历史学

① H·巴特菲尔德：前引书(1951年)，第182—224页。

② 同上，第198页。

③ 杰奥皮克·多布罗夫等人：《处理历史学信息的计量方法和机械方法》(Deopik, Dobrov et al., Quantitative and Machine Methods of Processing Information)，莫斯科，1970年出版。

研究的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写到的："掌握了韵律技巧不一定能创造出伟大的诗篇"，但是，仅仅靠"掌握技术也不可能创造伟大的历史学"。①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危险是仅仅因为机械方法容易操纵就把历史学研究集中到一些并不重要的主题上去。②如果这样做的话，新技术的利用不但不能把历史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反而会加深历史学实际上已经备受折磨的那种疾病：即"迂腐地追逐毫无意义的东西"。③只要看看世界各大学的历史学论文题目，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目前，对这种状况的不满已经有所表现，例如，有人认为"新经济史学"根本缺乏限定性和明确性，只不过是"容忍对那些早已被埋葬掉了的问题进行没完没了的讨论"。④

这些实际上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真正的危险还在于，正是因为积累了只有利用现代技术和借助于交流的增强才有可能积累的知识，历史学现在可以进入"亚历山大时代"，也就是说，对历史学所抱的最高希望是成为百科全书式的系统化。安德烈·马尔罗曾经提醒我们，在世界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能够同时研究有关过去的全部档案、人类的制造物、工艺品、考古文物和文件资料。⑤由此开辟的前景应当是令人鼓舞和令人振奋的，但同时又可以使人气馁。历史学家怎样才能掌握住范围如此广泛、而且正在不断扩大的知识呢？如果象贝塔里达

① C·道森：前引书（1957年），第293页。

② J·M·普赖斯："当前历史学中的计量工作"，载《历史与理论》杂志，第9卷（1969年），第13页。

③ 波威克曾经为这种疾病感到惋惜，见F·M·波威克：前引书（1955年），第192页。

④ D·C·诺斯："经济史现状"，载《美国历史评论》，第55卷增刊（1965年），第86—89页。

⑤ 马尔罗的这段话转引自B·马兹利什：前引书（1966年），第450页。

所说的那样走传统的老路子，即一丝不苟地、过分细致地探索独特性和个性，那充其量只能够写出一些专著来。这样一来，不但不可能从分散的资料中推导出“规律”或坚实可信的结论，甚至连全面的整体观都无法形成。① 我们前面提到的对“历史哲学”的那种兴趣几乎在全面地衰退，这也许恰好就是一个先兆罢。躲避到“微观历史学”中去寻找安全也许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微观历史学”经过有意识的和辛勤的劳动总有一天也会到达这样一个阶段，即它作出的贡献不再仅仅是那种建立在薄弱基础上的冠冕堂皇的结论。② 就连波斯坦那样一些信心十足的“微观历史”论的主将，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微观历史学的不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宏观历史”结构，就不可能将“微观历史”现象“纳入范围庞大的论述中去”。③ 尽管如此，数量的问题依然在纠缠着历史学家。小型研究成果的积累数量日益增加，到现在实际上已变得无法掌握，它与历史学对表现整体的要求——这项要求是历史学家呼吁进行严肃思考所依据的全部基础——之间的距离已经十分明显，而且看来还在不断扩大。正是这个数量上的问题，再加上客观性的问题，使今天的历史学家进退维谷。

大多数历史学家却而对这两个问题洋洋得意，否认这一点是无用的。历史学是一门正在兴旺发达的职业，它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稳定上升的收入，而且正在吸引着人数可观的学

---

① 贝塔里达：前引书(1964年)，第182页。

② 在专门讨论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学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参见上文。

③ M·M·波斯坦：《西欧经济史，1945—1964年》，伦敦，1967年版，第5页。

生（虽然数量与质量之间也许不太相称）。在广大读者当中，历史著作仍然占有一大批追随者，这些读者几乎和作者一样乐于参加一些空洞的争论——譬如说关于希特勒的性格和政策；关于查理曼大帝的加冕仪式，以及关于乡绅兴起的争论，而这些争论又使历史学家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撰稿人。这些读者把罗伯特·默顿这样一些曾经对他们提出过批评的社会科学家看作是心怀叵测、行为不端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想对这些批评作出回答，就用“你也一样”这种人们熟悉的方式来反驳，而不仅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且努力加以改正。除了少数喜欢追忆祖先的人声称修昔底德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很象把一切政治智慧都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那种政治科学家，他们对待历史学的态度是认为历史学是渐渐进化的，对于历史学需要革命性变革的任何建议，他们不是怒气冲冲地加以否定，而是加以嘲弄。不过，他们也许是正确的。上帝总是站在多数人那边。这些保守主义者，至少那些相信历史学在前进的道路上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的人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他们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的营垒里都有自己忠实的追随者。正如为“目的连续性”进行辩护的一篇最新的文章所写的那样，“历史学研究尽管遭遇了许多挫折，也干了大量蠢事，但是，总的说来，已经在向更高级的技术和更成熟的概念迈进。”① 在他们看来，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如果在两千多年以后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将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然而，他们却显然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对于历史学如果不扭转方向就有可能进入一片荒芜之地，

① 马尔威克：前引书（1970年），第23页。

他们也毫不关心。

若有人想作一个总结，那么，他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仍然是老生常谈，那就是今天的历史学既面临着广阔的前景，同时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由于本书集中叙述了历史研究的当前趋势所开拓的潜在可能性和新的观点，因此，在得出结论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对危险性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这些危险性，任何善于思考的历史学家都不会一无所知。也许正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缘故，历史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科学更加肩荷过去的重负，从而蒙受着苦难。历史学是沉入水中淹死在河底呢，还是胜利地浮出水面，登上彼岸，获得新生，重新充满着活力，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只有权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并且根据我们自己特有的气质，得出乐观的或悲观的结论。在这篇很长的叙述即将结束之时，我个人倾向于作出乐观主义的结论。虽然我认为相互对立的双方力量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确实，这种力量的平衡，让人感到了宽慰和自得。马修·阿诺德说："所谓历史就是充满着谬误的浩淼的密西西比河。"同许多个世纪以来一样，它永不停止地继续在宽阔的两岸之间流淌，灌溉和滋润着发育不全但却光彩夺目的神话和传说。我们已经看到，这就是它原来的目标。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历史学最终将会脱离它神话的渊源，那就完全错了。不过，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历史学家已经获得了将他们的研究转变为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这也确实是事实。在二十世纪，人们仍很难理解对科学的历史学的追求和探索，就象在十九世纪不能理解巴克尔、孔德和斯宾塞一样。不过，是否有可能理解，只有试一试，我们才能知道。只凭自己的想象便否认这种可能性的人，就象是海姆佩尔笔

下批评的那些历史学家，他们从历史哲学有错误的结论中不是推导出历史哲学应当改进和提高的结论，而是推导出不可能有历史哲学的结论。[1]目前，我们只能说，与巴克尔、孔德和斯宾塞的时代相比，把历史学提高到一门科学的地位的可能性大多了，对科学的历史学的意义的理解成熟多了，所使用的技术也先进多了。如果历史学家作出了选择，对这些新技术不闻不问，那么，责任在历史学家自己的身上。

遗憾的是，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仅仅是他们的。社会科学当前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时间元，缺乏深度，这种深度不可能产生于对社会作静止的研究。只有研究社会在连续不断的变化中呈现自己的各种力量的动态格局，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深度。[2]马克·布洛赫敏锐地看到这是历史学家的机会和挑战。如果没有历史学——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简单地从现在的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因为现在毕竟只是过去投在未来之上的阴影），而不是从人类全部时代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社会科学就不完整。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不过，这必须是富有科学精神并且具有明确的社会目标的历史学。当前的这些发展已经将这样的历史学交到了我们的手中，也就是说，青年一代的历史学家应当去掌握它，并且充分利用它。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仅需要从资本设备的投资中尽快获得利润，而且还要尽快地从

---

① H·海姆佩尔："德国历史研究的组织形式"，载席德尔编：《〈历史杂志〉创刊一百年纪念论文集》（《历史杂志》第189卷增刊，1959年，第178页）。

② S·M·利普塞特的话，引自《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5卷（1960年），第283—285页。

花费大批经费培养人力的投资中获得利润的社会里，这种人力投资，期望着社会科学家构筑起有效的理论体系。运用这个理论体系，我们能够驾驭自然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改造我们周围的环境。对于这个要求，历史学家是责无旁贷的。他们在短期内恐怕还可以舒舒服服地继续走老路，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历史学家将要依据他在与兄弟学科的合作中以及在利用有关过去的知识为构筑将来方面所作的贡献大小来接受评判，而历史学则将与之同时接受评判。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作者＝
页数＝３４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